〔法〕史式徽著

江南传教史

第一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021 6354 0

江南传教史

第一卷

〔法〕史式徽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Changhaï, Chine, 1914.

根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 1914 年版本译出

江南传教史

第一卷

〔法〕史式徽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75,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3188·46 定价(七)：1.30 元

印数：0,001—5,300 册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叙述了耶稣会恢复以后派遣传教士来我国江南地区(即现在的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一些活动情况。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它是天主教内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曾参与西欧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遭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抨击，在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中曾被取缔。1773 年教宗克里门十四世一度解散该会，1814 年教宗庇护七世始予恢复。

作者史式徽(1866—1937 年)是法籍耶稣会会士、文学博士、教会史教授，1909 年来华后一直在上海徐家汇神学院、大小修院以及震旦大学任教，并编著教会内部书报。本书是他的早期著作之一，系根据另一法籍耶稣会会士高龙鞏(1833—1905 年)的同名著作改写而成。本书原分三卷，写的是 1839年至 1900 年江南教会的历史。卷下分为部分，以先后担任主教的罗伯济、赵方济、徐类思、年文思、郎怀仁的任期作为划分阶段的根据。前两卷(1839—1878 年)经主教批准于1914 年由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出版。至于第三卷 (1878—1900 年)，虽经预告，但不知何故终未出书。作者曾另著一本《江南传教区简编(1840—1922 年)》("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小册于于 1923 年出版，为了补缺，兹摘译该书第五章《教区的进展(1878 —1923 年)》作为本书附录。

作者编写本书时，参考了罗马、巴黎、上海等地的教会档

案，英国、法国外交文件和法国驻华使馆、法国驻沪领事馆档案以及外文书刊资料等，资料较为丰富，其中有的是国内难得见到的，有的也很少有人引用过。作者在叙述耶稣会恢复后重新派遣会士来华的传教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与葡萄牙的保教权之争；教区内部不同修会之争；与新教（耶稣教）教会的矛盾；违反与我国订立的条约规定，潜入内地购置地产；插手我国教友和非教徒的人民内部矛盾，借口“教案”，勒索赔款，迫害群众，激化两方矛盾；以及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教会日益发展等等。同时他还在叙述“教区概况”时，谈到了地方政治，反映当时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因而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国近代史、江南地方史提供了某些资料，可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但本书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观点是反动的。书中美化英法帝国主义，对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并无只字半句谴责；把第二次鸦片战争，说成是我国得罪了英法两国所引起的，竟然称英法联军北上的侵略战争是“光荣的北京战役”。又如鼓吹以舰队作后盾解决“教案”，把无视外交准则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持枪恫吓、开枪伤人因而酿成的天津教案说成是天津“惨案”，并支持帝国主义借口入侵；而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等我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则诬蔑为“盗贼”暴乱等。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作者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读者无疑会注意及此，并予批判的。

正因为这样，本书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暴露：第一批、第二批传教士来华是经法国皇后批准，与法国外交人员同乘一艘军舰而来；他们既是外交人员的翻译，“亲密的合作者”，又是英法军队的翻

译；他们为英法侵略军献计策划："要谨防中国方面的诡计"，"劝告他们切勿以不足的武力直趋大沽"；又为法国政府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至于他们对法国商业所作的努力，则认为"早就该大受赞扬的了"。他们借口"教案"干涉我国内政，带领法军要挟地方官，勒索赔款，镇压群众，扩大他们条约外的权利。用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话来说，他们"是法国将来在这里(指我国——引者)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具"，他们"必将为法国作出重大贡献"。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伯爵清楚地说过："教会正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支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利用这些传教士作为侵略工具的面目。

本书对传教士津津乐道的所谓在中国的善举——育婴事业的记述，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真相。传教士们并不是"育婴"，面是借口育婴，追求付洗和作终傅的数字，在国外捐募大量款项，而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

因此，本书对近代史、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历史性的资料，同时也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本质提供了一部反面材料。

本书由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出，参加翻译的有丁宗杰、叶廉青、唐致中、梅乘骐、蒋卫琳、蒋润生，由丁宗杰统校。关于其中先后来我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的姓名，均按《耶稣会会士录(1842—1908 年)》(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 1908 年印行)一书所载中文姓名译出；教会职衔、教会组织和教会机构的名称，则根据德礼贤所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一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法国驻沪领事的中文姓名，则根据张志瀛所编《法领政略表》(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 1912 年印行)，特此一并说明。

原　序

很久以前我就有编写这部著作的打算。1872 年 8 月，在郎怀仁主教主持的教务重要会议上，决定把江南教区已在进行的一切科学与文化的规划，一一付诸实施。费赖之神父接受了编著《江南新教区① 通史》的任务。② 费神父曾因著《1869年的江南教区》，并在《天主教各教区》及《中国新教区书信集》中发表过许多通信而早已出了名。费神父按他一贯认真的态度和热爱耶稣会的深情，即着手开始工作。数年之内，他的卡片箱里已堆满了无数有关资料和文件；但不幸的是，他在动笔编写之前，于 1891 年 5 月 17 日去世了；在这之前数天，即 5 月 12 日，这些宝贵史料被转移至芜湖夏鸣雷神父处，结果，这些史料因该处住院火灾而被烧毁。费神父却不知道，这场大火对未来编写教史者来说是一场多么可怕的灾难，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③

高龙鞏神父继承了费赖之神父的工作。数年之内，他搜集了旧江南教区和新江南教区的历史资料；1896 年，高神父的手稿已编写就绪并准备付印，可是教区的书刊审查员阻止排版，规定只准按原稿石印，并限教会内部传阅。高龙鞏神父曾披阅了很多参考资料，我证明他的手稿是很齐全的，可以说没有遗漏一件重要的史料。可惜的是，高神父对史学工作认识不足，核实不够，引证不确，又过度地滥用他本人的“私人回忆”，加上他这种善良人所有的活跃的想象力，更造成了历史

的失真，由此产生了过多的重复和冗长的繁文。虽然如此，他的著作对于我还是大有裨益的，我正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谢才好；我对他找的资料查根核源，多次纠正他误用的引文；并从他没有参阅过的各地档案里大量核实和补足了史料的出处；同时，也删去了他近三分之二的冗文。他确是我的好向导；跟着他的踪迹，我能抓住并发现许多线索。否则，我对有些事情是难以揣测和想象的。他在"私人回忆"中记述的凡是他亲身经历或亲自证实的事，在本书中我仍多次引用，并且给读者作了一个小注。

在1907年至1908年，当耶稣会法国省省会长尊敬的德耀章神父来江南巡视教务时，许多传教士要求他叫人重新编写并刊印一部教区传教史，省会长就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也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使命。1908年夏天，我开始了这项工作，为编写这部传教史，我侥幸地作了一次饶有兴趣的旅行，去各有关的总铎区巡回观察。从1909年9月至1910年8月，我去了北京法国公使馆、上海法国总领事馆、徐家汇本会会院和各总铎区，查阅了资料丰富的档案，找到了许多有关史料的原始材料；我也走遍了书中叙述到的各个事件发生的现场，又从活着的证人或当事人的口中，搜集到许多宝贵的详细情节。在巴黎外交部，在罗马传信部，在欧洲本会各会院所有汇集的文件资料室里，我终于欣然满载而归。在这里，我谨向那些对我热情接待、仁惠慷慨地为我搜寻资料提供极大便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

① 江南教区在1840年以前称旧教区，1840年以后称新教区。——译者

② 见本书，第2卷第207页。

③ 见高龙鞶：《赉毓之神父传略》，第3卷第1252页起。

这部历史性的作品，我拟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案：我先叙述各位主教任职期间的教区概况，各总铎区存在的共同问题或对整个教区有普遍影响的事件；其次叙述教区内个别地区的纯地方性的事件，我统称其为“教务细节”。我并不讳言这个方案是有缺陷的：首先是重复，尤其在分头叙述时，难免出现那种不切实际的分裂现象。但是我却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案，既要把全部重要的教区史概括进去，又要不因行文太长而使读者望而生畏。

本书中的汉字译音，是用晁德莅神父的拼音法，这已为《汉学杂纂》和教区刊物所采用。官话发音，我在书中已注明，有关中国东南地区的人名、地名，我在括号内再注以上海译音。这是那些地区的传教士们在通信中经常遇到的。至于上海及其附近的几处主要机构，那我就只注本地方音，因这已是彼此惯用的名词，例如：徐家汇、洋泾浜、圣母院、土山湾、佘山等等。当然，我也保留并袭用了在法国采纳的名词，如 Changhaï 为上海，Péking 为北京，Nanking 为南京，Macao 为澳门，Canton 为广州等等。

本书第二卷书后所附的一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名、地名、官职、教堂等的法汉对照表以及本著中述及的拼音名词后附上的汉字，是由张玛第（渔珊）神父负责编排的，我在此向他谨表谢意。

我把这部著作献给江南的传教士和教友们，愿他们能更永久更深沉地热爱这个美好的教区。因为今天之所以取得如此慰人的成就，是以无数人的牺牲为代价而换来的。我也把此书呈献给我们教区的朋友们、法国在中国的代表们以及外交人员和海军人员，由于他们的斡旋，把我们的传教事业多次

从面临毁灭的危险中挽救了过来，获得更顺利的发展。恩人们的仁爱，给了传教士们最大的帮助，但愿他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我们不全面的但极诚挚的谢意。

1914 年 5 月 24 日

佘山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

于徐家汇

参 考 书 目

（括号内为简写）

一、手稿本

罗马传信部档案。（传档）

Archives de la Propagande, à Rome. (Prop.)

传信部全体大会记录。（传全）

Acta Congregationum generalium. (Act. Congr. gen.)

传信部（1841—1856 年）有关中国及东印度事务专录，第 23、24 卷。（传特）

Acta congregationis particularis super rebus Sinarum et Indiarum orientalium; t. 23 et 24 (1841—1856). (Act. congr. partic.)

传信部（1830—1860年）议事记录，第 7—18 卷。（传录）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 t. 7 à 8. (1830—1860) (Scri. ref)

法国巴黎外交部档案。（法外）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aris. (Aff. Etr.)

回忆录及文件，中国部分，1843—1846 年；第 5 — 9 卷；第 13— 15卷。（刺尊尼使团）

Mémoires et documents. Chine. 1843—1846; tomes 5—9;

13—15. (Mission Lagrené)

中国通讯，第 2 卷，1844—1847 年。

Correspondance de Chine; tome 2; 1844—1847.

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档案。(法使馆)

Archives de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g. (Leg. Franc.)

江南传教区教会事件，卷宗 116。

Carton 116. Affaires religieuses, Mission du Kiang-nan.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档案。(法领)

Archives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ï. (Cons. Franc.)

教区主教及教区会长致领事馆的信件。

Correspondance des évêques et des supérieurs de la mission avec le consulat.

耶稣会在欧洲保存的文件。

Documents conserves dans la Compagnie en Europe.

教区上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和法国参赞神父的信件。(中总)

Correspondance de la mission avec les TT. RR. PP. Généraux et les RR. PP. Assistants de France. (Gén. Sin.)

总会长和参赞神父致法国省、那不勒斯省省会长神父以及上罗马教廷有关教区事务的信件。(总法那罗)

Correspondance des Généraux et Assistants avec les Provinciaux de France et de Naples, et avec la Curie, au sujet de la mission. (Gén. Franc. Néap. Cur. rom.)

教区致法国省会长和教区在法国的帐房神父的信件。(法信)
Correspondance de la mission avec les RR. PP. Provinciaux de France et les procureurs de la mission en France. (Franc.)

江南教区在徐家汇的档案。(徐档)
Archiv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à Zi-ka-wei(Zi).

经常引证的大致有:①《会士录》和教务工作报告书;②江南主教和代牧主教的信件;③总铎区总本堂和本堂区本堂神父上主教的信件;④总铎区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⑤教区公文;⑥耶稣会上级的信件;⑦文件副本;⑧传教士的回忆录及手稿;⑨中文文稿及其他有关印刷文件。

巴黎圣婴善会的档案。
Archives de l'œuvre de la Sainte Enfance, à Paris.

江南教区卷宗。
Dossiers du Kiang-nan.

二、书刊类

遣使会年刊,1834 年起,巴黎版。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Paris 1834 sq.

传信部年刊。(传年)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A. P. F.)

圣婴善会工作年刊。(婴年)
Annales de l'œuvre de la Sainte Enfance. (A.S.E.)

奥布里:《中国人在其本土》,1889 年,巴黎版。

Aubry: Les Chinois chez eux. Paris 1889.

德博瓦尔(伯爵):《周游世界》, 1874 年, 巴黎版。

Beauvoir (Comte R. de):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Paris 1874.

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 1900 年, 河间府版。

Becker (S. J.): Le R. P. J. Gonnet. Ho-kien-fou 1900.

桑必寿:《中国人和传教士》, 1899 年, 利摩日版。

Bizeul (S. J.): Chinois et missionnaires. Limoges 1899.

布尔热:《中国史》, 1884 年, 伦敦版。

Boulger: History of China. Londres 1884.

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 1855 年, 巴黎版。

Broullion: Mémoire sur l'état actuel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aris 1855.

《中国丛报》, 1833 年起, 广州版。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1833 et sqq.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 第 3、4 卷, 土山湾石印本。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 3, 4. Autographié; T'ou-sè-wè s. d.

高田:《征华史(1857—1858 年)》, 1905 年, 巴黎版。

Cordier: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1857—1858. Paris 1905.

同上:《征华史(1860 年)》, 1906 年, 巴黎版。

id.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1860. Paris 1906.

同上:《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 1901 年, 巴黎版。

id.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Paris 1901.

同上:《法国在远东三殖民地的起源》, 1896 年, 巴黎版。

id. Les origine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Extrême-Orient. Paris 1896.

顾随(侯爵):《回忆录》, 1900 年, 巴黎版。

Courcy (marquis de): Souvenirs. Paris 1900.

达莱:《高丽教会史》, 1874 年, 巴黎版。

Dallet: Histoire de l'Eglise de Corée. Paris 1874.

谭维翰:《亚历克西·克莱克传》, 1875 年, 巴黎版。

Daniel (S. J.): Alexis Clerc. Paris 1875.

樊国梁(主教):《北京》, 1900 年, 巴黎版。

Favier(Mgr): Pékin. Paris 1900.

德费里埃·勒韦耶:《法国驻华使节》, 1854年, 巴黎版。

Ferrière le Vayer (Marquis de): Une ambassade française en Chine. Paris 1854.

费世班:《中国印象》, 1855 年, 伦敦版。

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Londres 1855.

方殿华:《南京今昔》, 1901 年, 上海版。

Gaillard (S. J.): Nan-king d'alors et d'aujourd'hui. Changhaï 1901.

安邺:《从巴黎到西藏》, 1882 年, 巴黎版。

F. Garnier: De Paris au Thibet. Paris 1882.

日意格:《1858 年和 1860 年订约后法国的对华政策》, 1872 年, 巴黎版。

P. Giquel: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depuis les traités de 1858 et 1860. Paris 1872.

狄虚衷:《吉代神父传》,1867 年,巴黎版。
Grandidier (S. J.): Vie du R.P.A. Guidée. Paris 1867.
吉代:《艾方济神父小传》,1860 年,巴黎版。
Guidée (S. J.): Notice sur la vie et la mort du P.F. Estève. Paris 1860.
夏鸣雷:《江南教区》,1899 年,巴黎版。
Havret (S. J.):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aris 1899.
于布内(男爵):《周游世界记》,1873 年,巴黎版。
Hubner (baron de):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Paris 1873.
古伯察①:《中华帝国》,1857 年,巴黎版。
Huc: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57.
《江南教区日志录》,徐家汇,石印本。
Journal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Autographié, Zi-ka-wei.
朱里安·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1864 年,巴黎版。
Jurien de la Gravière: Voyage en Chine. Paris 1864.
洛内:《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史》,1801 年,巴黎版。
Launay: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is 1801.
同上:《中国贵州教区史》,1903 年,巴黎版。
id.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Kouy-Tcheou. Paris 1903.

① 古伯察(1813—1860),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1839 年来华,1852 年回法国,1860 年死于巴黎。上海旧法租界有古神父路(今安福路),即指此人。——译者

拉维斯和朗博主编的《通史》。
Lavisse et Rambaud: Histoire général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拉沃莱:《法国和中国》,1900 年,巴黎版。
Lavollée: France et Chine. Paris 1900.
徐听波:《爱德华·迪巴尔主教传》,1879 年,巴黎版。
Leboucq (S. J.): Monseigneur Edouard Dubar. Paris 1879.
《中国新教区通讯》(通讯)(1842—1868 年,巴黎版,石印本)。
Lettres des nouvelles missions de la Chine. (N. M.) (autographiées, Paris 1842—1868)
《拉瓦尔(1879 年至)和泽西岛(自 1881 年起)两地神学院的信函》。(神学院)
Lettres des scolastiques de Laval (jusqu'en 1879) et de Jersey (à Partir de 1881). (Scol.)
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
Litteræ annuæ provinciæ Franciæ Societatis Jesu.
季理斐:《耶稣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纪念册》,1907年,上海版。
Mac Gillivray: A centena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Changhaï 1907.
马尔博:《福尔卡德主教传》,1886 年,巴黎版。
Marbot: Vie de Mgr Forcade. Paris 1886.
马佐:《北堂女英雄埃莱娜·德若丽娅》,1905 年,巴黎版。(北堂女英雄)
Mazeau: L'héroïne du Pé-tang, Hélène de Jaurias.

Paris 1905.

《遣使会回忆录》，1865 年起，巴黎版。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Paris 1865 sqq.

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1889 年，巴黎版。

Mercier: Campagne du Cassini dans les mers de Chine. Paris 1889.

莫热（侯爵）：《遣华使团回忆录》，1860 年，巴黎版。

Moges (marquis de): Souvenirs d'une ambassade en Chine. Paris 1860.

马德赉：《中国教务统计表》，1909 年，上海版。

Moidrey (J. de S. J.): Notes statistiques sur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Changhaï 1909.

蒙塔尔托：《上海史话》，1909 年，上海版。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ï. Changhaï 1909.

《江南教区消息报》，徐家汇，石印本。

Nouvell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Autographié Zi-ka-wei.

《江南教区教务工作年报》，上海版。

Œuvr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Changhaï, annuel.

柏立德：《佘山圣母朝圣记》，1875 年，上海版。

Palatre: Le pélerinage de N. D. de Zô-sé. Changhaï 1875.

同上：《中国溺婴记》，1878 年，徐家汇，石印本。

id. L'infanticide en Chine. Autographié, Zi-ka-wei 1878.

《英国议会文件》，摘自伦敦英国博物馆。

Parliamentary papers, Accounts and papers. (British Museum à Londres.)

费赖之：《中国、高丽和日本的天主教教会体制》(由马德赛整理，1908 年，上海版)。

Pfister (S. J.): 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en Corée et au Japon (éd. P. J. de Moidrey) Changhaï 1908.

同上：《1869 年的江南教区》，1869 年，巴黎版。

id. Le Kiang-nan en 1869. Paris 1869.

同上：《耶稣会会士录》，1872 年，上海版；又 1892 年版(薛孔昭续编)；又1908 年版(屠恩烈续编)。

id.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 J., qu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 Changhaï, 1872; Editions de 1892 (P. L. Sica); 1908 (P. H. Dugout).

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1893 年，贝尔福版。

Pierre: Vie de Mgr Languillat. Belfort 1893.

潘如汉：《戴元英神父传》，1896 年，巴黎版。

Pouplard: Vie du R.P.M. Fessard. Paris 1896.

《中国通讯》，第 189 期起，巴黎版。

Relations de Chine. Paris 189 sqq.

《南京教区通讯录(1873—1875年)》，1874、1875 年，上海版。

Relations de la mission de Nankin; 1873—1875. Changhaï 1874, 1875.

夏之时：《中华帝国地舆》，1905 年，上海版。

Richard (S. J.): Géographie de l'Empire de Chine.

Changhaï 1905.

罗淑亚:《北京》, 1878 年, 巴黎版。

Rochechouart (comte J. de): Pékin. Paris 1878.

鲁塞:《中国纪行》, 1887 年, 巴黎版。

Rousset: A travers la Chine. Paris 1887.

史式徽:《中国概况》, 1912 年, 巴黎版。

Servière (J. de la S. J.): Croquis de Chine. Paris 1912.

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 1884 年, 徐家汇, 石印本。

Sica (S. J.): Annales domus Zi-ka-wei. Autographié, Zi-ka-wei 1884.

同上:《南京教区开牍册(1847—1871 年)》, 1871 年, 圣布里厄版。

id. Status missionis Nankinensis a 1847 ad 1871. Saint-Brieuc 1871.

同上:《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 1892 年, 巴黎版。

id. Une famille napolitaine. Paris 1892.

同上:《郎怀仁主教小传》, 1879 年, 罗昂东版。

id. De vita RR. DD. Languillat. Roehampton 1879.

张志瀛(雪香):《法领政略表》, 1912 年, 上海版。

Tchang-Tche-Yn (S.H.): Liste chronologique des consuls de France à Changhaï. Changhaï 1912.

韦尔登:《传教区内的魔鬼》, 巴黎版。

Verdun: Le diable dans les missions. Paris s. d.

沃尔费斯唐:《在华天主教会》, 1909 年, 伦敦版。

Wolferstan (S. J.):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Londres 1909.

目　录

原序…… 1
参考书目…… 1

第一部分
罗伯济主教时期(1839年至1848年)

导言…… 3
一、江南地区…… 3
地方行政　气候　生活条件
二、江南教区的起源…… 8
第一章　1840年的江南教区情况 ……13
署理主教罗伯济……13
神职人员：法国遣使会会士　中国遣使会会士
会外中国司铎
辅助员：会口办事人及贞女们
教友：优点和缺点
第二章　耶稣会被召重来江南……30
一、征召……30
北京教友们的活动　罗伯济主教　南京教友　传信部颁来的使命
二、选定首批传教士及传教士们到达澳门(1840

年至1842年)……37
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三位神父　他们的被指定和出发前的准备　玛丽-阿梅利皇后的协助　航行到达澳门
三、从澳门到上海……44
中英之战　三位神父被澳门当局驱逐　舟山群岛的逗留　到达上海
第三章　罗伯济主教时期的教区概况……49
一、刺萼尼使节来华之前(1842年至1844年)……49
罗伯济主教和教友们迎接新来的神父　最初的传教工作　"鸦片战争"引起的教区变化　南格禄神父的一些规划　教区与法国"胜利之后圣母圣心善会"建立关系　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的一些指示
二、从刺萼尼出使到松江教友事件(1844年至1846年)……62
刺萼尼使节　新生力量支援江南　法国遣使会撤离江南教区　"黄埔条约"的签订和对天主教弛禁　刺萼尼专使在上海　拨地偿还教区的旧教产　支援高丽天主教　金安德神父
三、教区内部纠纷和罗伯济主教离任(1846年至1847年)……91
松江教友事件　一个葡籍主教的干扰　同耶稣会会士的纠纷　罗伯济主教离开教区　中国神职人员向罗马控诉罗主教　罗主教辞职
第四章　教务细节……112
一、耶稣会会院……112

初设在横塘　计划在上海　奠定在徐家汇
二、修道院…… 116
创办在张朴桥　迁移到横塘　修院修生　修院课程　修院假日　同罗伯济主教的矛盾
三、上海及其附近…… 121
城内三家教友　欧美人最初的机构　松江府的会口；当地情况；传教方式；教士奔波；开四规；探访病人　传教士的劳累和考验　安慰　主要改革的成功　弛禁上谕张贴后教友胆怯的消除　传教先生、办事人和贞女们的进修　向教外人传教　魔鬼劝教　育婴事业的开始
四、崇明及海门…… 139
葛必达神父的创业　快速获得的成就　善良的教友们　艰苦的生活　传教方法　育婴事业　大批教外人的皈依　困难与迫害
五、江南其他总铎区的教务概况和统计举要…… 152
六、山东教区…… 154
郎怀仁神父和李秀芳神父　郎怀仁的被拘捕和押送回上海　李秀芳和方济各会代牧主教的分歧；李秀芳回上海

第 二 部 分

赵方济主教和徐类思主教时期(1848 年至 1856 年)

第一章　从赵主教任期开始到叛乱战争发生 (1845 年至 1852 年)…… 163

教区历史概况…… 163
传信部排除法籍神父并规定宗座代牧与耶稣会会长权力划分的部令　传教生力军　1849年至1850年的饥荒与瘟疫　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　创立横塘孤儿院与徐汇公学　开发湖广计划　上北京办科学事业的计划　马再新神父的厄运　上海主教集会　开发直隶西南与日本的计划
第二章　从赵方济主教任期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48年至1852年)…… 210
一、上海主教公署…… 210
建造主教座堂　主教公署　创办洋泾浜事业　吴淞的教务　上海的外侨
二、徐家汇…… 215
歇夏与避静　第一所神学院　徐汇公学;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进展　圣依纳爵堂的兴建和祝圣　劝化附近教外人的失败　辅理修士范廷佐及其工艺学校　徐家汇的来访者　罗礼思神父引李盎博神父入高丽
三、修道院…… 228
迁至张家楼　教学课程　教学成绩　与徐类思主教的纠纷
四、松江府…… 234
横塘孤儿院迁至蔡家湾　收回松江教堂的尝试　郎怀仁神父在浦东的善会
五、崇明及海门…… 241
教友的复兴工作　育婴事业　贞女
六、西区教务…… 250

从无锡到五河各堂口的情况　文雅各的归正　马再新神父之死
七、成绩概要…… 260
第三章　从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到徐类思主教任期结束(1852年至1856年) …… 265
一、红头(小刀会)占领上海之前(1852年至1853年9月7日) …… 265
太平军叛乱初期　占领南京城和城内教友的遭遇　董家渡大堂的祝圣　"哈尔米士"号在南京　李秀芳和马义谷徒然走访南京
二、红头攻克和占领上海城(1853年9月7日至1855年2月) …… 278
叛乱开始 神父们的忧虑;爱棠的殷勤　欧美人士决定中立　清兵围攻上海　董家渡主教大堂的险遇　"贾西义"号军舰在上海　董家渡医院　救援城内被围教友　"贾西义"号军舰的南京之行　董家渡和徐家汇神父们为"贾西义"号士兵们服务　被围时期的租界　"泥城之战"　辣厄尔海军上将到达上海　1855年1月6日的突击失败　叛军撤离县城
三、教区内部历史…… 311
翁毅阁神父的罗马之行和他在法国的情况　翁毅阁神父的《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　伏伯禄神父巡视教区　江南教区和直隶东南教区同时委托给耶稣会　赵方济主教逝世　徐类思主教的离职
第四章　教务细节(1852年至1856年)…… 343
一、江南教区的七个总铎区…… 343

上海　徐家汇　松江　浦东　苏州　崇明及海门
西教区
二、总结…… 378
附录一　北京教友呈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书…… 381
附录二　北京教友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奏疏…… 384
附录三　1842 年至 1844 年的最初教务记录 …… 389
附录四　修道院修士宣誓式…… 393

第一部分

罗伯济主教时期
(1839年至1848年)

导　言

在叙述1840年耶稣会[1]会士被征召重来江南的历史之前，先叙述一下传教士们进行活动的这幅员辽阔的两个省的地理以及地方上天主教的来源，我想是有益的。

一、江南地区

地方行政　气候　生活条件

江南宗座代牧区所称的江南，原是中国一个省的旧名称。到1667年开始划分为两个省：江苏省在东，安徽省在西；南接浙江省（目前有两个属遣使会[2]的代牧区），西接江西省（有三个属遣使会的代牧区）和湖北省（有三个属方济各会[3]的代牧区），西北与河南省接壤（现分三个代牧区属巴马[4]的和米兰[5]的外方传教会）；北接山东省（有三个代牧区，两个属方济各会，一个属德国圣言会[6]）。[7]

据嘉庆年间1814年的户口调查，[8]江苏省人口是三千七百八十四万人，安徽省人口是三千四百十六万八千人，经过叛乱战争和种种灾害之后，人口大大地减少了。人们估计，目前江苏省是二千三百九十八万零二百三十人，安徽省是二千三百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人。[9]

我们这部传教史，写的是从1840年至1898年的这一个

历史阶段。行政方面，那时的江南和江西同属于南京制台管辖。两省各有一个巡抚，江苏省的巡抚驻在苏州，安徽省的巡抚驻在安庆。江苏省分有十二个府，六十七个县；⑩ 安徽省计有十三个府，五十五个县。

府和县的所在地都围有城墙，但在江苏有二十一个、安徽有七个府或县是没有城墙的。⑪ 其中好几个城市虽然仅仅是属县一级的，例如：上海、芜湖、无锡等，却是人口稠密、政务集中的要地。

---

①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创立于1534年，1540年由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推行全球，1773年教宗克旦门十四世命令取缔。1814年，教宗庇护七世命令复兴。取缔以前称旧耶稣会，复兴以后称新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四大修会之一，其他三会是本笃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译者

② 遣使会或称味增爵会，于1625年由圣味增爵(1581—1660)创立，培植派遣往外方传教的人士，故称遣使会。遣使会的母院在巴黎圣拉匝禄街的圣拉匝禄教堂，因此该会会士又称"拉扎利斯脱"。——译者

③ 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1182—1226)创立。来华最早的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诺(1247—1328)于1294年以教宗钦使名义来到北京，元成宗接见了他。1307年教宗委任他为北京总主教(见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这样就在中国传开了天主教。方济各会是一个古老的大修会，凡天主教传到的国家，几乎都有他们的分会。——译者

④ 巴马外方传教会，由巴马总主教孔福尔蒂设立，1906年曾得到罗马宗座的表扬。1904年，该会第一批会士来中国河南南部传教。——译者

⑤ 米兰外方传教会，原是一座修道院，由帕维亚主教拉马佐利于1850年在米兰创立，由教皇庇护九世批准。该会按巴黎外方传教会会规献身于传教事业，罗马传信部曾把中国三个教区托给该会。——译者

⑥ 圣言会，德国斯泰伊尔圣言会，也称斯泰伊尔传教会。斯泰伊尔是荷兰的一个村庄，该处修道院是该修会的发祥地，该修院院长让松神父创立了传教会，自任会长。后该会发展到德国、奥地利，培植传教士。1882年有第一批圣言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于山东南部兖州、沂州、曹州、济宁、胶州等地。——译者

⑦ 以上教区划分，根据马德赉：《中国教务统计表》，第3页。

⑧ 见柏立德：《南京教区通讯录》，1873—1874年第11页。

⑨ 夏之时：《中华帝国地舆》，第147、154页。

⑩ 见《江南教区行政区划分表》，徐家汇，1911年版。

⑪ 它们在职的官员，一般就驻在附近的一座城内。

各省有一个抚台，一个总管财政的藩台，一个总管诉讼的臬台，一个总管科举考试的学台，还有若干视察各行政部门如关税、交通等等的道台。其中一个道台驻在上海，是专门办理外交和宗教事务的，在安徽也有办外交的一个道台驻在安庆，但他的作用就比较次要了。

府有知府，县有知县，再加级别稍次的藩司，他们对县下面的分区，对负责地方治安的地保，都有管理权。乡绅董事在城乡的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传教士接触最多的是知府及知县。"在这些衙门里，职务和组织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同时是判官又是检察官，是税官又是种种法律的执行者，在诉讼中又是民事刑事的初审者，他们的官俸很低，于是产生种种敲诈和勒索，视诉讼人贿赂的多寡面定官司的胜负；他们派遣自己属下的一批蛮横的小人，在欧洲称为衙役的人，去执行他们的命令。这些衙役通常都是些大烟鬼，为了可以较长时期地索取当事人的贿赂以自肥，他们总是把讼事无限止地拖延不决。"①

教区位于巴黎以东东经一百十三度和一百十九度，北纬二十九度和三十五度之间，夏季非常炎热。6月中旬至8月底是大热天，加上扬子江口的潮湿气候，不仅使教士们常常感到难受，而且也很危险。他们往往会在热病、肝病、痢疾、伤寒流行时期或因中暑而丧生。这就是在教区，尤其是在初期传教士中，造成过早过多死亡的原因之一。

目前传教士们对气候已比较适应，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

---

① 见夏鸣雷：《江南教区》，第110页起。我在这里只提及传教士们一再提及的那些官员，若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官场的等级制，可见夏之时：《中华帝国地舆》，第280页起。

措施，因此传教士们的平均寿命已经显著地延长。①

江南的秋天，一般是最舒适的季节，传教士们因酷暑而变得虚弱的身体，能在这段时期内得到逐渐恢复。

传教士的生活状况，按他们工作地点的不同而大有区别。大江以南，教友们的生活往往比较富裕，教士们在旅途中，通常能住进砖瓦房屋；大江以北以及崇明、海门地区，有很长一段时期，茅屋草棚是教士们唯一的宿舍。多少传教士，在这种既肮脏又不卫生的住所内，感染了疾病，促成了早亡。目前，人们正在努力使每个总铎区的各位神父在座堂旁边有一所比较舒适的屋子，使他在艰苦奔波之后，能在那里略微休息以恢复体力。

饮食方面同样也大有差别。大江以南，在教友聚居的总铎区内，由教友们承担维持神父的生活；他们一般都慷慨地乐意尽这个义务，以至常需要神父下令加以限止。

困难的是若干传教士来华初期，对于中国菜肴很不习惯。可是，传教士在贫困的农村里，也快乐地和自己的教友同吃、同住。在大江以北和安徽省那些福音初传的地区，传教士对新教友是一无所求的，他们只靠教区的津贴来维持生活和支撑事业。

对于那些风尘仆仆地不断在路上颠簸，去巡访各会口或给病危者施行终傅② 的传教士，交通工具却是个重要问题。这

---

①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 年)，附录 2 第 94 页起。

② 终傅：天主教七件圣事之一。当教徒病危临死前，应该由神父傅擦圣油并为之祝祷，以赦免其一生的罪恶。天主教非常重视这终傅圣事。

终傅礼仪，包括：告解、放临终大赦、送临终圣体及念"助善终经文"等等，统称为最后圣事。——译者

问题也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各不一样。上海附近，在一片广无边际的稻田平原里，密布着无数的小河浜，赶路就得用船只，每个传教神父都有各自的"神父船"，船梢上飘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帜；这种方头小船是盖有舱棚的，船舱分成两间，一间给神父，一间给跟神父的传教先生，这两个小舱都比较舒适；长途航行时，神父可以在船上阅读、书写或做其他工作。在崇明及海门，行路除用小车外，就别无他法。小车的构造，是一个高约三尺左右的大车轮，轮阔约三公分，贯以轴心，轮的左右是车身，车身两边平衡地各突出阔约一尺的车架，传教士就坐在一边的车架上，两脚只好荡空吊着，行李就装在另一边的车架上，这样车子就平稳了。可惜当冰胶雪冻或下雨时，道路泥泞不堪，就无法行车，那时传教士只能步行跋涉了。大江以北，在徐州府治一大片平原盆地上，那就用驴车。安徽全省的山区地带，传教士就骑驴子，一个脚夫用一根竹制扁担，两头挑着神父的行李跟在后面。

至于长距离的路程，河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条壮丽的江河自东至西，从南到北地贯穿着，广阔的扬子江从安庆直至江口都在江南省内，许多轮船公司的舒适的大轮船和汽油船穿梭般地往来，三十六小时内可以从教区的这一端到达那一端。大运河则从苏州到徐州。大部分的航道内有小汽船可坐。最后，在那条灌溉安徽北部与扬子江平行着的美丽的淮河上，木船也是可以通行的。

交通的便利，使代牧主教能比较迅速地巡视他辽阔的教区，这也是教区至今(1914 年)还没有划分的理由之一，而在邻省却早已划分为好几个代牧区了。

最近几年来新筑了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线，沪宁线已向北

延伸至教区的北端，改变了教区内极大部分传教士的生活。往昔需要十天、十二天甚至半月以上才能到达的路程，今天只要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了。

正如徐家汇一位神学教授很雅致地说："我们享用了蒸汽的便利。"由于交通的发展，使传布福音的事业开展得越来越迅速和方便了。

二、江南教区的起源

利玛窦神父及其最初的同事们，为江南天主教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从那时起，教会虽然经历了种种迫害而仍保持至今。在1595年及1599年，当利玛窦上北京时，曾在南京逗留，在那里他做了大量的劝化工作。接替他在南京工作的罗如望神父，在1603年劝化了一位北京朝廷将封以最显赫官职的著名的大学士徐光启，罗神父给他付了洗，取名保禄。徐光启，上海人，是他引进利玛窦的同会兄弟到他的本城本乡，他城内的住宅便成了附近地区宗教信仰的发源地。① 不久，在这位著名阁老的影响下，有许多农民归化信奉了天主教。这就是我们上海许多美好会口的起源。

十七世纪在江南的传教士，大部分是属于耶稣会中国临时副省的，副省的省会长驻在北京。② 1663年，根据中国教务巡阅使德加马神父的手抄记录，江南省那时有十二座大教堂和许多会口，共计有五万五千一百名教友，由六名耶稣会神

① 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91页起。（《汉学杂纂》18。）

② 据《耶稣会会士录》（1701年）记载，在安庆和南京各有方济各会会院一所，在池州有教区本地司铎们的住院一所。

父分担这些教务的重任。上海就有两座教堂、六十六所小堂，共有四万名教友；徐光启的一个孙女许甘第大，是教区卓越的恩人，她曾给教区的发展以大量的资助。与此同时，天主教也传入了崇明岛。

教友群众的主要集中点，是在上海附近以及运河两岸，例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松江。

在十七世纪末期，安徽开始有教堂。一个比籍的耶稣会神父卫方济被许甘第大的一个侄子邀请到五河县，并在那里付洗了几百个人。

自1688年法国遣使会在北京立足后，给中国副省在江南传教的耶稣会会士以有益的协助。1720年，法国遣使会神父已在江苏的徐州、无锡、江阴以及安徽的五河等地都有了固定的住院。

在教务最盛的十八世纪初期，江苏已有十万名教友，其中八万名就在上海附近。相反，在安徽，除了教友比较多的五河以及南部的东门外，对传教来说，还全是荒地。①

江南和其他几个省，从1674年至1690年，是属于宗座代牧主教管辖。1690年4月10日，教宗亚历山大八世设置了南京主教区，置于印度果阿总主教和葡萄牙保教权之下。

1696年10月15日，教宗英诺森十二世敕令，把南京主教区的辖区限于江南省和河南省；十八世纪共有过五位主教，三位是耶稣会会士，其余两位，一位是方济各会会士，一位是圣衣会会士。

十八世纪是中国天主教会的不幸时期。我们在这里不必

① 详情见夏鸣雷：《江南教区》，第14、22、39页，以及他所引用的其他作者的文章。

重提当时为了中国"祀祖祭孔"的礼仪问题引起传教士中间的争吵和分歧，从而激起了教友们，尤其是读书人和士大夫的愤慨。教宗克里门十一世和本笃十四世根据教理作出决定，断然制止了教会内部的纷争，但终于引起了雍正（1724年和1732年）和乾隆（1746年及以后）时期的宗教迫害。① 这一切很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中国教友数字之所以大大削减的原因。江南教区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取缔耶稣会，这首先发生在葡萄牙，继而蔓延到整个世界。1762年，共有二十四名会士，其中十六名是属于耶稣会中国临时副省的，由于蓬巴尔② 的命令，他们从澳门被押去欧洲，后来被放逐至意大利，关押在圣朱利安堡垒，受尽了种种折磨。1775年，南京主教耶稣会会士南怀仁负着痛苦的使命给他的同会弟兄们宣读了"主赎世主"的教宗诏书。这位苦命的主教，在他1752年至1787年的主教任期内，受尽了一连串的艰难困苦和种种灾难迫害，在他衰老的晚年，他手下只有一个原耶稣会的中国神父作助手，抚牧着江南尚敢公然表示信仰的三万多名教友。南主教在逝世前，还给四名中国青年晋升为司铎，这些司铎在以后很长时期中仍坚持进行主教的传教活动。1787年5月22日，南主教死在上海附近的浦东汤家巷小会口内，他的遗体由教友们运往苏州（白马洞）教友墓地安葬，1877年在他坟上竖立了一方刻有拉丁文和中文的石碑。③

① 1748年12月12日，在苏州监狱里，两位耶稣会神父，葡籍人黄安多和意籍人谈方济被绞死。——译者

据《耶稣会会士录》记载，两位神父是死在9月12日。——译者

② 蓬巴尔（1699—1782），葡萄牙政治家，约瑟夫（1750—1777）一世的总理大臣，为了巩固国王权力，曾与耶稣会会士作过斗争。——译者

③ 见马德费：《中国、高丽和日本的天主教教会体制》，第29页。——译者

江南最后一个耶稣会会士是姚若望神父，安徽徽州人，他活到1796年。1790年和1792年，他为从崇明移到海门的拓荒者创建了最初的会口。

在五十年内，江南教区中除了南怀仁主教遗留下来的几位中国神父和自北京和澳门派遣来江南的几位遣使会会士接替耶稣会会士外，再也没有其他牧羊人了。北京主教汤士选在1790年左右被委为兼南京主教区的署理主教。汤主教是在1808年死去的，继其位的是葡萄牙遣使会会士毕学源，1804年8月20日毕神父被祝圣为南京主教。他还参加钦天监的工作，由于事务繁忙只得居住在北京，之后，他又兼了北京的署理主教。他管理江南只请了几位和他同会的神父作为代权。其中，1831年有赵若望神父，1832年至1836年有昂里凯神父，他们到教区，都只是少作逗留，通常就驻在澳门的专为培养中国司铎的圣若瑟公学内。

毕主教最后行动之一，是重新征召并引进了主教区的第一批宗徒们的同会弟兄重来江南，使江南教务从废墟中复兴起来。

第 一 章

1840 年的江南教区情况

署理主教罗伯济

神职人员：法国遣使会会士　中国遣使会会士
会外中国司铎

辅助员：会口办事人及贞女们

教友：优点和缺点

当 1840 年至 1842 年耶稣会被召重来江南时，南京主教区刚被委托于一位新的署理主教。

伯爵罗伯济，意大利维罗纳人，与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是同乡，他曾在罗马读书深造，在那里他与耶稣会总会长最尊敬的罗当神父非常熟悉，也认识巴雷尔神父及许多耶稣会其他会士。①

他是教会研究院的成员，当时他很可能得到一个显赫的教会职位。可是，1833 年，他表示决意献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归传信部调配。

1833 年 5 月，罗伯济给额我略十六世呈了一封陈述他传教圣召过程的动人心弦的书信之后，② 在法国波尔多登船启程。他随身带着传信部的一份指令，指令上写道，万一南京主教兼署理北京主教的毕学源主教一朝逝世而未指定继承人

时，罗伯济就有权接任视事。③ 当时谁都知道毕主教已是病重垂危了。

这道部令沉重地打击了葡萄牙的保教权，因为直到那时，当北京和南京的主教一职空缺时，葡萄牙根据保教权，是有权指定并实授新主教的。

罗伯济神父原打算上北京重操原耶稣会的科学工作，所以他来时曾带了不少物理和天文仪器。1834 年，他和他同行的四位传信部司铎一起来到澳门后，认识到他的计划会遭到最激烈的反对，因为毕学源主教原在北京钦天监工作已是朝廷极大的宽容了，如再来一个外国神父，很可能引起一场剧烈的宗教迫害；去北京从事科学工作，不但形势不利，而且也不可能；此外，在澳门的葡萄牙遣使会会士也不讳言对这个新计划感到惶恐；除了他们的会士之外，再加一批外国司铎到北京，会不会再发生类似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使教区大受损害的分裂；没有葡萄牙的许可，把一个传信部教士引进中国，到了北京，可能会与保护他们的政府之间引起不和。④

罗伯济忍痛放弃了上北京的计划；在和传信部驻澳门帐房⑤翁璧尔神父商讨之后，便潜入了委托于传信部司铎传教

---

① 李秀芳 1842 年 11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40 页。

② 罗伯济 1835 年 5 月 8 日信，见«传录»，第 8 卷。

③ «传信部指令»，1833 年 3 月 9 日由传信部部长佩迪西尼签发。见«徐档»，卷宗 B 1 。

④ 见遣使会总会长萨洛涅1835 年 4 月 18 日致枢机弗朗索尼信，见«传录»，第 8 卷。枢机弗朗索尼对罗伯济到了澳门没有得到澳门遣使会的援助，表示不满（1835 年 3 月 31 日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482 页起）。总会长萨洛涅神父和法国遣使会在中国的会长陶若翰神父，都证实了葡籍会士们的处境困难。（«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483 页起、第 487 页起。）

⑤ 本书所指帐房，不专指办理经济的机构，事实上，是一个"办事处"。——译者

的湖广地区，在那里，他从事传教三年，① 并任该宗座代牧区代权主教。②

江南教友杜保禄原是澳门若瑟公学的学生，他每年来澳门负责传递教区内中国司铎们的信件和领取教区在澳门所拥有的财产上的收入作为生活费。1837 年，当他知道湖广来了一位罗伯济神父，就去拜访了他，通过和他交谈，再加上教友们的传说，他猜想这位来自罗马的传教士定是一位隐瞒自己身分的耶稣会会士。杜保禄回到江南，就把他臆断的消息传了开来。江南的司铎和教友们对过去旧耶稣会传教士原留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还不止一次上书罗马，要求他们重来中国。当时毕学源主教的南京教区的代权葡萄牙遣使会会士昂里凯神父，由于身患多病，常住澳门，不能亲自来江南领导教区。王若望和张西满两神父起草了呈文，其他司铎以及上层教友们都具名画押，然后送去北京，要求毕学源主教委任罗伯济神父为江南教区大代权的职位。毕主教认为能给自己从未视事的教区送来一位得力助手，深自庆幸，便欣然表示同意。③

毕主教就派几个教友给罗伯济送来了 1838 年 10 月 1 日签发的委以南京主教区大代权职位的委任书。④

---

① 罗伯济曾写信给传信部部长和澳门帐房神父，陈述他在湖广的传教工作，有好几封信写得十分有趣，信保存在传信部档案《传录》，第 8 卷。

② 罗伯济 1839 年 10 月致澳门帐房神父的信，见《传录》，第 9 卷。

③ 我们可以从对罗伯济抱有敌对情绪的其他江南司铎于 1847 年 6 月寄给澳门的一份冗长的汇报中了解到一些详细情节。这些片断以后还要提到。见《徐档》，卷宗B15。

④ 这封写给江南神职班和教友的信，保存在《徐档》卷宗 B1。似乎是由于毕主教的请求，传信部才派遣了一位有能力管理江南教区的教士来；但由于形势不利，因此直到罗伯济正式上任后才宣布。昂里凯神父因病长住澳门，罗伯济伯爵被擢升为教区大代权。传信部在信中说："我们擢升伯爵罗伯济为代权治理南京教区，并宣布他享有主教的一切职权。"

罗伯济神父早知道传信部原来的用意，便接受了授予他的这个荣誉和重任。1838 年末或 1839 年初，他来到了江南。①

他的这次转移使他失去了以身殉教的荣誉：原来已经有人向湖广巡抚告发了他和董若翰神父。② 假如他不出走，无疑要和他的传教同伴一起遇难。③

罗伯济到了江南，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原南京主教区的代权昂里凯神父，因不能亲自来行使职权，曾把他的权力转委于一个法国遣使会会士盛若翰神父，由他管理主教区。④

为了避免职权上的行政混乱，罗伯济神父写信给传信部呈述了种种困难之后，又返回了湖广，等待着罗马的裁夺。⑤

这时，毕学源主教在 1838 年 11 月 2 日死去。传信部抓住南京主教一职空缺的机会，及早解决南京主教区的行政问题，尽管没有明文收回教皇亚方山大八世 1690 年敕建南京主教区的诏书，而事实上已撤销了葡萄牙人的管理权。1839 年 9 月 3 日，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敕令把山东省从北京主教区划

---

① 如果我们相信澳门法国遣使会会长陶若翰神父的信（1839 年 7 月 8 日，引自«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07 页。）是正确的话，应为 1839 年 2 月。但陶神父这时期的信件中有很多日期不正确，如果我们相信前面所引江南司铎们的信是正确的话，应在 1838 年年底。见«徐档»，卷宗 B16。

② 董若翰，中国名董文学。教会书上多译为董嘉伸厄尔，1802 年生于法国蒙日斯蒂，1836 年入中国内地，传教于河南、湖北，1839 年在湖北谷城县茶园沟被捕，1840 年被绞死于武昌，葬于洪山。1880 年 11 月 10 日，罗马教宗把他列入真福品。见«中国遣使会会士录»，第 39 页。——译者

③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59 页。

④ 1834 年，葡萄牙在国内取缔一切修会时，葡萄牙遣使会曾征得传信部许可，把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区委托法国的同会会士来管理。于是，盛神父在 1837 年，石伯禄神父在 1839 年来到了江南（«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02、720 页起）。

⑤ 罗伯济 1839 年 10 月致传信部驻澳门帐房信，见«传录»，第 9 卷。

出，设置一个直属于圣座的宗座代牧区。1840年1月10日任命伯爵罗伯济神父为该代牧区的代牧主教，顶加诺贝府(i.p.i.①)主教衔。②

1840年1月23日，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传谕新主教罗伯济，因为比邻关系，另委托他署理管辖南京主教区的教务，并享有他在山东代牧区内同样的一切职权。③

1841年4月16日，盛神父向教区神父们宣布了罗马的新决定，并劝他们签名给新署理主教呈一份贺词，表示欢迎。④

1841年3月14日，由山西省顶衔欧利亚府主教宗座代牧艾若亚敬主教祝圣为主教。⑤

罗伯济被祝圣后即到任视事，管理这个幅员辽阔的教区，在中国行政上，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个省。⑥

有十一位司铎和他合作；两位法国遣使会会士，盛神父和石神父；两位入法国遣使会的中国神父，直隶人杨安德和蒙古人陈保禄，两人都是在北京北堂培植的；还有七位中国司铎；

---

① i.p.i.为in partibus infidelium的缩写，意即"在教外人的地区"。一切代牧主教的顶衔下都有i.p.i.三个简写字母。——译者

② 这些资料的片段保存在《徐档》，卷宗B1。1840年1月23日传信部签发的信中，部长弗朗索尼枢机补充说："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已答允给他派遣三位或四位会士前来帮忙。"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初的消息。

③ 见《徐档》，卷宗B1。

④ 在这份贺词上签名的有盛、石、张、杨、秦、沈、李、金等神父，贺词是附在盛神父致罗主教的信内的。见《徐档》，卷宗B7。贺信内出现许多葡萄牙人的名字，因为在葡萄牙保教权下，在中国的中外神父都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译者

⑤ 见薛孔昭：《南京教区开牍册》，第1页。

⑥ 葡萄牙保教权给传信部造成的许多困难，我在这里不说了，读者可以参阅樊国梁主教：《北京》，第189页起；《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97页起。在江南，葡萄牙的势力不久便被英国和法国的势力所压倒，在后面一些章节中，我将讲神父和教友们曾几次要想和澳门企图恢复联系的尝试。

金保禄和沈玛窦是入了葡萄牙遣使会的；其他都是由葡萄牙遣使会或在北京或在澳门若瑟公学培植成为司铎的，他们同遣使会保持着联系，他们通过若瑟公学和欧洲通信。当法国遣使会会士离开江南时，同会的杨安德和金保禄也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其他司铎便留属南京主教区。①

盛神父曾在塘湾创办过一所小小备修院，实际上是一所遣使会的初学院，共有五名青年，三名来自无锡，②一名来自崇明，另一名是遣使会的哲学修士，姓张。他给他的小同学们教授拉丁文，同时自己进修，准备晋升司铎。1841 年盛神父呈罗主教工作汇报时谈到这所修院，他写道："这些青年们的生活很有规律，学习也很用功。修院是按照本会会规设立的，它题名为'至圣无原罪始胎圣母玛利亚'。属于无锡小教区的修生，由我们负责给养；属于江南教区的修生的费用，则由我们的葡萄牙同会兄弟支出。"③

这些初学修士，在遣使会会士离开江南时，也都跟着一起走了。④

江南的司铎及修生们的生活，是靠每年从澳门寄来的一笔息金维持的。南京主教区在澳门由于许多葡萄牙老教友的大量捐献而拥有不少产业，由遣使会若瑟公学的帐房神父经管着。每年一次，由一位原若瑟公学的校友杜保禄去澳门，给江南的司铎们带去信件，并带回这笔教区财产上的息金。杜保

---

① 见《耶稣会会士录》(1892 年)，附录第 2 页。

② 无锡教区，特别是在法国遣使会会士继承了北京旧耶稣会会士的旧业上重建起来的。

③ 见《徐档》，卷宗B7。

④ 盛神父 1842 年 9 月 17 日致总会长艾蒂安神父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15 页。

禄则运用这笔款子购买货物，再回到江南变卖生利。① 此外，上海附近有不少教友很富裕，他们对于资助神父和神父们的传教事业也是极其慷慨的。②

盛神父和石神父的书信及他们致罗主教的汇报，都表现了他们出奇的传教活力和所取得的慰人的可喜成绩。③

1840 年，传教士们不顾骚扰和迫害，曾听了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个神工（告解），④ 其中一万零三百二十一个是四规神工，行了五百七十六件婚配，送了一千零二十八次终傅。⑤

中国司铎们对于传教的帮助较小，他们几乎全是老弱多病者。⑥ 他们和当地的教友一样都非常胆小，只敢在深夜，坐在紧闭着的轿子或船舱中，不让任何人看见，出外冒险施行圣事。来到某处一家殷实的教友私堂里，会集附近村里的教友，就在深更半夜给孩子们行补礼、⑦ 举行婚配礼、听神工……虽然这样防范严密，但还是常常被邻近的教外人猜到，有的人

---

① 摘自一位中国神父 1847 年 6 月写的一封信，见《徐档》，卷宗B15。

② 盛神父 1838 年 6 月 10 日、1839 年 5 月 23 日信，见《遣使会年刊》，第 5 卷第 203、346 页起。

③ 见《遣使会年刊》，第 8 卷第 341 页起。

④ 告解：亦称"神工"，天主教七件圣事之一。告，即教徒向有权神父告明所犯的罪。解，即由神父解免其罪。按天主教四规，教徒每年至少告解一次、领圣体一次，这就叫作四规神工和四规圣体。此外，平日的告解、圣体，称恩工、恩体。——译者

⑤ 盛神父于 1841 年致罗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7。鄂尔璧神父继承了石神父在浦东的教务，曾这样称赞说："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擅于讲中国话，处理事情经验丰富，受到众教友的尊敬。" 见《教务报告（1851—1852 年）》；《徐档》，卷宗 C7。

⑥ 罗伯济 1842 年 5 月 15 日、盛神父 1841 年 5 月 6 日信，见《传年》，第 16 卷第 393、432 页起。

⑦ 由教友付的洗礼，称"权付"。权付后，于适当时机，再由神父补行圣洗全部礼仪，称补礼。——译者

便威胁着要去报官；于是教友们只得急急忙忙凑钱去买个太平。①

可以理解，除了教友众多并比较富裕的松江府和苏州府外，在其他地区，司铎们往来的就更少了。1842 年，盛神父记载，崇明已有七年没有见到一位神父了，② 分散在运河两岸以及五河等处的会口，几乎全部放弃了。

按上面已引述过的盛神父 1841 年 6 月 1 日的教务汇报，教友数字至少还有四万八千名。③

教友中各阶层的人都有，而大部分是种稻田的贫苦农民，以及以船为家的渔民。但在上海、松江、苏州、南京等处却有不少富有的教友人家，由于罗马对于"祀祖祭孔"的中国礼仪之争作出了最后决定，这些富家教友子弟就不再去应科举走仕宦的道路，而去经商或经营重要的企业了。在那恐怖的叛乱战争④ 之前，在松江府和苏州府，教友们的财产远比今天为多。由于教友们的勤劳正直，许多贫农教友也有因勤俭持家而致富的。当时路过或接触过江南的传教士，都异口同声一致赞扬。⑤ 南京主教区在整个世纪没有任何宗教资助而仍然保持宗教信仰，主要应当归功于这些上层教友的慷慨；在他们的屋宇之下，庭院深处，隐藏着一间念经的小圣堂，不仅集合了他

---

① 见康治泰：《天主教在浦东》一文中搜集了当时这类事情（《神学院》，1885 年，第 344 页起）。

② 见《传年》，第 16 卷第 296 页。

③ 见《徐档》，卷宗 B 7。1839 年 5 月 23 日信上（《遣使会年刊》，第 6 卷第 203 页起），盛神父初记是三万八千名教友。第二个数字无疑是在他了解了各会口情况之后而作出的。

④ 指太平天国。——译者

⑤ 见本卷后面。

们的家里人，而且也接纳了四邻八舍的教友。①

他们负责管理着由他们祖先捐献给本堂口应用的，往往是一笔很可观的财产。这些办事人还负责给会口内新生婴孩们付洗，注意婚姻仪式举行得是否合乎教规，在环境不太恶劣时，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还得去请一位神父来举行圣事。他们集资捐款、打发送信人，供应神父的生活费用以及传教经费，他们还救济贫病者，还得贿赂胥吏衙役，以此来求个太平。他们又是官吏和衙内师爷们时刻勒索敲诈的首批牺牲者，为了摆脱那些告发、那些会使人破产的官司和防止被投入监狱而经常要掏尽腰包。②

1845 年，葛必达神父曾写道："许多教友为了保持他们宝贵的信仰，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这种清贫，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光荣和值得赞扬啊！"③

---

① 在我多次引证的盛神父的 1841 年 6 月 1 日呈罗主教的报告中，他估计当时有四百只小堂。见《徐档》，卷宗 B7。上海城内陆家的小圣堂至今还虔诚地保存着。南怀仁主教曾在那里举行过多次弥撒。他住过的那间用意大利圣像装饰的房间以及房内一切古老的用具，都是教难时期的遗物。

② 艾方济 1843 年和葛必达 1845 年的信中，对这些"办事人"都有很好的描绘。见《通讯》，第 1 卷第 63、183 页。

③ 葛必达 1845 年 1 月 1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89 页。康治泰神父在《天主教在浦东》一书中曾记有当时当地一件较典型的轶事，叙述了那个后来还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1823 年，金家巷本堂姚神父，在某个深夜去给病人送终傅的路上，被一群教外人围攻，他们抢走了神父的终傅篮，其中有礼仪经本、圣油盒、短白衣、领带。终傅篮被送到上海县县衙门。为不使这些圣物留在教外人手中，来请终傅的界沟湾教友，集资出了八百银元（那时要值四千法郎以上），把这只终傅篮从衙门里赎了回来。尤其是姓陈的那一家，卖去了田地，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家。陈家的一个青年女子，她本想在家守贞的，也只能放弃了这条心，改嫁了人，目的还是为了想能从夫家得到一笔彩金，使父母得到一些钱。她嫁给了赵主教的船老大张五官。后来张五官靠了外国人，做了洋行买办，成为上海最有钱的教友。张买办也使妻家发了财，成为今日浦东最富有的人家之一。见《神学院》，1985 年，第 354 页。

除会口办事人外，神父们最得力的助手是贞女们。那是江南最初的传教士仿效教会初期成立的美妙组织。几乎每个小康之家，都有一、两名或更多的这样的好姑娘。她们为了献身于传教和慈善事业，放弃了结婚，有的就生活在父母家里，有的则三三两两或更多的人聚集在属于她们会口的公所内，组成一个小小的团体。多亏她们的努力，使孩子们学会了经言，学得了教理，病危垂死的也得到了扶助，小圣堂得到了维护并保持了整洁。

有人或许会认为传教士的这些宝贵助手一定是神父们驯服的工具，在缺乏神父、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办事人和贞女中不会发生令人伤心甚至真正的丑事，那只能说明他对人的本性认识不足。事实上，在传教士呈主教的汇报和罗主教呈传信部的报告中，记载着许多贞女和办事人给神父们造成的种种困难。办事人往往自以为享有管理和自由使用他们会口财产的全权，因此拒绝传教士核查他们的帐目，他们的这种做法牵涉到他们的道德品质问题。当传教士巡视会口时，他们外表上对神父无限尊敬，就是最有声望的办事人也在祭台旁给神父辅弥撒，在饭间里给神父端饭、搬菜。但每当神父要查问或审阅会口的经济帐目时，就会和这些会口中有势力的人家产生矛盾，有时竟有发生暴动的危险。①

无疑，由于这一类的困难，石神父曾在他1840年写的一封信上讽喻说：江南是一个"富饶、豪华、寻乐之地，但也是世界上最愚蠢、最傲慢之地"。②

---

① 我们在后面将会遇到好几桩轶事。

② 石神父1840年的信件，他在笔记上又重复写了贞女们的轶事。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728页。

更严重的是有关贞女们的问题，她们中不少人讲时髦爱打扮，这有损于她们的身分。再则，她们同男子交往接触时也没有遵守应有的审慎持重。看来，那时真有而且经常有令人伤心的丑事。中国司铎们既胆小怕事，又经常或多或少要靠这些贞女们照应服侍，因此几乎不敢申斥她们。盛神父和石神父初到江南，就一眼看出这个美好的组织有走下坡路的隐患，就毅然决然大无畏地取缔了这些流弊。1840年，石神父写道："目前，我最大的事情是禁绝贞女们穿绸着缎，并禁止她们和邻居或亲戚们交往过密，这往往是惨痛丑事的根源；她们见到我非常害怕，称我为'可怕的人'，感谢天主，我之所以可怕，正是为了攻击她们的恶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或者遵守贞女规则，或是干脆结婚。我所耳闻目睹并得到证实的那些丑事使我心碎，但也给了我毅力，我一定要采取措施，使这些可怜的女子与世俗人断绝往来。"①

在贞女们出过力、出过钱的会口里，她们比办事人更想把持领导权。在好几个农村，贞女竟单独包揽了办事人的职务；在各处圣堂里，她们领念经文、圣书，申斥那些不虔诚的教友。罗主教在他那份呈传信部部长的教务汇报中描绘贞女们的情况说："她们高声唱着中文的主日圣经，而可怜的神父却在祭台上低声默念他的拉丁文圣经。"主教的结论说："枢机呀你看，我们的贞女们不仅仅是歌唱者而竟是女六品，比圣教初期的女六品的权力还要大得多哩。"②

---

① 盛神父也写了同样的信件，列举了一些可悲的事情和解决弊病的方案。他又在1840年6月1日致罗主教的信上说："大多数贞女们是心地善良的，但是环境迫使她们堕落。"见《徐档》，卷宗 B7。

② 1842年9月30日信，见《徐档》，卷宗B13。

大部分教友是保持信仰的，他们为了获取圣事神益，会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盛神父写道："我很欣慰，我留居教区五年之久，在我探访到的一般教友身上，我荣幸地证明，他们是遵守天主戒命和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虽没有修成最高级的圣德，但也没有堕落于重大的罪恶。"①

至于教友比较多的本堂区，教友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在那里却保持着纯朴的风气和原始的信仰。反之，那些散在教外人中间的教友，却会很迅速地忘掉他们的职责，终于和相处的教外人同流合污了"。②

此外，传教士常常惊奇地叙述教友们为了望弥撒领圣事，不怕赶二十、三十，甚至四十里远的路程。③

尤其是，当要使病危者得到教会的最后圣事时，他们更表现出基督徒的真精神。艾方济神父在到达江南不多几天后，写信说："教友们一得任何病症，只要是患着高烧，接近临终，就不管天气如何，不论严冬或酷暑，为了能领得最后圣事，他们先从住处叫人负上小船，接着赶三、六、十至十二里的水路。再看看这些送来的病者，他们大多数穿的是多么破破烂烂，坐的又是多么狭小的木船！他们不在途中死去，这简直是奇迹。我不知道他们来求灵魂上的扶助时，是否有死在半路的。但却有不少病人，一领了最后圣事，几乎立即断了气。"④

---

① 见《遣使会年刊》，1843年1月，第8卷第380页。

② 同上。

③ 见《遣使会年刊》，1838年6月10日，第5卷第340页；这里所说的里指的是法国古里，每古里约合四公里，下同。

④ 艾方济1843年5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63页。在鄂尔璧神父1845年7月13日信件和在崇明的魏道味神父1847年2月的信件中都有类似的记述。见《通讯》，第1卷第245页；第2卷第7页。

江南教友对于扶危济贫、帮助神父是不计较的，可惜就是极度的胆小。①

一百五十年来，教友们所经受的教外人和官府方面的种种迫害和敲诈勒索，已足够说明他们这种胆怯心理的由来。但这个胆怯，却严重地妨碍了传教工作的进行。为避免教友们的虚惊，传教士就得隐匿不出，防止和教外人有任何接触。一有风吹草动，教友们唯一的心事就是怎样凑钱来应付控告者和官吏们。这种息事宁人的办法更助长了仇人们的胆大放肆。即使在鸦片战争英国人胜利后，尽管欧洲人已在上海设立了保护受迫害的教友的领事馆，但教士们仍需要与教友们的过分的拘谨作斗争。②

从十八世纪开始，这种种剧烈的或轻微的迫害几乎从未停止过，以致造成了教友对四周教外人的反感，因此他们就从此不再想向四周教外人传教了。所以，时至今日，这不幸的历史还说明了"老教友"众多的地方，教外人的归化何以如此稀少的原因。③

在司铎过往很少，即使来了也不逗留的会口里，教友们的极度无知是可以设想的。他们几乎从未听过神父们讲道，由于告解人数众多，神工架上(解罪亭)司铎对忏悔者的指导也

---

① 安若望神父后来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代牧主教。他对江南教区写道："上海附近的教友，配称为胆小如鼠……江南虽没有多大的教难，但在全中国行贿是那样的普遍，因此有钱的教友也就到处向官吏们买求太平。"见《遣使会年刊》，第8卷第177页。

② 南格禄神父1843年5月18日、1844年6月4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46页起、第121页。南神父埋怨教友们的胆小，使他处于"半拘留"的地位，强迫他深居简出，压抑了他的传教热忱。一直到刺萼尼公使得到皇帝弛禁上谕之后，才使这种难堪的处境宣告结束。

③ 笪良仁：《浦南报告》，1851年，见《徐档》，卷宗C7。

只能尽量的简短。① 即使办事人和贞女们都很虔诚，但经言和要理却经常被忽视。更加困难的是，那些极优美的经文和要理问答，都是用官话或诗歌体裁写的，使那些不识字又只会讲上海方言的人感到很困难，甚至无法了解其中的意义。②

办事人和贞女们也常常受不到足够的宗教教育。由于他们的无知，以致发生了许多有损于教友神益的谬误。南格禄和艾方济两位神父来教区后几个月，觉察到好多男权付者和女权付者给人付洗时用的是错误的或可疑的付洗经文，也有不遵照规定礼节而付洗的。

更多的是婚姻问题，不管有何禁阻，③ 便举行婚礼，以致使婚礼成为无效。中国司铎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既不调查，也不补救；何况他们也几乎不敢进行调查，于是感到极大的苦闷；当这些事实真相一被揭露，教友们的惶恐不安更使初来的传教士们加重了负担。④

1841 年，盛神父和石神父呈给罗主教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几个主要方面，并指出当传教士人数增长时才有可能而且必须对教友们进行整顿。南格禄及其同伴的最初的信件都证实了这些观察是正确的。

许多教友由于无知又怕得罪人，就任人拉去参加教会禁止的种种教外人的节日或丧事；可是教友们却心安理得地去参加而且行礼自若。教友也去看中国人很喜爱的社戏，而社

---

① 石神父 1841 年致罗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7。

② 艾方济 1848 年 5 月 2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64 页；魏道味 1847 年 7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67 页。

③ 禁阻，即天主教内禁止结婚或阻止结婚的条例。——译者

④ 南格禄 1845 年 3 月 3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04 页。

戏的内容往往是不健康的，大部分又是迷信的。教友又自认为贫穷所迫，在主日和罢工瞻礼日自作主张地照常出工、干重活。中国家庭又盛行着"童养媳"的不道德恶风；按中国习俗，男女很早就订婚，聘金一付，那女孩子从此就得由未来的婆太太去管束。于是，这女孩的天真无邪就被这陌生的夫家扼杀了。还有寡妇们领小青年当养子，随着也常发生淫乱之事。同外教人婚娶，受到损害的往往是信教的一方。在贞女们管教的经言小学里，男女同学间也有许多麻烦事。至于赌博、抽鸦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是身心两败的根源。①

最后，那些叛教者的重新归正，却是一个使人最烦恼的问题。为了逃避衙门的敲诈勒索，上千数的教友在客堂正中重新供上了他们祖先的牌位，当举行教外的异端礼仪时，一些古怪的菩萨像也挂了起来。②

多数叛教者竟成了教友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告发者。有的虽从未明显表示放弃信仰，但因多年缺乏神父，渐渐地把宗教忘掉了，于是新生婴孩也不给付洗了，和四周的教外人过着同样的生活，结果，同化了。③

少数家庭还继续保持着若干旧的宗教习惯，他们珍藏着苦像、念珠以及祖传下来的经本，认为这些都是吉祥压邪的珍品，即使教友们出高价去征收，他们也拒绝出让。④

引归这些迷路的亡羊，往往比劝化教外人更费劲。

---

① 《徐档》，卷宗B7中存有两份盛神父的、一份石神父的 1841 年呈罗主教的报告。

② 罗伯济 1843 年 5 月 15 日信，见《传年》，第 16卷第 430 页。

③ 艾方济 1845 年 6 月 1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25 页；魏道味 1847年 7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63 页。

④ 艾方济 1843 年 5 月 2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60 页。

这些陋俗和流弊实在令人痛心，新来江南的传教士在拨乱反正之前，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奋斗啊！可是当人们想到南京主教区被放弃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还留有这么多忠于信仰、忠于祖传的宗教礼规的教友时，又实在感到惊奇。

1841 年 12 月 30 日，罗主教给传信部上书说："五、六年中，教友们虽能勉强行一次告解，但他们也是冷淡的、无知的、散漫的。"① 当他进一步认识了他属下的教友后，就不再那么严峻地批评了。1843 年 5 月 15 日，他写信给传信部总部说："虽然教友们处在各种各样坏榜样的包围之中，又没有欧洲教友那样丰盛的精神援助，可是他们的操守却使我们感到惊奇。"②

教友的坚持信仰，不是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传教士们艰苦培育这些美好会口作出的最好评价吗！葛必达神父来江南几星期后写的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教友们保存着信仰，可是宗教教养太少了。当人们想到五十多年来他们身受的迫害，既无精神上的援助，从小又被迫和腐朽的教外人相往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坚持信仰正标志着天主特别的保佑。假如法国也遭到了这种同样长期的考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还有这么多的教友。"③

教区的教务情况，给新来的传教士们指明了应尽的责任。二十年左右，他们几乎只献身于老教友众多的府治区域；"信仰者的老家"正强烈地要求着优先的照顾。

---

① 见夏鸣雷：《江南教区》，第 44 页。
② 见《传年》，第 16 卷第 436 页。
③ 葛必达 1845 年 1 月 1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88 页。

从郎怀仁主教任期起，传教士才开始向尚未传布福音的地区奔驰。他们对教友们进行微小的启蒙教育和提高神修，从而开始了传教士们的辉煌征途。

第 二 章

耶稣会被召重来江南

一、征　　召

北京教友们的活动　罗伯济主教　南京教友传信部颁来的使命

中国的司铎和教友最先要求利玛窦的同会弟兄们重到他们的国土来。1832 年 4 月 25 日，北京一批教友给耶稣会总会长最尊敬的罗当神父呈上一份请愿书，书中追述过去旧耶稣会会士在科学和传教方面作出的成绩，并感叹目前一切都变了样。在北京主教区，只感到司铎缺乏。中外传教士在皇上和高级士大夫面前，没能保持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地位，上层阶级和平民百姓，谁也不愿听信他们。

请愿者恳求总会长神父迅速给以补救，派遣象旧耶稣会会士那样的数学家、天文家、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这样的一批神父，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皇上及其周围的大臣们所希望的”。①

1834 年 5 月 18 日，总会长罗当神父给 3 月 17 日收到的上述这封请愿书作了答复。他感谢“最可爱的中华帝国的教友弟兄们”对过去老一辈传教士的感恩和怀念。耶稣会也没有忘掉中国的传教区，它只有一个心愿，就是重返旧日的传教

八乙　三二一五

区。②

然而传教士重返之事，本会也无权决定；但人们总希望有这么一天，使传教士重返之事能够实现。但愿中国教友加紧祈祷，加速其来临。而适合中国教区的传教士，在本会也不乏其人。

1833 年，又是这些北京教友，为了同样的目的，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这次竟直接上奏罗马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奏疏是 1833 年圣神降临节日写的，据说是由毕学源主教和宗室皇侄亲王伯尔明祥阿发起的。其内容和上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的请愿书相同，在追忆当年旧耶稣会会士在北京的种种的事业和成绩之后，惋惜目前教会衰落的惨状；禀告现有幸运的机会，预期一个美好的将来。伯尔明祥阿亲王是皇帝一个兄弟的儿子，他和北京主教有密切的交往；他经常来访主教，谈论些科学和宗教上的问题；他许诺，假如他能再得皇上钦命重掌钦天监(他曾被五次任命)，他必竭力运动皇上重新召唤欧洲的数学家来重操旧业。可惜的是，那时在澳门只有一两个中等程度的数学家。他建议立即派遣一些精通而得力的博学人士，直接从欧洲来澳门，等到皇上一有表示，他立即把他们引进北京。

向平民群众传教的教士也比较缺乏，近十年来没有见到司铎的山东教友，最近派了代表上北京；他们向主教请愿，主教也只有同声感叹，并苦劝他们耐心等待而已；可怜的主教，在这次惨痛的会见之后竟病倒了多天，从此再也不愿接见教

① 见«中总»，第 2 卷第 1 章第 4 页。请愿书是用中文写的，由那不勒斯中国公学翻译成拉丁文。——译者

② 见«徐档»，卷宗F11。

友代表了。其他教友集中的地点，也是三、四甚至五年没有见到神父。北京的主要圣堂，由于主教身体多病，也难得当众举行弥撒；人们很担心，一朝主教死去，这座圣堂及堂内的一切圣物，也许会被没收充公或遭拆毁。所以，教友们恳求"普世教友的至圣教宗，至慈至仁的共同大父"恩赐速遣传教士来，挽救这些灾难。"最好还是派遣一批耶稣会的神父前来我国；他们的虔诚热心和他们的道德学问，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记忆犹新的，他们胜过任何其他修会的教士。可以肯定，假如他们带着宗座的使命来到北京，全国人民以至高级官员，必将衷心欢迎。不久整个帝国行将接受信仰。因为在平民与士大夫之间，在皇帝朝廷之中，耶稣会的声誉受到特别尊敬，甚至认为一位博学多才的耶稣会会士比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要强得多"。北京主教和亲王伯尔明祥阿都在奏折上具名画押，证明内容是真实的。①

1833 年 8 月 24 日，湖南、湖北、山西、北京、陕西等省的教友都有类似的请愿上书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他们肯定，皇帝左右的六部九卿以及朝廷上的大臣都曾叩请皇上恩准耶稣会中精于机械、天文以及其他类似学问的神父，重来帝国。②

这一年，罗伯济带着上述传信部的证件，动身前来中国。从他写给总会长罗当神父的信里，可见他对当时中国教会的惨状也有同样的看法，并强烈要求，速派耶稣会会士来到他们

---

① 见《传录》，第 7 卷；《传全》，第 2 卷第 6 页。本书附录有这篇重要文章的拉丁译文。它说明了罗伯济主教和传信部在 1848 年的种种传教计划。

② 见《中总》，第 2 卷第 1 章第 7 页。

先前的教区，给以补救。①

也许是由于他们的发起，南京教区九十八名教友于1839年10月联名向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呈了一份新的请愿书。请愿书叙述"江南没有牧羊人，教会事务极度混乱"。从利玛窦以来，连续三个世纪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由于后继乏人，来者又无才能，以致这些旧业都被荒废了。开始是米朗达神父，之后是赵神父和昂里凯神父，由毕学源主教委任为南京教区的代权主教，他们只是偶然到一下教区；而昂里凯神父又回澳门去了，听任教友和司铎们歧路彷徨，茫无领导。②

由于教友们的请求，罗伯济主教从毕学源主教那里得到了南京主教区代权主教的职权，江南教务才开始复兴。罗伯济初到江南，为了避免同代替昂里凯代权职务的盛神父在教区管理上发生冲突，又悄然离开了教区。他离开后，教区又"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两年之前，教友们曾写信给葡萄牙王后玛丽，要求她设法派遣耶稣会会士前来中国；可是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很自然的结论是：葡萄牙的保教权不仅仅不孚众望，而且还是一重障碍，一种危险。"最后，只有上诉教宗了。"我们，你的仆人，在反复深思熟虑之后，在我们悲痛苦难之中，我们再无其他方法，只有向我们至仁至慈的最高大父教宗哀求，呼吁恳请圣父在西方耶稣会会

---

① 罗伯济1835年1月25日、1840年7月18日致罗当神父信，见《中总》，第2卷第1章第9页；又1839年10月致传信部在澳门的帐房神父信，见《传特》，第9卷。

② 他们对教区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措词很激烈，当然未必句句真实。以后，我们将看到，其他中国司铎也用同样的语调攻击了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等神父。

士中，甄选一位博学大德的会士，祝圣为北京和南京的主教"。他必须带领一批人数众多、身强力壮的传教士们结伴同来，因为目前所有的中国司铎都已是风烛残年，或沉疴缠身。在澳门专为北京、南京两主教区培养中国神父的若瑟公学，"已有好多年没有送来过一名能帮助传教的新司铎"。由罗马任命来的主教及其传教助手们，必将受到全体一致的热烈欢迎。"可是，罪仆们由衷叩请并一致提出，我们拥护的是一位耶稣会主教和耶稣会神父。否则众人意见不能统一，很难形成一个可观的多数"。①

这份请愿书的编写者已给传信部指出教区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十五年之后，传信部经过种种困难，终于决定：江南及其邻省各代牧区固定由某个修会或某个传教团体主持，而各区主教即在其本修会或本团体的教士中选拔担任。

这次请愿运动，是在两位中国司铎王若望和张西满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俩曾从毕学源主教那里得到委任罗伯济为代权主教的委任书。他俩都活到目睹耶稣会会士重来江南，再建旧业。那份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的请愿书，是在佘山脚下的张朴桥会口里缮写的，共一式四份，是写在一幅白绢上的。其中一份，由一位中国神父珍藏着，他在临终之前，遗赠给了李秀芳神父。② 我猜想现在保存在徐家汇的就是这一份。经

---

① 假使没有传信部现存的档案，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由澳门发出并在澳门译出的。我认为不是由若瑟公学而是通过传信部帐房寄出的。见《传录》，第10卷。复本及中译本存《徐档》，卷宗B13。我引用的法语译文，根据帅维则神父的译文。见费赖之神父1874年2月14日致德吉列尔米神父的信，《法信》2664。《中总》第2卷第1章中还有意大利译文。

② 郎怀仁 1855年11月3日致省会长信，见《法信》2667。

过中国教友们的多次请愿，终于使罗马感动了。起初传信部曾想把整个江南教区或其一部分划给巴黎外方传教会，① 但虽有建议，却没有实现。1840 年 1 月 13 日，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通知耶稣会总会长，说罗伯济主教已任命为山东代牧区代牧兼南京主教区署理。他要求耶稣会给罗主教“至少派四位传教士给他帮忙”，并听从他的支配。枢机在信下面附了重要的设想说：“仰赖上主庇佑，我们希望，人们还可进入日本。从山东到日本比较近便，人们可以为那里重布福音。”②

从 1 月 16 日起，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以灵魂深处的极大安慰”接受了传信部给耶稣会提供的教区。③

1 月 23 日，弗朗索尼枢机给罗伯济主教颁来了授权文件，并鼓励他说：“再者我通知尊座，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已答允，在最短期内将派遣三至四位会士前来，这为尊座将是一个极大的鼓励。”④

罗伯济主教和传信部帐房若泽神父，一得消息，便一再向总会长罗当神父和传信部上书，催促并请求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罗主教在 1841 年 9 月 18 日上书给总会长说：“本来我在接受主教的爵位时就很勉强，只因我寄希望于父台曾答允部长枢机，在最短期内遣送三或四位贵会神父前来支援，因此我才敢应允。”主教在信内还重提了总会长神父于 1834 年

---

① 满洲代牧方济各主教于 1847 年 10 月 22 日自香港致书比拉蒂神父说：“六年前，人们把江南送给我们，我们一致同意接受；但在赠予和接受的过程中，有人却接替了我们。”见《传录》，第 12 卷。方主教至少把日期弄错了。1840 年初，耶稣会已被征召来江南了。

② 见《中总》，第 2 卷第 1 章第 12 页。

③ 见《传录》，第 9 卷。

④ 见《徐档》，卷宗 B1；见本卷第 17 页。

8 月 18 日安慰中国教友时所作的诺言和保证。①

1840 年 6 月 30 日，传信部秘书卡多利尼神父给总会长罗当神父转来了传信部颁给被指定来华的三位神父的委任状，并嘱三位按教宗本笃十四世的钦定，作了宣誓礼。②

同一天，枢机弗朗索尼给罗伯济主教发出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在这本备忘录里，他为即将启程来华的三位神父和他们的后继者确切地指出了传教的目的。不论在山东代牧区还是南京主教区，他们全体应服从教区负责人的调配；罗主教曾在汇报中表示，迫切需要对中国司铎和教友们进行整顿，由于他们的到来，这项工作会完成得更顺利。此外，"传信部还打算借助这批会士及其继承者们重去开办日本的教务，一俟天主圣意喜悦，便可使这片悲惨的土地解除传教士入境的禁令而重放福音之光。"③

剩下的是，要选定"三或四位传教工作者"，他们首先得前往中国，重操旧耶稣会会士的事业。耶稣会法国巴黎省和里昂省为向江南和其他教区输送第一批传教宗徒而感到荣幸。

---

① 见《中总》，第 2 卷第 2 章第 19 页；并见传信部驻澳门帐房若泽神父 1841 年 11 月致其耶稣会会士兄弟的信、1842 年 5 月致总会长罗当的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2 章第 9、20、23 页。罗伯济 1642 年 8 月 13 日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信；若泽神父 1841 年 4 月 23 日、7 月 6 日、8 月 14 日、10 月 22 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 10 卷。

② 见《中总》，第 2 卷第 1 章第 13 页。

③ 见薛孔昭：《南京教区开辟册》，第 2 页和第 97 页上曾引用了这些文件的节本。

传信部部长枢机在 1842 年 12 月 23 日给罗主教的信上，重申了假如事属可能，即派遣一两位神父去日本的建议。见《徐档》，卷宗B1。

二、选定首批传教士及传教士们到达澳门（1840年至1842年）

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三位神父　他们的被指定和出发前的准备　玛丽-阿梅利皇后的协助　航行到达澳门

南格禄神父是第一批出发来华的负责人。他于1803年6月12日生于法国尚贝里主教区内的巴瑟，所以他原是撒丁岛人。当他在圣路易迪蒙的小修道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于1822年9月8日进了蒙特鲁热的耶稣会初学院，他主要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帕萨热和弗里堡的学生们曾多次对他表示诚挚的怀念。①

1839年至1840年，南格禄神父在昂诺内的阿伊圣母堂，做他的第三年卒试。②不肯轻易表扬人的神师富约神父数年之后说，他从未遇到过象南格禄那样谦卑忘我的人。③

南格禄神父在卒试时，不只考虑他怎样更好地献出他的一生，也不只期望能去远方传教，他还要求到最繁忙最艰苦的传教地区去。在1839年底或1840年初，他向总会长神父自荐，愿去格陵兰为耶稣会开创一个教区。正在那时，传信部部

① 李秀芳1856年7月2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73页起；薛孔昭：《南格禄神父言行录》，第1页起。

② 据耶稣会会规，会士晋升神父后，再作为期一年的最后考验，称第三年初学，或简称卒试。卒试后，发终身大愿。——译者

③ 这句话是1845年富约对薛孔昭说的。见《南格禄神父言行录》，第1页。

长枢机弗朗索尼征召耶稣会会士去江南。这件事启发了总会长罗当神父。1840 年 1 月 11 日，总会长写信给在阿伊圣母堂作卒试的南神父说，他的渴望传教之念来自上主，但上格陵兰岛去创业，目前看来还不可能。①

1840 年夏天，南格禄得知他已被指定去江南新教区，并将是该地区的第一任会长。②

7 月 13 日，他答复总会长，谦恭并愉快地接受了使命。③

他将同艾方济神父和当时尚未指定的第三人（即李秀芳神父）一起结伴同行。

艾方济神父，1806 年 3 月 22 日生于土伊勒里宫，父亲埃斯泰夫伯爵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埃及时的同伴，是王朝的财政大臣。艾方济于 1828 年进了伊西大修道院，1831 年升神父，当马德伦教堂副本堂两年，分担迪庞卢神父的工作，1833 年他进了蒙特鲁热初学院。在弗里堡干了四年教务，又在瓦讷工作了几个月，他申请并得到来华传教的允准。④ 他母亲忍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从一开始，即使在他的儿子死亡以后，她始终是教区最慷慨的恩人。⑤

李秀芳神父生于勒浦伊附近的唐斯，1831 年 9 月 19 日进初学院；他在梅朗和弗里堡读完哲学后，曾为埃斯塔韦耶和梅朗学校服务，当他被指定来华时，他正在瓦尔读神学。

总会长罗当神父的最初计划，是想要在中国重操旧耶稣

---

① 见《徐档》，卷宗 F11。

② 罗当 1840 年 7 月 7 日致南格禄信，见《徐档》，卷宗 F11。可见当时南格禄已被指定去中国，但尚未去信答复。

③ 见《中总》，第 2 卷第 2 章第 2 页。

④ 艾方济于 1840 年 6 月 6 日被允准来华。《中总》，第 2 卷第 2 章第 1 页。

⑤ 见吉代：《艾方济神父小传》，第 1 页起。

会的事业，即科学和传教同时进行。那是根据北京和南京教友们向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和向耶稣会总会长提出的申请，也是罗伯济主教和传信部驻澳门的帐房若泽神父一再要求的。根据这种要求，总会长物色并选拔了上述三位首批来江南的传教士。艾方济和李秀芳两神父被指定专搞传教工作，而他们的会长南格禄神父，则将努力设法深入北京，准备重操十七、十八世纪伟大先辈的事业，用科学和教育来间接传教，可能也是比较有效的，也是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方法。其他正在法国培植的助手，以后将会陆续派来。总会长罗当神父指示新会长，在准备一切远航必要手续时，同时还命令他在巴黎学完管理天文台的主要学识。这对于一个已是三十七岁，当了好几年教师的人来说，确是一件艰苦的使命。在南格禄神父上总会长的许多信件中，透露了他曾用多么大的毅力和传教的热情战胜了学习上的重重困难，因其中一部分，对于他来说还是一种新的学问。①

总会长罗当神父用高瞻远瞩的思想鼓励他："我不知道你到中国后是怎样站住脚跟的；我也不知你是否有机会运用你下了这么大的苦功而得来的知识；但无论怎样，为了天主的光荣而承担坚持下来的这番苦工，天主不会视而不见的。"②

这位未来的传教士，为他的事业找到了一位服务最忠诚和最有实效的帮助者拉尔热托先生，他是经纬局的常委，《气象知识》的总编辑。③

南格禄在信上说："这位卓越的老师真是一位上天派来的

① 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4—8页。
② 罗当 1840年12月23日信，见《徐档》，F11。
③ 南格禄1840年12月8日致罗当信，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5页。

难以用言语赞扬的人，在我该钻研的实用的学问上，他胜过巴黎所有的第一流学者。他讲解清晰无与伦比，他努力提高学识使之适合我的职务，他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简直和我会里的上级一样，他常常表现了既极细致而又毫无保留的服务精神。直到最后几天，他对我仍倾注着慈父般的关切；我和他告别时，他拥抱我如同拥抱他自己的孩子一样。"①

拉尔热托先生还为南格禄编写了好几本备忘录，在南格禄动身之前交给了他，许多还是手稿，其中就有专为中国传教区用的《中国教区实践天文学》。②

在这时期里，南格禄神父还去拜访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为准备远行广收有益的指导。其间，产生了一次严重的误会，几乎误了他的征程。在拜访遣使会当时的总帐房艾蒂安神父时，南格禄神父得知罗伯济和盛神父在教区管理权方面产生了纠纷。按艾蒂安的见解，在江南教区里，唯一合法的管理权应该属于葡萄牙遣使会，他们是已故毕学源主教的合法继承者。所以他肯定，葡萄牙人决不会允许，尤其是没有葡萄牙的许可而从法国前往的耶稣会会士在传教事业上与他们竞争。③

直到传信部有关罗伯济主教的职权问题的通知到达后，这个令人遗憾的误会才得到解决。④

剩下的就是怎样去找一艘开往中国的船只。通过一次漂

---

① 南格禄 1841 年 4 月 23 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8 页起。

② 蔡尚质：《徐家汇天文台史》手稿，见《天文台档案》，第 1 卷第 10 页。

③ 南格禄 1841 年 1 月 7 日致总会长罗当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2 章第 6 页。

④ 总会长罗当 1841 年 1 月 21 日复信，见《徐档》，卷宗F11。

亮的斡旋，终于解决了一切困难。由于德拉维尼昂神父的请求，出入宫廷的迪庞卢神父把神父们的预期计划上禀了虔诚的玛丽-阿梅利皇后陛下；皇后替他们从海军大臣迪佩雷处争取到了免费乘坐"埃里戈纳"号军舰的机会，舰长塞西尔正准备于1841年4月离布勒斯特港。玛丽-阿梅利为了完成她的善举，又供给神父们从巴黎去布勒斯特港的一切开支，并热情地再三嘱托海军大臣好好照顾三位传教士。南格禄曾写信给总会长称赞皇后说："她的表现与其说是我们的保护者，还不如说是我们的好母亲。"①

由于当时的宫廷制度，神父们不敢申请觐见面谢，只得委托迪庞卢神父，向皇后陛下转达他们的谢意。②

外交部亲善地为神父们提供了通过驻华外交官与西方通讯的便利；这渠道至今从未中断过。③

"科学研究院"和"地理学会"很关心科学事业，对如何管理未来的天文台下达了不少的指示。才创办成立的传信善会也送来了一笔二万法郎的哀矜供神父们使用。④

---

① 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8页；见南格禄1841年4月23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3页起。

② 同上。

③ 南格禄1841年4月23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2页。

④ 南格禄1841年2月8日致总会长罗当信，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5页。在徐家汇天文台还保存着那时的四架漂亮的天文仪器：一架天文望远镜、一架反射圈或称巴尔达圈、一架复测经纬仪及一架大的离心镜复测经纬仪。

天文望远镜上有比洛的签名。其他三架有冈贝的签名。这些仪器都由南格禄神父带来，并按照他老师的指示叫人安装起来的（罗当总会长曾批准装置，1840年10月21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高龙鞶神父也肯定（可惜没有指出出处）说，这是皇后玛丽-阿梅利赠予的。我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蔡尚质神父在他手抄的天文台史里只证实有这个传说，但他着重指出，在南格禄的信件中，对此却从无一语道及。见《徐家汇天文台档案》，第1卷第10页。

1841 年 4 月 15 日，南格禄到了布勒斯特，不久即同二位旅伴汇合。二位年轻的遣使会神父翁羊铎和龚伯察也得到和耶稣会会士同样的待遇，坐“埃里戈纳”号启程。1841 年 4 月 28 日，二等舰“埃里戈纳”号起锚了。航行四十七天后，第一次在里约热内卢靠了岸，在那里停泊了四十八小时；七十九天后到了新加坡，终于在 9 月 23 日晚上到了马尼拉，结束了整个航程。

三位远航者的信件中，对舰长塞西尔以及他的参谋副官等常流露出深切的谢意。可是虽有这些先生们的关怀照顾，在这首次远航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五个传教士的铺位就设在帐篷下的炮房内；他们同桌工作，坐在各自的行李箱或提包上；假如风平浪静，他们就在这里举行弥撒；夜间，就拉起吊床睡觉。当风起浪涌时，不用再提这种设备是多么不方便了。5 月 10 日，一个严重的事故几乎使南格禄神父的生命危殆；他所患多年的疝气突然发作，剧痛了好几天，军舰上的军医官认为必需动手术。5 月 14 日，病者从李秀芳神父手领了终傅后，便一心信赖医师，忍受历时四十五分钟的剧痛乎术。结果手术成功，总算救了南格禄一命；只是手术后，他老是得躺着；一连三个月，他被迫停止做弥撒。

南格禄神父的旅伴和两名遣使会神父一有空就学习中国语言。虽然塞西尔舰长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但那时规定，军舰上是不准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的。但教士们至少可混在水兵们中间，和他们谈论天主的道理；这些老实的水兵大多数是布列塔尼人，信念都比较坚定，使神父们真正得到了安慰；在那个可怜的小堂内，约四十多人领了圣体；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原是个加尔文派教徒，也宣誓归正，并初领了圣体；在航程中，

有一个船员病危，由李秀芳神父给他送了终。①

他们在马尼拉停泊了两星期，该处总主教和各教会团体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那时有一艘汉堡人的"天堂"号商船将驶往澳门。神父们便搭了那条船，于10月10日起程，同月21日到了澳门。那时，凡来中国的传教士，几乎人人都要在那里上岸的。②

卓越的传信部帐房若泽神父接待了这批旅行者。在他的帐房里正培训着预备升为司铎的九名中国青年。神父们原以为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这个热心的小住院内做他们的避静神工，③然而第一天，若泽神父去向澳门总督汇报，当总督得知来的三人其实是派赴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时，他马上下令要他们立即出境。南格禄神父和若泽神父同去见总督，费了许多唇舌，终于被允许延期到复活节出境。在这期间，神父们就写信请示罗伯济主教，并等待他的指令。他们还利用这段时期加紧学习中文并研究中国官话，由若泽神父介绍教师并供给书本。若泽神父敦请南格禄神父给住院里的那批中国青年修士们用拉丁话领做了一次圣依纳爵神操。④

神父们一到澳门，便去拜谒了澳门的署理主教德博尔吉

---

① 南格禄1841年6月16日、9月4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7页起。

② 南格禄1841年11月6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23页起。另三位神父分别于1841年10、11、12月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12页起。

③ 避静，就是避闹就静，避去日常事务，专务静思，检查自己内心的神修工作。这种工作或个人单独举行，或更多些人集体举行，由一位称为领避静神父领导讲道。避静，因由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创始的，所以也称"圣依纳爵神操"。——译者

④ 南格禄1841年11月6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23页起。

亚主教，署理主教把圣方济各沙勿略手臂上的一块较大的圣骨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神父们。在法国遣使会帐房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帐房里，神父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①

三、从澳门到上海

中英之战　三位神父被澳门当局驱逐　舟山群岛的逗留　到达上海

按南格禄神父原来的行程计划，是沿袭前辈传教士的途径，经广州、江西再深入中国；可是这次神父们来华，正值清帝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传教士提供了一条既近便又稳妥的路线。

对举世闻名的"鸦片战争"，我在这里只提出对江南教区的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事情。②

众所周知，当两广总督林则徐没收、焚毁了英商的两万箱鸦片之后，由于英国人受了侮辱，他们的财产又大受损失，1840年，英国终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1840年6月，珠江被封锁了；1841年1月，炮台被轰毁了，广州城被迫赔偿六百万两银子，香港也割让给了英国。接着8月，英军攻占了厦门，

---

① 南格禄1842年3月9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5页起。三位神父以及若泽神父给罗马的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古怪和有趣的详情细节，叙述这批新传教士初到澳门时该地教会机构对他们产生的种种印象和猜测。见《中总》，第2卷第2章第14—21页；《传录》，第10卷。

② 在高田：《法国在远东二殖民地的起源》一书和《远东》（拉维斯和朗博主编的《通史》，第10卷第28章第978页）中，可找到详尽的记述和参考书目。

同年10月攻占舟山群岛，1842年3月占领了宁波。当南格禄神父及其属下登上澳门时，① 珠江已被英国舰队控制着，② 对欧洲的贸易又恢复了，一些英国人已在香港定居下来，并开始经营"维多利亚城"。当时法国在澳门也有一个代表，即上校真盛意，他是随英军出征，派来研究如何在新形势的发展下从中谋求法国的商务利益的。因此，法舰"埃里戈纳"号于同年12月调到澳门，神父们又非常高兴地会晤了舰长塞西尔及其官员们。③

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一直考虑着如何摆脱对远东传教区制造种种麻烦的葡萄牙保教权，当香港被英国占领后，罗马马上把这一地区划为宗座监牧区，脱离了澳门主教区。传信部驻澳门帐房若泽神父被任命为香港第一任监牧主教。他立即去香港部署，并派了一位神父专门照顾在香港居住的大量的爱尔兰士兵和水手。

当然，宗座的这一措施在澳门掀起了一场风波。1842年2月29日，④ 若泽神父刚从香港回来，立刻被葡萄牙总督传去，总督勒令他放弃罗马授予的职权并承认葡萄牙对香港的保教权。若泽神父认为传信部的指令是一清二楚的，总督之命难以奉行；澳门总督当场勒令他和他的人员以及中国学生于

---

① 据耶稣会法国省的会士录，总会长任命南格禄神父为江南教区会长的委任书上的日期是1841年4月15日。

② 南格禄1841年11月6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23页。信中他提出启发性的观点："从英国开战后，葡萄牙政府对传教士的态度已不那么傲慢了。"

③ 见《中国丛报》，第11卷第580页。

④ 据额我略十三世修正历，1842年不是闰年，因而2月不能有29日，应为28日。——译者

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澳门。由于真盛意上校的斡旋，限期被推迟了三天；在1842年2月底，若泽神父就在香港定居了下来。①

澳督驱逐若泽神父出境，同时也波及在帐房投宿的三位客人。由于真盛意的转圜，他们才被许可暂留澳门，等待罗伯济主教的指示；但逗留期至迟到复活节为止，那年复活节是3月27日。在这几个星期内，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澳门的帐房李波神父收留了这几位被勒令出境的客人。

3月12日，南格禄神父听到有一艘英国三帆船"马斯登"号将开往舟山群岛，那儿离江南要比澳门近得多，于是就决定到那里去等待罗主教的指示。在香港和厦门两地停泊期间，神父们就对爱尔兰士兵施行神工圣事。1842年5月7日，神父们到达了舟山群岛的定海。从那里去上海比较近便；神父们随即向罗伯济主教报告了他们到达定海的消息。②

在定海，英国驻军军官和督办德尼斯热情地接待了神父们，并帮他们找寻住处。郭士立和美魏荣两牧师是英军部队的翻译人员，对新来的客人也关怀备至。艾方济神父由于通晓英语，对驻军中的爱尔兰士兵施行神工圣事，收效不小。士兵们对神父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便慷慨解囊，以至神父只得加以限制。③

罗伯济主教给神父们的信是由澳门经香港再转到定海的。主教得悉支援人员的来到万分高兴，并敦促从速前往。另

---

① 若泽1842年4月18日致传信部总部信，见《传全》，第15卷第245页起。

② 南格禄1842年3月9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5页起。

③ 高龙鞏神父引自艾方济神父日记。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55页。

有一信，系松江、镇江、扬州等地十七名教友署名，向重返江南的利玛窦神父的同会神昆深表敬意，那封信是用中国式的抒情诗体裁写的，信上说："伏闻至圣教宗，广施恩泽，特遣父台等前来我国，业已抵粤，江南信众，得此佳音，莫不额手称庆，雀跃不已，大街小巷，歌声洋溢。"①

主教得悉三位神父已到定海，随即派他的传教先生和两名教友前往迎接。他们带了罗伯济主教1842年6月20日写给神父们的一纸短笺。神父们商讨后决定把李秀芳神父留在定海，看来在英国国旗庇荫之下，那里的工作可以很安全地展开。

南格禄和艾方济两位神父，以及去山西的两位方济各会神父，于7月4日傍晚，登上一艘英国机帆船"安娜"号向吴淞进发。7月11日安然到达扬子江口，使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又遇见了停泊在长江口的"埃里戈纳"号军舰，它在那儿密切注视着英军的行动，尽管英方对此表示很不满意。②

1842年6月16日，英军占据了吴淞，6月19日占据了上海；并准备顺扬子江大举进攻镇江、南京，迫使中国接受决定性的让步。③

舰长塞西尔再次在他的军舰上招待了他先前的旅客们；7月12日，一条由几名教友驾驶的小船来接两位神父，并把

① 南格禄1842年3月2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17页。

②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39页起。法舰长塞西尔没有取得英军同意，径自乘了沙船到南京，参与签订了"南京条约"。

③ 见高田：《法国在远东二殖民地的起源》，第5页起；又《远东》，见《通史》，第10卷第978页。

他们送到了浦东金家巷教堂。①

神父们从离开法国布勒斯特港至今，已整整十四个月零十六天了。在这漫长的航行期间，英国人已在中国为欧洲各国商人打开了大门，使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条件也随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① 南格禄 1842 年 7 月 22 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4、37 页。

第 三 章

罗伯济主教时期的教区概况

一、刺蓼尼使节来华之前(1842年至1844年)

罗伯济主教和教友们迎接新来的神父　最初的传教工作　“鸦片战争”引起的教区变化　南格禄神父的一些规划　教区与法国“胜利之后圣母圣心善会”建立关系　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的一些指示

南格禄和艾方济两位神父到达金家巷时，罗伯济主教正好有事外出。主教得讯后即迅速赶回，殷勤地招待了两位新来的传教士。7月22日，南格禄神父写道：“罗伯济主教接待我们的盛情是很难用言语来描绘的。他对耶稣会关怀备至，他切望本会在中华帝国深深扎根。从我听到的和接到的信件看来，江南教区的教友，人人心满意足了。在我们漫长的征途期间，他们加倍恳切祈祷，并不厌其烦地向主教请求把我们派到他们各自的地区去。主教为了避免引起教友彼此之间的妒忌，又为了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学习语言，主教明智地拒绝了各方面的请求。主教希望我们袭用本会前辈著名会士的中国姓氏，给我取姓为南，就是南怀仁神父的南。艾方济神父的姓是艾儒略神父的艾。李秀芳神父则和利玛窦神父同姓。”①

两位神父初到时，发生了一件相当麻烦的意外事，使他们了解了上海当时的情况。英国人占据上海后，地方官的情绪非常低落，人们再也不怕他们的敲诈勒索，因此教友们认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前来接引神父，并装运他们的行李箱笼。这些大大小小的箱笼引起了地方上的轰动。一时谣传着“洋鬼子”带来了大批金银珍宝。不久又传说麇集在浦东的地痞流氓准备向收留传教士的金家巷教友村发动一次洗劫。罗伯济主教为了谨慎起见，认为必须尽快地把艾方济和一部分引人注目的箱笼妥善地转移到几十里外的佘山附近的张朴桥会口去。②

几天之后，南格禄神父才和他的同伴们相会。由于“埃里戈纳”号军舰停泊在吴淞，南格禄神父在金家巷逗留了一个星期后再次会见了塞西尔舰长。为了感谢他对神父们的盛情照顾，罗伯济主教赠予舰长和他的军官们一些中国古玩；还有一尊象牙镶嵌的乌木十字架和一顶游金线绣的祭巾（在中国，司铎举行弥撒时戴的一种方形礼帽），托其转呈法国皇后玛丽-阿梅利，因皇后为了神父们的这次远行，给予了极大的帮助。③

7月24日，南神父去张朴桥，罗主教于月底也到了那里，和他们一起欢度了圣依纳爵瞻礼日。④

李秀芳神父一直留在舟山群岛的定海。罗伯济主教考虑，如果这些岛屿长期由英军占领，则就在那里创建修道院，而李

---

① 南格禄1842年7月22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35页。因李与利同音，新来的外国神父一时尚难辨别，误以为是同姓。——译者

② 南格禄1842年7月22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37页。

③④ 同上。

神父就担任办修道院的工作。可是1842年8月20日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这些岛屿退还给中国，英军已准备撤离，罗主教就召回了李神父。10月22日，李神父顺利地到达了吴淞。这次教友们是在夜间乘了一只小船，把李神父接到靠近黄浦的一座公所，用隆重大礼接引神父进堂，并饷以一席丰盛的中国酒筵。①

罗主教随即通知李神父前去会晤，表示请他在江南创办一所修道院；并希望不久后，还能看到成立一所耶稣会的初学院。②

李神父随后也到了张朴桥和两位同会会士汇聚。从开始几个月直到他们能熟练地掌握中国语言并能执行传教任务，教区中国司铎们自愿承担神父们这段时期的一切生活开支。③

数星期过去了，神父们一面把在澳门学得的一些中文加以补充，一面又学习了和官话大不相同的上海方言。罗主教急于要新来的助手们从事传教工作；等他们准备的布道稿经传教先生校正口音能为人们听懂时，就叫他们开始工作。主教留下了南格禄神父供其使唤；在他的教区会长的职权之外，罗主教另委他为代权主教。南神父在没有得到总会长神父批准之前，只答允充当临时代权，因根据会规，他不能接受教区中的任何头衔，在没有得到批准之前，他也不能对教区神父和教友行使任何职权。罗主教乃代向传信部申请，总会长罗当

---

① 李秀芳1842年11月20日致法国某神父信，见《通讯》，第1卷第39页。

② 同上，第40页。

③ 同上，第41页。

神父也表示了同意。从此，教区耶稣会会长就兼任教区代权主教之职。①

艾方济神父负责浦东大片地区的教务，他的总堂设在奉贤的高桥。② 唯一留在江南教区的遣使会石伯禄神父负责浦东其他堂口的教务。③

李秀芳神父专门负责创办和管理修道院，罗主教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1843 年 2 月，在张朴桥已有修生二十二名，其中十七名属江南教区，五名属山东教区。南神父每月前去探访一次，并听修生们的告解。④

对这些初步的和以后的传教工作，我留在下章再详细叙述。

每逢瞻礼日，三位神父会聚一处，如 1843 年 1 月 15 日，艾、李两神父在汤家巷小堂内向南会长神父复愿。⑤ 汤家巷是南怀仁主教逝世之地，当地教友还保存着不少南主教的遗物，并满怀敬意地向神父们出示。一天，艾神父又欣然为一位徐保禄的后裔付了圣洗。⑥ 这位徐保禄就是引进耶稣会会士来上海的大名鼎鼎的徐阁老光启。看来，前辈创业的伟人犹在为

---

① 罗伯济 1842 年 9 月 20 日致总会长信、南格禄 1843 年 10 月 12 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6、16 页；又罗伯济 1843 年 9 月 17 日致传信部信，见《传录》，第 10 卷。

② 罗伯济 1843 年 5 月 26 日和此后几封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54 页起。

③ 盛若翰神父被任命为法国遣使会在中国的巡阅使(监会铎)之后，于 1842 年最后数月间离开了江南。罗伯济主教此后在教区内不愿再接纳新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关于此事，后面另有记述。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15 页。

④ 李秀芳 1843 年 3 月 29 日、5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42、51 页；又 1845 年 6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32 页起。

⑤ 耶稣会会士在未发终身大愿之前，每年必须复愿一次，即重申初愿的誓言。——译者

⑥ 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79、87 页。

后继者的初步工作祝福。

同年4月间，南神父遵照罗主教的要求，在塘湾小堂给教区司铎们举行圣依纳爵的避静神工。这一工作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地方教友由于多年来常受教难的风险，看到大量神父的集合，生怕引起麻烦，做避静的神父们自己也多少感到心有余悸。南格禄神父写道："经过周密的布置和防范，一切恐慌终于解除。有七位神父做了八天的避静，另一位因病未能前来参加。主教亲临主持，并给众人作出专心致志、缄默沉思的榜样；主教看到参加做避静人的心灵都取得成效，感到满心快慰……中国神父由于平素不习惯朗读拉丁文书本，我不得不除了领讲避静之外，还得在午饭和晚饭时朗读拉丁文圣书，这对于我来讲的确感到格外吃力。"①

当神父们对生活习惯以及地方气候逐渐适应时，"鸦片战争"还在继续。英军于1842年7月27日攻占镇江，8月9日直抵南京城下。英军正准备于14日发动攻城时，中国方面的媾和人员出面向英国的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表示愿意商讨条件。1842年8月29日，在"康沃利斯"号军舰上签订了和约；和约于10月27日由道光皇帝批准，1843年6月26日双方在香港换文。

南京条约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②

可是，五口通商势必导致前来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提出在商埠奉行宗教生活的权利。另据葛必达神父1844年4月

① 这一天是1843年5月18日。见《通讯》，第1卷第46页。

② 见高田：《法国在远东二殖民地的起源》，第3页起；又《远东》，见《通史》，第10卷第979页。

14日信中透露，继南京条约之后，另外还签订了一些秘密协定，其中有一条是关于传教士的问题。① 即如有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被拘捕，不得再判处死刑，必须移交给其就近的本国领事。

英军于8月底胜利地返回吴淞，并前往舟山群岛等待执行条约第一条。当亨利·璞鼎查爵士在上海时，罗伯济主教曾多次上"皇后"号军舰前去拜会。看来主教住在上海近郊，地方官是不知道的，主教走访英舰是在夜间进行的。罗主教每次去拜访，都受到殷勤的接待，英国的全权大臣亦乐于与主教谈论中国之事；罗主教出身贵族，对这些绅士们很能应付裕如。军舰上的官员们也对之热情款待，不亚于服侍他们的长官。一次，在宴请主教时，特意由爱尔兰水手上来服侍；大概他们以为天主教主教跟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相仿，也是长期吃素的。因此，这天尽管是星期二，他们却为主教备了一席素菜。②

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上海就来了个英国领事。1843年10月15日，南格禄神父愉快地谈到，原英国炮兵部队上尉③巴富尔到达上海。尽管地方官不断阻挠，巴富尔还是在上海城内找到了一所比较合适的房子，并且定居了下来。④

---

① 见《通讯》，第1卷第107页。据说葛必达神父的这一消息是从舰长塞西尔处得来的。

② 葛必达1844年10月13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73页。

③ 见《通讯》，第1卷第80页。

④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28页起。据葛必达神父1844年8月20日信上说，从几个法国和英国军官那里得知璞鼎查回香港时已完全赞成罗伯济主教的观点，他向驻在各商埠的英国领事具体指出要保护天主教传教士。见《通讯》，第1卷第151页。

法国在上海设置领事馆前，巴富尔先生对天主教的传教士一直很关怀。黄浦江畔的英租界范围已经圈定，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便正式公布对外开放。英美两国的商人不久就在上海城垣之外盖起了洋行洋楼。①

这些英美商人的和平入侵对改变天主教主教神父们的处境影响越来越大。从此以后，至少在上海附近，神父们的行踪不必再躲躲闪闪了。

当时，传教士们的一个不太愉快的邻居，就是基督教新教的传道人员，在设置了英国领事馆后，他们也接踵而来了。伦敦差会的第一个代表麦克拉奇于 1844 年来到；其他英美耶稣教教派从 1845 年后也相继陆续到来。②

一些圣经协会教派的本地工作人员已向教友们散发他们的新旧约和小册子；罗伯济主教不得不向所属教友发出通知，禁止教友阅读他们的书本刊物。为了顾全英国领事的情面，主教在发出通知前，曾先向他打了招呼，但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又发现耶稣教教徒竟把过去旧耶稣会出版的教理书，按他们的观点加以篡改重印后，在上海和四郊散发。③ 南格禄神父代表主教向英国领事表示遗憾。英领事声明，他不愿干预宗教方面的事情；但对篡改书刊，领事认为，"这是有关版权和信誉问题，理应加以阻止；但因事先未能及时通知，深表遗憾；往后，只要及时得讯，类似事件不致再会发生"。④

---

① 见《中国丛报》，第 12 卷第 631 页；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 28 页；高田：《远东》，见《通史》，第 10 卷第 980 页。

② 见季理斐：《基督教差会在华一百年(1807—1907 年)》。

③ 南格禄 1844 年 6 月 4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23 页起。

④ 南格禄 1844 年 11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79 页。我们的传教士对这种类似的作风常常深表不满。见《通讯》，第 2 卷第 318、326 页。

时局的剧变，迫使传教士们的工作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他们的传教工作就不得不和他们的前辈有所不同。在南神父当时的信件中都是些远景规划。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目光是多么的犀利，他已经为后继者要实现的重要事业制定了规划。1844 年 2 月 24 日，他要求派“一批神父或修士能给一些商人的子弟教授英语”。①6 月 4 日，他又列举在上海一带应该陆续举办的事业：中国神职人员的修道院、培训从事教育工作的修士学校、“培育女青年的女修会、医院，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教养院”。②

1845 年，会长神父听到在巴黎正式成立一种育婴善会后不胜欣喜，对办孤儿教养院一事有了把握；他已展望到未来的宽敞的孤儿院，收养着一些被遗弃的中国孩童，给他们授以宗教生活和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各种手艺。③

为此，需要“一批胸襟宽大、又有才德的人员来献身于这项美好的事业”，④又需要“一批满腔热情能吃苦耐劳的修女，她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工作，尤其在初创阶段，必须经受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且还要有在本地的女青年中物色选拔许多助手的能力”。看来，上海是天主上智神奇地安排好为庇护这些事业的地方。“这个城市似乎注定是开放中国的一扇大门，在这里将举办种种慈善事业，在这辽阔的皇朝国土上，它将成为其他城市的一个典范……我不知是否在幻想，可是我

① 南格禄致罗伯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9。

② 见《通讯》，第 1 卷第 122 页。罗主教完全同意这些主张。

③ 南格禄 1845 年 3 月 30 日、1846 年 12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05、443 页。

④ 南格禄 1845 年 3 月 3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05 页。

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将是一座满布宗教机构的圣城，并成为全国各省吸取救灵力量的源泉。"①

南会长既没有忘掉过去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忘掉总会长罗当神父在他临行之前的叮咛，他关心传教事业，同样也关心科学事业。他在1846年就写道："当我们在上海布置就绪之后，我想建立一座小型的天文台。如果人们未必要我们编一本历书，我们也可以另搞一本，在准确性方面一定可以超过第一本。"②

在这期间，南神父原想把他在巴黎辛苦学得的一些知识派上用场，作些观察，并把记录转给他的老师们。他写道："我认为能从中国寄出一些天文地理等的观察资料，这是为欧洲，特别是为法国的耶稣会争得了很大的荣誉。"③ 由于教务工作吞没了他的全部时间，他为无暇从事科学研究而深感遗憾。④

以后，修道院、教育机构、中外修会组织、孤儿院、救济所、医院、天文台及科学机构都陆续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向欧洲开放通商的初期，耶稣会第一任会长能了如指掌地认清教会事业的形势，真是耶稣会的荣耀。

要对四散在江南教区的五万名教友尽到职责，要使上述各项事业能够付诸实施，那需要有大批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声称，来四十名传教士只能够勉强应付，因此，要开展必要的

---

① 南格禄1846年12月28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443页。

② 南格禄1846年12月3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425页。

③ 南格禄1842年9月22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8页。

④ 南格禄1844年5月1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19页。

工作，必须立即增派十二名传教士。①

南格禄神父回忆起，在旧耶稣会时期所有传教区是由耶稣会在各国的各会省来支援的，因此他就向里昂、德国及西班牙的各省省会长申请，要求得到帮助。不久，他得悉，今后将采取另一种措施：即每一教区由耶稣会的一个会省负责提供一切有关人力、物力的种种资助。江南教区则由耶稣会巴黎省承担。②

对于南格禄神父来说这确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他直率地向总会长神父倾吐了他内心的感受。③

他原是耶稣会里昂省成员，曾亲眼目睹瓦尔斯神学院的年青一代决心献身于中国传教事业的一片热情，而今他不得不为抛弃那里的伙伴而感到痛心；另外他还不知道，巴黎省是否能保证向江南教区提供这么些资助。不久，他就安心了，我们将会看到大量的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涌到新教区。

当然，欧洲能保证大力支援新教区，这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能得到巴黎初创的一个祈祷善会为江南千万教外人的归化而奉献祈祷神功，那就更好了。艾方济神父原是巴黎神职人员，他在进耶稣会前已认识了圣母胜利之后大堂的敬爱的本堂司铎谭泽德神父，在出发来中国之前，艾神父曾伴同他的两位同会旅伴拜访过他。1838 年以来，在谭神父的本堂区

---

① 摘自南格禄 1842 年间信件。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5 页。

② 同上；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致法国省会长布朗热神父信中写道："中国教区目下已委托给耶稣会，我把它交给了法国省。"（1843 年 11 月 15 日信，见《总法那罗》，第 3 卷第 70 页。）

③ 南格禄 1844 年 11 月 14 日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3 页。"里昂省耶稣会会士对中国教区满怀激情"，马亚尔神父来信说，"在两处初学院和他的神学院中，人人报名愿来中国跟我们一起工作"。

内，专为罪人归化而创办的祈祷善会和无玷圣母圣心会救灵神效已很显著。这位圣善的本堂神父希望江南教区也能加入，三位神父也接受了一旦在中国条件成熟便建立分会的职权。神父们一到中国，就向罗伯济主教报告了这件事情，主教极表赞同。按李秀芳神父的请求，就把初创的修道院作为这一善会分会的中心，1843年5月6日，即复活瞻礼后第三个星期日，由主教宣告成立。修道院从此命名为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修院修士就成了登上该善会会友录的第一批会员。①

从此，这个善会组织便推广到整个教区，教友们热烈欢迎，踊跃参加。从那时起一直到1865年，神父们在传教中，在经受种种艰难危险时所蒙受的奇恩特宠，都得归功于这个善会。神父们致谭泽德本堂司铎的信札内，满载着对巴黎信友虔敬的圣母无玷圣心的感恩之心。②

开始时神父们把所有的工作、计划、牺牲和祈祷，都一一向总会长罗当神父如实地汇报，总会长在复信中也都是一些鼓励话，并作了具体的指导。由于总会长神父很熟悉罗马教宗和传信部的计划，因此，他的复信富有远见，并十分关心首批来华的传教士。

总会长罗当神父特别关照首批来华的传教士要遵守会规、忠于神修，因此，使旧耶稣会会士在中国能维护修会高度

---

① 见罗伯济主教设立这一善会时的议事录，1843年5月6日信，《徐档》，卷宗B3；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80页。

② 1848年10月4日，谭神父发给编组证件，见《徐档》，卷宗B 10。李秀芳1843年5月22日、1857年12月29日致谭神父信，见《通讯》，第1卷第52页；第2卷第362页。郎怀仁1845年8月27日致总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256页。

的信誉和美名。此外，总会长特别关心的是要求传教士同其他本地的或欧洲的传教士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服从当地主教。① 神父们来到中国是作为罗伯济主教的助手；所以一切行动，除修会纪律外，都应遵照主教的指示。耶稣会是否可以建立会院，在开始阶段传教士是否只应从事传教工作，这一切都应由主教来决定；对传信部总部拨给神父们的物资，也应由主教来负责调配给这广阔的教区中他认为最需要的传教士。②

神父们必须小心地避免去过问主教和教区神职人员的关系，严格遵照主教的嘱咐去完成任务。③

在这一切任务之中，培植本地神职人员是首要任务。当然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也可积极开展科学事业；“尽管这些方法是次要的，但我认为也不应忽视”。④

重返日本的计划仍须常放心头；至于出发的时间和方式，还得由罗伯济主教去决定。在中国的耶稣会会长不必亲自出动，而应由同会的另一个或几个人去尝试。⑤

对于中国教友和中国司铎来说，“祀祖祭孔”的礼仪问题是一个困难问题。神父们应一律严格遵守，也责令其他人员遵守教宗克里门十一世和本笃十四世的禁令，对此不得有任何含糊或犹豫的态度。同时必须防范对先前的传教士作任何

---

① 总会长罗当 1840 年 7 月 7、27 日指示，见《徐档》，卷宗F11。在最初几年里，总会长神父曾规定，所有信件（上述两封信）直接寄给总会长本人。

② 总会长罗当 1840 年 7 月 27 日指示。

③ 总会长罗当 1842 年 12 月 21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④ 总会长罗当 1840 年 7 月 7 日、1844 年 7 月 29 日信，出处同上。

⑤ 总会长罗当 1840 年 7 月 7 日、1844 年 2 月 18 日信，出处同上。当时法国曾有远征日本的计划，南格禄神父曾拟亲往日本。南格禄 1845 年 2 月 15 日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3 页。

过严的批评。南格禄神父在他写给总会长罗当神父的一封信里曾提到，为了表达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看法，有一次他几乎要"跪在举行避静的中国司铎面前郑重地要求指责"过去某些传教士的做法。① 总会长神父严厉地训斥了他的这种感情冲动，他在另一封非常明智的复信中还澄清了那些神父被错误地认为不服从的事实真相；须知错误并不是罪过。②

总会长罗当神父反复叮咛要注意教士们的健康。他深知南格禄神父严于律己，对别人也严格要求，因此特别提醒他必须防止冒失行事，他说："江南遍地水稻，四周又尽是河浜，素有洋人墓地之称。"③ 为此，在开始阶段，④ 他允许从欧洲带来或托运大批生活必需品，当然应该避免浪费。⑤

对传教士精神上的鼓励比起物质支援更为重要，新会长禀性多疑，对同仁往往指责多于鼓励。总会长神父曾写信给他指出："不要老是忧心忡忡，吹毛求疵，要知'过犹不及'，胸襟宽大些，要多看到属下身上的优点，在推心置腹地提出批评时，同时还得循循善诱，多加鼓励。"⑥

罗伯济主教或南格禄会长总是不断地写信请求多派传教士来。两年过去了，法国才派来一批新的传教士，而且准备派到上海的人数少得可怜，与上海所要求的相差很远。罗主教和会长神父的信中充满了懊丧，甚至有些激动，总会长因此也

---

① 南格禄 1843 年 3 月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13 页。
② 总会长罗当 1843 年 11 月 15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③ 总会长罗当 1844 年 7 月 29 日信，出处同上。
④ 总会长罗当 1840 年 7 月 27 日信，出处同上。
⑤ 总会长罗当 1843 年 11 月 15 日信，出处同上。
⑥ 同上。

感到非常伤心。①

总会长神父在回信时，只得反复声明欧洲的长上对中国的迫切期望无法如愿以偿的种种原因。有志来中国的圣召并不少，只因事业纷至沓来，各地新教区日益增多，处处伸手要人；何况委托法国承担的在江南教区进行创业，更需要选拔一些优秀人才。“亲爱的神父，把一年的来往信件中所积累起来的误会，要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中予以澄清，又怎么可能呢！”②

总会长神父不只局限于劝勉和指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对江南教区给予了大量的物质援助，③ 他还积极关心培育新的传教士。一批支援江南教区的积极而又能干的新传教士终于来到了。这是对主教和会长的诉苦所作的最好回答。

二、从剌萼尼出使到松江教友事件
(1844 年至 1846 年)

剌萼尼使节　新生力量支援江南　法国遣使会
撤离江南教区　“黄埔条约”的签订和对天主教弛禁

---

① 罗伯济 1843 年 7 月 28 日、1844 年 10 月 6 日致传信部枢机主教信，见《传录》，第 10 卷第 11 页。罗伯济 1843 年 8 月 4 日、1844 年 10 月 10 日、1844 年 12 月 27 日致总会长罗当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15、22、25 页。南格禄 1844 年 5 月 1 日、7 月 2 日、11 月 14 日致总会长罗当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19、20、23 页。

② 总会长罗当 1842 年 12 月 21 日复南格禄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③ 南格禄 1845 年 6 月 26 日致总会长罗当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32 页。

刺萼尼专使在上海　拨地偿还教区的旧教产　支援
高丽天主教　金安德神父

1843年，基佐内阁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去中国，企图按照英国的方式和中国订立一个商务条约；直到那时，代表法国的只有1829年设在广州的一个领事馆，1844年的领事是伯爵德拉蒂·芒东。①

耶稣会上级决意利用这个遣华使团，送六位得力的传教士去中国。这次和1841年一样，皇后玛丽-阿梅利恩赐他们乘坐使团的军舰免费远航。②

被选的六位传教士是：葛必达、鄂尔璧、笪良仁、郎怀仁、瓦尼五位神父和一位辅理修士辛斐禄。为了照管神父们带的大批箱笼行李，领队葛必达神父提前到了布勒斯特。不久他发现，虽有皇后的保护照顾，但要把这么多的箱笼装上舰船还是相当困难的。整个使团有两艘军舰护送，"西雷纳"号的舰长是夏尔内，"胜利"号的舰长是德热努伊。公使刺萼尼先生带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以及秘书、参赞、商务代表等十六名随从人员。这些贵宾们的行李之多人们是不难想象的，因此这两艘舰艇已经显得很狭小了；负责给使团筹备装运的布勒斯特港务局，打算专为使团加一艘运输舰。当使团人员

① 高田：《远东》，见《通史》，第10卷第981页；又《中国丛报》，第12卷第400页。

② 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2页起；《南格禄神父传》，第20页；《徐档》，卷宗H3。德拉维尼昂神父1843年10月2日致葛必达信说："请注意，对外切勿透露我们有一位高贵的靠山。否则，在目前环境下，可能会引起很麻烦的事情来。"见《法信》2765。

听到有六个耶稣会会士要搭乘舰船，而且还有三十只箱子和行李时，于是他们就夸大这些行李的数字和体积，以此作为借口向交通部施加压力。这样就征到了一艘运输舰“探索”号，给这次远航帮了大忙。他们安排葛必达和鄂尔壁两位神父登上“西雷纳”号，其他同伴则坐运输舰“探索”号。

不幸的是，葛必达的箱笼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有些箱子的确体积很大，因内装圣堂用的祭衣和装饰彩条、书籍、物理仪器以及中国那时还没有的家具；这一切都是为即将建造的会院准备的。还有一大批中国教友们最喜爱的圣像、念珠等圣物。教务帐房穆瓦雷神父为优待去江南的传教士，曾从慷慨的巴黎人士那里征募来一大笔哀矜；而这位太轻信人的帐房穆瓦雷神父却把这笔哀矜交给了他的秘书，即那个出名的阿夫纳埃，从而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诉讼；阿夫纳埃是负责为教区劝募处理捐款的，可是他是个贼，照理应该把他交给法庭处置，但是他这个受到耶稣会信任的人反而向法庭控告起耶稣会会士来了。律师在给他作辩护准备时，找到了供应和装运这些箱子的货单。这是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又是多么重要的宣传材料！一艘国家的运输舰船，竟被征用来装运耶稣会会士的财宝到中国去！各报都争着报道这件事。政府生怕上下议院提出质询，竭力使报纸缄默下来。人们知道幸亏主持这次争端的法官的那种毅力，阿夫纳埃案件才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公愤。①

三艘舰船于1843年12月扬帆启航。它们在里约热内卢会合了。在那里，瓦尼神父由于患着严重的伤寒症，被迫上

① 见狄虚衷：《吉代神父传》，第217页。

了岸。后来三艘舰船到了好望角波旁岛上的圣但尼港，在那里，“探索”号结束了它的航程；郎怀仁改乘“胜利”号，笪良仁和辛斐禄转乘“萨比纳”号。1844 年 8 月，神父们在香港汇合了，传信部帐房方济各会会士费利西阿尼神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①

在这长途航行中，葛必达和鄂尔璧两位神父搭乘公使乘坐的那条军舰，这些高贵的旅伴对神父的评价很高。公使的一等秘书，侯爵德费里埃·勒韦耶在他饶有兴味的《出使记》里，对这两位神父作了很生动的描绘：“在‘西雷纳’号船上，和我们一同去中国的两位神父是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姿态高雅，宛似天神，对他即将面临的艰险处之泰然，令人深感惊奇。当我们这些尘世的外交官在澳门或香港舒适地和（大清）帝国的第一流大臣们彼此平起平坐地就签订和约问题进行会谈时，这位教会的使者将怎样完成他的使命呢：他将把头发剃光，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奔走于中国各地；他将和穷人同吃同住，处于贫病交迫之中，忍受各种委曲侮辱甚至坐牢、挨大板、受迫害、受酷刑；可是他将争取许多人获得真理，减轻民族罪责的重荷，他将给天上人间签订和约；在他的思想中，受苦是甘饴的，死亡就是胜利。”②

神父们在信中对这些高贵的旅伴总是表示感激不尽。剌

---

① 我且把正题放下，分析一下葛必达神父写的富有兴趣的《远航日记》。在头几年来的传教士中，梅德尔和葛必达神父的叙述既内容丰富又生动而引人注目。他俩都善于交际、善于领导，对和他俩接触的军官们和外交官员们影响很大，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许多事实。葛必达神父的旅行日记发表在《中国新传教区来信和消息》，第 1 卷第 18 页。

② 见德费里埃·勒韦耶：《法国驻华使节》，第 25 页。这里指的是鄂尔璧神父，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

蓼尼先生是圣阿舍利公学的老学生，是那个时期不易多得的虔诚教友。每逢主日，他总要在客厅里恭与弥撒。① 他和神父们通过多次长谈后受到了启发，使他在广州完成了对传教事业极有利的使命；后来在上海，他再一次希望见到他的旅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关心着江南教区的发展。②

"西雷纳"号和"胜利"号上的两位舰长夏尔内和德热努伊不久又来到中国，那时他俩都已晋级为海军上将了；他们对江南教区一直表现出是忠诚的保护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看到不少例子。另外，"西雷纳"号上的副舰长、海军上尉克莱雷和葛必达神父的关系相当密切；葛必达写给他的信中充满着友情，很吸引人。③ 最后是使团的主事，不久成为上海第一任法国领事的敏体尼先生也在这次航程中认识了这些传教士，以后他也曾勇敢而又有效地保护了他们。

9 月 22 日，神父们就在香港乘一艘英国的机帆船"克利斯普"号出发，10 月 15 日到达上海。

罗伯济主教得到英国领事的通知后，立刻派了一只小船前往迎接，并把他们送到浦东网尖主教公署，艾方济神父早已恭候在那里了。可是，这次会聚的快乐被一个不幸的消息冲淡了。由于两年来的艰苦岁月，加上辛劳过度而心力交瘁，南

---

① 葛必达 1843 年 12 月 2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81 页起。

② 刺蓼尼回巴黎后，对他目睹的耶稣会会士在江南所从事的种种事业曾予以极度的赞扬。法国省会长吕比荣神父 1846 年 7 月 4 日致南格禄信，见《徐档》，卷宗 F13。

③ 见《通讯》，第 1、2 卷，在葛必达 1846、1847、1848、1861 年的通信集里（《法信》2566、2765）多次提及刺蓼尼先生、敏体尼先生，尤其是热诚地提到了海军上尉克莱雷。这批葛必达的信件里，几乎包括从 1844 — 1862 年所有来中国的法国重要外交官和军官们的通信。这些书信原寄往法国，作为编著《葛必达神父传记》的原始材料，可惜此书始终没有写成。

格禄会长在横塘修道院患了伤寒症，罗主教正在那里照料他。神父们立即赶往横塘，辛斐禄修士就担负起护理工作。由于护理周到，尤其是由于南神父愉快地看到教区来了一批传教生力军，以至救了他的命，数天后他便脱险了。①

罗主教和会长神父原想给新来的传教士几个月的时间学习地方方言和习惯。可是，由于教区的巨大变化搅乱了人事安排，打破了原定计划的实现，迫使罗主教立即派这些青年教士在刚刚学会几句方言之后，便去各地直接传教。教区巨大的变化是1844年5月2日，传信部指令河南省脱离南京主教区，划为宗座代牧区，委托于法国遣使会，该区第一任主教是顶佐阿尔主教衔的安若望。②

此外，同年11月1日，遣使会中国巡阅使盛若翰神父从澳门写信给罗主教说："近接巴黎本会总会长指示，得知传信部对南京主教区作了新的布置，总会长认为本会在该地区的同会弟兄应及早离去。为了服从上级指示，我命令本会各弟兄，在接到我通知之日，立即到达我所指定的地点，不得延误。"③

1845年2月5日，在江南传教的三位法国遣使会会士，当时负责浦东一部分会口的石伯禄神父和传教在崇明的杨安德、郑保禄两位中国神父就这样离开了他们的岗位。

为了了解教区逐步变成目前这种体制的来龙去脉，我们得略微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已看到1837年1月11日传信部

---

① 葛必达1844年10月13日至18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60页起；又南格禄1844年11月20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77页。

② 见《遣使会会士录》，第235页。

③ 见《徐档》，卷宗B7。

发出的指令，得知由于澳门的遣使会因人手不足，不可能满足各传教区的需要，因此曾获准派他们的法国同会弟兄来协助工作；从1837年至1844年，其中五位法国遣使会会士曾来江南传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

当耶稣会会士被征召重来江南时，传信部曾规定江南由两种不同的修会肩并肩地工作，各守各自的会规，在一位代牧主教的管理下，执行着各自的传教方式。当主教所在的辽阔的教区形势较好时，他可以自由地任用这些同事们。②

罗主教厌恶这种措施。当时，他和其他许多教廷的高级教长一般都不怎样喜欢法国神职人员的想法和做法。③他在动身来华前，路过巴黎时也未去访问遣使会神父和仁爱会修女。④他到了澳门，就和葡萄牙遣使会发生了摩擦；1839年他和盛神父关于教区管理权的纠纷，并没有使他减少成见。⑤

罗伯济当了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后，他觉察到教友和本地无会籍的神父们都愤愤怪怨葡萄牙遣使会神父，认为主教区的日趋衰落是由于他们的懈怠疏忽。⑥而且，他们又错误地

---

① 1842年9月17日、12月6日，1844年10月8日的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614页起。

② 枢机弗朗索尼1842年1月22日致澳门帐房吉耶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7。

③ 安若望后来当了河南代牧主教，他曾和罗伯济从澳门去湖广时一度同路。1835年4月27日他写道："罗主教对我们大有成见，反对我们，反对我们的传教区，尤其反对陶若翰神父；他认为法国神职界中尽是些异端和莽撞的人。"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498页。

④ 见《遣使会回忆录》，第481、496页。

⑤ 见本卷第16页起。

⑥ 见本卷第33页起。江南教友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信、若泽1840年致罗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6；又若泽1841年7月6日、8月14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10卷。

把这种偏见引申到法国遣使会神父身上。尽管法国神父来到教区之后，热心传教，① 成绩显著，但是教友和无会籍神父总对他们不满意。而且事情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以致在许多会口，如果不另派其他牧羊人去，势必引起教友群众的反抗，有导致裂教的危险。②

派遣耶稣会会士来江南的消息传开后，反遣使会运动真如罗主教给澳门帐房和传信部长信上说的那样，已发展到他已无法抵御的地步了；这是由于他早已抱定主张，也许是由于他制止得不够有力的缘故。当第一批耶稣会会士来到江南后，罗主教就认为他辽阔的教区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人力了，于是他声明，在教区内存在着耶稣会和遣使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和做法，他们之间必然会不断地发生往昔中国传教区内备受痛苦的分裂。③ 为此，除了早已在教区工作的人以外，他拒绝接受任何新来的遣使会会士，甚至，凡是没有他的允许而进入教区的，即使只是路过，也将给予摘权④的处分。⑤

遣使会中国教区巡阅使盛神父用传信部 1842 年 1 月 23

---

① 见若泽致罗主教和传信部信。

② 见若泽致罗主教和传信部信。若泽神父出于对双方的信任，听取了彼此的诉苦，他对那时忠于保教权的葡萄牙遣使会会士也非常反感，因此他比较公正地对待法国遣使会会士，并努力说服罗主教支持他们。

③ 罗伯济 1842 年 7 月 16 日、8 月 4 日致盛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13。对这问题，遣使会会士都同意他的看法。在中国的盛神父和在巴黎的艾蒂安会长曾多次谈到这事。艾蒂安于 1843 年 5 月 17 日给传信部部长枢机上书说："我不必再向钧座指出，对于中国，必须避免在同一省内存在完全不同的修会。"见《传录》，第 10 卷。

④ 摘权：即剥夺神父举行弥撒和施行圣事之权。——译者

⑤ 遣使会驻澳门帐房吉耶神父 1842 年 12 月 6 日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17 页。

日发出的部令向罗主教提出抗议，宣称部令并不曾把遣使会会士排除在江南教区之外，但是他的抗议毫无用处。罗主教的答辩是，按部谕，主教有全权接受或拒绝前来献身协助传教的人。① 诉讼上到罗马，罗伯济胜诉了。② 1842 年 12 月 23 日，弗朗索尼枢机表示希望遣使会会士和耶稣会会士在罗主教的辽阔教区的不同地区分段合作的同时，承认主教对于辅助人员的人选有取舍的自由。枢机主教还预示将采取解决的办法，即将罗主教辽阔的地区划分为几个代牧区，每个代牧区将委托于不同修会中的一个修会。③

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也向传信部申请，要求把南京教区委托给遣使会，由他们会中选拔一位代牧主教来管理教区；罗伯济主教则留任山东，由耶稣会会士做他的助手。④

1843 年，传信部专门为这个问题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艾蒂安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因为江南的本地神父和教友都表示反对遣使会会士。结果，会议决定把河南省划为宗座代牧区，托给遣使会管理。同时准许罗伯济主教自选一位副主教去管理山东。⑤ 这样，罗伯济主教的管辖区是缩小了，而传教修会间的争夺和纠纷也避免了。从江南划出河南省的诏书上所注

---

① 这些令人难受的信札片段保存在«徐档»，卷宗B7(盛神父信)和卷宗B13(罗主教信的底稿)中。

② 罗主教、盛神父、吉耶和艾蒂安神父 1842 年致传信部的好几封信，见«传录»，第 10 卷。

③ 见«徐档»，卷宗 B1。

④ 艾蒂安 1843 年 3 月 17 日致传信部信，见«传录»，第 10 卷。

⑤ 见«传特»，第 23 卷第 169 页起，这些诉讼笔录很确切扼要地记载了罗主教和遣使会上级双方提出的理由。圣部认为罗主教的态度对法国遣使会太生硬了一些。

的日期是1844年5月2日。①

人们预料，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决不会同意让他的那些在江南工作的会士们再拖延逗留下去。

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曾谆谆嘱咐南格禄及其同伙们，对这种痛心的内部纠缠务必置身局外，而必须和圣拉匝禄的会士们保持着诚挚的关系。② 他本人和弗朗索尼枢机同样都恳切地希望两会的传教士们能在辽阔的南京主教区内划界耕耘；他曾经根据这个目标写信给罗伯济主教，可是毫无结果。③

江南的神父们诚心诚意地听从了他们总会长的指示。可是不久，他们也卷进了葡萄牙遣使会关于保教权的令人痛心的争辩之中。但他们与法国遣使会却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当盛神父一获得耶稣会会士重未江南的消息时，他曾写道："但愿耶稣会神父备受欢迎，对教区作出更多更好的成就，在那里需要做的善事正多着呢；既然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幸福要求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而不是耶稣会的敌人，因此，我们应当尊敬他们，我们将诚心诚意地接待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是我们唯一的最高主子派遣来的使

① 部令下达的同时，弗朗索尼枢机还附信（1844年5月23日）给罗伯济，允许其为山东自选一位副主教。见《徐档》，卷宗B1。

② 罗当1842年12月21日致南格禄信，"当你们知道圣部决定遣使会会士将撤离南京主教区时，我想不必再来提醒你们，不要忘记基督要求的是谦让和友爱"。见《徐档》，卷宗F11。1843年8月20日又有同样的指示（出处同上）。

③ 罗伯济1842年7月25日复总会长罗当神父信，见《徐档》，卷宗B13。

者。"① 他写信给罗主教说："我深深认识到这些神父们满怀着高尚的精神，所以我毫不怀疑，他们一旦到了南京教区，他们必将会和我们的同会弟兄们融洽相处。"②

在我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可悲的事件之后，南格禄会长说："我们同这些神父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各尽所能地互相帮助。对教区所发生的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彼此都很谨慎，尽量避免谈及，好似事不关已。"③ 接着，他又写道："遣使会的先生们④ 已离开了我们，他们给教区留下了一大片空白，我们新来的几个神父，远远不能填补……我们同这些先生们的关系一直十分和谐，直至他们离去；用我们法国话来说，即我们分散后还是好朋友。我们曾为了天主而背井离乡，抛弃了世界上最亲爱的一切来到这天涯海角，如果由于卑鄙的野心却去毁坏主的工程，那么我们真是太可怜了。"⑤

遣使会神父离去后，鄂尔璧、郎怀仁和笪良仁三位即奉命到浦东和浦南协助艾方济神父；葛必达神父则被派去顶替崇明两位中国籍的遣使会神父杨安德和郑保禄。他到了崇明几星期之后写信说："你曾否设想一个才摆脱神学院教室、毫无经验的青年教士，离开了欧洲，刚刚到达如此遥远的地方，既

---

① 盛神父 1842 年 3 月 2 日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12 页。在盛神父的后一封信里，似乎责怪罗主教的这种作风是耶稣会会士引起的；又 1842 年 9 月 17 日信，《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615 页。这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设想，我目睹许多信札，可资证明，何况，罗主教此后的行动说明罗主教的禀性决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耶稣会会士也碰到同样的情况。

② 盛神父 1842 年 7 月 23 日信，见《徐档》，卷宗B7。

③ 南格禄 1844 年 11 月 14 日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3 页。

④ 遣使会神父在法国称先生。——译者

⑤ 南格禄 1845 年 2 月 15 日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60 页。

不会讲那里的语言，又不懂那里的习俗，却要单独地去替代两位老练的传教士尚且觉得力不胜任的教务；派到和同会弟兄们相距二十里之地，没有领导，没有跟班的传教先生，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一个能理解他的人。会长所嘱咐的唯一临别赠言，就是一切服从主教，而主教的种种指示，总括起来就是：'我知道你困难重重，你自己去尽力设法解决就是了。'"①

虽然葛神父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但当时的处境的确异常艰苦。他在接到罗主教命令的当夜，彻夜流泪祈祷，翌日还去苦苦哀求南会长，要求给他调一个岗位。会长深知他的品德学问和办事能力，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葛必达终于克制住自己，毅然决然地动身。由于他服从命令，因此他到任后不久便获得了显著的成绩。②

其他几个新来教士所处的岗位，同领导和同会弟兄们相距都并不那么远，得到的帮助就比较多。但他们只学习了三个月的方言之后就去工作，因此困难也不少。然而，他们的会长却以其最大的慈爱和最大的努力，使他们从业伊始就得到了便利。神父们说，南会长在累得喘不过气来的传教工作中为他们编著一本关于上海方言的语法和词汇书，他们接到此书时都表示说不出的感激，彼此急急忙忙抄录了这些本本，因此他们就能较快地去听教友们的神工了。③

---

① 南格禄 1845 年 4 月 22 日，见《通讯》，第 1 卷第 209 页。

② 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 8 页；《徐档》，卷宗 H3。薛孔昭写了南格禄所叙述的片段。凡是了解葛必达的胆量和闯劲的人，这一片段很能说明他开始时所遇到的重大困难。

③ 葛必达 1845 年 1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93 页。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同神父们一起航行的高贵的旅伴们在广州为法国和为天主教完成了一件卓越的工作。剌萼尼先生一到澳门，就看到了罗伯济主教写给他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主教为他提供了目前中国天主教的情况，追忆了过去教会所处的光荣地位，陈述了从乾隆以来遭受的和至今尚未中断的大大小小的迫害。主教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由于抗英战争的失败，中国官员已弄得垂头丧气，那么象法国这样一个得到尊敬的强国，假如为了宗教的利益提出某些要求，中国必然是会有求必应的。①

驻澳门的各帐房神父，也和南京署理主教一起提出了申请。

剌萼尼先生给罗伯济主教写了一封极有礼貌的回信。他肯定将会象路易十四世时代那样，"法国国王永远是个最虔诚的信教君主"。他声称为使自己不辱使命，他很重视传教士们提供的情况以及为了传教事业所作的斡旋。"对于在中国的天主教代表们长期以来日积月累所汇集起来的关于当地的知识，我深知其有重大价值"。②

这并不是一些空洞的客气辞令，剌萼尼先生曾接到政府训令，务必保证让法国也得到和英国、美国同样的权利。在美国的(望厦)条约第十七条是这样写的，"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

① 见《教会之友》，1849年12月8日，第144卷第110页。《通讯》中的题目是《宗教在中国》，它取材于《罗马观察报》，疑是那时已回罗马的罗伯济主教所写或受他的启发而写的。因为其中有大量叙述罗主教的详情细节。

② 剌萼尼的这封信于1844年8月28日发自澳门，保存在传信部。见《传录》，第11卷。

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① 此外，葛必达神父还引证，②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的全权大臣在秘密会议上又附加了这样一个内容：此后，凡在帝国内地被拘捕的传教士，不得再处以死刑，必须引渡到他最近的本国领事馆。

1844 年 10 月 24 日，中法条约在巡航舰“阿基米德”号上签字，这就是黄埔条约。黄埔是广州东郊外的一个岛，在那里英国已设置了领事馆。③

该条约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条，给传教士的处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为此，地方官和法国领事协商成议后，指定最适宜的地段建造法国人的宅院，并指定地点供建造上述建筑用。根据条约第二十三条，法国人在通商口岸附近旅游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假如地方官审判并有理由拘捕传教士时，应该将他们引渡到最近的法国领事馆。只要地方官稍微再宽容些，这条条文还可扩大到内地的传教士，那么，象最近发生的董若翰神父被绞杀的惨案，就可以避免。④

1845 年 8 月 25 日，中国全权大臣耆英和刺萼尼公使在澳门互换了批准书。在会谈中，耆英对天主教传教士潜藏在帝国的情况及其人数都非常清楚。他断言官员们不会严格地

---

① 见《中国丛报》，1845 年 12 月 14 日，第 570 页。

② 见本卷第 54 页。

③ 见拉沃莱：《中国和法国》，第 99 页起。拉沃莱在序言第 6 页里也承认该书内容不够完整。我一再读了他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及文件》，法国外交部的《刺萼尼使团》（第 6—9、13—15 卷），待有机会再作补充。

④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 年）》，第 3 页。

执行条例，把在内地的洋人拘捕并送到通商口岸来。但传教士务必审慎，使地方官对他们的存在继续保持眼开眼闭的态度。①

公使为了使教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利用他和全权大臣耆英之间的极亲密的交往，请他上奏皇帝，恳请给天主教更大的恩赐。这位两广总督在1844年12月28日的奏本里曾引叙了几件民间流传的反对天主教的事例，承认这些罪行"都是借宗教为名的坏人们干的坏事，与西洋各国信奉的宗教无关"；这个教过去曾多次蒙御批钦准，从未加以禁止。由于法国公使的要求，耆英敢"仰恳天恩，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至于外国传教士，"只准其在通商口岸建堂礼拜，不得擅入内地传教，倘若违背条约，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经拿获即解送各国领事馆。"奏上，皇帝朱笔御批"依议钦此"。事实上，耆英的奏折即转成了上谕。②

对剌萼尼公使活动的作用，各地的评价极不相同。许多传教士认为一无用处，据他们看来，中法条约上有关保护宗教的款项以及皇上对教会的谕旨，在内地很少有人知道，地方官也并不重视。③ 在离海较远，对洋人没有多少恐惧的内地，事

① 见剌萼尼使团的二等秘书伯爵德阿尔古：《法国遣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1844年)》，载《两个世界评论》，1862年6月1日，第655页。

② 见拉沃莱：《法国和中国》，第235页起。

③ 伯爵德阿尔古上引著作，见《两个世界评论》，第667页起。对这些看法，他认为是不公正和不知恩的表示。相反，他引证江南的神父们对公使剌萼尼却表示感激。从1846年起，广州领事德贝古尔先生就已经在抱怨"中法条约"和皇帝上谕在帝国内地仅是一纸空文；德贝古尔1846年9月20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04页起。

情可能是如此，但在江南情况就不一样。罗伯济主教一下子就看出了，通过全权钦差大臣从皇帝那里获得的种种让步将会给他和他的司铎们多大的力量啊，尤其在这道上谕里更感到皇恩浩荡。上海的领事们将负责提醒对上述条约掉以轻心的中国官吏们。1845 年 2 月，罗主教在苏州颁布了一张热情洋溢的谕单，嘱令属下教友连续在三个主日上举行谢恩祈祷，① 并奉劝中国神父和教友们更努力地修德行善，为仰报皇上的宏恩，树立更好的榜样。②

南格禄会长别无其他想法，当刺萼尼公使回去时，他曾写信到法国说："四散在中国内地教区的洋人中，有些人称法国公使在这伟大帝国里是教会的救星；可是也有人对公使在中国所办的事抱怨不满。在听不到英国大炮轰击声的遥远内地，对刺萼尼先生获得的弛禁上谕并不那么欢迎，因为反而引起人们对教友的注意。在这以前，内地的传教士尚可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求得太平，如今反要受到一时的麻烦了，因此产生不满。若干传教士则要求刺萼尼公使向皇帝要求传教士有进入帝国内地的自由，并要求将皇谕在各省公布。可是这能否办到？是否应该从这点上着手？至少我们希望公使的努力能逐渐见诸成效；而对天主教弛禁上谕的宣布将能摧毁中国人头脑里的许多偏见。"③

---

① 见《中国丛报》，第 14 卷第 199 页。

② 稍后，罗伯济还写信（1845 年 4 月 5 日）给外方传教会设在澳门的帐房李波神父。信由李波神父转给德贝古尔，由法领事转递到巴黎，法领事还加上注说："罗伯济主教是一位杰出的教长，皇后陛下曾授予最慈惠的荣誉。"见《通讯》，第 2 卷。

③ 南格禄 1846 年 5 月 2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33 页。

不久，神父们在上海获悉法国公使为完成他的使命，将巡视新条约中规定的给法国商业开放的各个商埠。1845年10月17日，公使来到了上海，带着六艘军舰，由舰队副司令少将塞西尔率领。罗伯济主教和江南的神父们都期待着他这次威武巡阅的巨大成果。刺萼尼公使将从上海道台处索还旧耶稣会在上海城内建造的老天主堂、神父住院以及南门外的教士墓地(圣墓堂)。①

公使在政府训令的范围内，尽力满足教士们的愿望。上海高级官员对公使的隆重款待和尊重，以及公使本人处处突出表现自己是一个天主教教友的事实，对胆小的江南教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刺萼尼公使曾带领使团高级官员去上海城内教友集中的三座小堂，恭与罗伯济主教举行的弥撒。②他又多次接受罗主教的访问，并亲自到浦东金家巷正式回访主教。③

刺萼尼先生在和法国外交部的通信中，写下了对这次回访的深刻印象。“先生，我在那里看到了法兰西的国名受到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赞扬，他们在国王代表前，争先恐后地歌颂

---

① 葛必达1845年4月22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18页。信上写着当时教友中流传的一个老传教士的预言，当官府没收老天主堂逼迫他离开时，他说：“白的让位给红的，百年之后，红的又将让位给白的。”那时正过了一百年。

老天主堂没收后改为关帝庙。“红的”指庙里供的红面关羽。——译者

② 刺萼尼1845年12月6日从澳门写给外交部的信（此信拉沃莱没有引用），见：《回忆录及文件》(中国部分)，《刺萼尼使团》附篇，第12卷。

③ 南格禄1846年5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35页起。一个可悲的消息冲淡了这次快乐的回访。公使刚接到从法国寄来的报纸，报上刊登着由巴黎大学出面写的攻击耶稣会的文章，并威胁将准备对他们进行种种迫害。公使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罗伯济主教，罗主教转告了与会的南格禄会长，南格禄对法国走上这样的道路表示痛心。公使和舰队司令塞西尔尽力地安慰他。

祝福，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也不会抹掉。”①

上海道台毫不费力地同意叫人把弛禁上谕张贴出来。②

剩下最棘手的，是归还上海天主教的旧教产问题。公使本人、海军上将以及供给剌萼尼公使宾馆的英国领事巴富尔先生，都相信可以圆满解决。③

然而，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官员们的诡计多端，南格禄叙述说：“剌萼尼公使是很老练的，他去拜访上海道台时说：‘我去拜访两广总督（指耆英）时，他给了我一件宝贵的礼品：给中国人民颁布了敬拜真天主的自由。我这次荣幸地来拜访阁下，希望阁下也能送给我一件贵重的礼品。’接着，公使就提出了归还旧教产的要求。”④

道台一听到这个要求，便不加考虑地连连宣称，这完全越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他无权处理；还说，如果上海民众见到一百多年来已由皇帝敕令充公的产业复归于洋人，他们定将起来反对。⑤

既然一无所得，为了表示愤慨，法国公使拒绝了道台的馈赠，临行回舰时也不准中国官员们护送。⑥

这次的挫折使传教士们大失所望。数星期后，南格禄神父在信上写道：“在群众的眼里，判断一切事情就要看其成果。这件事情的不良结果，总的说来大大地损害了公使的威信，也

① 剌萼尼 1845 年 12 月 6 日信。
② 同上；又南格禄 1846 年 5 月 26 日信。
③ 同上。
④ 南格禄 1846 年 5 月 26 日信。
⑤ 剌萼尼 1845 年 12 月 6 日信。
⑥ 同上。

牵涉到法国的声誉。"①

公使竭力向罗主教和传教士们解释，并劝告他们办事不宜操之过急，"致使功败垂成"。②

可是公使并不放弃他的计划。上海道台把自己无权处理作为挡箭牌，那么如能求得皇上的一道新的上谕，一切困难不都迎刃而解了吗！于是刺萼尼公使回到广州后，继续承担索还天主教在中国的旧教产的责任，全权大臣耆英答应再向北京作一次新的尝试。

尝试的结果很圆满。1846 年 3 月 18 日，两广总督在广州宣布了 2 月 20 日的上谕。上谕除重弹过去诬陷若干教友的老调外，承认了"天主教教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然不同，业已准免查禁。为此皇上钦定，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如勘明确实，准其归还该处奉教之人"；"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③

在肯定天主教教义劝人为善的特征方面，这第二道上谕比第一道更明确。这道上谕到了传教士手里，就成了同地方官作斗争的最锐利武器；不久，我们将看到江南传教士的领导人利用了这道上谕，并依仗上海领事们的支持，摆脱了不少困难。

---

① 南格禄 1846 年 5 月 26 日信。

② 刺萼尼信，公使向政府所作的工作汇报。又 11 月 6 日，公使给"西雷特"号上的旅伴葛必达神父的信，信中总结他出使的成绩说："我感谢天主，使我能造成一种形势，我希望它不久将普及到整个帝国，而且能巩固下来。"见《法信》2765。

③ 见《中国丛报》，第 14 卷第 539 页。
上谕原文，见《正教奉传》，第 6 页。——译者

神父们不会忘记这位熟练和热诚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努力，通过耆英的请旨得到了两道上谕。12 月 2 日法国发生了政变，刺萼尼先生因不愿为新政权服务而被解职；他引退后，常把能接到葛必达神父及其同会弟兄们的信件，欣知他们享受他出使时取得的成果，看作为自己的幸福。"我欣悉我出使时的工作，虽有阻力和某些官员的刁难，但终于因收到基督文化与宗教自由的极大成效而感到高兴"。①

在这重大的交涉中，却有一幕喜剧性的插曲。来上海的一批耶稣教牧师很遗憾地看到，由耆英请旨得来的两道皇谕中，只指定专为"天主教"，这是罗马公教的一个专用名称；并指出这个经官方批准的教会特征是供奉十字架和圣像。② 很显然，刺萼尼公使没有想到他们。当刺萼尼公使来上海时，文惠廉和麦都思两牧师要求公使向皇帝声明，他的要求既代表天主教也代表耶稣教。但他们没有得到公使的答复。英国领事拒绝插手这件事情。最后美国领事福布斯答应为他们向中国官方交涉。1845 年 12 月 22 日，一贯表示友好的耆英答复说："本大臣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至规矩之或异或同，

---

① 刺萼尼 1848 年 3 月 22 日信。此后几年内，刺萼尼还写给葛必达神父不少信，陈述了同样的意见。最后一信是 1861 年 11 月 26 日写的。见《法信》2765。

② 在中国，为了区别于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一般称为耶稣教。他们教派虽多，但都以十字架作为标记，却不象天主教在十字架上还钉有耶稣形象的"苦像"。他们也不象天主教，除供奉十字苦像外还供奉圣人们的雕像或画像。耶稣教人认为，天主教的敬礼苦像和圣人像，都是偶像崇拜。——译者

断无分拒之理。"①

要求是满足了，但还是美中不足，因为牧师们在中国借用的"耶稣教"这个名称还没有明白指出，牧师们应当认为满意的，是从此他们也可利用法国公使为天主教争得的种种权利了。

1845 年 4 月 22 日，南格禄会长把第一个传教士的死亡消息报告了省会长神父；4 月 20 日，辅理修士辛斐禄在横塘死了。他来中国只有几个月，他以他护理病人的老经验和他的服务精神，给教区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可惜由于他工作过度，积劳成疾，终因咯血而死。② 遗体就临时葬在横塘神父住院附近。

1846 年对教区来说是个欢庆之年。有八名神父、两名读书修士、两名辅理修士，共十二名传教士到达了教区。第一批由卜亦奥神父带领，于 1846 年 5 月 24 日到达上海。③ 第二批于同年 8 月 20 日到达，由梅德尔神父率领。④ 他们是坐商船来的。

在新来的人中，我们应特别指出四位姓马萨的同胞兄弟，他们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男爵德佩斯加斯罗利的儿子。⑤ 其

---

① 见《中国丛报》，1845 年 11 月和 12 月，第 14 卷第 549、587 页。剌萼尼公使回到广州后，同意在耆英面前支持耶稣教牧师们的请求。见拉沃莱：《法国和中国》，第 287 页起。

原文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128 页。——译者

② 南格禄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07 页。

③ 神父：卜亦奥、陆建石、薛孔昭，读书修士马驷堂、辅理修士娄良材，后在香港又汇集了神父马奥定、马再新和他们的兄弟辅理修士马义谷，他们是乘英国商船经由苏伊士运河而来的。见《通讯》，第 1 卷第 374 页起。

④ 指梅德尔、丁恭思、魏道味三位神父和读书修士施于民。

⑤ 这门有圣德的家庭共献了九个孩子给天主，他们都进了修会，见薛孔昭和勒肖夫：《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

中两位：卡热唐(马驷堂)和尼古拉(义谷)，由于谦虚，进会时只愿当一名辅理修士；他们后来都读完了神学，在江南升了神父。奥古斯坦(奥定)和勒内(再新)早已升了神父。最年幼的路易于两年后亦来中国同他的哥哥们会合。卡热唐是最早由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派遣来中国，指定给罗伯济主教当秘书和助手的，因为当时罗主教向总会长要求派一个既有教养又要仪态高贵大方的意大利修士来担任这个职务。三个兄弟就要求总会长准许他们和大哥同去中国，不久他们就在香港和大哥会合，他们是取道最近的航线，经由苏伊士运河而来的。①

增添了这批旺盛的生力军后，使现在江南有了十五名耶稣会神父，因此南会长才敢接受新的本堂区域。马驷堂和施于民两位读书修士送去横塘修道院，后者不久就升了神父，替代了李秀芳神父的职务。在耶稣会那不勒斯省，马义谷修士曾做过省会长神父的协理兼一些重要会院的帐房，他被罗伯济主教看中，选为秘书，替代先前指定任该职的马驷堂。其他神父分派到目前松江总铎区内的几个岗位。薛孔昭神父被派到苏州总铎区的常熟，魏道味神父则去崇明及海门帮助葛必达神父。罗伯济主教关心山东代牧区，那里的司铎人数比江南更少，他就要求南会长帮忙，于是郎怀仁神父在1846年10月26日，李秀芳神父于1847年2月24日受命动身前往山东。

1846年3月18日，刺公使屡次要求而获得的归还天主教教堂教产的上谕在广州张贴公布了。是年8月，罗主教和

① 见薛孔昭和勒肖夫：《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37、57页起。

南会长决定要求上海地方官先发还上海城内天主教的老教堂和旧教产。但是，要进行交涉却困难重重；因为上海官员认识的教士不能出面，而上海附近地区的神父，即使凭着弛禁上谕，但究竟还是禁入内地的，所以也难以出场交涉。于是决定在新来面还没有被认出教士身分的神父中选出一位，去承担这个任务。正巧在1846年8月30日到上海的神父中，有一位办事很精练，看来完全适宜去办这桩棘手事的人，这就是梅德尔神父。他原是法国芒市主教布维埃的外甥，曾当过他舅父的私人秘书多年，他从这位卓越的老师那里学得了许多办事能力和经验。1841年他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在拉瓦尔迅速读完神学后，奉命被派来到江南教区。①

梅德尔一到上海，上级就委任他为教区帐房，因此他和驻沪的洋人有频繁的往来和联系，特别和最近代替巴富尔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以及怡和洋行的代理人、丹麦领事代理人亚历山大·卡尔代交往更密。这些先生们都殷勤献策，争相布置一幕小小的政治性喜剧。大家同意让这位上海官员们还没有认识的梅德尔神父，不用传教士的名义，仅以一个法国青年神职人员的身分出面，自称来华使命是专为调查刺萼尼公使求得的弛禁和发还教产的上谕执行的情况。梅德尔在道台面

---

①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传》，第73页起。书中薛神父叙述了一桩典型的轶事。布维埃主教本人原是个杰出的神学家。他曾编著过不少经典著作，历来为许多修道院所采用。他又亲自栽培了这位青年修士梅德尔，他很器重他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又委任他为芒市主教区的良心问题的解答者。可是奇怪的是，当梅德尔第一次去考神工书时，竟不及格，必须补考。芒市主教数天后知道了这件事，叹着说："直到如今，我仍对你的考试成绩表示怀疑，现在我懂得了。"布维埃主教曾一再带讽刺地对拉瓦尔院长说："但愿你的神父们多多研究神工书，他们在芒市的听神工的神权，还得由我颁发的呀！我正指望着他们哩！"

前出现时，只穿一身法国式的教士服装。

要求归还的教产有三处。首先是潘国光神父建造的那座老天主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座教堂曾是上海地区教友宗教生活的中心；目前已改为关帝庙。这样，即使根据上谕，也已失去了一切索还的权利。在教堂旁边一座原属于神父住院的房屋和一个花园，那时还空着；只是屋子已成为城内儒生们集会的书院。最后，南门外的那块旧耶稣会会士的墓地里保留着的不少墓碑也可证明它的来历，墓地小堂和四周垣墙则都已坍毁了。①

对这些产业所有权的证明，只有靠民间的口头传说和回忆了。梅德尔神父经过调查后，根据有据可查的情况编写了一本备忘录，交给了两位领事。在和道台会谈的前夜，卡尔代先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他提出要求发还老堂，道台必将用上谕来拒绝；那么他就用同一个上谕来要求归还其他教产。

卡尔代先生的方案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谈交涉后数

---

① 在这里我扼要地摘录南京教区司铎黄伯禄神父：《上海老天主堂记》和《圣墓堂记》中的一段回忆。黄神父由于曾在《汉学杂纂》里发表过许多著作而出了名。见《徐档》，卷宗H。这里讲的关于圣墓堂的一桩美妙的轶事是黄神父从圣墓堂守墓人的子孙中搜集来的。据说，当1724年神父们被驱逐时，有一家姓潘的教友看守潘国光神父建立的墓地；他给城内占据神父住院的秀才们纳了一笔为数不大的租金，因此得以继续看守墓地，挽救了公墓。到了1800年，这姓潘的教友不再关心给子女付洗，事实上他已背弃了宗教。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嫁给了一个教外人，虽然她没有领过洗礼，可还知道一些娘家过去的传统，有时她也想回头重奉她祖先们所信奉的天主教。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让他们幼小的独生女儿去选择，他们在她面前放了一串念珠和一个小菩萨，女孩推倒了小菩萨并踏上一脚，却把念珠紧握在手。夫妇两人认为这是天主圣意，于是就要求领洗。1842年2月10日，在张家楼由石神父替他们付了洗。见《上海老天主堂记》，第21页。

天，南格禄神父叙述说："卡尔代先生那天早上伴同领事及其译员去会见道台，一手拿着申请书，一手拿着皇帝的上谕。他要求发还已改为庙宇的老天主堂。'你是在给我谈去年我和法国公使谈了十天，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的事。''正因为你无能为力，法国公使回到广州后，才给阁下送来了这份皇帝的上谕。''这道上谕，你和我都知道，上谕明明指出凡教堂改为庙宇的概不发还。''改为庙宇，算了吧！但庙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上谕上没有说是例外呀。''这是真的？''庙旁还有一座大房子并不曾作为民用，所以也应列入钦命发还之列。''这座房屋我不能归还，否则必将引起民众的反对。''这是一个公道问题，做官当权者正该作出榜样来。假如这事发生在英国，明天就能完全解决。现在一位法国舰长司令即将到来，在他逗留上海的日子里，坚持要为他的国王陛下干下几件辉煌的大事以表达他对他国王陛下的忠诚。假如他到了上海，得知阁下对法国政府全权大臣签订的条约熟视无睹，他将怎样对付你呢？总之，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原来毫无利益可图，我们的宗教信仰也不同。''这倒是件严重事件，我需要足够的时间加以考虑。''考虑吧，那对你是很值得的。'"①

道台很尴尬，于是他急忙上省城苏州，向他的上级抚台请示。两天后，他回到上海，亲自给英国领事作了答复："旧传教士的墓地毫无困难地即可归还给教徒，至于附属于关帝庙的那座房屋，由于许多重大原因不能发还，但可以另拨一方合适的土地作为补偿。"这正符合神父们的愿望。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庙旁边的那座房屋；他们也正希望在别处找到更

① 南格禄1846年12月3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1卷第424页。

合适的地方来开展教会事业。

原则同意后，梅德尔神父也就出面登场了。他多次和上海官员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得到很隆重的接待，终于暴露了他自己是传教士和主教代表的真正身分。他向上海道台和知县等人详细地介绍了在这批行将拨给的土地上准备建立的那些科学、慈善和宗教事业的机构。罗伯济主教看到情况好转，决定自己出面，由英国领事陪同正式拜访道台，受到了极隆重的接待。① 这次官方正式承认天主教主教一事，比起拨让土地其重要性要大得多哩。

结果，归还土地的协议达成了，选定了三块土地，一块在城垣之内，两块在黄浦江边，彼此相距约三公里，每块约有一公顷左右的面积，② 至今仍然归教区所有。第一块地面上已盖满了出租房屋。第二块地面上则建有董家渡主教大堂和主教公署。第三块地，正好在法租界的中心，那就是圣若瑟天主堂又是教区的总帐房，地点正在公馆马路和孟斗班路的交叉口。③

几个月之后，几个有利的时机使董家渡那块土地扩大了不少。两艘法国军舰"胜利"号和"光荣"号在高丽沿海翻了船，一百八十个落水者和"胜利"号的舰长德热努伊被一艘英国船带回了上海。舰长去拜访了地方官吏，从他们那里获准

---

① 梅德尔 1846 年 12 月 1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426 页起。

② 梅德尔 1847 年 2 月 16 日致芒市主教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2 页起。由上海道台宫慕久及其后任咸龄划让给罗伯济主教，于 1847 年 5 月 6 日和 11 月 13 日移交。圣墓堂墓地是由上海县知县于同年 11 月移交的。见黄伯禄：«上海老天主堂记»，第 20、23 页。

③ 现四川南路金陵东路口；解放前，孟斗班路一般称天主堂街或洋泾浜天主堂。——译者

董家渡那块转让来的地皮延伸到黄浦江边。①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官员们和署理主教开始了正式的官方往来，即使在最恶劣的日子里，这种往来也从不间断。梅德尔神父写道："从罗伯济主教同中国官府有了来往之后，没有一位欧洲主教能得到比他更大的荣誉。官员们多次用最隆重的礼仪来答拜，罗主教去拜访时也受到同样隆重的接待。阳历元旦，官员们先探问我们是否就在这天过年或是等待到2月15日(阴历春节)祝贺新年，主教回答说，我们是西洋人，遵守西洋历。因此1847年的元旦，上海四位大宪同来向主教贺年，我很幸运地见到了他们的全部仪仗队，三位是坐轿子来的，那位武官是骑马来的；他们各自带着各自的随从，人人都穿着大礼服。"② 从此，年年在阳历元旦举行这种贺年的会访，而主教的答贺则是在阴历正月初一。

在这些重大的会谈时期，又发生了一件动人的插曲，在我们传教士的通信里叙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节。

1845年5月28日，一艘高丽帆船到了吴淞口，在英国舰队中间下了锚。帆船船长去访问了英国军舰上的军官们。军官们很惊异地听到来访者操着法国语言，他说自己是天主教的一个六品修士，曾在澳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帐房读书，由他的主教高主教派遣，预备进入那个倒霉的高丽教区，然而那里的宗教迫害异常猖獗。他名叫金安德，他租到一条不那么好的帆船，船上船员都是教友，经过了一段奇迹式的航程，③ 前来接引正在澳门等待着好消息的高主教。以保护传教士为己任

① 施于民1847年10月10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46页起。
② 梅德尔1847年2月26日致芒市主教信，见《通讯》，第2卷第2页起。
③ 见沈则宽：《高丽致命事略》，第66页。——译者

的英国军官们，为了使他们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就用军舰护送这条高丽船，一直送到了上海。金安德就去拜见了英国领事，领事雇了一顶轿子，把他送到城内某一户教友家。在那里，这位勇敢的金六品就写信给他在澳门结识的南格禄神父。南格禄神父立即赶来，给他送来了一笔银子，使他能维持全船人员的生活。高主教也很快地得知了这个好消息。①

不久，南会长就亲自到那条船上去慰问那些勇敢的高丽人。后来，他在信中写道："你可设想到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看到这十二名教友，几乎尽是殉教者的父亲、儿子或亲戚。他们一见到我，提出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办神工问题；于是金安德急忙把船舱略加布置，使我能在船上举行弥撒。一切就绪后，他叫人通知了我，我决定当夜到他船上过夜，准备翌日早上施行圣事。这些人已有六、七年没有遇到神父了。我给他们讲明，当人们只能用翻译行告罪时，神工书上有不必全告的规定；可是他们都不愿享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恩，他们说：'我们已有好久不办神工了，我们必须一点也不隐瞒地交代告明。'他们叫我放心，他们对于宗教奥迹是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我就坐在一只木箱上，那可爱的六品便第一个跪了上来，当他告罪完毕，就跪在原地不动，充当船员们的翻译，船员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跪在金六品身旁告罪……这些告解把我一直拖延到天明。船在隔夜已装饰好了，最后布置完毕，我就在那条小船上环绕在十二名高丽教友中举行了弥撒，而在就近的这个中国大城里却满是些庙宇菩萨。这些勤劳诚朴的

① 南格禄1845年7月8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38页起。外方传教会会士达莱神父在他写的《高丽教会史》第2卷第285页上曾引用了南神父的信以及金安德致澳门帐房李波神父的信。

高丽人在多年剥夺了宗教生活后，今天能够参与圣事，感到极大的幸福。”①

高主教一得到消息便从澳门赶来，陪同他前来的是一位青年神父安斐理，他也是准备潜进高丽去传教的。高主教为了表彰勇敢的金六品，1845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在浦东金家巷堂内给他升了司铎作为报酬。教友们成群结队地涌来，一名中国神父和四名外国神父给高主教当了参礼。24 日，金安德去横塘修道院举行他的头台弥撒。这是高丽国供献给圣教会的第一位司铎。②

八天之后，新神父又登上了那条可怜的小帆船；高主教和安神父都潜伏在舱内。小船一出吴淞口便遇到了大风，结果把它吹到了海门，那里正会集着好几艘上海教友的沙船，他们是预备到辽东去做买卖的。教友们就会聚在其中一艘沙船上过了圣母圣诞瞻礼；船上共举行了四台弥撒，船上众教友都领了圣体。10 月 12 日航行者幸福地到达了高丽。在这以前，高主教曾想尽方法拟由陆路进入，而始终没有成功，这一次终于进入了他自己的教区。

1846 年 8 月，金安德被衙役逮捕。9 月 16 日，他为了信仰而被处死。二十年后，在 1866 年的耶稣受难节上，安斐理主教也殉教致命了。③

---

① 南格禄 1845 年 7 月 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39 页。

② 同上，第 241 页。

③ 见达莱：《高丽教会史》，第 2 卷第 295、309 页起。

安斐理主教于 1857 年 2 月 25 日在汉城被祝圣为主教，1866 年 3 月 8 日被处死。——译者

三、教区内部纠纷和罗伯济主教离任
(1846年至1847年)

松江教友事件　一个葡籍主教的干扰　同耶稣会会士的纠纷　罗伯济主教离开教区　中国神职人员向罗马控诉罗主教　罗主教辞职

1846年，正当教会的重要事件在上海进行交涉时，罗伯济主教却开始碰到了一连串的困难，迫使他离开了这个数年来他重整复兴的教区。为了了解他离开教区的原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

我们知道，罗主教一到江南即沉痛地感觉到，在某些会口中有不少贞女和办事人僭越傲慢，而且目空一切。他们不仅管理会口的物质财富，还干预教友们的精神生活，甚至不准司铎们检查他们的工作。①

当他们在圣堂内朗诵冗长而又为中国教友们所热爱的经文时，这种不良倾向表现尤为突出。在不少会口里，有一些教友竟闭口不再念经，而由公所内的贞女们专揽包办。此外，由于会口里的办事人多少是有些文化的读书人，因此，他们高声朗诵这些经文时并不是虔诚地向天主祈祷，而是在欣赏经文的声调和词藻。② 在1845年的最后几个月，③ 罗主教命令，在

① 见本卷第22页。

②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5页起。薛孔昭是这事件的见证人，他从一个中国神父沈玛窦处得到一切隐情。沈神父正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见第25页注）。

③ 薛孔昭在《南格禄神父传》一书中记的是1846年初，然而在1845年11月7日的一封信里，松江教友已在抱怨主教这个办法了。见《徐档》，卷宗B15。

圣堂内禁止女教友单方的念经，而应当由全体教友一起念，分男女两部分，男方女方轮流念。这个办法在上海附近许多富裕的堂口，特别是松江一带，竟有人拒不服从，甚至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最后，据说由一个被艾方济神父撤了职的传教先生，编写了恶毒的宣传品，在各堂口散发。那是一次有组织的向主教和支持主教的外国传教士们发起的进攻。他们指责主教及其支持者，破坏了中国的习俗，违背了祖传的制度，不尊重利玛窦神父及其后继者努力得来的成就；说他们既不懂中国语言又不懂中国文学。还说这次改革念经措施为有些地区的叛乱树立了榜样。按中国风俗，男女之间绝不能进行公开的交谈；而如今在圣堂里竟允许男女彼此轮流唱和，这只能引起教外人的仇视和讥讽。①

当这次叛乱爆发时，罗主教正在香港和传信部驻港的帐房神父商谈南京主教区的教产息金问题。因此，当时的代理主教南会长不得不出面来应付这些围攻。由于南会长禀性率直，在跟那些攻击者进行迂回曲折的笔战时，更是措词生硬，他把攻击的条目逐条加以驳斥，并译成中文，印后散发到各个会口。②

南会长承认，新来的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风俗的认识比不上过去老一辈的教士，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新教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教区里有六万名教友几乎被剥夺了宗教上的扶助，他们呼吁新来的传教士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献给宗教事业。难道你们"为了专心研究你们的经典书籍去花尽一切

① 南格禄神父曾收集了几张攻击罗主教的传单，并亲自摘取了要点，保存在«徐档»，卷宗B15中。

② «徐档»，卷宗B15中保存有中文的和法文的稿件。

时间，忍心让你们的病者不得领受圣事而死去？”

将来神父的人数增多后，对研究这种学问是决不会忽视的，在科学研究方面和热忱服务方而，他们也决不会落在前人之后的。接着，会长神父指出，他们对为他们宣传福音而不惜离乡背井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的攻击，是忘恩负义之举。会长还揭露，那些可笑而又可恨的要求是曲解并违背了圣经的精神的。罗主教从香港一回来，就又发了一份严厉的谕单：“痛斥那些罪恶事件的密谋者，这些人既不懂圣教道理、又胆敢编制散发那些闻所未闻的反宗教的传单和小册子。”①

他宣布处分那些抗命者，对愿和教会重归于好的，罚以必须先做公堂补赎（当众认罪忏悔）。但这事件的全部了结，还在罗主教的继任者赵方济主教就任之后。赵主教把前任规定的惩罚条例放宽了尺寸，并在男女教友双方轮诵经文容易产生坏影响的地区，准许只由男教友单方诵念。②

这次抗命几乎造成真正的裂教。与当时在印度造成的教会分裂相似，其根子都是由于葡萄牙夜郎自大，坚持它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的保教权。事实上，它的保教权既不合时宜，又毫无实效。

自从罗伯济主教来到中国后，传信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山东脱离了北京主教区，河南脱离了南京主教区，在该区设置并任命了一位宗座署理主教。这一切都没有咨询或通知葡萄牙，这显然是对葡萄牙保教权的严重打击。澳门的葡萄牙遣使会以及它的以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的圣若瑟公学，对

① 1847 年 3 月 26 日，见《徐档》，卷宗B3。

②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 28 页。

此都提出抗议；该公学院长雷神父将罗马的措置向里斯本作了汇报，并指出，假如不抗议的话，那么不要多久，葡萄牙的保教权就只能行使于澳门主教区了。①

这些汇报使里斯本政府大为震惊。最后，里斯本指定了澳门若瑟公学的两位教授，葡萄牙遣使会会士赵若望神父和米神父担任北京和南京主教区的主教。他俩也表示接受这两个主教头衔。

罗马同意接受葡萄牙推荐的这两个人，但有一个条件，即不得再用北京主教区和南京主教区的主教职衔，而改为在部分地区的和代牧主教的名称。事实上就是取消了葡萄牙在中国这两个主教区的保教权。里斯本政府拒绝接受，赵神父和米神父也同样拒绝接受这个条件。②

但是否可以越过教宗的玺书(委任状)呢？按那著名的保教权的特典，葡萄牙政府认为有权在印度和中国委任主教，并且在教宗玺书到达之前先行祝圣。根据这条特典，米神父于1845年5月写信给江南的中国神父，通知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南京主教，问他们是否准备欢迎，一俟接到他们的回信，他便去受圣，并即来江南就职。③

我们知道，这些中国神父早已忠诚地承认并接受罗伯济主教的领导，其中有两位还曾经在毕学源主教时期担任过代权。④

---

① 雷神父1843年1月11日、3月26日、1844年12月11日、1845年5月8日呈葡萄牙王后玛丽·达格洛里亚信，见《徐档》，卷宗B15。

②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5页。

③ 同上，第26页。好几位中国神父原来都是澳门圣若瑟公学米神父的学生，在1845年的7月至10月间，他们曾去信祝贺他。见《徐档》，卷宗B15。

④ 见本卷第15页起。

可是从那时起，种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接踵而来。以前，在澳门圣若瑟公学有一笔专供江南教区司铎生活的基金及其利息，自从罗伯济主教以南京署理主教的身分声明要对这笔钱进行调查，并且亲自安排动用后，江南教区司铎们便失去了这笔生活费。① 罗主教为了促使他所请来的耶稣会会士能积极传教，又作了种种整顿和改革，这一切大大地扰乱了中国神父们的生活习惯。②

一位葡籍主教来接替罗伯济，让后者回到遥远的山东去，看来中国神父是不会不同意，但也不愿为此而冒风险。只有沈玛窦和金保禄这两位进葡萄牙遣使会的中国神父，还竭力效忠于葡萄牙的保教权。

当米神父报告他被委任的信到达江南时，中国神父们便在苏州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如何答复。会议决定，按中国习惯大家分摊出资，备一份美好的礼品送给米神父，作为一种尊敬和祝贺的表示，并附上一封由各人签名的回信，告诉他如果带着教宗的玺书来江南，定会得到热烈的欢迎。目前，圣座既已委任罗伯济为署理主教，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承认他的管理权。③

松江的教友没有他们的神父们那么审慎，一觉得有人支

---

① 起初，帐房雷神父还按过去习惯，通过杜保禄汇寄生活费给中国神父们，罗主教要求看帐单，并很正当地合乎分寸地写信表示他有权了解南京教区的产业及其收入，并有权支配这些财产(1843 年 7 月 16 日给雷神父信，«徐档»，卷宗B13)。在提出这些要求之后，雷神父就不再寄钱了。因此，中国神父们深表不满(李路加神父 1845 年 10 月 18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5)。

② 沈玛窦 1846 年 8 月 14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5。

③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 26 页起。薛神父听沈西满神父说，当时苏州会议的决定是由沈西满倡议而得到多数通过的。

持反对罗主教，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给葡萄牙女王呈了一份热情的请求书，又把传单和小册子上对罗主教的种种攻击重新提了一遍，并请女王从速派遣米神父来登上他的主教宝座。① 与此同时，他们为迎接葡籍主教，还在松江准备好了一座主教公署。②

罗伯济主教那时在香港，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合乎分寸的信给米神父，说：假如他去江南由"大门而入"，就是说持有罗马教宗的玺书，那么，罗本人和他的同事们都甘心让位。但假如他打算走"地下坑道"，即没有罗马的委任状，那么，一场激烈的抵抗正等待着他。③

幸亏米神父没有印度果阿教长们的那股犟劲，不致造成类似果阿地区的叛变和长久的分裂。他预感到进入江南必将遇到相当严重而又无有力支持的重重困难，就决定留在澳门，也不去领受祝圣礼，④ 尽管松江教友还继续不断地来信敦促。⑤

实际上，这件事的受害者只有沈玛窦神父一人。他是葡萄牙遣使会会士。从1844年起，他负责松江本堂。他曾鼓动教友们反对罗主教，不断地向教友们扬言南京署理主教不久便将退职，主教区将有一位葡籍主教来。⑥ 从浙江来的石主教⑦曾访问过他，并劝他服从罗马委任的主教，但是他不愿

---

① 1845年11月7日的信无疑不曾寄往里斯本，见《徐档》，卷宗B15。

②③④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6—27页。

⑤ 1847年10月3日信，见《徐档》，卷宗B15。

⑥ 沈玛窦1847年7月2日信，见《徐档》，卷宗B15。

⑦ 石神父在江南传教到1845年，1846年被选为浙江代牧，1849年死于宁波。——译者

意。① 罗伯济主教也亲自来说服他，指出他的顽抗是罪过的，而且毫无用处。②

但是，这可怜的司铎继续进行顽抗。于是，1847 年罗主教命令他离开松江，由一位意籍方济各会会士谢吕比尼神父替代他的职务，由于沈神父拒不从命，便受到摘权的处分。于是他不得不同意退往离松江约十八里外的张朴桥会口。③ 在那里，他一直活到 1878 年。④ 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仍不断地写信给澳门，表示对取消葡萄牙保教权感到痛心与不满。⑤ 到了赵方济主教时，他才得到调解，重归于好。

罗主教在这次和教友们的争执中总算得到了胜利，但内心却感到无比的痛苦。然而使他感到最痛苦的还是他和那些他努力征召重来江南的耶稣会会士们的争执。

这位加诺贝主教一向真诚地热爱和重视耶稣会，他在罗马时曾对耶稣会的事业研究了多年。⑥ 他也确信昔日旧耶稣会在北京所采取的传教方式，是归化中国上层阶级、使天主教在中国树立并扎下根来的卓越的、胜利可望的唯一方法。⑦ 他曾诚挚地向总会长神父保证，并向刚来到中国的神父们表示，希望他们遵守他们的会规，以至可以立即随地招募人员作为成立一座初学院的基础。⑧

可是这位率直忠诚的耶稣会的朋友罗伯济主教，对于领

---

① 沈玛窦 1847 年 7 月 2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5。
② 沈玛窦 1846 年 8 月 14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5。
③ 沈玛窦 1847 年 1 月 30 日、7 月 2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5。
④ 见《耶稣会会士录》(1892 年)，附录 1 第 2 页。
⑤ 我看到的最后一封信是 1853 年的，见《徐档》，卷宗B15。
⑥ 见本卷第 13 页。
⑦ 见本卷第 35 页起。
⑧ 见本卷第 51 页。

导权是寸土必争的。他对教区教务都是事必躬亲，而且独断独行。他既是教区领导，当然要按照他的看法来安排人事，他从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耶稣会会典规定各地会长对属下有支配权，他的这种作风，怎能符合曾经罗马多次批准的耶稣会会典呢？假如主教禁止会长访问四散在教区各地的会士，禁止接受他们的来访，不许会长和他们通信，又怎能作到会典上重要的根本的一条“诉心”呢？① 1844 和 1846 两年里许多增援的教士来到后，在教区的神父中耶稣会会士已占了多数，而罗主教却宣称，神父们的工作岗位必须由他单独调出调进。事实上，他也不征求南格禄会长的意见，把新来的神父随心所欲地派往各个空缺的岗位。南会长用会典的名义向主教提意见，并请主教注意，如果不问人地是否两宜而进行分配，对某些人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鄂尔璧神父，他到江南时还不到三十岁，体质又很虚弱，南会长有意把他留在上海附近，便于在工作上对他进行指导，另外也可照顾他的身体；但罗主教不接受任何建议，却把鄂尔璧派往遥远的浦南，同会长所在会口相距船行二天的路程。其他神父初来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南神父想到他当会长的责任，一再向主教提议，罗主教却不予采纳，漠然置之；当年心连心的交情，从此隔阂横生，困难重重。②

---

① 天主教的“诉心”，一般行之于各修会或神职人员，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交心”。——译者

② 南格禄曾在 1844 年 12 月至 1846 年 5 月的致总会长的信中详细地讲到了这些痛心的纠纷。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6 页起。罗伯济也写信给传信部，诉说所受到的委曲。他常常是光明磊落的，他要求传信部把诉陈之事转告耶稣会总会长，而且他自己也直接给总会长写过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5、29 页；第 4 章第 8 页。

南神父曾在信中写道："罗伯济主教的作风是高贵、大方、善良和和蔼的，他助人为乐习以为常，但一触及权力问题，虽然他常常是光明磊落的，但他往往寸步不让，甚至宁可手臂脱臼。"①

另一个棘手的并由此而不断产生纠纷的问题就是关于经济收入问题。从法国汇来的大批哀矜，其来源有两类：第一，每年由法国"传信善会"和"圣婴善会"捐献和施主们寄来用于教区一般事业的。第二，由施主们送给巴黎耶稣会帐房，委托帐房转赠给中国的同会弟兄的。

无疑，第一类捐款应当由教区主教，而且也只能由他单独支配。然而罗主教还不满足，他还要同样支配第二类捐款。南会长认为这是道德问题，不能同意他的要求。这里且有会典作为依据。会典规定，在许可的范围内，耶稣会有拥有或使用基金和不动产的权利，江南是否和在其他各地一样也享有这种权利呢？葛必达及其同伴们带的那批箱子不仅差一点妨碍他们启程，还使基佐内阁因阿夫纳埃②的诉讼遭到了许多麻烦，而且那批箱子使这次争执更加尖锐化。罗主教逼令上交这批箱子，南格禄会长则拒不执行。③因箱内装的都是巴黎耶稣会帐房用施舍给中国耶稣会会士的捐款购置的东西；会长原打算把内中最优美的一部分任凭主教支配，但这必须由会长自己规定，表示他的权限。罗主教却拒绝接受一切赠予物，认为给他教区的捐献必须经他审查，否则他是不能容

① 南格禄 1845 年 9 月 22 日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4 章第 1 页。

② 见本卷第 64 页。

③ 南格禄 1845 年 1 月 29 日致香港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的信、同年 2 月 15 日致总会长的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9 页起。

忍的。①

罗主教致总会长神父的信可总括为一句"名言":"耶稣会会士来江南，不是作为一个耶稣会会士，而是作为一个传教士。"②

南格禄禀性率直，1845 年 11 月 12 日，他在仔细地概括了会典的规定之后，写了一份摘要呈给主教。总结彼此的争执归纳为两点：人事的安排和物资的支配。他明确指出："会士隶属会长，是耶稣会会士的特征之一，谁破坏这一条，等于破坏耶稣会。"③ 目前来中国的传教士，看到主教侵犯这一条基本会规，他们就不能安心，他们的工作劲头也没有了。法国的神父们一旦知道了，那么，来中国的圣召也完了。"当他们知道了这些困难后，谁还愿申请前来中国呢？"他在结束他的论题时作了和主教相反的"名言"说："一个耶稣会会士在成为传教士之前毕竟是一个耶稣会会士。"

这篇上主教的呈文是经过五位神父的传阅斟酌和同意了的；此外南会长还请郎怀仁、葛必达、李秀芳三位神父上书总会长汇报这一切情形。三位神父深知会长处境困难，同意上诉罗马，并等待罗马研究解决，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传教士修会生活的问题。郎怀仁写道："会长不能自由支配会士，基本会规上'诉心'这一条就无法遵守，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

① 罗伯济 1845 年 1 月 25 日致南格禄信，南格禄将此信转呈总会长神父。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28 页。信中说："我从不要把手伸进旁人的口袋，但我认为，给教区的一切我至少都应该知道。"

② 罗伯济 1845 年 1 月 25 日致南格禄信。

③ 耶稣会巴黎省省会长吕比荣神父曾犹豫不决，在"只徒有耶稣会会士的虚名"的这种情况下，他考虑还要不要继续派遣他的属员去中国。南格禄 1846 年 4 月 27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3。

主教和会长，双方都忍声吞泣，暗自伤心。”①

李秀芳认为，江南教区的主教是一位会外人士，而整个教区的神职人员其主要和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是耶稣会会士，这种情形如不加改变，困难就不能解决。他注意到，“中国其他代牧区都委托于一个修会或一种传教团体，而代牧区的主教就从他们之中推选出来”。②

假如江南教区的会长对属下行使按照会典赋予的权力，那么教区主教的权力又是怎样的呢？在1846年，江南的传教士和耶稣会会士已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当时中国的圣召尤其在开头的几年里，还是很少很少；人力物力主要来自富裕的巴黎省，它提供给江南的后援和津贴远远超过了教区无会籍司铎们所能供给的。假如他们只听主教的指挥，无论会长如何细致周到和谦虚恭让，终免不了要发生最难受的纠纷。当第一批耶稣会会士重来江南时，传信部原来的计划只是叫他们做南京主教的或其他代牧主教的助手。既然中国的圣召短少缺乏，助手反成了主体，那原始的计划就非改变不可。

这种种困难罗伯济主教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他向传信部的汇报里，③一再明显深刻地提到这个问题。耶稣会的上级

---

① 郎怀仁1845年12月20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4章第4页。

② 李秀芳1845年12月28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4章第6页。葛必达神父（1845年12月23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4章第5页。）认为，一个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尤其是熟悉耶稣会会典规章、能保持本会基本权利而不去损害主教权利的会长，才能调解这种争执。目前在中国的神父中，按他看来还没有一个人能承担得起来。他恳求总会长选择并派遣一位能干的新会长来。他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数年之后，我们看到尊敬的伏伯禄神父从法国被派遣来中国，担任监会铎（巡阅使）职务。根据伏神父的汇报，才建立了教区今日的制度。

③ 罗伯济主教在1845年9月7日写给传信部一份报告中记载，当时教区全体神职人员有十六名耶稣会会士、三名方济各会会士、两名外国无会籍的传信部教士、五名中国无会籍的司铎。见《传录》，第11卷。

领导人也和他有同样的感受，假如这种局面不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圆满的结果。① 这些纠纷直到建立现今中国各教区的制度之后才告终止。

总会长罗当神父伤心地注视着这些痛苦的争执，并尽其一切努力缓和平息双方的争执。他给南格禄会长大讲其谦逊的道理，嘱咐他行动要明智谨慎，指出他来信中的许多词句太尖锐太刺激了。“请你，无疑地，你认为应当遵守会规，可别把会规诠解得太严格，当你认为主教的意见不能接受时，你应当说明理由，使他了解，但措辞必须斟酌，对主教应该保持应有的尊敬。”② “你的地位很困难，这我明白，并和你有同感，你既怕得罪代牧主教，又怕触犯会典会规，真是左右为难。至于问题的本质，你判断的很正确，但形式上，我认为今后你写信给主教说明我们的权利时，还是少引用会规，即使和他往来谈话中，也是如此。”③

对事情的本质，总会长神父作了如下的指示：“千万避免象人们说的‘耶稣会会士不受代牧主教的约束’，也别说：‘耶稣会会士在传教区，只从属于代牧主教之下。’代牧主教对教区，除教区行政外还有对传教事业的指定权。对已委托给本会的

---

① 巴黎省省会长吕比荣神父于 1845 年 8 月 31 日上书总会长，提及这些困难时说：“按南格禄神父来信道及的罗主教的自负自大有两点：就是物资与人事的安排上。’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假如在教区内，如南会长所理解的，会士们的一切所有统统由会长支配，会士们的职务岗位也都由会长来支配，而主教的属下神职人员又大多是耶稣会会士，如目前南京主教那样，那么，这位主教势必成为只是一位受过祝圣礼的主教而已。因此我明白何以日本的主教是一位耶稣会会士。”见《法总》，第 5 卷第 3 章第 7 页。

② 总会长罗当 1847 年 3 月 13 日信，见《徐档》，卷宗F11。

③ 总会长罗当 1846 年 11 月 1 日信，见《徐档》，卷宗F11。

事业，会长不应该不经主教同意随心所欲地指派或撤换会士；但是为了要良好地管理教区和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代牧主教就需要考虑和注意到会长的意见。”①

总会长也写信给罗主教，凭着过去的老交情，他慎重地但也率直地给主教提了些意见，一方面坚持耶稣会会典的原则，②一方面对某某或某某神父和主教的争论中有伤感情之处，谨代为道歉，并请主教以仁爱的精神和对耶稣会原有的稔熟友情予以谅解。③

为了使主教和会长之间感情融洽，总会长命令会长神父，把一笔由巴黎圣婴善会总会决定布施给教区耶稣会事业的一万法郎划给罗主教，任凭主教支配；还有一位法国施主捐献指定为耶稣会在江南修道院作为基金的一万法郎，也划给罗主教专为横塘修道院之用。④

善良的行动和坦率的辩解都挽回不了罗主教。从1845年开始，主教所采用的一连串措施都表现出，他根本不信任他的助手耶稣会会士。他拒绝耶稣会开办初学院，尽管他以前曾希望并许诺过这件事。他命令教区修道院的修士们宣誓，凡没有主教的特别豁免，不能进任何修会，特别不能进耶稣会；而偏偏又是让南格禄会长来担任监誓的神父。⑤

---

① 原信日期已撕落；我疑和前信一样，是1846年的。

② 例如1846年8月1日，他曾寄一份备忘录给罗主教，其中阐述代牧主教和会长相互之间的职权问题；这几乎是上述南格禄神父信的扼要翻版。见《徐档》，卷宗B13。

③ 总会长罗当1844年12月28日、1845年8月2日、1846年1月11日信，见《徐档》，卷宗B13。

④ 总会长罗当1846年信。

⑤ 关于这点，南格禄曾向传信部申诉，并送去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见1846年《传录》，第12卷。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件事情得到了解决。

耶稣会神父管理着修道院，却无权去听修道院的修士修生的神工，而由附近一个方济各会神父，于规定日期，赶到横塘来听修士们的忏悔。当梅德尔神父从上海道台处得到三块地皮作为代偿被没收的旧教产时，南格禄会长提出在其中一块地皮上建造一所固定的会院，因为那时，耶稣会会院是设在远离上海的横塘修道院附近的，但主教不同意。主教还拒绝批准由耶稣会自费买进一座在上海的房屋。任何耶稣会会士都不准在上海城内举行圣事，而城内的陆、艾、施三家教友，由于受老辈人的影响，对旧耶稣会有好感，都愿意耶稣会会士来领导指引。①

主教甚至还想离间会士与会长之间的感情，他制造争端，使会长处于困境。他唆使1846年来华的几位意籍耶稣会会士去信罗马，攻击法国的会士和会长南格禄。他们都拒绝执行，并认为会长所以和主教有意见分歧，只是为了想捍卫耶稣会的会宪和会典。②

当主教不在教区时，南格禄曾以坚强的毅力，制服并消弭了松江教友的分裂，这也不能使罗主教改变对会长的看法，而总是把他当作仇人一般看待。③

罗主教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一些有财有势的教友家庭的反对，因此当时有可能产生一场裂教的灾难；部分中国神父要求换一个葡萄牙主教；罗主教和他本希望成为他最可靠最得

---

①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1页起。

② 同上，第24页。薛神父在书中指出，由于主教和会长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些可悲的意见破裂并没有向外流传，只有罗主教和南会长以及他们征求过意见的几个人才知道。

③ 见《南格禄神父传》，第23页，薛神父述说了一桩私人之事。

力助手的耶稣会会士的破裂使他在困境中颠簸着，于是在1846年初，他悄然动身去了香港，向该地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征求指导和帮助。这位耶稣会的忠诚朋友，听了主教的倾诉，深受感动，他那时写的书信，也十分真切动人。1846年2月27日，他请求部长枢机研究这些问题并作出怎样划分主教和会长的职权的决定，"务使既要耶稣会的会规全部得到遵守，而同时又要使会长的权力不侵扰主教的职权"。① 实际上，他的思想完全是总会长罗当神父的主张，双方对属下的人事安排如何能找到更协调和谐的办法呢？他表示这位可怜的主教已是心力交瘁，很需要回欧洲作一次旅行，使他恢复健康。②

因此，罗主教决定亲自去罗马，或辞掉他传教区主教之职，或是一切纠纷由传信部予以解决，他休息数月之后，重回教区。

罗主教就在香港给传信部部长枢机写了一封紧急信，要求准许他回欧洲一行。③

申请得到批准，但他必须先选出并祝圣一位对情况熟悉的副主教。④

按照教宗额我略十六世1846年3月27日发布的敕令，南京主教有权在教区里选择一位由他认为在天主台前最称职

---

① 见《传录》，第11卷。费利西亚尼在1845年3月29日的另一信件中也写着同样的意见。又《传特》，第23卷第467页起。

② 同上。

③ 罗伯济1846年4月24日信。在1845年10月6日，他（罗主教）已有类似的申请。见《传特》，第23卷第367、467页起。

④ 枢机弗朗索尼1847年1月12日致罗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1；又《传特》，第23卷第467页。

的附有继承权的副主教，并把他祝圣、顶衔为索利主教。①

罗伯济选择了赵方济神父为继承人。赵方济出身于那不勒斯圣家修院，曾传教于湖广地区，真福董若翰在监狱时曾得到他的照顾，他还收集了这位殉教者的第一手材料。② 他的被选是经罗马批准的。③

赵方济主教在1847年的圣神降临瞻礼日在浦东金家巷会口受祝圣。④ 施于民神父曾领了全体修士参加了这次祝圣典礼，施神父给我们留下了很有趣的记述。主教举行大礼时，有十位司铎襄礼。教友群众在该会口小圣堂内拥挤得喧嚷不堪，以致"起初的半小时，竟无法使之静默，你拥我挤，你拉我推，甚至堂内栏杆也被挤断了"。闹声平静后，祝圣礼才得隆重进行如仪。

有三个外国客人应罗主教的邀请，也从上海赶来观礼。祝圣礼毕，继以午宴。"中国式的酒席非常出色，使外国人感到特别惊奇的，是会口里的家家户户这天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各家的庭院角落都在大张喜筵，唯有富饶的堂口才能负担得起如此庞大的费用"。⑤

罗主教在离开中国之前，还要负责完成一件他应尽的职

---

① 见《徐档》，卷宗B1。

② 赵方济1840年9月22日致浙江代牧张主教信，见《遣使会年刊》，第7卷第24页起。

③ 枢机弗朗索尼1847年1月12日信，见《徐档》，卷宗B1。

④ 施于民神父信上只说在张家楼"邻近的一只会口"。金家巷距张家楼只一华里，在当时只有金家巷会口的圣堂比较大，才可容纳这么多的观礼者，何况地方上的传说也是指金家巷。

⑤ 施于民1847年7月11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54页起。赵方济于事后数星期也写信给传信部，叙述了祝圣的经过。1847年9月1日信，见《传录》，第11卷。

务，即给他的继承人在教区的中心地点上海，找一座比较相称的府邸，并给未来的主教大堂奠下基石。由官方代偿旧教产而拨下的三块地皮中有一块是在董家渡，这块地皮正处于城郊居民密集的黄浦江边。许多做买卖的教友们的船只也经常来这里集合。罗主教就选定在董家渡建造他的主教公署。在目前大堂入口处的台阶下，原有一间小屋，罗主教就把它略加修理和布置。据目睹过该所老屋的一位神父说："那间屋子面积较阔，自南至北，可以容纳不少人；其特点是，吃饭时它是一间饭厅，祈祷时就成了一所小堂。在屋子的北端，拦上一小间，正好放上一座祭台，还有一块供辅祭跪的地位，宗教礼毕，把弥撒间关上，人们就已在饭厅里了。在饭厅上面，有几间小小的房间，当时已算是很好的房间了，这几间房间，是留给病人作治疗养病之用的。"①

这座简陋的屋子一修好，主教就住了进来，着手经营他的主教座堂。禄理格神父又说："主教亲自划地段、正方向、量面积和定大小，拟了初稿。"一个新近来教区的杰出的艺术家范廷佐修士，② 采用了罗马耶稣会大学圣依纳爵大堂的格式绘图设样。

可惜的是因经费不足，迫使赵方济主教把原来样稿大大地缩小了。

1847 年 11 月 21 日，罗主教给大堂放上第一块基石，行

① 见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

② 范廷佐是 1847 年 10 月 24 日同年文思神父、倪也堂神父、禄理格神父以及方百胜辅理修士同来教区的。1847 年 4 月 7 日，又来了柏葆禄神父和伏守谦神父。1846 年 11 月 12 日，第一个进耶稣会初学院当辅理修士的中国人陆乾坤，由于没有坚持圣召终于出了会。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 年），第 2 页起。

了奠基礼后，当夜就动身上船回欧洲。他邀了马再新神父作旅伴，目的是叫他同去罗马向耶稣会上级汇报教区情况，并在其本国招募意籍传教士，这是罗主教非常着重的一点，① 因主教对法籍传教士没有什么好感了。

在主教 1847 年 11 月 25 日的一份公告上，罗主教给属下神职人员宣布了他动身回欧的消息。"因圣教会现有许多问题需要本主教亲自去欧洲觐见教宗"，他嘱咐他们服从他的助理赵主教，"假如天主圣意喜悦，本主教不久就会回来，行将看到上主委托我们经营的这一方葡萄园更加茂盛兴旺"。②

罗伯济主教似乎早已有意不再回到中国，在他写给传信部的好几封信里，使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③ 总之，当主教回到罗马征询了上级之后，一切犹豫消除了。为了了解当时罗伯济主教所以毅然决定的理由，我们必须追忆主教从 1845 年起与部分当地中国神父和上层教友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严重纠纷。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教友和神父们曾要求派一个葡籍主教，以至能从罗马任命的署理主教的种种改革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但他们的愿望没有达到。同时，在另一件事上他们又向主教发起进攻。他们向传信部接二连三地禀奏，诉述对主教的种种不满。这些诉状是用不象样的拉丁文写的，由澳门圣若瑟公学的院长雷神父加上诠释和说明后设法寄往罗马。1845 年 11 月 3 日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已有信给南格禄，

---

① 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60 页。

② 见《徐档》，卷宗B3。

③ 罗伯济 1845 年 10 月 6 日信，罗主教曾要求准许他回意大利为了"痛哭罪愆，预备善终"。见《传信》，第 28 卷第 367 页起。

以传信部部长的名义，询问他对人们控诉主教有何想法。会长神父那时和主教已经有严重的矛盾，大可乘机攻击一下，可是他1846年5月29日给总会长的信却给罗主教作了一个正确公正的评价；关于松江裂教行动的前因后果，他也给圣部指明了真正的原因，他说："我深知主教极愿辞职，他已想尽一切办法，但他禁止我外传。据我看来，主教实已心力交瘁，我认为把主教安插在欧洲和放在传教区是同样适宜的，但在传教区，作为主教就必须既是强将又是精兵。"①

就在1846年年底，想必南会长曾通过总会长写了一份有关罗主教管理教区的备忘录，这个文件我没有找到；但1847年5月13日，总会长确认前信已经收到，回信说："罗主教将离开教区"，② 从这时起，罗马已断定罗主教的处境确是太困难了。

从1846年的10月至1847年的7月，又有偏信葡萄牙保教权的三名中国神父上禀罗马，他们是：沈玛窦、金保禄和沈西满，前两人都是入葡萄牙遣使会的，沈西满是不入会的教区司铎。澳门圣若瑟公学的院长雷神父和提名为北京主教的赵神父也写信给罗马，支持中国神父们的诉状。他们指责罗主教，藐视中国神父和中国教友，无视中国的风俗习惯，他既出言不逊，又常滥用职权，对属下严厉苛刻，有一个中国神父因主教拒绝给他必要的照顾和休养而死亡。还有其他性质更严重的控告。

与此相反，1847年5月1日，其他中国神父和传教先生

① 南格禄1846年5月29日致总会长信，此信转致传信部。见《传录》，第11卷。

② 见《徐档》，卷宗F11。

们也上书传信部，对罗主教的管理教区大加赞扬，当主教讲起要回欧洲时，他们出面阻止，并提出至少推迟启程日期。①

由于事隔久远，又缺乏反对派方面的可靠材料，我们很难确定他们控诉罗主教究竟有何根据。根据我们上述的一切，有一点可以肯定，罗主教一方面是位绅士，仪态优美，慷慨宏量，吸引着不少在上海的欧洲人和耶稣教人，他们对主教很有好感；另一方面，他热心传教、不顾危险、不知疲倦，这就迅速摧毁了主教的体力。在主教身上的确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态度生硬、决断草率、刚愎自用，开始是法国遣使会会士，继而是耶稣会会士都备受其苦。他的这些作风已影响到中国神父和教友们，他为了取缔一些确凿的流弊，激怒了他们，以致到后来使主教陷入了困境。

在罗马，人们把责备他的话告诉了他。② 他认为如他再返回教区已没有什么威信了，于是决定辞职。③ 在他退休期间，传信部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咨询中国教务，④ 他曾参加梵蒂冈公会议，⑤ 后在 1871 年死去。⑥

---

① 见《传录》，第 11、12 卷。

② 马再新在 1848 年 5 月 25 日致总会长的信中，总揽了罗主教的信件。见《中总》，第 2 卷第 8 章第 46 页。

③ 罗伯济 1848 年 5 月 20 日致旅伴马再新神父的信。

④ 1850 年 1 月 29 日，在香港的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曾因罗伯济是代牧而向他请教。见《传录》，第 13 卷。1854 年 7 月 17 日，罗伯济曾写信给（传信部）巴尔纳博主教，为赵主教正在建造的上海主教大堂请求补助。见《传录》，第 15 卷。

1856 年关于划分北京主教区有人征询过他。见《传特》，第 24 卷第 418 页起。

⑤ 《梵蒂冈教务会议录》（拉庆西斯集丛，第 7 卷第 999 集）。

⑥ 吕比荣 1871 年 11 月 10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3。

1849 年 2 月 2 日，赵方济主教给南京教区的神父们传达了 1848 年 6 月 3 日罗主教告诉他业已辞职并得到传信部批准的通知。① 从此，索利的主教就成了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山东的副主教，方济各会会士② 江类思主教，继任为山东代牧区正主教，从此山东代牧区终于和江南教区完全脱离了。

① 见«徐档»，卷宗B3。
② 见本卷第 70 页。

第 四 章

教 务 细 节

一、耶稣会会院

初设在横塘　计划在上海　奠定在徐家汇

当第一批增援教士宣告即将到来时，南会长便一心准备要给来者提供一座属于耶稣会的住房，神父们可以在那里集合在一起做每年的避静神工，可以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患病时也能有个地方得到护理和休养。那时候，罗主教还比较关心他们，大有利于这个计划的实现。会长写道："我们可能在神父们来到之前，准备好一个小小的住所。我早就感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立足之点，在那里我们可以安放我们的行李。罗主教也对我们关怀备至，把教友们奉献的一所房屋划出一部分给我们，我们又用一位和耶稣会极友好的中国神父赠予的一大笔哀矜修理和布置了房屋。这屋子靠近圣堂，距离修道院只二十步路。屋分九间小房，一间图书室，一间餐室，一间小堂。小堂联着圣堂，人们可以随意关闭。此外还有一个庭院，还有一个较大的可以散步的回廊，门前还有一个小花园。在官吏和小偷们双方不来搅扰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可以说一直享受着极大的宁静。但愿仁慈的天主继续保佑我们。"①

横塘离上海很远，那时上海已逐渐成为教会事业的中心

了；横塘会院四周又都是稻田，空气很潮湿，极不卫生。南会长遥见佘山九峰起伏，就打算在那里为衰老病弱的教士们建立一所疗养院。②

但他念念不忘要在上海中心地点建立一所会院。梅德尔神父一到中国，会长就叫他在上海四周寻觅一所房屋做教区的中心站，作为初来者的憩息地和患病者的疗养所。③ 1846年10月6日，梅神父终于在城外董家渡，现今大堂之西租到一所房屋；10月7日，罗主教准许神父们在该屋内举行弥撒，并准许教友们在那里过宗教生活。④

自从罗主教对耶稣会的态度改变后，耶稣会便不能再保存这所房屋了。1847年初，罗主教决定要把他的主教大堂和主教公署建造在董家渡，地点离梅神父租来的屋子只几步路。⑤ 在主教公署前面，会院应该迁让。那所租来的房子在使用了几个月之后，便退还给庙里。⑥

主教还禁止耶稣会神父在上海城里另找房屋，⑦ 要寻，就

---

① 南格禄1844年11月20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80页。南格禄神父对初期的耶稣会的中国恩人常表示极大的感恩心，他曾把收到的哀矜作了一张表；有两位曾运动耶稣会重来江南的中国神父，一位捐献了五百银元，一位三百银元。见《徐档》，卷宗E_5。

②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235页。

③ 梅德尔1846年9月14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86页。

④ 见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210页。教友宗教生活，这里是指主日及瞻礼日，教友应该在当地主教规定的公堂内恭与望弥撒、念经、办神工、领圣体等；一般私人宅院的小堂，非经主教特准，教友们是不得入内过宗教生活的。——译者

⑤ 梅德尔1847年5月3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6页起；又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6页。

⑥ 见本卷第104页；又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210页。

⑦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3页；《南格禄神父传》，第26页起。

得往城外去找。

在离上海城八公里地有一个小村庄，那是伟大的阁老徐光启的出生地；他的坟墓也在那里，墓前还排列着纪念他的功勋的石人石马。坟墓附近，住有他的几户子孙，他们虽都已贫穷落泊，但仍自豪地追念着他们伟大的祖先；有几户还是教友人家，他们在河浜旁边建了一间小屋，作为他们的小堂；其他几家则在教难和无人照料时已背弃了信仰，他们顽强地抗拒圣宠，过去以至目前还是徐家汇教士们的一桩棘手事。盛神父在 1842 年曾来村上巡视，他被这些姓徐的教友的信仰和诚朴所深深感动。①

南会长决定要在徐家汇创办一所会院，表示对引进我们旧耶稣会神父们到上海的这位大宰相的缅怀，这些怀念又似在邀请他们的后继者。该村又正靠肇嘉浜，去上海和松江交通都很便利，能在这里建立一所中心会院真是适得其所。②

梅德尔神父又是营造会院的负责人。1847 年 3 月，在毗连徐家汇小堂处买了一小块地皮，建筑工程就开始了。正巧那时薛孔昭神父从常熟古里村姓刘的教友家得到一笔很可观的哀矜，施主要求用于耶稣会事业。这笔献款，正好用来偿付地价和购置新会院的设备。那会院简单朴素极了。梅德尔神父写道："开始靠近小圣堂先搭一两间房间，为接待远道而来的神父们，而这也不是没有困难的。11 月 11 日，向北延伸又造了一埭房屋；以后在不同的时期，又增添盖造了几间；就这样，这座会院就是在事先无计划的情况下，神父们相应地

① 见《传档》，第 16 卷（1842 年）第 307 页起。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3 页起；又梅德尔 1847 年 5 月 3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6 页起。

作出了适当的部署后建造的。"①

在营造施工时，事实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一天，一群教外人，大约有八十到一百人，由一个地方上人人害怕的坏教友领着头，闯来工地，扬言要阻止并拆毁建筑物。当时马义谷相公② 单独在工地上督工，即挺身前去强力慑服了进攻者，终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进攻者也渐渐退走了。③

梅德尔从上海知县那里要到了一张保护工地的布告，布告痛斥了这次进犯者，并命令地方警察——地保，如遇到新的扰乱当以武力对付。④ 这样一来，使那些挑衅者软了下去，正常秩序恢复了，工程也得以顺利地进行。

7月，当徐家汇会院完工落成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人们从横塘搬运家具等等来徐家汇时，横塘教友中有些人认为神父屋子里的一切动用家具都是属于当地教友的；他们眼看这些东西搬走，都仇眼相视；他们也预感到修道院将搬走，这样不仅他们在宗教生活上缺少援助，一些物质利益也必将随之而去。因此，一场围攻娄良材相公及其苦力的真正的暴动将要发生。当横塘会院的家具被搬运上船预备开往徐家汇时，外国相公以极大的毅力，才阻止了暴动，终于使船开出。后经罗主教出面调停，以后的搬运工作就能顺利地进行了。徐家汇会院落成，家具也草草布置就绪，从此神父们可以在那里过几天暑假，并举行避静神工。⑤

---

① 梅神父的笔记由高龙鞏抄录在《江南传教史》，第236页中。

② 上海教友一般混称修士为相公，读神哲学的修士称读书相公，辅理修士称办事相公。——译者

③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237页；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9页。

④ 见《中国丛报》，第17卷第479页。

⑤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7页起。

从这天起，耶稣会会院就按耶稣会制度组织成功了。教区会长同时成了会院的院长，在他忙于出外奔波的日子里，理家神父就代行院长的职权；会院的常住户，就是那些新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的神父们、读神学预备升神父的读书修士以及若干辅理修士。

二、修 道 院

创办在张朴桥　迁移到横塘　修院修生　修院课程　修院假日　同罗伯济主教的矛盾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罗主教的委托，李秀芳神父在佘山脚下的张朴桥会口创办了教区修道院，于 1843 年 2 月 3 日开始授课。① 修院共有二十二名十三至十八岁的修生，其中四名来自山东；到 1844 年，修生人数已发展到三十二名，其中六名山东人。李秀芳在他的书信里给我们作了生动的描绘，叙述他创办时的艰难情况。不久，张朴桥教友感到，大批青年的汇集很可能引起邻近地方官吏以调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因此害怕起来。1843 年 7 月起，教员和学生就搬到了横塘，横塘教友畏怕情绪比较小，他们也懂得修道院的存在对他们是大有裨益的。②

横塘的修院和张朴桥的一样十分简陋。自从罗主教与葡萄牙遣使会割断联系后，南京主教区在澳门所有财产的息金

① 见本卷第 52 页。

② 南格禄 1843 年 10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78 页。

收入就此没有了。[①] 主教就得想方设法供养这一批修院学生;[②] 南会长记述道,"在这里,修院学生要付学膳费是闻所未闻之事,此外,能缴付得起的也只是少数人"。1845 年,横塘教友见到自己会口内有了修道院,他们感到既幸福又得意,于是互相捐募,建造了修院。李秀芳神父写道:"这所修院,在欧洲不算漂亮,但在这里,见到的人都惊讶赞赏。事实上这所修院是我们自己制图、自己监工造起来的,所以布置适宜,尺度开阔,可以很舒畅地容纳五十名修生。这是一座四合院,内院有庭心,四周围有隐修院式的回廊,屋外还有一片场地,孩子们可在那里自由地游戏、蹦蹦跳跳。小圣堂收拾得很整洁,护壁板涂了中国的上等漆,精光溜滑,一套来自巴黎的十四处苦路像更使小堂生辉不少。"[③]

修生们要学习好几门功课,既要识方块字又要读应考秀才必读的中国经典著作(四书五经),[④] 还要读拉丁文,拉丁文是读教会神哲学的关键。李秀芳神父很有风趣地说,在欧洲,人们封为大修院院长美名的我,"在这里却从早到晚只教 A、B、C"。[⑤]

当学生们会念洋书并正确书写时开始学拉丁文。

李神父述说道:"为了补充书本的缺乏,我先在涂白漆的粉板上写上文法法则和日常念的拉丁经文,于是我开始教学

---

① 见本卷第 92 页。

② 修道院原分大修院和小修院,后者是由年幼开始读拉丁文的学生组成;前者则由小修院毕业,读哲学和神学的人组成。——译者

③ 李秀芳 1846 年 3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8 页。

④ 施于民 1847 年 4 月 23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27 页。有二位中国老师教中文课。李秀芳 1846 年 3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80 页。

⑤ 李秀芳 1844 年 11 月 4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77 页。

生以相当于法国小学四年级的课程。至于拉丁文规则，我就尽量追忆我读过的《洛蒙文范》。过去一位老神父遗留下来的一本《阿尔瓦雷文范》，对我也极有用处。靠了我几个学生的协助，我把这本语法书译成了方言和官话，因为那些从山东来的学生，他们也属罗主教管辖的，迫使我同时必须掌握这两种大不相同的语言。"①

我们想想，当时李神父既要管理"修院的神业和杂务"，同时，虽然他不给教友们开四规②，但至少也得给送来的大批病人行终傅，因为人们在这里总能找到他，③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李神父的工作量是多么的繁重。

幸亏孩子们的善意帮助，大大地便利了李神父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李神父写道："我想我们这里成绩优良的修生，可以比得上法国的初中二年级。"④又过了一年，他又写道："他们中进步较快的，已开始能讲拉丁话了；每天在休息时，他们不讲别种语言。"⑤此后，高年级的学生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教；他们兴致勃勃而且很有成效地给新入院的修生教授初级读本。⑥

---

① 李秀芳 1846 年 3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9 页。

② 天主教规定教徒必须躬行实践的四条规则，即：一、凡主日暨诸瞻礼之日望弥撒；二、遵守圣教所定斋期；三、解罪至少每年一次；四、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这是 1934 年以前的四规条文)。

开四规，即在一定日期内，神父集合教友，给他们讲教理行圣事；主要的是行一次告解和领一次圣体，即所谓"四规神工"和"四规圣体"。教友按律做了，才算开了四规，满了四规。在西方，开四规一般在耶稣复活节前四十天的封斋期内举行，于复活节开斋日结束，故开四规也称"过开斋"。——译者

③ 李秀芳 1846 年 3 月 10 日信。

④ 李秀芳 1845 年 6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33 页。

⑤ 李秀芳 1846 年 3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9 页。

⑥ 同上，见《通讯》，第 1 卷第 233、279 页。

1846年，施于民和马驷堂这两位读书修士到达上海之后，即被派给李秀芳神父，作为他的助手。施于民修士于1846年12月6日升了神父后，即替代了李秀芳神父。由于罗伯济主教见李秀芳神父在江南创办修院有成绩，于是派他去山东创办修道院。马驷堂修士因一直在发高烧，只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①

施神父在家信里叙述了修院事业的发展经过。在1847年初，修道院有三十八名修生，其中十三名入院已有五年，使人欣慰的是：他们一方面自己继续学习功课，一方面照顾帮助年幼的，并教他们诵读和书写。院里的一切杂务也由他们来分担，并且做得都很认真。修院里年龄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二十二岁。修生中山东人与江南人之间常常发生小小的争吵，山东人比较粗鲁爽直，但更有毅力，江南人则比较文雅，但却懦弱。他们在争吵时，只要神父一句话，便可排除一切纠纷。②

在同一信里，施神父还给我们讲了横塘修道院的作息日程。我从其中摘取一段他所述的上中文课的方式方法，在欧洲人看来必定认为是杂乱无章的。"欧洲人断定一间教室的好坏，总是以学生外表的端正、教室的肃静为标准的，但这里却相反，一切乱哄哄的。他们读书不只高声朗诵而竟是高声歌唱，好似进了我们的收容所大厅。而且，各管各拚命地叫着喊着。有时我去巡视教室，看到中文课堂竟无法自我控制，我就立刻退出，怕暴露我的害怕的样子。可是那位长着长指甲、

① 施于民1847年4月23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7页。
② 施于民1847年4月13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6页起。

留着山羊胡须的尊敬的学者——中文老师，却庄严地、镇定自若地坐着。他的身旁和他平行站着一个学生，面对墙壁，正以惊人的速度背诵着他冗长的经典诗文。一般学生对诗文内容是不知所云的，这真是了不起的记忆力；这正如你给孩子以两页数目字叫他熟读背出一样。虽然我们劝告这位老师采用更合乎逻辑的教学方法，即先给学生讲解书中意义，然后再令熟读背诵，但习惯势力总是占上风。"①

修院放假日，上海附近的富裕教友常常争相招待修生，彼此在比较谁家招待得更好。施神父写道："每次当我们去某会口时，我们保证会有人接待我们。教友们为了更象样地招待我们，宁可自己省吃俭用。我们这些缺乏家庭天伦之乐的修道人，却得到了旅游的乐趣和受到了慷慨好客的接待。"②罗主教查考了修生们的成绩，表示满意。在他给传信部的汇报中，对江南修生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培养，作出了公正的评价。③

主教对这些苦心培植人才的人们表示感谢，但其感谢方式却很特殊。那就是他取消南会长对修道院修生们的听神工权，并命令修生们宣誓，宣誓在没有得到主教的特别豁免时不得进任何修会，尤其进耶稣会。④

这种措施不仅没有提高耶稣会神父的威信，反而损害了主教自己的威信。许多年龄较大的修生已要求进耶稣会，但

---

① 施于民1847年4月28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9页起。

② 施于民1847年7月11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55页。

③ 见《中国修道院回忆录》，《传录》，第11卷。

④ 见薛孔昭：《南格禄神父传》，第23页起。薛神父正确地指出："我和其他人都认为这种禁令对我们是有裨益的；初学院创办未免过于急躁，我们对于中国青年的禀性和习俗尚未透彻明了。"

他们解释不了主教为什么要反对他们进会的理由。①

三、上海及其附近

城内三家教友　欧美人最初的机构　松江府的会口；当地情况；传教方式；教士奔波；开四规；探访病人　传教士的劳累和考验　安慰　主要改革的成功　弛禁上谕张贴后教友胆怯的消除　传教先生、办事人和贞女们的进修　向教外人传教　魔鬼劝教　育婴事业的开始

上海这座大城市，自鸦片战争和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它的地位更显得重要了。当年天主教是那么兴旺的城内，但在1844年南格禄给教友开四规时只剩下近百名教友了。教友们没有一座公共的圣堂，只在陆、艾、施三家教友私堂内会集祈祷。陆、艾两家的小堂至今还保存着，为了纪念他们在教难时曾为教会服务，堂主人享有许多特恩，有神父经常去举行弥撒。② 施家的小堂则在可怕的叛乱战争③ 中被毁灭了。

---

① 南格禄1845年6月9日、8月25日致罗主教信，见«中总»，第2卷第4章第14、17页；又1845年6月26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32页。

当李秀芳神父发四大愿时，罗主教禁止他在修道院小堂内举行，而这位修道院院长不得不赶往附近的小堂口杨字圩去完成他修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上引薛孔昭书）。1843年9月8日，艾方济神父比较侥幸，他在修院小堂内发了大愿。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88页。

② 我有幸于1910年5月30日在陆家小堂举行弥撒；因此，我能在我的«中国概况»一书中描绘了我的见闻。见«中国概况»，第63页。

③ 指小刀会起义。——译者

"巴约内兹"号舰长——后升为海军上将的德拉格拉维埃尔于1849年参观上海时访问了陆家，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赵主教的介绍，陆家把德拉格拉维埃尔当作朋友来招待。陆家七十高龄的老太爷和他的两个儿子及许多孙子，以中国式的盛大的迎宾礼仪，以教友对教友的真挚热诚，于1849年2月4日接待了舰长和许多法国军官们。陪同前往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李盎博神父。李神父在陆家小堂先举行了弥撒，弥撒后才彼此行相见礼。舰长对这家中国家庭中男人们的尊严和妇女们的端庄不胜惊异，他写道："我们彼此争执很久的问题，现今完全明白了。传教士们的救灵热诚，在我们看来是合法的，理所当然的。对那些对传教布道的好影响产生怀疑的人，对那些对多劝化中国人信奉福音能使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仍表示怀疑的人，最好请新来的传教士把陆家老太爷和他后一代介绍给他们看看。任何一个心地正直的人在离开这座宅邸时，都会疑云消散，都会向这位尊敬而又慷慨的异邦奉教者致以崇高的敬礼。"①

当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城外荒地上地产的价值，第一批洋楼已开始建造。这些洋楼是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富商们的。洋楼造得又宽阔又舒适，一开始，这些洋行的营业就很繁盛。1847年夏天，施于民神父曾领了他的修生们来上海游逛散步，很惊奇地看到在原来的荒地上已迅速耸立起不少真正的王宫。他写道："英国租界变魔术似地迅速繁荣，真是个奇迹。他们不是造西式洋楼，而是在造各式各样的华丽的宫殿。人们可以说：天主为了英国人曾保护了传教士，在今世就给以地

① 见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1卷第303页。

堂的报酬。"①

初期，他们爱护教士的确是诚心诚意而且也是有实效的。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巴富尔和阿礼国两位最初来华的英国领事曾是罗主教及其教士们的真实朋友。②

其他洋人也仿效了他们，1844 年南格禄神父写道："不只是领事对我们表示关心，其他洋商，在这点上也与领事竞争着。我患病时，有人叫我喝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这是唯一适合我的饮料，人们去同一个英国富商商量，那时他也没有这种酒，但他却给我送来了十二瓶葡萄牙的波尔图葡萄酒，并说他已写信给朋友去弄一些波尔多葡萄酒来。不多几天后，果然给我送来了六瓶波尔多葡萄酒。一个西班牙经纪人，那时正来上海，为了向传教士们表示他本国对传教士固有的热情，一时寻不出足以表达他思想的词句，离别时对主教说：'英国人被你们迷住了。'"

在松江府境内，在黄浦江两岸，传教生活虽甚艰苦，但却令人兴奋。近百年来，这地区的教友几乎被人遗忘，也得不到什么心灵上的援助，他们正渴望有神父来给他们宣讲道理和施行圣事。因此，新来的神父在尚来掌握地方语言之前，就得应付繁重的传教工作。艾方济神父叙述他最初在 1843 年身受的艰苦，此后，在绝大多数新来的传教士身上又重演了。

"四、五个月来，我讲道，我教要理，但我自己也至多只能

---

① 施于民 1847 年 7 月 11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57 页。德拉格拉维埃尔舰长在《中国旅行记》一书里，曾对上海最初建造洋楼的情景作了动人的描绘（第 1 卷第 290 页）。蒙塔尔托在他的《上海史话》第 43 页里作了同样的记述，还附有当时建筑的照片和图象。

② 见本卷第 84 页。

听懂一半。最困难的是发音，到目前我还掌握不住。这种随地而异的发音，一个本地人觉察不到，而对一个可怜的外国人，就足以使他迷惑得不知所云了。主教不得已派遣我到教区不同的地段，而各地不同的口音同时装进我的脑袋，使我紊乱不堪。我每次初到一处，一般人对我提问的回答，是：听不懂。数天之后，人们才开始猜懂，但到了另一处，人们又不懂了。有些口语，我甚至要重复一千遍！我下苦功准备好后去接近一个从来没有和我交谈过的人，当他侧耳细听我讲话后，却问我'你要说什么……'我靠了一位懂拉丁语的中国六品修士的帮助，写了几篇最实际的布道稿。本月是圣母月，在中国和在法国一样，我到每一所会口，我重复关于恭敬圣母至圣无玷之心的布道，虽则人们至多只听懂我讲的一半，但我仍高声宣讲，满心喜悦，好象人们已句句听懂，一句不漏似的。我求天主在他们的心灵的耳朵边代我讲话，世上只有那些听不到天主圣言的人，或是祈祷中不求使人听懂他谈论天主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者。"①

向教外人传教之前，最迫切的工作还是给老教友们以再教育。我们看到，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对被遗忘和被舍弃是感到多么的痛苦！因此，必须首先对传教士不可缺少的助手传教先生和贞女们进行良好的训练；对若干富裕会口的办事人的浮夸自大要进行斗争；对腐蚀教友家庭的恶劣风气要加以纠正；特别是对那些在圣教基本道理不甚了了而已领了洗礼的人们，要给以再教育；对病危临死者要给以扶助……这一切，便是初来传教士们的繁重艰巨的工作。下面，我还将讲一

① 艾方济1843年5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65页。

些详情细节。传教士当年在这些教友地区的传教生活至今仍没有多大变化，最初重来教区的教士们在寄往欧洲的一些汇报中，对生活情况的描述，仍是今日教区生活的真实写照。

浦东以及包括松江至上海这一地段的一些堂口，是罗主教指定南格禄会长及其首批助手们活动的地带，直到从法国又来了增援的传教生力军之后，人们才开始北上传教。至于1842年至1848年的传教地区，郎怀仁神父曾这样写道："再没有比浦东更单调的地方了，那里找不到什么高低不平之地或什么丘陵湍溪、草地以及丛林。在你面前只是一片辽阔无际的平原，数以千计的人工开掘的河浜纵横交叉。浜内积着污水，河浜上面架着没有栏杆、三人不能并行的石桥或木桥。除了条条河浜外就是麦田、稻田和棉花田；田野里有坟，有的是土坟墩，有的是砖砌的浮厝，有的只用稻草或用芦苇包扎，也有的就是一具白皮棺材，停放在田岸边；讲到居住，有钱人盖的是砖瓦房，地基也比较高，其他则尽是茅草屋，屋顶低矮只到我的肩头，式样千篇一律，此屋彼屋毗接不分，这样就不孤零了，大的村子也就是这样构成的。"①

赶路程，大多乘船。每个神父有各自的船。艾方济神父为了安定家里慈母的心，充满诗意地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的小船简直是一座行动的房屋，船舱内有我的卧房、客厅、食堂、厨房以及仆人的卧室，还有工作间。夏天船上很凉爽，冬天我也不感到寒冷，因为船上的门窗制造得很紧密，但没有包

① 郎怀仁1845年8月27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53页。

上一点铁皮，全部是用木料做成的。"①

到达了终点站，人们以最大的尊敬，当作天主的使者来接待神父。艾神父继续写道："在欧洲，人们对司铎们所表示的最大尊敬就是脱帽点头；在这里，人们就先要双膝跪下，接着叩首至地，额角要碰到地皮，才算是最大的尊敬。有的人为了更表示他的尊敬，竟要叩首三响。我很想对这些在地板上或方砖地上向我叩响头的这些男女教友说：'算了，痛心捶胸忏悔吧，但不要把头颅磕碎了。'在欧洲，一个有地位的人为表示尊敬司铎就请他一起入席进餐；这里，主人无论怎样有钱，能荣幸地把神父请到他家里，他就给神父亲自端饭搬菜，从不肯和神父平起平坐，他只站立一旁，好似佣仆；神父食毕，他才进餐。一般教友，是从来不敢当神父面坐下来的。"②

上面我们已提到，有时神父就在有钱的教友人家的私宅小堂内，聚集附近的教友，施行圣事过宗教生活，而一般则是在地方上教友们的公所内举行。1845 年，笪良仁神父写道："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四或六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

① 艾方济 1846 年 4 月 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28 页。笪良仁神父更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航船，他写道："你们知道，中国的船只一般分为两间船舱，神父占的一间比较大，舱内放有一只桌子，一只长阔高低适宜的船箱，上面可以铺被褥，夜间可以睡觉；另一舱间是传教先生或教友的……每个船老大都是厨司，你可以在船上进餐，而船仍继续航行。" 1845 年 9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63 页。

② 艾方济 1843 年 5 月 2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61 页。

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公所的保管和维护，往往就托住在同院厢房里的教友人家。许多公所为贞女们另辟了一院；她们并不象欧洲修女们一样要发愿①，但她们喜欢住在圣堂附近，主要是为了满足她们的宗教生活。"②

神父来到后，先进小堂，堂内已汇集着教友，他们正在高声朗诵"求为神父诵"，神父乃向教友们洒圣水，然后进住房，接见向他磕头行礼的教友们。此时便开始他艰苦的日常工作。③

艾神父在信上写道："每天，弥撒前，我向孩子们讲要理问答；弥撒中，我向教友们布道；弥撒后，我听神工。白天，我只剩下一些为自己行神业的时间。此外，我得倾听教友们的谈话，探望病人，找寻那些不愿来堂的教友。"④

进餐时，也得利用来传教。笪良仁神父写道："进餐时间到了，男教友会集在神父房间外面的一间，等神父出来进餐。在他就坐之前，那些还不曾向神父请安的人，拥上来向神父磕头；磕过头，大家站在一旁等着神父给他们交谈……在涂了漆的红桌子上面，排列着许多瓷碗，装满了各色菜肴，一大碗白

---

① 发愿即宣誓，天主教修士修女，都有宣誓服从上级、不敛钱财、保守贞洁，即所谓绝意、绝财和绝色的仪式。——译者

② 笪良仁神父 1845 年 9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62 页。

③ 同上。

④ 艾方济 1844 年 10 月 3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63 页。

米饭，两根象牙细棒(筷子)，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头等的饭菜了。可是，这些菜肴调味特殊，很难引起一个欧洲人的食欲；饭，总是有的，否则人们必将在盛筵之下饿肚子了。"神父进餐毕，"男教友们退出，到另一间房子去进餐。这时，在神父允许下，贞女们，有时也有少数其他女教友来向神父行礼请安，她们一进来便向神父双膝跪下叩头，由于她们都是缠过脚，而且穿的又是尖头弓鞋，行这种礼对她们来说是很辛苦的。神父乘此机会教导她们几句话，她们常常是乐于接受的。她们很胆小，只敢低声说几句，一俟神父把她们辞退，她们立刻就退出。"①

给重病者送临终，是传教士一项操心而又沉重的工作。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教会受迫害的时期，教友们也不怕跋涉六、八、十里的路程，使病危垂死的人领得最后的圣事。②

这种事情常常使初来的传教士深受感动和感到欣慰。自从传教士的人数逐渐增多后，教友们便不再送病人来堂而是传教士亲往病家去了。试想一个纵十里，横五、六里，拥有八千到一万名教友的本堂区，就不难设想施行这最后圣事是多么的艰巨了。在神父们往来的信札里，也能想象出当时困难的情景。南格禄会长曾在他初期的信里叙述过这样的一次出征。那时他在横塘，靠近李秀芳神父所在地，有教友摇了船来请他去给两里路外的两个病危的人行终傅。到达病家，已是深夜十一点钟，南神父自己也正在发高烧，"我的病情和被探访的病人的病情同样严重"。整个一夜他就给两个病人送临

① 笪良仁1844年10月3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63页起。
② 见本卷第24页。

终。翌日清晨，当他正要上船返回时，"又有几个从更远的会口来的教友，请我去给另一个病人送临终，我就去了。给病人终傅完毕，我正预备回转，而第三个请终傅的人已来了，我又该启程赶去。在这第四个病者得到宗教援助后，到了中午我才回到了第一次来召我的会口，而那里已有另一个从更远的会口来的教友正等候着我，也是来请我去行终傅。这一次，我不打算当天回到我的住处。到病人那里已是傍晚，我就在病人家里过夜，翌日早晨，在那里做了弥撒，讲了道理，才得动身。"①

当教友近邻之中得了一种罕见的病症时，他们往往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来请神父去行终傅，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此外，神父们常常要怪怨的是，有的教友为了请神父到自己的小堂内做弥撒，知道神父没有充分的理由不会来，于是就假装有重病人要行终傅而来请神父。这种过度虔诚却给新来的、尚未适应当地严峻气候的传教士加重了负担，有的人因过度劳累严重地危害了身体。②

事实上，这些初来的神父能较长时期适应这种生活的很少，他们在教区内工作了五、八或十年之后，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假如人们设想一下他们繁重的任务，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郎怀仁神父阅读了南会长编写的作品后，写道："当我想到他编著的那本语法书和那部字典，我就不难懂得南会长

---

① 南格禄 1843 年 10 月 1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75 页起。这些情况并不特殊，在最初几年的书信里，常有类似的记叙。

② 郎怀仁在 1846 年 6 月 24 日的信里也曾有生动的描述，见《通讯》，第 1 卷第 367 页；葛必达 1845 年 1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96 页；鄂尔璧 1845 年 7 月 13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44 页。

之所以致病的原因了。我曾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不间断地誊抄才抄完的这两本作品，而他却是在船上、在深夜、在风尘仆仆又杂务繁多的情况下编写的，他既要作为传教士进行一般传教工作，又要为建造主教的公署、住院以及我们的一所会院而操心；而且当时他一刻也不能脱身，手拿曲尺，跟着泥水木工在工地上视察，务使建筑不致发生差错。照我看来，他实在不仅工作多，而是工作太多了。"①

人们对会长的这种光荣的"谴责"，也可奉赠予当时每位传教士。

主教本人也以身作则。尤其在初期，当他和南会长还没有发生可悲的纠纷，当他和他的合作者还是同心同德毫无隔阂时，他常喜欢分担他们的工作；他一听到有人患病，就立刻奔向病人床头。1843 年，艾方济神父写道："我再也不能默默不语了，我有几天病得很厉害，足足有一个星期，主教象慈父，更确切地说象慈母般地体贴照顾我。主教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他那么谦卑仁爱，甚至为我干着仆人的工作。他还代我出外给病人行终傅。当我既惭愧又诚恳地阻止他，请他自己保重时，他却说：'司铎们的健康比我自己的更为宝贵，我生病没关系，只要你能恢复健康。'实际上他也是说到做到，为了照顾最卑微的我，他竟不惜拖累了自己。"②

这种热心得到了不少报酬。神父们欣喜地看到神工和圣体数字的增加，教友和神父们也相处得更为亲热。由于冷淡和叛教者的回头，教友的数字也大大地增加了。开四规后，教友

① 郎怀仁 1845 年 8 月 27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53 页。
② 艾方济 1843 年 5 月 26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67 页。

家庭中的和睦宁静和虔诚气氛又重新回复了，对圣母的敬礼，也毫无困难地在各处传布着，这就带来了上主的祝福。教友们由于喜爱神业功课和教会礼仪，往往在圣堂内祈祷很长时间。①

神父们一到会口，即开始对教友进行重整和改造工作。首先他们着重于付洗的礼仪。南格禄神父及其同事们经过细细考察之后，觉得许多男的或女的权付者所用的付洗经文很可疑，有的竟是无效的；罗主教一得知这个情况，即出谕单，规定了今后权付者必须遵守的条例。不久，神父们查出教友中领洗无效的数字相当大，虽然他们审慎地秘密地采取了种种补救办法，但教友们的内心还是感到不安和惧怕。这个细致而又困难的调查工作持续了好多年，对神父们来说这的确是件艰苦的工作。当传教士熟悉了教友会口之后，他们感到婚配圣事也是一桩令人关注的大事。1846 年郎怀仁神父写道："几年来，教友们举行的婚礼几乎完全和教外人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只想到俗礼，乘机尽情娱乐，他们大摆筵席，而从不想婚配圣事的神圣。"为了纠正这个流弊，罗主教又出谕单，在唤起教友们回忆婚配圣事的来源和神圣性后，他作出了规定：今后教友在结婚之前，应先通知本堂神父，假如神父不能亲来主持，则由神父给以免单并指定证婚人，在小堂内举行婚礼，并诵念规定的经文。另一种流弊，你们知道，中国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由父母给子女找结婚对象，有时竟是一种买卖式的，

① 艾方济 1843 年 5 月 26 日的信（«通讯»，第 1 卷第 62 页起）和郎怀仁 1846 年 6 月 5 日的信（«通讯»，第 1 卷第 352 页起）。鄂尔璧 1846 年 7 月 16 日写信叙述他曾在石神父多年经营培植的一所会口里传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见«通讯»，第 2 卷第 369 页。

还有一种指腹为婚的偶婚，即在两家孩子尚未出生前，已预定了亲事。例如，一家生了男孩，另一家如生了女孩，即由父母作主定为夫妇。今后，这种婚姻，凡是教友一律禁止，也禁止在童年订婚，或在结婚前未婚妻先到夫家作童养媳。

按照天主教的结婚仪式，男女双方需彼此握手和彼此高声表示同意，然后接受神父的祝福，这对中国教友来说确是桩极大的听命行为；这一切，在起初，常会引起观众的哗笑。"目前，这种神圣的仪式已经以一种感化的方式在进行着。可以说，这似乎为宣布特兰托公会议的决定开辟了道路。"①

由于赌博、酗酒、吸鸦片，使许多富裕的会口衰败堕落了。在艾方济巡视过的一所会口，好几个教友为了纵情于这种可耻的嗜好，竟和一股海盗联络，其中一人，竟成了盗魁，这个可怜的人直到一场重病后才惊醒了过来。②

此外，生活腐化常常是家庭悲剧的根源，南格禄写道："一天，有人通知我，一个来自远方的教友要求见我，这人有一个三十岁的儿子，行为放荡恶劣，弄得家翻宅乱鸡犬不宁，因没法使他改邪归正，就把他勒死了。他冷漠地问我，是否应该按照惯例为亡者念经祈祷。"③

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主要不是缺乏善意而是缺乏甚至完全不懂教理知识。在许多会口里，孩子们一直长到十二、三岁

---

① 郎怀仁 1846 年 6 月 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54 页起。

特兰托公会议是 1545—1563 年由教宗保禄三世主持，在意大利特兰托城举行的天主教会议。会议是针对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召开的。最后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教宗权力和反对宗教改革的决议。"特兰托"，天主教史旧译"脱利腾"。——译者

② 艾方济 1844 年 10 月 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53 页。

③ 南格禄 1846 年 3 月 19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24 页。

也不受一点教育，他们无所事事，放任自流，蹉跎岁月。①

1847 年，笪良仁神父记载道："我们大部分教友只勉强知道一些告解和领圣体的最起码的要理；就算能背出全部教理问答的人，也很少能了解其中的意义。"②

经言和教理问答都是用文言和官话编写的，几乎所有的教友要么只了解一半要么甚至一点都不了解其中意义。因为那时，人们对把教理问答译为上海方言一事还迟疑不决。"中国人的心理，认为用通俗的方言来表达教理，是贬低了教会，因官员们对说方言的人，也是轻视的"。③

要在教友和中国神父之间根除这种成见，还需要等待多年。

幸亏教友们，尤其是低层教友比较听话，大大地方便了讲解者的工作。郎怀仁神父激动地指出，当他给孩子们讲解要理时，父母及祖父母等也和孩子们一起答问，毫不羞涩，并驯服地不仅接受神父的而且也接受传教先生的考问和纠正，任其评分而定程度。④

有了如此良好的条件，重整工作就进展得快了；告解和领圣体的数字日日上升，证明了宗教再教育在教友中正大有进展。

当然，神父们更关心当地的助手们，即传教先生和贞女们的宗教培养和进修问题。南格禄神父初到教区时，罗主教就

---

① 艾方济 1844 年 10 月 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58 页。
② 笪良仁 1847 年 6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48 页。
③ 同上。
④ 郎怀仁 1846 年 6 月 5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53 页。

请他给传教先生们举行了一次避静神工。①

对这些常伴着神父一起奔波的传教先生的培养与进修问题，是应该更加关心和重视的。因为尤其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是神父与教友群众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其中有不少成了真正的宗徒，例如这个出名的保禄，他原是小学教师，经鄂尔璧神父劝化和培养，使"他简直诚实象一个以色列人，热心传教象一个宗徒……他一心只想一件事，就是使他的同胞能得到和自己同样的恩宠。"②

至于贞女们，对她们再进行培训要困难得多；只有请欧洲的修女来，才能妥善做到。南格禄神父很希望外国修女能来江南，可是当时的时间和环境还没有成熟。③

神父们只有在神工架子上尽量地给这些大可发挥作用的助手们施以教诲。总是满腔热情的艾方济神父说："这些贞女们若天神一般无声无息地完成她们的工作，人们真可称赞她们为会口之花。这些鲜花，使教会田园得到极大的荣誉……她们给予启蒙无知者极大的帮助，她们又给人付洗，抚养被遗弃的婴孩，劝化病危垂死的教外人。假如人们对她们的劝导掩耳不闻，至少也不得不盛赞她们的热心，尊敬她们的品德。欧洲圣味增爵会(仁爱会)的修女们所做的事情，中国的贞女们是完全可以胜任的。"④

葛必达神父比较更为冷静更为正确地写道："我们在将来

---

① 艾方济1843年5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68页。

② 艾方济1846年7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72页起。

③ 见本卷第57页；南格禄1845年3月30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05页。

④ 艾方济1846年6月1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48页起。

可以从这个组织中取得极大的裨益；假如这些女子受到更多的教育，她们可以成为学校的优秀教师，培养教友家庭的贤妻良母，给会口起着造福的作用。”①

上面我曾提及，会口里的传教先生、办事人和贞女们曾给罗主教和他的助手耶稣会会士添了很多麻烦，而南格禄会长又怎样坚决抵制了那些真正的裂教企图。②

1847年初，艾方济神父被派往松江府一处发起抗拒罗主教事件的地方。他生动地叙述了他所遇到的困难，并怎样运用了纯中国式的方法使他不辱使命。“目前我是否应该向你略提一下，去年当主教出了谕单之后，这里几个不愿服从的人曾策划着一个小小的阴谋？……我一得到消息，立即赶往这些坏家伙会集的地方。当我想挽回他们，并给他们解说，做教友要升天堂的唯一途径和首要任务只有服从由天主赋予权力的人时，竟有人胆敢起来大声反驳我。我想这时正是我运用我从未用过的讲中国话的全部口才来制服他的时候了，于是我大声喊着：‘从地狱里钻出来的是哪个魔鬼？只有魔鬼，只有魔鬼才敢向天主的代表抗拒。大家快把这个魔鬼赶出去！他在哪里？在哪里？’那时，我只见一个人，避着众人的目光，灰溜溜地出了小堂，我装着要去追捕他，可他已在人群里不见了。我就说：‘现在，这笔帐要算算清，否则，我就不再来此地，今夜我就上别处去。’事实上，我要走也走不成了，因为所有的门已关闭，有的人拖住了我的衣服，有的人跪在我的脚下，他们都喊着说，神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错误而惩罚众人啊。我

① 葛必达1845年1月1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88页。
② 见本卷第91页起。

想我应该收场了。后来那些坏人再也不敢公然在我本堂区内策划闹事，但我知道尚有三、四个人还在暗中活动。一天，其中一个人懊丧地来找我，对我说：'神父，随你喜欢叫我什么都可以，但请你不要叫我魔鬼。'在这里，称作魔鬼，几乎同绝罚一样的可怕。我回答说：'那么，你就做天神吧！否则我就要叫人把魔鬼两个字写在你的帽子上。'一些好教友威胁那些闹事者，假如他们再兴风作浪，就要用武力来对付"。①

我们已知道，在神父们初来的年头里，当教友们忆及过去长年的教难时还是心有余悸的。由于教友个个胆小如鼠，常迫使传教士采取种种自缚手脚、令人厌烦的戒备，传教士在赶路时只能禁闭在船舱或轿子中，或只在夜间行动，到了目的地，就深居不出，形同囚犯。②

但自刺萼尼公使得到皇帝开放教禁的上谕，并经上海道台命令在上海及其附近把上谕张贴公布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③

神父们一致要求教友们"化当年的胆怯为坚强"，郎怀仁神父补充说："要把多年被教外人轻视的人，转变为被人追求和尊重的人。当年传教士被迫若丛林中昼伏夜行的野兽……今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乡间通行无阻了。"④

罗主教靠着英国领事在上海大官面前的威望，大胆地指导并了结了若干件纠葛之后，终于使传教士和教友在这座大

---

① 艾方济 1847 年 8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86 页起。

② 见本卷第 25 页。

③ 见本卷第 80 页。

④ 艾方济 1847 年 8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87 页；郎怀仁 1845 年 8 月 27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59 页。

城及其附近受到了社会上的尊敬。

浦东有一个官员，他还是一如既往向一处教友村进行敲诈，教友们拒绝了，他就派来一队兵，带了绳索锁链，要把办事人带走；教友们冲向这批进攻者，即用他们带来的绳索把他们捆绑了起来，押送到道台衙门。道台把反抗的教友投进了监狱；罗主教把一切情况通知了英国领事，英领事立即给道台送去了一张强硬的照会，被投进牢狱的教友就都被释放了。①

另一个地方官，因鄂尔璧神父的一名教友对一个教外妇女做了劝教工作，就把他关押起来，罗主教亲自去县里，闯进衙门，给知县递上皇帝的上谕，说了几句一般表示道歉的话，就从知县那里领回了被关押的教友。②

几次抢劫事件被狠狠地制止，证明天主教不能再容忍欺侮了。③

弛禁上谕内有一条是束缚神父们顺利地进行传教工作的，即禁止外国人进入帝国内地，规定如有传教士越出商埠范围而被发现扭获者，当把他引渡到最近的本国领事。④

耆英曾答应刺蓐尼先生，假如传教士谨慎明智，这一款就形同虚设，地方官对他们的存在，可以继续熟视无睹。⑤

在上海附近，这个诺言是兑现的，神父们也采取一定的审慎态度，公然传教，施行圣事。⑥

---

① 葛必达1845年1月1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189页。

② 鄂尔璧1846年7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70页。

③ 南格禄1847年5月19日信、艾方济1847年4月29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5、42页。

④ 见本卷第75页起。

⑤ 见本卷第76页。

⑥ 笪良仁1847年9月7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92页。

传教的方便虽大大增加了，可是教外人的归化还是很少，正因为传教士的负担过重，根本没有时间去向教外人宣教。神父只是努力和教外人和睦相处，保持良好关系，有时也请他们来圣堂参与宗教节日的大礼，这样，许多偏见便渐渐消除了。神父还劝导教友们燃起救灵神火，劝化四邻。①

要进行劝化教外人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教友们很不易接受这种去劝化教外人的思想，难道多年来欺侮、勒索和敲诈教友的人，竟也能和自己一般成为天主的儿女！很多教友对教外人是抱着轻视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神父们还得和教友们的这种态度作长期的斗争。回顾中世纪我们十字军在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中的历史，可见教外人的大批归化，并不是在老教友众多的地方产生的。

"魔鬼劝教"是一种奇特的、不期而来的传教帮助；在神父们的信件里，也屡次提及这种事情。往往是有人得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古怪病，一旦该户人家宣布愿当保守②，他们销毁偶像，领受圣洗，那怪病竟会霍然而愈。有时出现了可恶的、或猥亵的幽灵，损害了家庭人员的健康，破坏了安宁的生活；一旦领洗进了教，家里就安静了。③

当然，对于这种种传说的记述，原可加以探讨，但我们看到，连严肃的葛必达神父以及郎怀仁神父等也曾肯定确有其

---

① 郎怀仁1845年8月27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55页；1846年6月5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55页起。

② 保守，乃保证遵守教规，希望入教而尚未领洗入教的人，又译作望教者。——译者

③ 保禄韦尔登，对这问题曾编了整整一本书：《传教区内的魔鬼》，其第二卷讲的都是发生在中国教区内的事情。他转载了江南传教士的许多记述，可不是件件都有同等价值的。

事，而且在最初的年代里，也确实得到了大批的新奉教者，所以也难否认魔鬼对教外人的身心确有一种特殊的影响了。①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谈到，当这些怪事层出不穷时，人们只有把经过情况告诉徐家汇神学教授们，让他们去研究了。

那时有一项新兴事业，大受上海附近教友们的欢迎，那就是收领被教外父母舍弃的小孩，授以洗礼，抚植培养作为自己的子女。②

下面在谈到崇明和海门两个总铎区时，我得再重点叙述一下，那里的育婴事业成绩卓著。

四、崇明及海门

葛必达神父的创业　快速获得的成就　善良的教友们　艰苦的生活　传教方法　育婴事业　大批教外人的皈依　困难与迫害

我们知道，葛必达神父到中国数星期之后，即被派往崇明岛，替代两位遣使会的中国神父。他俩在崇明从开发教务起直工作到离去教区为止。③

去那里传教，简直象过一种流放生活；事实上，当风雨交加，水位高涨时，按常规坐船过扬子江是不可能的。葛神父虽

① 郎怀仁1845年8月27日信、葛必达1847年9月26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57页；第2卷第124页起。

② 南格禄1846年12月28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439页。

③ 见本卷第72页。

是一个刚毅果敢又富有创造性的人，当指定他去崇明过那种生活时，也感到诚惶诚恐，他曾苦苦哀求会长派他到别处去。当他的要求被拒绝后，他就毅然接受了使命，欣然动身前往。到了那边数天以后，他写信说："幸蒙主佑，我自来这里，深深感到生平从未如此高兴和愉快过。由于听命而被派来，我曾明显地感受到，而且还在感受着，统治万物的上主给予我们教区的一切勇气和力量。"①

葛必达神父曾孤独地留在岛上达一年多时间，到 1846 年 6、7 月间，南会长才给他派来了陆建石神父，作为他的助手。可是，陆建石虚弱的体质受不了崇明的艰苦生活。同年 9 月，魏道味神父从法国来华，一到上海，就指定派去帮助葛神父并从他那里学习传教。

崇明和其他江南的会口一样，由于去上海交通不便，在长达一世纪的遗弃中受苦很深；在长长的岁月里，崇明从没有一位神父久驻过；即使有，也只每隔五、七或十年，有神父从大陆上来巡访几处主要会口，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当然神父对传教先生和贞女们不可能起什么监督作用。叛教者或半叛教者的数字便与日俱增，而忠于信仰的教友们，由于愚昧无知，得到了可悲的下场。②

盛神父派来的两位遣使会的中国神父，开始着手对教友

---

① 葛必达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09 页。葛神父还引述了几桩奇妙的事情，证明在他开头的几天里，他只会伊伊哑哑，一点没有学会对他说来是新而又新的崇明方言时，他已经得到了上主的祝福。

② 见禄理格：《崇明注释》，见《历史研究》，第 7 册（《徐档》，卷宗 H4）。罗主教于 1843 年去巡视崇明教务，从 1803 年以来崇明就没有行过坚振圣事了。就在这次巡阅时，罗主教决定在岛上最繁盛的大镇堡镇附近，建造大公所总堂。

们进行再教育，他们的成就曾博得上级的好评。①

在葛必达神父的大力推动下，工作开展得相当出色，魏道味神父到岛上不久后写的一封信，概括了十八个月来葛神父的工作情况。信上说："当我在法国读到葛必达神父的书信时，我曾想到他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的高超；今日目睹了他的种种工作，更使我感到他不愧为一位出奇的人。他在信上只不过说了一半而已。他负责的这一小方由上主划分给他垦荒的葡萄园，在短短的时间内竟发生如此的巨变：许多忘掉教友最基本任务的会口，从死一般的酣睡中觉醒过来，回复到过去原有的虔诚；有的会口已开始重建和巩固；许多小堂已经重修；不少教友，由于缺乏扶助而堕落的，经过他的指引，又重新回到善牧的羊栈里来了；数以百计的婴孩由他送上了天堂；困难虽然不少，但都被这位传教士坚忍不拔的传教热情所制服。天主显然祝福了他的宽宏大量。我很荣幸能和他作伴，并从他那里学习扩大耶稣基督神国的影响。"②

事实上，葛必达神父在1845年和1846年写给罗伯济主教的汇报里，曾报告他已建立了九所新会口，付了三百十二名成人的洗礼，劝化了至少有同样数字的教外人和付了一千四百名教外婴孩的洗礼。③

葛必达神父不仅具有传教士们的种种优点，而且还有管理和领导的特长。这些特长，说明了他之所以能得到超越于同时期众人的辉煌成绩。他知道怎样培植本地助手，使他们渗透他的传教神火而去劝化教外人和给垂死的婴孩付洗；经他

---

① 见本卷第26页起。

② 魏道味1846年9月24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396页。

③ 见禄理格：《崇明注释》，见《历史研究》，第8册。

培训的传教先生和贞女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在教区内很出名。他常留心观察他们的行动，而暗中引导，避免引起教外人的猜疑。还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衣着、饮食起居及行动方面，可以说完全中国化了；他很快地学会了和中国官员交往的种种礼节以及和他们商讨事务时的折冲樽俎。此外，他还是一个勇毅、镇静，在任何凌辱或危险面前永不让步的人。稍后，他对上海洋人们的影响，更给了他一种新的力量。①

此外，上海附近会口里的那些令人头痛、使初期的传教工作大受挫折的种种困难，在崇明是没有的。在那里，没有豪门巨官的教友，因为有财有势的教友往往傲慢不驯，喜欢批评，甚至是造成分裂的危险种子。崇明和海门的教友大都很贫穷，只靠种一些贫瘠田来养家糊口，他们的谦卑自抑，邀得了天主的祝福。葛必达和魏道味两位神父，对这批诚实人的听话受教，不断加以表扬，至子反对外国神父，他们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岛民的主要而宝贵的优点就是简单纯朴，是教友式的纯朴，我想这是耶稣基督对任何人或任何要修德成为完人者所要求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反对神学第一德性的诱惑，任何陷于谬论的思想也没有，一切由天主说了算。传教士说的话，他们从不反对，'神父说了，就听，就照着做'，这是教友们常说的一句话。当他们中有人不肯接受公道上要求的一种牺牲时，我正直的传教先生和教友们便会把他包围起来，不容分辩地在他耳边大喊大叫，反复说：'神父的话就是天主的话，那是一码事'……受了这样的教育后，那人终于被领到神父跟前，双膝下跪，表示他已完全服从。"②

① 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8页起；《徐档》，卷宗H3。

② 魏道味1847年2月28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8页。

崇明的物质生活比任何地区更艰苦。在浦东，传教士出门坐船，速度虽慢，但尚舒适。在崇明，传教士要从岛的一头到另一头，就只有坐中国的小车。葛必达神父曾风趣地叙述说："当我们不能步行时，我们就得坐小车。当然车有车轮，但车轮却设置在车的中央，两旁备有粗制的驮架，那是装你的行李和你本人的，假如天晴的话，一个车夫在后面推就行了。假如地上有泥浆，那么得有两个车夫，一个在前面，用一根绳子缚在车上，相帮后面的车夫，把你拉向前去，假如泥泞不堪，这在没有石头没有砂砾的地区是常能碰到的，那你只有让小车陷入泥里，假如你愿意继续赶你的行程，你就得赶快下车，在泥泞里跋涉前进。因你是直接或几乎是直接坐在车轴上面的，所以车子一动，你立刻可以感到整个车辆的震动，这对促进你的消化，是大有帮助的。"①

在上海附近，许多教友家庭相当富裕，他们常慷慨地乐于满足神父的需要。在崇明，葛神父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确切地说：'我被派去穷人那里传布福音'。"②

传教士和教友一样，常常很穷。魏道味神父写信说："我们的岛民大多极其贫穷，却自甘菲薄，从不作非分之想。小小一个岛，土地又贫瘠，居民却有上百万，各户所占耕田当然很少，辛勤所得实难维持生活。小圣堂和神父住房都是茅屋，墙壁和屋顶是用芦席做的，地板也只是平整过的泥地；岛上没有燃料，菲薄的菜饭，只用几根干芦柴匆匆煮成；假如下雪，或整个星期冰冻，贫苦的教友就毫无办法了，炎热的夏天也一样。"

---

① 葛必达 1845 年 9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68 页。
② 葛必达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7 页。

魏神父写道："好多次，我的四肢冻僵了，刺骨的西北风从芦苇缝隙吹进来，把我桌上的油灯也吹熄了，我背上好似有千百把尖刀在刺割着；以前，我不信人们盖造房屋，可以不用砖瓦、不用石头、不用木板，可是今日在我从早到晚奔波的乡间所见到的房屋，难得看到用砖石木材建造的。当你跨进这种赤贫的收容所式的屋子里面，你也不见有桌子、凳子，也没有任何家具或装饰；只有几只用以煮饭的陶罐；继而是一只大木柜，柜上面睡人，柜里面藏着全部家产，差不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财产。他们的饮食、衣着，总之在一切生活必需品上都反映出他们那种极贫穷的生活。"①

是这种赤贫启发葛必达和魏道味两神父在传教初期的一切工作中着手兴办起光辉的美好事业。在崇明，溺婴的恶习比上海附近要少得多，农村风俗也不那么腐败。② 许多人家，由于家境贫寒缺粮，就把孩子送给任何愿意收养的人。葛必达神父就设想创办一种专为照顾这些被弃婴孩身灵的庞大组织。

当这位传教士初到崇明时，就想到救灵第一。他写信说："重要的，不是播种，不是灌溉，而是只有天主能使之成长的事业。我组织一支新兵队伍，专门为保卫在天大父托我经营耕耘的这块小园田。为了更有力地激发天主的慈悲，我的新兵队伍只指那些纯洁无罪、穿着领洗白袍的灵魂，他们的祈祷，天主也无法加以拒绝。我正着手编第一个连队，要由一百名临死受洗的婴孩组成，再有五、六个孩子，连队就编成

① 魏道味 1847 年 2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5 页起。
② 葛必达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6 页。

了。"①

从此，仁慈启发葛必达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临死的婴孩为他们付洗。罗主教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婴孩的猎手"。在葛神父谈话的声调中和他在书信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这正是他"造次颠沛"的心事。"我将怎样对你说我的天神队伍呢？我的天神们也就是我以洗礼编制上天的那些被弃的婴孩。我不能默而不语，这常是我心头快乐的源泉。我对你说过，在5月圣母月内，我以三十名小天神编制的一个花环，献给了我们天上的好母亲。特敬耶稣圣心的6月里，也不会比5月少。圣依纳爵月是这种美果最丰收的一个月，我还祈求先我们而死去的、有圣德的耶稣会老传教士。我终于有了六十多名的婴孩洗礼。8月，特敬我们慈母无玷之心的圣月，编队一开始就很顺利，第一天人们知道我已有了十五名婴孩洗礼；玛利亚光荣凯旋的一天(15日)，当我正抱怨圣母为何还不在这样的庆日把孩子给我送来时，消息传来，十三个小天神已应征入伍进了天堂。"②

1846年10月，葛神父终于写道："给教外病危婴孩付洗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六个月来，在崇明已有近六百个这样的洗礼。"③

为得到这些成就，葛神父曾利用一切方法，他甚至赢得一

---

① 葛必达1845年5月31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19页。葛神父信上补充了令人高兴的一段细节说："当瓦尔斯的弟兄们正预备领受铎品时，我愿分受他们铎品圣事的恩宠，我为他们每人，给天主奉献一个无辜的灵魂，眼看这些孩子即将升天时，我以我为他们付洗的名义，叮咛他们，定要特别保护这些祝上司铎阵线的新兵。"

② 葛必达1845年9月20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273页。

③ 葛必达1846年10月10日信，见《通讯》，第1卷第408页。

个教外助产士，她给他付了近八百个洗礼。葛神父写道："她时常来看我，我给了她几件西洋物品，她极其高兴，对我的印象极好，她说：'为使神父喜欢，我要给孩子们付洗。'她训斥起那些拒绝给孩子付洗的父母来，是很辛辣而又独特的。一天，她对一个教外产妇说：'怕什么，你怕孩子死？假如孩子受了洗礼而死，她就直升天堂，她将为你祈祷，你将再养一个比她美丽百倍的孩子，而且将是一个男孩。'孩子受了洗，立即死去了。但这个助产士为什么不奉教呢？对这个问题，她曾这样回答，因为她干这一行，很容易赚钱，一进了教，她就不能干了，她干的是哪一行呢？她是替不要儿女的父母把婴孩溺杀。但愿仁慈的天主，对这个妇女，怜悯胜于公义。"①

葛必达神父主要是通过他的教友而得到大量的付洗的。他利用一切机会给教友们灌输这种神火。有一家教友，请神父去给他的老娘行终傅，认为她已病得不可救药了，葛神父叫她答允设法付四个垂危病孩的洗，合家答允了，老太的病也好了，合家就想方设法实践了诺言。另一名教友患了慢性病，终年缠绵床头，神父建议用同样的处方，这个可怜人，也照样实践诺言，付洗了一两个小孩，当他付洗第三个时，他的病也痊愈了。②

行这种善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民间已流传着种种荒谬可笑的谣言，这些谣言给圣婴事业带来极大的障碍，例如说：外国人出钱买小孩去挖眼抠心，说什么这是外国人施展点金术或进行科学实验所不可缺少的。③

---

① 葛必达 1845 年 9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5 页。
② 葛必达 1846 年 10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410 页。
③ 同上。

受洗的几乎都是些病危垂死的婴孩，而受洗之后又立即死去，所以教外人始终认为领洗就是被杀。于是男女付洗者常常被辱骂、被殴打，有时遭到石击。① 可是传教士放在他们心中的神火，使他们能忍受一切。

教友们往往不顾自己的贫穷，出钱收买被弃的孩子。假如小孩领洗后活了下来，那就成为该家庭的一员。教友们也知道，送一个小孩去付洗，是比做任何一件好事更能使葛神父感到快慰，而且也肯定会从神父那里得到一个圣牌、一串念珠或一张圣像。这种虔诚的交易在不断发展着。人们把孩子从五六里路外送来，被送来的孩子的额上，有的还留有为了敬鬼而燃烧过的纸符灰迹。有时，还有教外父母亲自把孩子送来的。②

葛神父又写道："在海门，人们有时可见到有人抱着几个小孩出售，卖给出价最高者，但价钱常常是很低的。一个贞女买了三个，并付洗了其他三个临死的小孩。她买进的那三个孩子，共花了一百五十个制钱，两三天后，天堂里就增加了六个小天神。我曾见过许多有水的小沟，人们在深夜里把不要的孩子投入沟内，两分钟后，孩子们就都淹死了，把死孩投入沟内的，那就更多了。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一笔葬费。今天，我付洗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一定要把他丢掉，母亲比较还有些人性，通知一名女教友，女教友就去把孩子抱了来。"③

---

① 葛必达 1845 年 9 月 30 日、1846 年 10 月 1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5、408、412 页。

② 葛必达 1845 年 5 月 31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9 页起；魏道昧 1847 年 2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2 页。

③ 葛必达 1845 年 5 月 31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9 页。

1847 年 2 月，同葛神父一起工作的魏道味神父汇报他的成绩，说："在葛神父来崇明之前，谁也不曾着手在教外人中做给垂死的婴孩付洗的工作，但两年以来，自从这个美好的事业创办以后，在这里就出现了服务与仁爱的真正奇迹。往往是一些贫苦教友，或以日常工作作为全部家产来源的贞女，或一个子女众多，家中以道德善行作为传家宝的家长，牺牲最后一个银币去买进一个出生才几天的婴孩，授以洗礼，假如死去，他就被送进天堂……最近，两个贞女各自给我抱来一个教外婴孩，说：'神父，我出了三百个制钱买了这个毛丫头。她的妈一个制钱也不肯让，宁愿把她溺杀，不肯以两百制钱卖给我。'我问第二个贞女：'那你买这个孩子花多少钱？''两百制钱，神父，去年就是这个教外女人以三百五十制钱卖给我一个孩子，她曾答允我两百制钱卖第二个，如果有了第三个，还可以更便宜些。'"① 在魏道味神父的书信里，也记载了不少类似的情况。

这批辛勤的，差不多尽是从事农业的居民，过惯了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大体说来，他们的风俗习惯比上海附近的居民要好得多。教外人的劝化工作，在初期就取得了比较慰人的成绩。葛必达神父写道："那些穷人都是长年不息的体力劳动者，一般说来，他们遵守自然法则，凭良心做事，比起有钱人来也较少迷信。还有一点更突出而更令人注意的，即那些遵守自然法则的人，往往更易于接受福音。我每日目睹的事实，证明了神学上'自助者天助之'这条原理的真实性。"在葛神父的笔下，写下了很多正直的教外人回头归化的喜人事实：有的

① 葛必达 1847 年 2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9 页。

人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而走上了救灵的道路。一个青年同神父谈了一次话，就接受了光明。他为了保持信仰，顶住了家里对他的种种迫害。一个老醉汉，又是鸦片鬼，第一次听了神父的道理，竟回去给神父招来了不少新保守。① 再有几个诚实的乡下妇女，看到了教堂内大瞻礼日的隆重礼仪，或由于乳香香气的吸引，竟成了全家的宗教宣传者。②

还有好几个新奉教者，是从吃素的人那里劝化来的，葛神父写道："吃素的人是一种教派，他们誓不杀生，不吃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人们种植的蔬菜也不吃，他们只采吃田间野生植物的块根或茎叶，或生吃，或煮熟，也不加任何调味作料。他们说这种养生之道，对抑制情欲很有奇效；当人们不追求口福时，就更易于避恶行善了。"③

有不少吃素的人，得到他们教长的许可后改奉了天主教。因教长们研究教理之后，认为天主教最适合于改造人心。④

这种独特的大慰人心之事，使罗伯济主教公开承认，葛必达神父的管辖区是"教区内最美好的本堂区"。⑤ 而大慰人心之事是要经受种种特殊的考验的。崇明和海门的传教士也不例外。在这些远离上海的地区，知道刺萼尼公使得到弛禁皇谕的人不多；对洋人和他们的领事也不甚惧怕。何况百年来，

---

① 葛必达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6 页起。

② 魏道味 1847 年 10 月 4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45 页。葛必达于 1845 年 9 月 20 日写道："从我到这里几个月来，我已付洗了五十多名成人；我目前正在培训三百多名。"只要时间许可，他还准备每年能付洗四百至五百人。见《通讯》，第 1 卷第 277 页。

③ 葛必达 1845 年 4 月 22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16 页起。

④ 同上。

⑤ 魏道味 1846 年 9 月 24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391 页。

地方上的传教士都是本国人，魏道味和陆建石两位神父还是最初到海门的外国人；① 他俩都曾遇到种种困难，葛必达和魏道味两位神父都曾作了若干生动的叙述。

葛神父叙述说："一次我正走出乡镇，约有两百多人在我身后奔走叫喊着：'喏，外国人，抓住他！'给我领路的几名教友开始惊慌了，我对其中一名说：'把烟管给我，看我怎样叫那些小家伙滚回去。'我的烟管还是新的，我得声明，这是根四尺长的又好又亮的竹管，头部是黄铜的。我继续慢慢地向前走，直到那些急于追赶我的人距离我只有两、三步时，我突然转身，问他们干什么？他们不响，不回答，我便大声对他们说：'滚回去！'这些家伙相视无语，变卦了，他们乖乖地转身跑开。另有一次，我向一个叫喊得最响、与我保持着一定的敬而远之的距离的那个人说：'来抓吧！你，外国人正等你来抓呀！'他却不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得小心，如遇到一个头脑发热的人或是一个醉汉，那你就尴尬了。"②

魏道味神父和葛必达神父共事一年后，被派遣到海门半岛传教，和他合作的有陆建石神父。在一次真正的暴动中魏神父几乎成了牺牲品，幸亏他的镇静，救了他的生命。他曾详细地叙述了这次险遇的情况，我只简单地总括几句，使人认识到，开教时期神父们常常会遇到真正的危险。③

1847 年 6 月 24 日，魏神父曾在他最重要的一所会口里，召集教友过圣若翰瞻礼，集会的教友约有五百名以上，加上成千名来看热闹的教外人，公所被挤得满满的了。在这些人

① 魏道味 1847 年 9 月 7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101 页起。
② 葛必达 1845 年 9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277 页。
③ 魏道味 1847 年 9 月 7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01 页起。

里面混入了不少伺机抢劫的盗匪。教友们人数众多且态度坚定，神父则镇定自若，接纳这批不受欢迎的参观者如接纳朋友一般，因此避免了秩序的混乱。弥撒就在这批聚精会神的人群前举行了，气氛相对地来说还比较平静。当天晚上和翌日白天，参观者还在增加，虽然惹人讨厌，但还看不出他们有坏的企图。25日下午，一群匪徒，约六十多人，"这些人手拿长刺刀，身上只穿着地方上习惯穿的一条破烂的短裤"，他们出现在跟前，教友们密切提防着，神父继续看他的书，那些混蛋们终不敢发动突击。

他们就去茅家镇向知县控诉，诬告外国人正在煽动教徒们起来造官府的反。知县很有礼貌地叫人来请神父去会见，神父就坐了轿子去了。路上经过几个大镇，都有人群呼喊示威，但神父终于安全地到了衙门。知县很客气，给传访者出示了南京条约上禁止外国人进入内地的条文……神父反驳，声明自己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洋商，而是法国人，是传教士，最近已有皇上圣谕为传教自由作了保证。知县说他还不知道皇谕的原文。魏神父原要到上海做避静，答允从上海返回时一定给知县带来上谕的原文。会见在常例的礼仪中结束。这次会见对教友们来说，却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在这个衙门里，为了信仰而遭受过鞭打、监禁和罚款。他们看到神父和官府能平起平坐，得到他应得的权利，感到极大的快乐。魏神父为争取其应有的权利，当众严斥了一个对他无礼的衙役；继而隆重庄严地回到有人想谋害他的会口。第二天，他却接到了知县送来的拜访的名片和礼物。

不多几天后，魏神父按预定日期回到了上海。他的假期很短，因得知知县认为他的出走是逃跑，并自吹要阻止他再来

海门，不少教友也已受到衙役们的骚扰。所以魏神父应该尽快再出场，他带了罗主教给那不遵皇谕的知县的一封严峻的责问信，立刻返回了海门。

他的回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官员弄得晕头转向，只有惭愧地向上海道台请示，道台命令他象上海大城市附近一样，忠实地按照上谕办事。从此，海门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敲诈勒索的事情。茅家镇的大人物公开向神父道歉，并用隆重的礼节登门拜访。神父最后总结说："官家这一切好举动产生了很可喜的后果。从此拜偶像的教外人再也不来和我们纠缠了，我们祈祷、念经、传教、行动完全自由了；外国人在任何地方出现，再也不受呵喝和辱骂了。"①

然而神父还明智地规定，在以后教友集会时，力求避免人数太多，并叮咛教友们不能有任何挑衅刺激教外人的行动。

五、江南其他总铎区的教务概况和统计举要

赵方济主教就任之后，耶稣会会士才被征召到上海以北地区的总铎区；所以在初期传教士的书信里，都没有谈到那边的传教工作。苏州地区，原是由好几位中国司铎和由罗主教请来的一位方济各会会士谢吕比尼神父管理的。薛孔昭神父一到中国，就被派到属苏州府管辖的常熟县。1847 年，生于希俄斯岛的、传信部的希籍神父龙保理被罗主教从湖北召来，代替了谢吕比尼神父。可是常熟本堂区幅员辽阔，一个传教士是应付不了的，于是常熟就划分为二，龙神父留在西部，薛

① 魏道昧 1847 年 9 月 7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19 页。

孔昭就在东部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会口：张泾。①

浙江省的法国遣使会会士管理着无锡县和常州府，他们保持这两个地区一直到 1853 年。②

那时运河沿岸的会口，例如南京和安徽的五河，都没有常驻的司铎，而由一名传教士，一年一次前往该地给教友们开四规。安徽南部的徽州府的婺源县，则由江西的遣使会会士③管理。

教务总结工作似乎从 1847 年开始才正常地开展。在这以前，只有南格禄会长写给罗马总会长的两份报告：一份是从 1842 年 7 月至 1844 年 1 月，一份是 1844 年的。④ 1845 年和 1846 年的主要教务工作，曾在《中国新教区通讯》第一卷发表过。⑤

这些教务工作的统计数字是很值得注意的，它证实了教友会口的重整复兴工作是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而发展的。

在 1842 年和 1843 年间，只有南格禄会长和李秀芳神父两人从事传教。他们付洗了计有二百零三名教外小孩和六十八名成人。他俩听了四千三百二十六人次的神工。1844 年，他俩付洗了一百三十七名教外小孩和六十九名成人；领了五千五百个四规圣体。南会长观察到教友们满四规很困难，因

---

① 罗以礼：《苏州区汇报(1885 年)》，见《徐档》，卷宗C4；又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170 页。

② 顾主教和赵方济主教彼此同意，并经传信部 1853 年 2 月 1 日批准。见《徐档》，卷宗B1。

③ 浙江代牧和主教于 1846 年 3 月 10 日曾寄一份江南遣使会会士关于这座会口的教务报告给罗主教，见《徐档》，卷宗B7。

④ 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18 页。两份报告可在附录里查到。

⑤ 见《通讯》，第 1 卷第 445 页。

为教友们的中心地点，神父只能两年或三年才去巡视一次。

1845 年，总的情况比较更令人欣慰，也更有教育意义。那时有六名耶稣会神父在江南工作，要负责居住在二百十五座教堂或小堂周围的四万零五百名教友，付洗了二百八十名成人和七百零三名教外小孩，领了六千零二十一个四规圣体。1846 年有十位神父，负责领导四万八千二百八十六名教友，付洗了九百三十九名成人和二千二百九十一名教外小孩，领了一万零三百十三个四规圣体。

人们看到，在这些数字里，当时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强的教友开了四规，办了四规神工和领了四规圣体。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两方面比例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多而迅速增加，使教友们易于满四规尽好教友的宗教任务。

上述数字只限委托于耶稣会传教士服务的本堂区域，至于教区其他地段的教务汇报，我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

六、山东教区

郎怀仁神父和李秀芳神父　郎怀仁的被拘捕和押送回上海　李秀芳和方济各会代牧主教的分歧；李秀芳回上海

人们还记得，罗伯济主教要求耶稣会会士来华，一方面是为了南京主教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山东代牧区。因为他分别担任该两个地方的署理主教和代牧主教。1846 年，他周围已有十五名耶稣会神父，他便想分几位到他的代牧区去。1845 年 2 月，他曾匆匆地去山东，安置了传信部给他的一位助理主

教江类思。罗主教认为山东比上海附近更需要传教士，因为那里有七千名教友，分散在长达二百里的地带，而助理主教手下只有一位中国神父。①

郎怀仁神父第一个被指派去山东，1846 年 10 月 26 日他动身前往；1847 年 2 月 24 日，李秀芳神父也离开了横塘修道院赶往山东。两位神父先后走的是同一路线：沿运河从苏州到淮安；淮安原有不少教友会口，教友们热情款待迎送了这两位过路的神父。②

在淮安，两位神父都雇了大车北上，坐大车所受的苦处使两位神父念念不忘在浦东所坐的“神父船”，甚至也比不上在崇明所坐的小车，经过八天的艰苦路程，他们终于到达了山东教区。

山东教区的贫苦以及气候的严酷，使两位传教士备受艰辛。但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先前教友很兴旺的教区，而今只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残局，可见那里遭受的宗教迫害要比江南剧烈得多。教友们的无知，简直是江南教友们所想象不到的；教友们极度胆小，他们竟怕见神父。有一个办事人员，为了避免神父到他家里，竟然逃跑出走；许多叛教者固执地安于他们可悲的处境。这就是神父们在书信中给我们描绘的一些凄惨景象。一路上他们回想起当年光辉的年代，见到旧传教士的荒坟破塚和坍毁的教堂，更使他们倍觉心酸。③

---

① 李秀芳 1847 年 5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41 页；薛孔昭：《郎怀仁主教传》，第 9 页起。

② 见郎怀仁 1846 年 11 月 26 日信、同年 12 月 24 日信；李秀芳 1847 年 5 月 28 日信，见《通讯》，第 1 卷第 418 页起和第 436 页起；第 2 卷第 19 页起。

③ 李秀芳 1847 年 5 月 28 日信、郎怀仁 1847 年 12 月 5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57 页起。

两位神父估计传教助手会很快从江南赶来和他们会合，于是毅然立即着手开展传教工作。他俩彼此距离近百里之远，最初年头，他俩只能每年相逢一次，和欧洲的书信往来已全部停止，和江南的同会弟兄也是音讯不通，可他俩还是辛勤地从事这艰苦的工作。数月之后，郎神父已重建了几处古老的会口，并拥有了近百个保守教友；教友们有了神父的帮助，胆子也壮大了；何况山东省离北京比较近，人们知道刺蓦尼公使曾获得弛禁的上谕；高级大官员曾讲述皇上已好多次谈及有意重新召回曾在北京留下好印象的西方学者。① 神父满怀高兴地写道："我觉得天主降福于我了，今后这里年年可五谷丰登了！"② 他已计划和横塘一样建立一座修道院。③ 这些美好的愿望，不久就成为昙花一现的幻想。④

9月，郎神父正在山东东部马家屯会口。马家屯属平度州，州官是一个极端排外和反对教会的满洲皇族。几天前，已有教友把种种不祥征兆通报神父：不少教友已被骚扰，有的被衙门传去盘问洋人的踪迹。9月14日，正逢过光荣十字架瞻礼日，五个衙役来到小堂，把两个办事人抓走了，当时神父正在给教友们讲道。衙役还扬言夜里将有更多的兵来抓神父及传教先生。神父原有时间可逃跑，但想到这一逃"对教会或对教友都是极不利的"，于是留下等待着。到了晚上，十多个士兵

① 郎怀仁神父的这个消息是从江类思主教那里来的，见《通讯》，第1卷第437页。下面我们也将看到，罗伯济主教也有同样的报道送往罗马。

② 见《通讯》，第2卷第161页。

③ 见《通讯》，第1卷第436页。

④ 郎怀仁神父后来曾详细地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巴黎省会长吕比荣神父（1847年12月5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61页起）。

果然带着指名道姓的逮捕证来了，他们给神父颈上套了链条，给传教先生同样也套上了链条，把他们押送上城。到城时，已快天亮了。那时被捕者才被松了链。9月16日以后，州官才开堂审讯。他询问了有关欧洲各国的政治状态、英国和法国的财政经济、天主教的教理教规以及他似乎也知道一点的弥撒礼仪等等，他询问得非常详细，他又给神父出示了几只怀表，问是否损坏。神父耐心地一一回答，借此机会却给审判者及其周围参加审讯的群众说教传道。9月19日，州官决定接触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严肃地问："你们知道不知道皇上只准洋人居住在五个通商口岸，而不准洋人进入内地？""我不是商人，你们皇上开放五口通商，决无意禁止人们宣传人权和仁爱，那是你们的经书上每页都讲到的。我来中国，只是为了使人认识真教，救人灵魂。在五口通商开放之前，早有传教士来到中国，目前五口通商开放了，传教士继续又来了，五口通商如关闭了，他们还是要来的，为了救人灵魂，传教士既不怕挨打，也不怕死。"

从此，一切审讯停止了。人家也不再来传神父上堂，除了要当面清点箱笼行李，这是非常讨厌的场面。按中国习俗，被告者必须跪在判官面前，这是其他外国传教士决不肯屈从的。神父一连四十八天被监禁在哨兵队里；不和杀人犯、盗贼关在一起，那算是州官的额外开恩了。郎神父是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的，这使他以后在直隶和江南当代牧主教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很快就得到那些粗鲁爽直的同伴们的同情，他们都尽力地照顾他，他们得到了什么糖果零食也总要分给他一点。神父就把扼要的圣教道理讲给他们听，并教他们划十字圣号，作为酬谢。

虽则看守他的兵卒满怀好心，可是郎神父在他们中间还是受苦不少。他必须和他们睡一个铺位，合用一个木盆洗脸，他们的令人恶心的肮脏常常使他不堪忍受。他写道："从长远看，监牢对爱耶稣基督的人，似乎是可爱的；但应当相信，监牢总是监牢，饥饿总是饥饿，至于跳蚤呢（我为什么不说是我被监禁时的珍珠呢？），我说跳蚤还是跳蚤。在这四十八天里，我手中只有念珠，那是人们由于疏忽而留存给我的。没有日课经可念，也没有书本可读；你想想那是多么难熬的白昼和多么漫长的黑夜呀！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是饥饿。我总不会忘掉某一个晚上，我正向圣母哭诉着说：'娘，我饿呀！'就在这时，看守我的兵卒喊着：'好饭来了，好饭来了！'那是我同伴的朋友给他们送来的。我和看守我的兵卒一起享用了。我惊奇，我赞颂天主，他好多次使我好似捉摸得到他，他俯听了我的祈祷。天主的话，是链子锁不住的，成千上万的好奇者来围观我！天主上智安排了好机会，那时正是文武考生来城赶考和四乡农村缴租纳税的季节。谁都要来看我，不少人就坐在我的旁边，问我教会道理……不少人对我说：'我懂了，但这里不是公开传道的场合，将来，难道没有别处可以办这事么？'我规定了我祈祷的时间。当我在围观者前曲膝跪下为福音作证时，他们说：'他念经了，我们只看，不要和他搭讪。'于是他们之间就喊喊喳喳地谈论起宗教来；因此，我在被捕被囚时期的宣道说教，比平时下会[①]开四规时还要多哩。"

与此同时，对神父属下的教友们的宗教迫害也开始了。9月19日，州官贴出告示，宣布天主教是邪教，禁止人们信

① 北方教友称神父到小会口去开四规，叫做"下会"。——译者

奉；这是对弛禁的上谕的公开对抗。他还强迫郎神父的传教先生背教，罚跪铁链子竟达四小时之久；其他和神父同时被囚的，也受到同样的刑罚；受难者都坚持信仰，表现得很坚强，有一个还当面斥责州官违反皇命。在乡间，有不少教友被捕，并遭受残暴的毒打，有的不堪忍受而痛心地叛了教；有两个人后来后悔了，重复虔诚地信教，毅然表示了信仰。不少富裕的教友家庭出钱自赎，免受烦恼。后来，州官对自己这些不法行为也感到厌烦了，便下令停止暴行。假如上海领事们出而干涉，他必大吃苦头。后来他还是固执地严格执行南京条约时的皇谕。郎神父说："11 月 1 日，人们把我从监狱里领出来，派二十名卫兵负责押送我，我在同月 28 日到了上海。在押送我的日子里，我找到了向从未听到福音的地方宣传圣教的机会。我每到一城，见到一批一批的人群来到衙门。官员们要来看我，细细听我讲救灵的福音，有的要求看我的十字苦像。将来这个地方如何，只有天主知道，但我看来，这些地方得救的日子已不远了。对于我来说，我来中国似乎已经迟了七、八年！那时殉教致命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和这个皇室宗亲周旋，他雷鸣似的声音，炯炯的目光，假如我早几年碰到他，我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可是这次，这二十名押送我的兵卒，在到江南的路上，人数陆陆续续减少了，最后只剩下了那个小头目和我两人。一到上海，我立即被送到主教处，在那里我终于重新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看了这封信后，使我认识到郎怀仁始终如一的为人，他明智审慎，最恨傲慢吹牛和无为的挑衅，但对良心上的原则性问题，则寸步不让。他的那些在浦东的老教友要求赵主教把他们的老本堂派回，赵主教答允了，于是郎神父又一度送回到了

浦东。

李秀芳神父单独留在山东。可惜他叙述自己传教的书信一封也没有留给我们。继任南格禄当教区会长的卜亦奥神父，于1849年曾写信给省会长神父说："李秀芳这位好神父在山东正患着重病，由于没有神父，连给他送终傅也不可能。他远离他的弟兄们，好似单独地流放在这个省里。但没关系，他做的是好事。"①

李秀芳神父的处境不久就很为难了。自从江南与山东划开后，人们就不再派遣耶稣会会士去山东；山东代牧区罗主教的继任人江类思主教② 同耶稣会会士隔阂很深，虽则他也承认耶稣会会士的传教能力和服务精神，但他谴责他们的行动太随便了。③

传信部逐步决定把中国的各个代牧区委托于各个不同修会之后，方济各会便接管了山东。1851年，李秀芳就重回了江南。

---

① 卜亦奥1849年6月14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81页起。

② 见本卷第111页。

③ 见有关这些纠纷的信札：江主教1847年11月1日、1848年5月13日、1849年11月25日致传信部的信。传信部驻香港的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负责传递双方的信件，他还努力从中调解。1848年11月30日信，见《传录》，第12卷第13页。

第 二 部 分

赵方济主教和徐类思主教时期
（1848 年至 1856 年）

第 一 章

从赵主教任期开始到叛乱战争发生（1845年至1852年）

教区历史概况

传信部排除法籍神父并规定宗座代牧与耶稣会会长权力划分的部令　传教生力军　1849年至1850年的饥荒与瘟疫　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　创立横塘孤儿院与徐汇公学　开发湖广计划　上北京办科学事业的计划　马再新神父的厄运　上海主教集会　开发直隶西南与日本的计划

罗伯济主教同马再新神父于1848年初到了马耳他。[①] 罗主教离开中国时，对法籍神父，尤其对南格禄会长是很愤恨的，他控告他们在江南教区搞分裂。[②] 1848年5月17日，罗主教给传信部秘书去了一封信，声称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混杂在同一个教区内，要求太平无事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要求今后法籍神父一律禁止来华。[③] 传信部秘书巴尔纳博主教同意了他的请求。[④] 1848年7月6日，巴黎省会长吕比荣神父写信给教区新会长卜亦奥神父[⑤]，通知他，由于罗主教的请求，他曾接到禁止派遣法籍传教士再到中国去的命令。[⑥]

总会长罗当神父听到这个决定后感到很痛心。1848年8

月 25 日与 1849 年 3 月 8 日，他给传信部部长枢机提了意见，说这个新决定给江南教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⑦ 同时，教宗庇护九世的专管拉丁信件的秘书菲奥拉蒙蒂主教先在罗马、后在加埃塔⑧ 向教宗谈论了此事。圣父经过调查后，于 1849 年 4 月 21 日在一次接见部长枢机时，撤销了禁止法籍神父去中国的禁令。⑨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省会长吕比荣神父向中国报告了这个好消息，⑩ 另外，卜亦奥神父和赵主教也都上书传信部，呈请收回成命。主教特别指出，实际上教区非常平安⑪。在他们的申请书到达之前，他们的请求已被批准了。

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次事件给教区送来了一批卓越的意籍耶稣会神父。马再新神父为了迎合罗主教的心愿，通过总会长神父的授权，向意大利各会省号召征募。由于当时意大利国内正在闹革命，会士们的事业被打乱了，因此有一部分会士

---

① 马再新于 1848 年 2 月 15 日在马耳他写了一封致总会长的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7 章第 43 页。

② 吕比荣 1848 年 7 月 6 日致卜亦奥神父信，见《徐档》，卷宗F13。他曾注意到并俏皮地说："南格禄神父真是个纯撒丁岛人。"

③ 见《传录》，第 12 卷。

④ 菲奥拉蒙蒂 1848 年 10 月 3 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信，见《总法那罗》，第 29 卷第 13 章第 10 页。

⑤ 卜亦奥神父于 1848 年 4 月 15 日接替了南格禄神父的会长与代牧主教的职务。

⑥ 见《徐档》，卷宗 F13。

⑦ 见《传录》，第 12 、13 卷，并见总会长罗当 1848 年 8 月 26 日致卜亦奥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⑧ 菲奥拉蒙蒂 1848 年 10 月 3 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见《总法那罗》，第 29 卷第 13 章第 10 页。

⑨ 1849 年 4 月 22 日宣布撤销禁令，见《总法那罗》，第 29 卷第 13 章第 21 页。

⑩ 吕比荣 1849 年 6 月 13 日致卜亦奥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 13。

⑪ 赵方济 1849 年 2 月 22 日致卜亦奥神父信、赵方济 1849 年 10 月 6 日信，见《传录》，第 13 卷。

可以抽派出来。马再新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许多神父自愿献身给教区。要不是受到庞大旅费的限止，肯定会有三十名左右的意大利神父应征而来。①

最后，施伯相、吕索、杜惠伯、夏显德、德良弼、罗礼思和谷振声几位神父与马理师、晁德莅和利庸乐几位神学修士于1848年6月同马再新神父在马耳他上了船。在亚力山大港，他们得到传信部禁止法籍神父到中国去的通知。于是，这次长征中的唯一的法籍神父罗礼思不得不返回马赛港。②

吕索神父因为路费不足，无法继续航行，就和罗礼思神父一起返回了欧洲。由于湖广代牧主教要求增加助手，于是施伯相与夏显德神父被指定去湖广，因此他俩就留在香港，准备进入湖广。③其他的神父修士，在1848年9月27日到了上海。④

罗礼思神父返回法国对教区来说真是件遗憾事。罗神父多年来，为管理计划中的天文台，专门钻研了天文学。⑤他的回转，也是出于他的过分的认真。弗朗索尼枢机在一封致总会长神父信中，声明他的本意原不是要拖住一些已经动身的神父，而只是为了将来。⑥翌年，这道禁令取消了，罗礼思神父就同贝来德、费都尔二神父同来中国，1849年10月1日到

---

① 马再新及其同伴1848年5月至8月致总会长神父信，见«中总»，第2卷第8章第46页起。

② 同上。

③ 后面将要谈到此事。

④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5页。

⑤ 卜亦奥1848年7月10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3页。

⑥ 弗朗索尼1848年10月3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8页。

达了上海。①

正当传信部决定把法籍神父排除出江南教区的同时，又下了一道消除关于罗主教同南格禄会长之间因权限问题而发生争执的部令。这条部令，教区一直执行着，直到一位耶稣会会士出来当了代牧为止。

原则明确规定：除有关修会的纪律外，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一切教区教职以及管理事务必须听从代牧主教调配……特别指出：会士必须服从教区首长与本会会长的领导，而尤以前者为主；如两者命令有抵触时，应该服从前者。②

训令后面附着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重申教宗克里门九世与克里门十一世关于这问题的诏书以及传信部部长于1680年与1776年的声明。因为，南格禄会长在同罗伯济主教发生的笔战中发表的几项原则和上述公文有抵触，所以受到了谴责。他认为会长神父指派会士到某地担任某职或把他调换或召回是错误的；认为代牧只能和会长接触往来，而会长则能任意支配会士或调动主教已委派的职务，并自认为是人地咸宜，这同样也是错误的；相反，每个传教士"对于教区的一切事务和管理"应该服从于代牧主教的领导。③

关于修院修生无主教豁免不得入修会的誓言，必须按传信部关于这问题屡次申述的原则来办理。"必须注意，自由地进入修会会严重地损害本地神职班的培植工作，这是圣部一开始就极为关心的问题。近几年来，本部曾向各传教区的上级，特别向印度与中国教区的上级们一再叮咛和强调这个问

① 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5页。
② 见《传特》，第23卷第487页。
③ 见《传特》，第23卷第494页起。

题。”①

关于传教士同传信部的通讯，必须按当年为印度马杜赖建立耶稣会代牧区（1845年12月9日、1846年3月23日和9月22日）时的指令办。②

9月30日，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把这些决议通知卜亦奥神父。他说：“这些问题业经宗座多次决定，并屡次下达教区，而竟在传教区尤其在中国传教区内一再发生，实令人痛惜。”在重申上述决议后，传信部部长总结说：“如果主教与会长抱着基督的明智和为真正的传教精神所推动，而只求愈显主荣和拯救人灵的话，我们深信，这些类似的争执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了。”③

对南格禄神父提出的几个重点，有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有一点，圣部也确认他的申诉是有根据的；涉及到修会纪律时，会长对于属下会士有管理权，因此会长能同他们通信，并可自由地探访他们，需要时还可给他们下达指示。此外，关于耶稣会在教区中的财产问题，部令并没有触及到；为此耶稣会会士在江南与其他地区一样，在会典规定的范围内，也应该拥有置产权。

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权力的二重性常常是一项严重的困难。赵主教竭尽所能，以他的温顺谦让来缓和矛盾④。在开头几年中，代牧主教与耶稣会会士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紧

---

① 见《传特》，第23卷第494页起。

② 同上。实际上，圣部保留了江南修士对誓言的豁免权。

③ 见《徐档》，卷宗B1。

④ 见由总会长罗当神父转给江南神父们的一封赵主教写的令人钦佩的信（1849年3月16日），见《徐档》，卷宗F11。

张,① 但是已经在逐步改善中,我们将看到赵主教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要求耶稣会会士当他的继承人。② 耶稣会的上级也尽量想方设法使这种关系得到改善。罗当总会长神父与巴黎省会长吕比荣神父等有关这事的信件,就是最好的证明。③ 他俩不断地叮咛本会的传教士,要不惜任何牺牲完全遵守传信部的决定;对主教的一切抱怨,也总是用极清晰的指示转给江南的神父们。④

1848 年 11 月 8 日吕比荣神父写道:"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毫无异议地服从传信部的命令,努力设法协调一致,从主教处为神父们的愈显主荣而获得更有益的岗位。"⑤ 在实际上就是这样,直到赵主教任期末年,神父们的传教岗位是由主教任命的,但事前先征求会长的意见。⑥

此后几年里,法籍与意籍的传教生力军来了不少。在他们旅途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当时中国海面上正处在怎样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由于玛丽-阿梅利皇后的一再从中斡旋,翁毅阁神父由冉茀禄和费尔伯两位神父伴同,搭乘了法国驻华第一任公使陆

---

① 香港帐房费利西亚尼 1849 年 5 月 25 日致部长信,见《传录》,第 13 卷。吕比荣 1850 年 1 月 11 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说:"会长与代牧之间的分歧,症结就在同一地区支配同一些人。由于各自的观点不同,有时甚至互相背道而驰。"见《总法那罗》,第 8 卷第 1 章第 21 页。

② 后面将要提到此事。

③ 罗当和吕比荣 1849 年 3 月 15 日致赵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1。

④ 罗当和吕比荣 1849 年 1 月 3 日、3 月 16 日致卜亦奥会长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⑤ 吕比荣 1849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6 日、11 月 20 日、12 月 23 日致卜亦奥会长神父信。(出处同上。)

⑥ 赵方济 1849 年 3 月 16 日致罗当总会长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F11。

英伯爵及其使团的军舰。[①] 公使在香港停航了，神父们为了继续前进，租用了一艘葡萄牙人的机帆船。当时中国海面上正海盗横行。机帆船离港不久，即被好几艘海盗船围攻。船长吓呆了，想投降。翁毅阁神父毅然亲自指挥，稳定了众人，用机帆船上武装着的一些小炮，迅速地制胜了袭击者。由于害怕海盗而迟迟不敢前进的许多中国船，就追随在教士们的机帆船后面，结成一支船队，顺利地到了宁波、继面到了上海。不用说，这次为神父们服务的水手，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报酬。[②]

在赵主教任期内（1848年至1855年），有二十二名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③] 其中七名返回欧洲，七名死亡。[④]

代牧主教还找寻其他助手，征召一些在邻省教区已有经验的方济各会会士来江南；其中有芒吉里神父，他起初是按照范廷佐修士的样稿，监督建造新的主教大堂，另一个是徐类思神父。1848年9月11日，徐神父被祝圣顶塞斯皮斯衔的主教，任命为赵主教的助理主教及继承人，祝圣典礼在张家楼圣

---

① 船到里斯本时，翁毅阁神父受到许多贵族家庭的欢迎；其中一家把一个精美的象牙雕的十字苦像送给了教士，用以供奉在徐家汇大堂祭台上。见薛孔昭：《翁毅阁神父传》，第54页起。

② 梅德尔神父1848年4月9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77页。

③ 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日期：神父翁毅阁、冉蒲禄和费尔伯是1848年3月20日；上面提到的六名马再新神父的同伴是1848年9月27日；夏显德神父是1849年1月24日；罗礼思、贝来德、费都尔神父是1849年10月1日；高慎思、伊再可、柏理师神父与埔理修士石怀德是1851年3月29日；计依赖、平乃公、桑理爵是1852年1月11日；伏伯禄、卜理奥神父是1854年10月18日，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4—5页。

④ 艾方济死于1848年7月1日；马驷堂死于1850年4月28日；柏保禄死于1850年6月2日；马再新死于1853年4月28日；伊再可死于1854年5月30日；卜亦奥死于1854年6月9日；魏道味死于1854年8月23日，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

堂举行。赵主教驻在靠近洋泾浜由官方偿还的那块土地上的一所小屋内，后又驻进芒吉里神父给他在董家渡主教大堂近旁建造的一所比较合适但仍是中国式的住宅内。①

助理主教常住张家楼，管理着浦东许多兴旺的会口。②

最后一批传教生力军到达后，传教事业就可以认真地发展了。赵主教同意新任会长卜亦奥神父的想法，使一些新到的传教士有充分的时间去学习语言；同时，一些比较早来的有特长的传教士，他们在上层社会中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主教就让他们从事学习官话并研究中国文学。南格禄神父由一名山东秀才协助，指导这些工作。马奥定、马再新、葛必达和杜惠伯四人，由南格禄神父领导，他们就住在徐家汇。③

由于当时教区遭到重重灾害，迫使众会士迅速投入直接传教工作，这个计划和以后多次类似的计划都没有兑现。1849年5月和6月，大量的暴雨使江南及其邻省遇到了可怕的水灾；造成我们西方基督教国家从未见过的饥荒。当时神父们的来信，唤起了编年史家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悲惨景象的回忆。卜亦奥会长呈省会长神父的信上说："一连六个星期，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人们说整个帝国的江河齐泛滥了，这大概是指我们周围的几个省而言；农村淹水两三尺深，人们在田里撑船行走；粮食淹在水里都腐烂了。加上小偷，更确切地说，一些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的本地人充塞在地方上，在这人口众多，人叠人的地区，在年成好的时代，尚且还有赤贫的人，

① 见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

② 赵方济1849年8月26日致某神职人员信，见《徐档》，卷宗B3；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21页。

③ 南格禄1849年1月22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33页起。

那么在这灾荒时期必然会有许多人饿死。后来大雨停了，水也从淹没的农村逐渐退了，可是浸透了水的土地，被烈日一晒，蒸发出孕育瘟疫的臭气，这些可怜的饥民，更是成千上万地死去。"①

魏道昧神父对海门的情况作了同样使他感到悲痛的记载。郎怀仁、施于民以及柏葆禄等神父对浦东和松江附近发生的水灾情况也作了记载。②

上海虽然由于和欧美通商，地方日趋繁荣，但那时的景象也是一片凄凉。卜亦奥神父说："在上海除了一般平民外，突然增加了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灾民。两个多月来，这些人日日夜夜麇集在马路上，受尽了煎熬；大部分人被活活地冻死、饿死。"③

神父们立刻投入救灾工作。会口里的传教士从上级那里收到的哀矜，只能限于救济自己的教友。会长神父写道："眼看一个月之后，我们的经济来源即将枯竭，应该尽量节约，使我们在信仰中的子女免于饿死。"④

在上海有一些洋商，他们不分国籍，不分信仰，经常帮助教友们。由于他们的施舍，使我们有能力组织并扩大了救济的范围。赵主教本人也带头参加施舍粮食的工作。两天一次，四千至五千个饥民到主教住院，领取按计划供应的一撮救命的救济米。⑤

---

① 卜亦奥1849年7月4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88页起。
② 见《通讯》，第2卷第269、293、295、298页起，又第346页起。
③ 卜亦奥1850年4月23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20页起。
④ 同上，第331页。
⑤ 同上。

一些教外的富商，看到天主教的施舍工作大受感动，也要求参加教会的慈善事业，他们的布施就成为极有力的援助。上海知县开办了一所庞大的医院，专收四岁以上十岁以下由贫苦父母遗弃的儿童。①

赵主教看到富商中也有不少教友，于是就利用他给上海进行大量施舍而产生的好影响，想法使传教先生和贞女去这所医院工作，付得了无数临死孩童的洗礼；三位神父也被接纳了进去，罗礼思神父给医院装置了通风设备；马驷堂神父当了医生、翁毅阁神父当了主教的代理人；他们在那里开展的传教工作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赵主教及其助手们除了走遍各街道各里弄外，还探访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船只，给临死者付洗，并护理患病者。尤其是翁毅阁神父，在这些慈善工作中，得到了极好的评价。②

神父们在通信中，盛赞英美商人的慷慨协助。③

在这些凄惨危殆的日子里，真正称得上卓越的恩人的是法国驻沪首任领事敏体尼先生，他原是刺萼尼公使的主事，④公使曾亲自指定他为在华办理文教事业的继承人，⑤1847 年 1 月 20 日，他又被任命为驻上海的领事代理人。1848 年 1 月 25 日他到任后即同上海道台磋商，使法籍侨商获得了居住的地方。那时只有里昂人雷米的一所住屋，除传教士外，雷米

---

① 卜亦奥 1850 年 4 月 23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31 页。

② 同上；又赵方济 1850 年 4 月致传信部总部信，见《传年》，第 22 卷第 366 页。

③ 同上。

④ 见本卷第 66 页。

⑤ 梅德尔 1849 年 6 月 16 日信上说："刺萼尼通知敏体尼来上任，说他是他特选的人；我们对这两位先生都是感激不尽的。"见《通讯》，第 2 卷第 283 页。

是上海唯一代表我们法国的。雷米先生多亏了敏体尼先生的帮助，终于在1849年初买到了一块土地。同年4月6日，道台出了一张布告，划定了法租界的范围。①

赵主教住的那间中国式的小屋，地处上海官方代偿给教区的三块土地中的一块上面，② 又正好划入法租界范围之内。当主教搬去董家渡后，③ 就把这所老屋让给法国领事敏体尼，领事便同他的家属住了进去。④

敏体尼先生很快就了解到，保护各教区，特别保护江南教区，会给法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多年来，法国在上海的贸易量原不能与英美竞争；但自从保护了这座大城四周的七万多名教友后，使我们的政府代表在中国官员面前赢得了特殊地位。1848年11月10日，敏领事致书法国驻华公使陆英伯爵说："全力保护天主教，是我们执行的一个好政策；在中国官员面前我们的地位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天主教教徒中，我们已取得很大的影响，他们将是我们法国商业的第一批主顾。"

几个月后，他又向公使承认"我们手中正有着十二件有关传教士的案件"，他接着说："公使先生，我再重复对你说，这批传教士是法国将来在这里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具，我们的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保护他们。唉！我不是由于宗教情感，为他们说好话而偏袒他们；作为军人，在时代精神中成长

---

① 见高田：《法国在远东二殖民地的起源》，第1卷第38页起；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40页起。

②③ 见本卷第170页。

④ 见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1卷第251页起。书中曾生动地描写了敏体尼及其家属在上海的居住条件。顾随侯爵谈到这第一座法国领事馆，认为是"真正的一所陋室"。见《回忆录》，第2卷第203页。

的我，我自知知之甚少。但出于正义感和自尊心，出于维护祖国的荣誉，我认为保护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西方国家迟早会认真地过问中国事务，而我们的传教士必将为法国作出重大的贡献。至于商业方面，① 这些正直的人所作出的努力，早就该大受赞扬的了。"②

我们的领事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同徐家汇的神父们已产生了最诚挚的友谊。但是他同赵主教及其助理徐类思主教的关系虽然处理得恰如其分但并不亲密无间；他俩一方面利用法国领事为教会服务，而另一方面又害怕法国对天主教获得正式的保教权；他俩对我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也不敢表示特殊的尊敬与关注。我们的工作人员，虽总是竭尽所能保护教区的利益，但有时却也有些怨言。③

前面已经说过，当年发生灾荒时，敏体尼和他的秘书哥士耆伯爵对主教和神父们的慈善事业作了大力的协助。他们不只自己慷慨捐助，还向在上海的外国朋友、中国官员和教外绅士们进行劝募；主教主办的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与他们的协作是分不开的。④

为了防止徐家汇初创事业的毁灭，他俩不怕冒真正的风

---

① 吕比荣神父曾给总会长神父呈上一份敏体尼先生写给商务部长的公文，公文中领事盛赞江南传教士为了法国的利益服务甚多；尤其梅德尔神父"帮了法国商人的大忙，向内地提供货样，促使中国向法商定货、量布匹"。《法领》，第8卷第1章第15页。吕比荣神父认为梅神父对此是过分热心了。

② 见高田：《法国在远东二殖民地的起源》，第4卷第61页起。

③ 敏体尼领事和秘书哥士耆伯爵致赵主教的许多信中，都流露出这两种情绪。领事对赵、徐主教提出的要求，没有一件被拒绝过，然而怨言还是不少。敏体尼1848年12月30日信、哥士耆1849年1月3日信，见《徐档》，卷宗B8。

④ 敏体尼1850年2月26、27日致赵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8。

险。在薛孔昭神父写的《徐家汇会院年刊》中,① 记载了在这个困难时期中领事和秘书对付强盗的英雄事迹。在饥荒开始后最初几个月，乞丐和盗匪成群结队地充塞在上海四郊的农村里，勒索洗劫那些被认为藏有财富的人家；地方官已无力维持秩序。这批盗贼很快麇集到徐家汇神父们小小住院的周围。因神父们每天向几百名饥民施舍口粮，遂认为神父住院内定藏有用之不尽的宝库。强盗们首先洗劫了毗连住院的一户人家，后来又洗劫了一只从横塘来徐家汇的米船。最后他们扬言要火烧神父住院，想乘乱洗劫一切他们认为可取的东西。为了纵火，他们把稻草堆放在邻村的屋内。会长卜亦奥神父把此事通知了敏体尼领事。领事立即去见上海道台，要求对这座法国人的建筑物加以保护。道台回复说他无能为力，只答允事后偿还一切损失；他所有可以调动的兵丁正需要保卫上海本城，因为县城也受到乞丐与强盗们袭击的威胁。领事很气愤地对他说："你同你的士兵不敢去干，我去干！"他回到家里，拿了武器，由伯爵哥士耆作伴，坐了轿子直奔徐家汇。在那里，他向保正（地方警察，差不多相当于我们法国乡间的乡警）说："我是法国领事，神父们的房屋是受法国保护的；如果那里的住户发生什么灾祸，你就得负责。我不需要你们的官府，我本人要来亲手把你吊在你看到的那株树上。"这些话，南格禄神父作了翻译，可怜的保正听到这种从未听到过的语言大为惊慌。领事接着说："你领我到强盗聚集的窝里去。"神父们徒然劝领事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因为这些强盗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敏体尼坚持要去，南格禄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21 页起。

神父与娄良材修士陪着，由已吓得半死的保正领着，闯到一间集有一百多个强盗的屋子里。领事大声喝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强盗们看到两个法国人与娄良材修士都带着手枪，吓呆了，马上道歉，假惺惺地申辩说他们聚集在此是为了保护神父的房子，因为房子有被抢和被烧的危险。领事说："神父们不需要你们保护，他们是法国人，法国会保护自己的人。你们立刻给我滚开，谁敢为首闯祸，小心他的脑袋！"在这种情况下，这帮亡命之徒驯服了、分散了。领事同他的同伴马上回上海，他俩为了保护徐家汇，却先丢下了自己无人保护的家属。

这件事情发生后，徐家汇神父住院不再受到新的攻击。①

卜亦奥神父深知江南这场惊人的灾难，对地方将产生怎样的恶果，而唯有天主教的仁爱，才敢单独与灾害作有效的斗争，因此必须在地方上开辟宣传福音的道路。在灾难初期，他写道："如果我们有权组织管理慈善事业，继续已开始的仁爱

---

① 在敏体尼领事任期内，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情；由于他的大胆果敢，使他在中国常常获得成功。顾随侯爵、莫热侯爵以及德拉格拉维埃尔舰长，他们三人都曾目睹这位首任驻沪领事的事迹，一致赞扬他杰出刚毅的性格和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虽则他的才能远远不及英国、美国的同僚们。葛罗公使团的随员莫热侯爵写道："敏体尼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了解中国的人，他知道在中国必须敢于冒风险，他就冒险地去干了。要是有传教士在江南内地遭到麻烦或迫害，他就坐着轿子日夜赶路，直闯进演职官员的衙门，他半讲理半威胁地要官府答应，保证以后不再扰乱他所属地区的教友会口。他每年由陆路从上海去宁波，他预先通知沿途的官吏，要他们负责安全工作。他知道一只法国捕鲸船'那尔瓦尔'号在朝鲜海面失事，有十五名船员被俘这个消息后，由于当时没有一艘法国战舰可以支配，他就坐了一条机帆船和翻译动身前往出事地点。那时海面正风浪大作，几乎翻船，但他并不畏缩。他不管朝鲜官员阻止，强行登陆，并深入内地。最后他终于把那些即将被押到矿区去服苦役的俘虏找到，把他们从最艰苦的俘虏生活中解救出来，领到了上海。这十五个法国人得以脱险的这次奇特的成就，应当归功于他的果敢勇毅。"（顾随：《回忆录》，第184页。）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1卷第151页起，也有同样的评价。

工作，在上海，我们定能收获无数的救灵成果……我从教区的四面八方，得知教友们行的慈善事业，使我们大得人心……有几处本堂区，由于神父们的关怀，已开办了一些小学。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与有能力的教师，这美好事业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是我们准备大力推行的。目前，我们只求尽力做得更好些。我们准备在一些大的中心会口里，聘请由我们担负全部或部分薪金的教师，使他们成为教士的助手，而学校的管理权和教学方案，仍操在教士之手。学生既然几乎是全部免费，那教士就更有权力促使家长们遣送子弟来上学；这样，教育，尤其宗教教育，就可在教友中普遍传开。这些初级小学好似一架苗床，教士们就能从中选拔一些更聪明、更有才能、条件更好、影响更大的孩子送进高一级的学校。进这些高级学校的学生，必须先读四年或五年的初级学校，然后经过严格考试，证明其成绩相当优良后方得入学。高级小学的学程，将是三年至四年，在学校里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更深的教理，使这些青年能在理论上证明信仰、讲解信仰，并向教外人宣传信仰。毕业后，这些由神父们特别培养的青年，希望都将是善良的教友，并对旁人起良好的影响。有的还可被选拔去进修当神父的学识，开始学习拉丁文；其余的，可安插在小学里当教师，当他们到达二十六岁或二十八岁时，在传教士的领导下，可担负起传教先生的职务。"①

这个美好的计划未能随即实现，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些凄惨痛苦的日子里，只创办了两项在当时和现在都认为是教区光荣的事业，即目前设在土山湾的庞大的孤儿院和

① 卜亦奥 1850 年 4 月 23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31 页起。

设在徐家汇的圣依纳爵公学。①

圣婴善会是1842年至1843年在法国创建的，② 江南成立了圣婴善会后，江南教区就得到了大量慷慨的援助。③

在灾难深重的1849年，得到的援助更为丰富；卜亦奥会长曾写信感谢一位法国神父，他曾在该善会会议上，为教区作了大力的呼吁，因此教区得到了一大笔哀矜。信上说："哀矜从没有来得这样及时，我们也从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大量地利用这笔由慈悲之心交到我们手中的巨款。"有人向他汇报一部分由于家贫无以为生以致发生无数溺婴与遗弃孩子的情况后，会长神父附带说明，圣婴善会的救助金将特别用于帮助一些收养、寄养或过继被遗弃孩子的教友人家。可是由于找不到足够和可靠的人家，有人倡议开办几所由贞女们来管理的大型的孤儿院。④

横塘修道院的修士们，荣幸地为这美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施于民神父因不能象会口中其他传教士一样去给如此众多的弃儿付洗施救，正感到苦闷。就在这时候，修士们一次假日里在田野散步时，遇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四岁的男孩；他们把他领到修道院收养了。他们把孩子安置在耶稣会会士的老屋子里，这所屋子是会士们迁到徐家

---

① 即徐汇公学。1932年，因向教育局立案，改称徐汇中学。——译者

② 在徐家汇档案中保存的第一封信是1843年12月8日让松主教写给罗伯济主教的信，信上指明圣婴事业有三个目的：对垂危病孩付洗；赎买和过继被遗弃的孩子；建造孤儿院。见《徐档》，卷宗B12。

③ 寄第一笔款的日期是1844年。见《徐档》，卷宗B12。

④ 卜亦奥1849年9月21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98页起。在浦东，郎怀仁神父曾想开办十来座孤儿院。

汇后，① 耶稣会奉赠给赵主教任其支配的。

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孩子；四个月后，竟收了六十个小孩；其中三十名，虽然予以尽力照顾，但还是死了；施于民神父写道："我希望这些活下来的孩子能成为好教友，成为教区有用的人，这一线之望倍增了我们的活力。"② 慈善事业的基础已打好了，随后我们将看到它的兴旺发展。

徐汇公学的起源也相仿。邻近教友恳求神父们收留一些他们无力抚养的男孩；一些教外人也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神父，听凭神父们给他们付洗并抚养成为教友。神父们收养了一些，把其中一些较聪明的孩子交给一位教友老师带领，教他们读书识字。1850 年，有十二名孩子被录取为寄宿生；其中六名是教外孩童，不久也领了洗。这就是徐汇公学的开端。当时，校舍附属于徐家汇会院，几经变迁和发展，最后在教区工作中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③

离上海较远的会口财力不足，很难保证那些乞丐不变为盗贼。因此传教士生活在这种悲惨的日子里，只有经受死亡的威胁和各种考验。罗伯济主教深恐梅德尔神父在上海对洋商和官员们的影响太大，就调派他去海门。④ 在大水开始泛滥的几个星期里，海门地方已是苦不堪言。梅神父写信说："从 11 月和 12 月起，城里、城外、街上、路上已经有许多饿死、冻

---

① 施于民 1849 年 12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15 页。

② 施于民 1850 年 5 月 9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40 页。

③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27 页。徐汇公学收录的第一个学生姓俞，名昌言，洗名为"原祖亚当"，这是他儿子耶稣会会士俞神父告知的。

俞神父即俞伯多（1865—1940），名致中，字维几。曾在徐汇大修院教授哲学多年。——译者

④ 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行实》，第 79 页。

死的人。仅通州一城，死在街上的听说已达一万五千人之多。我曾问过许多中国人，关于海门死亡的人数，人们估计至少要占百分之十……试想：在这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半岛上，该有多少万人死去呀！”①

梅神父在他同一封信中，描绘了由于他的救济救活了许多饥饿垂死的教友的生动景象。他的善举得到慰人的传教成果。

“在我这个拥有五千多名教友的本堂区里，要是我们不设法去救济灾民的话，那就有好几百人得死去。我为灾民们啼饥号寒，我去敲家家户户的门，人们也怜悯我们。主教给了我济贫费一千多法郎，会长神父一心信赖天主上智，也从徐家汇的资金中抽出一大笔款子给了我”，从欧洲寄来的哀矜中共计有一千九百法郎可供支配。梅神父继续写道：“你可转告我们的恩人们，由于他们的施舍，我救活了一千多个生命。这里食粮奇缺，不只是穷人，连许多原是富裕的地主家庭，也只能喝到少量的豆饼汤，那是榨油榨下来的渣滓……我亲自去买了来，施舍给不久前还是很富裕的教友。请你再对恩人们说，他们的哀矜对人们的灵魂已产生了极大的益处。首先是这所海门会口保存了下来；对这个很难得有新教友的地方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再有，一些教外人看到我们与和尚不一样，我们到他们中间去不是为了搜刮剥削。因此，我们的慈善事业给人们一个很好的印象。有几户教外人家，已被争取到耶稣基督方面来了……在荒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我曾付洗了六百个垂死成人和近两千个小孩，其中两百多名由我们的穷教友收养

① 梅德尔1850年6月8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47页。

了去……我派往通州去的两位传教先生，做了十五天的准备工作，付洗了两百名成人……一名女教友给贫苦教外妇女做工作，三个星期内，她竟付洗了四百个成人和差不多同样数字的孩子。我累得简直象失去了理智。好久以来，我的脑子不听使唤；如果我想祈祷念经或做默想，我就只能躺在那里，不能思考任何问题。"①

在崇明也有同样的情况。魏道味神父给我们指出："一些教外父母瘦得象幽灵，把几乎濒临死亡的三、四、五岁以上的孩子送到教友手中，哭着求他们收留。"他又说："亏得我们一些贫苦教友的热忱心肠，才使这些孩子都找到一个避难所。"② 浦东和松江四周比较富裕，教友们一般都有些积蓄，但也有因父母抚养不起而舍弃的小孩，或把孩子溺死的令人痛心的惨状。③

在这种艰巨的传教工作中，有三位传教士由于劳累过度而去世了。我们还记得，新教区的三位奠基者之一艾方济神父，他曾由罗伯济主教委派去对付松江四周闹事的教友。在这种传教工作中，他遭受了无数痛苦的磨练，加上沉重的工作负担，使他终于体力枯竭了。他大力说服了这些闹事者，终于使赵主教能到那座原来反抗主教最厉害的会口中去举行坚振，④ 并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是天主留给这位宗徒的最后

① 梅德尔 1850 年 6 月 8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50 页起。

② 魏道味 1850 年 7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52 页。

③ 这些情况是卜亦奥会长从教士们通信中总撮的。见卜亦奥 1849 年 9 月 21 日、1850 年 7 月 6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298 页起，第 342 页起。

④ 坚振是天主教七件圣事之一，一般由主教按手敷油于教友头上，以坚定振作其信仰。——译者

的快乐；他在节日前夕，几乎通宵达旦地为教友们准备宗教仪式；当晚，他染上了伤寒症；当他被送到徐家汇后，他象圣人一般地死去了，临终时他四周环绕着许多前来做避静的神父。1848年7月1日，他的遗体迁葬于上海旧耶稣会的墓地——圣墓堂，和从横塘运来的辛斐禄辅理修士的灵柩① 同葬于江南初期宗徒们的墓旁。②

1850年4月28日，马驷堂神父也在徐家汇去世了，他四个胞弟兄陪着送了终。马神父精于护理病人，他把自己整个地献身于护理上海地区因水灾和饥荒而患斑疹伤寒的无数病人。他被道台创办的为收养几百名被遗弃的孩子的那所医院聘去当了医生。③ 同时他还用医生的名义去探访棚户和小船上的病危者，获得了许多优异的传教成绩。4月9日，五千多名穷人拥到董家渡主教公署前，按例来领救济粮。马驷堂神父整天在暴雨之下维持秩序，管理分配。由于这次的冒失大意而使他结束了生命。他患的是曾多次给人们治愈的斑疹伤寒，尽管有慈善事业中的同行英国朋友基尔克医师的细心照料，但他还是被斑疹伤寒夺去了生命。他死时只有二十九岁零三个月，晋升司铎才四个月。④

杨字圩会口的善良渔民们的本堂神父柏葆禄，来到该堂后不久，也因为照顾灾民和得了瘟疫的教友而染上了斑疹伤寒，于1850年6月2日死去。⑤ 赵主教常常为神父们的事迹

---

① 见本卷第82页。
② 卜亦奥1848年7月6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97页起。
③ 见本卷第172页。
④ 卜亦奥1850年5月1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34页起。
⑤ 卜亦奥1850年6月6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844页起。

感到自豪，他还盛赞他的传教士在江南这次惊人的灾害中所尽的职责。① 总会长罗当神父在获知马驷堂、柏葆禄两位神父生病和去世的消息后感到很悲痛，他写道："他们象勇士一般，临死不放下武器。上主必接纳了他们的全燔之祭，看着他们的牺牲，必将赐教区以更丰盛的恩宠。"②

1849 年与 1850 年的自然灾害，和那著名的太平军的叛乱战争给江南教区所造成的更严重更持久的灾难来比较，只不过是个不祥的预兆而已。

常驻在上海和上海附近地区的神父们给主教的汇报中，以及他们同领事或中国官员们的通信中，对中国的政治动态已有了更完整的认识，从 1849 年最后几个月开始，他们已流露出一种忧虑的情绪。③

侮辱外国人的事情也更加频繁地发生了，特别是在广州。1849 年 8 月 12 日，刚毅的澳门总督亚马勒被刺，但凶手却未受到任何惩罚；英国的商人、军官与外交人员继续不断地成为英国难以置信的麻木迟钝外交政策的牺牲者。1850 年 4 月 25 日，年轻的咸丰皇帝刚刚坐上龙廷，即被那批激烈的排外主义者所包围，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发生一场大动乱，人们为将受到迫害而感到恐怖。此时，中国南海一带已是海盗蜂起。1849 年与 1850 年，英国商船不断成为海盗们攻击的目标，英国人就用军舰来追逐；专事海劫的一百多只武装沙船，在两年

---

① 赵方济 1850 年 1 月 10 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② 总会长罗当 1850 年 8 月 19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③ 卜亦奥 1849 年 7 月 4 日、1850 年 4 月 23 日信；翁毅阁 1850 年 7 月 13 日、1851 年 11 月 13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287 页起、第 330 页起、第 417 页起。

中全部被击沉，许多海盗头子被捕，并处以死刑。其他海盗则逃上大陆，大概就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叛乱核心，取名太平或长毛；二十年之久，他们蹂躏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扬子江流域最富饶的省份。①

在叙述这次对江南教区大有影响和教会内部组织大有关系的可怕的内战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教会计划，如果那些计划能实行的话，必将使法国耶稣会会士在远东的传教史上呈现出另一种局面。

我们知道，传信部和耶稣会上级的原始计划，并非把一个固定的省份交给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传布福音，而是把他们交给各区代牧主教，听凭他们支配安排。当初曾特别明确指出，一朝日本对外开放时，罗伯济主教就分派几位神父前往日本。②

忠于这个计划的南格禄会长，就尽可能快速地建造一所中心会院，使派在不同代牧区的神父们回来后有地方休息调养，并共度若干时日的集体生活。③

为此，人们不必惊奇，在最初几年，耶稣会神父除在江南之外，又有其他地区的主教请他们去创办基业。

湖广代牧里佐拉蒂主教，在1847年被一次地方性的教难驱逐出境，他同几位修道院修士去了香港，后又到了澳门。④

---

① 关于这些事实可参阅高田的《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1卷第12、13章第168页起；拉维斯和朗博的《通史》也简短扼要地谈了这次内战，见第10卷第987页起。上面提到的神父们的信件中，对这些事已暗示了好几次。

② 见本卷第86页起。

③ 见本卷第113页，澳门保禄公学有两个世纪之久曾为旧耶稣会的中国教区尽了这个职责。

④ 施伯相1848年8月26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见《中总》，第2卷第14章第2页。

他的助理方济各会会士诺韦拉主教，于1848年6月曾向卜亦奥会长要求，能否派几位耶稣会神父到他深受严峻考验的教区去帮忙。①

卜会长表示很乐于接受这个邀请。他写信给总会长神父说："湖广是中国各教区中最杰出的，也是受难最深的一个教区。"②

1848年8月，当由马再新神父为领队的来华神父们到达香港时，③里佐拉蒂主教向他们表示愿将两省中的湖南省托给耶稣会；他要求暂时留下两、三位神父由他支配，帮助他培植修道生和重整教区。马再新神父认为可以让两位意籍神父留在香港，听凭湖广代牧调配；施伯相和夏显德两神父遂被留了下来，在里佐拉蒂主教处学习该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④

里主教给罗当总会长写了感谢信。⑤总会长对这事也非常关心，又把这事重新托付给巴黎省会长吕比荣神父。⑥

不幸施伯相神父病倒了，他心灰意懒地重回了欧洲。⑦1849年1月，夏显德神父单独一人到了上海，仍打算取道扬子江进入湖广。⑧

---

① 卜亦奥1848年8月30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4页。

② 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3、4页。

③ 见本卷第165页。

④ 马再新和施伯相1848年8月19日和26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见《中总》，第2卷第14章第1、2页。

⑤ 里佐拉蒂1848年9月27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14章第3页。

⑥ 总会长罗当1848年11月25日信，见《总法那罗》，第1卷第47页。

⑦ 施伯相1848年8月26日致总会长信；卜亦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2月10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14章第3页；第5章第11、14页。

⑧ 见本卷第165页。

里佐拉蒂主教改变了主意，他不再把湖南，而是要把湖北托给耶稣会，① 而且他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他的原则："凡修会会士一入教区便不能再是修会会士，而只能是传教士。"② 这是他向他邀请的合作者耶稣会会士提出的要求。耶稣会上级认为这和会典不能符合。③ 于是去湖广的计划被放弃，夏显德神父就在江南留下了。

与此同时，另一件重要大事正在进行。罗伯济主教于1845年7月从山东巡视教务回来，就向南格禄会长报告了一件重要新闻。他从山东一位高级官员处得到消息，说最近中国皇帝在北京曾公布"一道上谕……表示怀念昔日欧洲人编的合乎科学的日历，并抱怨自从他们走后，人们编出的历书错误百出，而且错的越来越多；他向大臣们流露，要尽快设法纠正这个谬误。"南会长把这个消息转告罗马，并且说："如果让一些没有信仰与没有宗教的凡夫俗子去占据先前专求天主光荣与拯救人灵的人们的地位，这正是何等的不幸呀！"④

1846年底，山东的助理主教江类思对郎怀仁神父说："皇上要召回欧洲人到北京，只是一种谣传。这个消息来源于一位大臣，他上朝回来曾说过，皇帝只谈起欧洲神父，并说要改正黄历只有靠他们，还垂问这些神父目前在哪里"。⑤

---

① 吕比荣、卜亦奥和马再新神父的许多信件，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11、14、17、19页；第9章第8页；第3卷第1章第31页。

② 南格禄1848年1月17日信、卜亦奥1848年7月10日信，见《中总》，第2卷第4章第29页；第5章第3页。

③ 卜亦奥1849年4月26日、6月24日、7月22日致马再新神父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18、21、22页。

④ 南格禄1840年8月8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34页。

⑤ 那是1846年12月24日说的，见《通讯》，第1卷第437页。

这些消息到底是否确切，看来就很难说。此后，马再新神父在从上海到罗马去的长途旅行中，常常听罗伯济主教回忆他的过去，而且其中有一些情节非常有趣。主教的这个消息先是来自山东的一个道台；据这个道台说：皇上似曾正式宣称拟召回耶稣会会士，并托好几位大臣设法使耶稣会会士重回北京；大臣们却复旨说：中国已没有耶稣会会士，要他们来京已没有希望了。①

不久，马再新神父接到了一张钦天监监正的声明书的副本，声明书承认自从欧洲精通天文的博士们离职后，无人可以替代，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②

奇怪的是，三年后古伯察神父途经四川省的成都府时，四川总督曾接见他，向他倾诉说，北京朝廷不久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传教士们推算的历书已快到尽头了，而无人能够继续推算下去。他说："总督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请传教士来参加修改历书的工作。"③

我们注意到，罗伯济主教得到上述消息正和剌萼尼④公使要求耆英公布开放教禁是在同一个时期，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朝廷中有一些大臣被鸦片战争中的列强吓破了胆，于是就产生了接近洋人的愿望。但也必须提及，当时负责署理北京

① 一份没有日期的致孟振生主教的副本，由马再新转致香港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并由他于1849年7月27日转呈传信部。见《传录》，第13卷。

② 马再新1849年4月24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13卷。马再新在1848年11月11日写的信上证明，香港的遣使会虽对此计划抱反对态度，但也承认皇帝似曾表示愿意欧洲的学者重回北京。《中总》，第2卷第13章第8页。

③ 见《中华帝国》，第1卷第140页起。

④ 见本卷第76页起。

教区的蒙古代牧孟振生主教却声称，他本人以及潜伏在京里的神父们，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理应激起一定反响的上谕。①

不管这道上谕的消息是真是假，罗伯济主教还是信以为真。他一到罗马，就急忙向传信部递呈了一份备忘录，撮述了他所接到的报道，并不掩饰他的希望。②

他这次向部里进行活动，连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及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都没有征询过。③

上面已经提到，北京教友曾几次向教宗额我略十六世请过愿。因此，罗伯济主教的呈报，引起了传信部的重视；马再新神父一到罗马，便被传信部召了去，并命令他一回中国，就立即准备上北京。马再新提出了困难，北京教区虽不属法国遣使会管辖，但自从赵神父拒绝当北京代牧后，北京教区至少暂时还是由该会负责管理着。④

为此应先通知遣使会，只有当他们对完成这种使命确实感到缺乏人手时，耶稣会才能插手，否则耶稣会就只能扮演一种令人厌恶的角色，中国各教区就有可怕和严重的分裂危险。可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他只接到坚持并由他去物色若干能称职的同伴同上北京的命令。马再新神父提出至少要先同蒙古代牧兼北京署理主教商量同意后才能进行，于是他拿到

---

① 孟振生 1849 年 5 月 3 日致马再新神父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② 在罗马，我没有找到这页记录，但从上述马再新致孟振生主教信中，可以肯定它的存在。

③ 卜亦奥 1848 年 12 月 20 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5 章第 14 页。

④ 见本卷第 94 页起；又《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872、987 页起。

了传信部出的介绍信和请孟主教对他的新使命提供种种方便的部令。①

耶稣会上级对上北京的计划，并不比马再新神父更为热心；卜亦奥会长、吕比荣省会长以及最尊敬的总会长神父等，都认为这事难以成功。上北京没有官方正式的邀请，而是把一些谣传当作皇上圣旨，那就是自找麻烦，将要给中国各教区带来不良的严重后果。② 对法国遣使会会士的反感以及与之而产生的纠纷，更是可以预料的。③

可是传信部的部令是断然的、明确的，尽管马再新神父曾提出不同的意见，但他们还是坚持要着手进行这次探索的准备。④

为了这个目标，两位极有学问的数学家杜惠伯和罗礼思神父成了马再新神父的旅伴。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太严谨呆板地理解传信部不准法籍神父再去中国的命令，以致罗

---

① 我扼要地看了上面引过的马再新致孟振生主教的信后，感到这位传教士的率直纯朴和品德高尚是无可置疑的，我在下面将讲到他以后所干的事业以及他英勇地死去的情况。这些事情，想必传信部的几位负责组织这次北京之行的主教们是知道的。此外，马再新神父在意大利逗留时和回到中国后写给罗当总会长的信（«中总»，第2卷第8章第45、46页；第13章第1页；第14章第1页）都证实了他在给孟振生主教信中所陈述的事实是正确的。

② 卜亦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2月10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14、21页。罗当总会长1849年3月15日致马再新神父信（«徐档»，卷宗F11）说："天主上智还不愿把这方田地赐给我们。"吕比荣1849年12月23日致卜亦奥会长信说："上北京这事我看不妙，执行得又未免操之过急……我们以后勿再参与其事。"见«徐档»，卷宗F13；又吕比荣1849年6月14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19页。

③ 同上吕比荣信；又梅德尔1849年1月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8页。

④ 同上吕比荣信。

礼思神父到了亚历山大港时被中途召回。①

在香港时，神父们把这个新使命倾诉给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费神父对此极感兴趣。可相反，遣使会帐房吉耶神父对此却极表反对，认为这只会使传教士彼此分裂，为北京教会引来教难而已。②

在上海，大家议定，请南格禄和马奥定两神父也加入北京之行，马再新神父则先走一步，去同孟振生主教商议是否可能并如何进入北京的种种问题，务使彼此步调求得一致。他走了之后，其余伙伴就悉心学习官话和钻研中文。上面我曾提及徐家汇开办的高级汉学研究班，创办的部分原因是针对这次北京之行的。③

1848 年 10 月 23 日，马再新神父离开上海，同行作伴的有一位姓刘的中国神父，他是马再新神父从罗马带回中国的一个传信部的老学生；他俩坐上一艘去辽东的教友的沙船，拟从辽东再设法由陆路进入孟主教的管辖区。

沙船才驶过崇明岛便遭到海盗们的袭击，马神父的一切行李、连同传信部给孟主教的书信、文件都被劫走。马神父及其旅伴终于在浙江海岸登陆，狼狈地到了宁波，受到法国遣使会会士的仁爱的接待。1848 年的 11 月 7 日，他们又从宁波回

---

① 见本卷第 165 页。

② 1848 年 8 月 19、26 日马再新和施伯相从香港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14 章第 1、2 页；费利西亚尼 1848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0 日、1849 年 7 月 27 日、10 月 21 日致传信部信，见《传录》，第 12、13 卷；吉耶 1848 年 12 月 28 日、1849 年 1 月 22 日致艾蒂安总会长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22 页起。

③ 见本卷第 170 页。

到了徐家汇。①

马再新神父寄书孟振生主教，报告了上述的遭遇，同时又给主教附上了一份罗马传信部给他的私人介绍信的抄件，并征求他的指导。蒙古代牧收到这封信后，于1849年5月3日作了答复。孟主教对马神父报告的消息感到十分惊奇。他本人和潜伏在北京的司铎们都没有听说过有这道凭空虚拟的复召外国天文家的上谕；假如这道上谕曾经公布，皇上很可以通过广州或上海的大官和领事们，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事实上，罗伯济主教很可能受了山东官员的哄骗，这些官员是擅长于玩弄种种献媚和欺骗手法的。此外，假如朝廷真的想重新开创当年的科学事业，那么遣使会会士定能从法国派遣一批有能力的会士来；耶稣会会士没有必要来北京，主教也绝不会欢迎他们。"历来的经验教导我们，假如父台及贵会弟兄前来北京，那么为传教最需要的爱德必将遭到削弱或损坏，教友们又会议论纷纷……在这苦难连绵的地区，两个不同组织的修会，虽都是卓越的，但决不可能在同一地区，在同一管辖权之下，彼此和衷共济相安无事的。"孟主教吁请打消来北京的念头，因为这只能激起教难；刺萼尼先生求得的开放教禁的上谕，在京里并不曾公布，司铎们在这里行圣事神工，也只能在极度的防范保密之下进行。②

---

① 马再新、卜亦奥以及其他神父于1848年10月至12月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9、11页；第4章第6、7页；第13章第2、3页。刘司铎1848年11月25日、费利西亚尼1848年12月20日致传信部信，马再新致孟振生主教信，见《传录》，第12、13卷。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4页。

② 费利西亚尼1849年7月27日致传信部信，见《传录》，第13卷。

面临这种明显的拒绝，马再新神父认为在传信部新的指示未来之前，应当停止一切新的活动，他的上级对此也作出同样的决定。①

孟振生主教、驻澳门的遣使会总帐房吉耶神父和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都上书传信部补充并重申蒙古代牧用以说服马再新神父的这些观点。②

香港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对孟主教对待耶稣会的态度表示极大不满，他认为这计划并非如孟主教说的那么不能实行；他给传信部的汇报中措词太冷酷无情，假如他能更深切了解到北京处境的实际困难，他的语气无疑会和善得多。费神父看到江南耶稣会会士心灰意懒，不再作上京的尝试后，他曾想由他来尝试一下，想通过法国驻华公使或上海的法国领事，把有学问的传教士介绍到北京去。③

道光皇帝的崩逝和咸丰皇帝的登基，打乱了这个计划。1850 年 11 月 21 日，道光朝的许多官员被黜贬降级，认为他们对洋人太容忍退让，有伤国体。④一种激烈的排外主义从此

---

① 马再新 1851 年 1 月 2 日致孟振生主教信，见本卷后面。

② 见«传录»，第 13 卷；«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18 页起。孟振生在给总会长艾蒂安信中总撮了我们上述的种种观点。他控诉耶稣会会士，又特别责怪马再新神父在罗马传谣，说什么“中国皇帝拟请他同会的天文家”并“设法由传信部派往北京”（1849 年 5 月 4 日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1018 页起），这是纯粹的假设。孟主教除了马再新神父的信件之外，别无其他证据。当然我们应当重视马神父的信。费利西亚尼神父比较了解此事的详细情节。数月之后，他写道：“遣使会会士认为耶稣会会士想上北京是为了霸占北京教区，那是完全错误的。”1849 年 7 月 27 日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③ 同上孟振生信，又 1850 年 2 月 22 日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④ 澳门遣使会帐房吉耶 1851 年 2 月 25 日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29 页起。

又控制了朝廷；因此，需要再次作出努力，才能迫使他们和欧洲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这个上北京创办科学事业的计划才可顺水推舟地收到幸运的成果。①

翌年，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迫使孟主教来到上海，乘此机会他对江南的耶稣会神父们作了明确的解释。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南京主教区司铎们的努力而使耶稣会会士得以重来江南，他们中有一位曾主动写信给一位北京的朋友，叫他也请求耶稣会会士到北京来。这个北京司铎把这封信交给了孟主教，孟主教同时还收到另一封一个中国耶稣会会士发的但与此无关的信，他认为这又是江南耶稣会会士搞的阴谋。1850年11月8日，孟主教写给马再新神父一封极严峻的信，斥责江南耶稣会是由于1848年没能把遣使会从北京排除出去，因而这次又来活动了。

马再新神父气愤地反驳了孟主教的这种轻信，他认为这关系到修会和传教士的荣誉。“我保证，我们中从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信，连间接作这样活动的企图也没有……难道我们需要一位中国神父的私人力量来协助我们上北京去不成？假如我们想上北京，当传信部派遣我们时，不是已完全有权利可以直上北京吗？我也并不是因为第一次遭到了海盗袭击就不能再作第二次尝试了。正因为尊重钧座的职权使我绕了个弯……假如我果真有钧座强加于我的意图，那我在罗马时就会用其他的方法进入北京了”。②

卜亦奥会长认为应该“保护受攻击的耶稣会的荣誉”，他

---

① 见本书，第2卷。

② 马再新1851年1月2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13章第5页。

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孟振生主教，信里概括了他给罗马的通信，并阐明了1848年北京之行的事实真相。"我向钧座表示，我对钧座的一切来信表示惊讶。对耶稣会企图上北京的这个计划的性质和环境，钧座似乎只有抽象的认识……因此，我想我应该把所知道的告诉钧座，将来倘若主教对这件过去的事再有什么指责的话，我们请求主教直接指责传信圣部而不再指责这里毫不相干的耶稣会会士，我是他们的会长，我为没有能逐字逐句彻底地执行圣部的命令而一度深感不安"。①

关于孟振生主教抱怨的所谓新的活动，卜会长在信上抗议说："我再希望，主教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开诚布公地给我指出，不必去轻信那些毫无根据的证据，我感到这是对我莫大的爱护。我认为，只凭一个人说的话而一概地控告这里'所有的耶稣会神父曾写信去北京'，未免太伤人心了。主教大人，耶稣会神父中没有任何人，尤其是马再新神父，会给北京的任何一位直接或间接地写信。我最了解同会弟兄们的思想言行，我敢向主教保证，并恳求钧座，看在我们司铎品级的荣誉上，不再控告并怀疑我们。假如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贵教区的教友或司铎，或是江南我们会外的任何人，表示愿意和希望我们重去北京，或竟断然要求我们重回北京去，我认为，这和我们毫不相干。我用我的以及我属下的名义声明，一切应由该负责任的人去负全部责任。"②

---

① 事实上，费利西亚尼神父在他和传信部的通信里，对江南耶稣会神父重去北京缺乏热情而表示不满。在马再新神父灰心丧气后，他曾决心自己负责着手推进这件事情。卜亦奥1849年7月27日信，见《传录》，第13卷。

② 卜亦奥1851年1月6日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13章第6页。

孟振生主教于1851年3月1日写来了回信，声明不要误解他的善意。信上说："请你相信我写给马再新神父信上的话，我不是如父台看来那么易于轻信的人；我曾郑重考虑，认为不能光讲仁爱而不维护教区的安宁与和谐，使我有愧于主教的职责，这对我属下的神益是多么的需要。目前我手中还持有人们写来的亲笔信，因此敢断定我对你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尊敬的神父，请你允许我，轮到我请你注意了，你对你的弟兄们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完全了解，而你的来信却是那么自信，认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直接或间接地写信给北京任何人。而我却亲眼阅读了贵会在中国的一位可尊敬的神父的原信，煽动收信人设法运动使贵会可敬的神父们来北京，而尊敬的神父不敢直接出面。由于我爱真实，并热爱你们尊敬的修会，迫使我不得不坦率说明，这封直接唆使你们来北京的信，是一位江南的司铎写的，而且又是你们的一位忠实的朋友。至于你，尊敬的神父，你和你的属下都没有赞同这件事，也不曾参与其事，因为你向我作了保证，我现在才敢相信了；但在你作出保证之前，我相信的却是相反，并足可以个别人员的行动而归诸全体。"①

孟主教在信尾又重申了他给马再新神父信中反对耶稣会会士到北京的种种理由，责怪耶稣会没有如实向传信部反映。但他最后说："任凭怎样，我还是尊重和关怀耶稣会的。"②

数月之后，孟主教有机会来到上海；他会晤了徐家汇的神

① 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24页。我猜想写那封不合时宜的信的，就是卜亦奥会长在1849年6月7日写给省会长信上说起的那位中国神父（《法信》2667）；而当时北京教区神父们的首席司铎正是他的伯父。

② 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24页。

父们，经过了长时间的交谈，他的疑虑消除了。从此他对耶稣会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后来因他深感自己人手不足，就邀请耶稣会会士去分担直隶省的管理。

他在江南逗留的时期是在1851年的最后几个月；后来他同一连串对中国未来教务有影响的大事都有连带关系。

中华帝国和欧洲列强签订了条约之后，中国皇帝又应允了刺萼尼公使的请求，颁布了开放教禁的上谕。传信部长想给中国传教区建立一种有利于推进教务组织的时间已经到了。①

1848年5月11日，传信部在有关中国教务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召开中国的宗座代牧全体主教会议的计划，以便在会上商讨关于中国传教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地点拟定在香港。这一计划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顶萨莫斯主教衔的日本宗座代牧福尔卡德主教首先倡议的，当时福主教正在伺机进入自己代牧区，并担任着香港的临时监牧。②

在中国的所有宗座代牧都接到这一计划的通知书，附有商讨问题三十四条，使大家能在开会之前先进行认真地研究。③

不少主教对去香港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异议；因为内地一些代牧，至今仍须时常谨慎小心，看来很难前去参加会议。

---

① 我这里写的《上海主教集会史》是采用了中国传教区1874年4月呈传信部的一份教区现状报告上的材料，见《传全》，第2卷第59页起所叙述的中国部分。

② 见马尔博：《福尔卡德主教传》，第173页起。

③ 香港的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曾建议由罗伯济主教主持他发起的这次会议（见本卷第110页）。

中国政府看到各教区的主持人到最近被英国夺去的土地上集结，很可能会引起猜疑。法国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德库塞尔支持他们的意见，于是在1850年5月28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取消了在香港举行这次会议的计划。

然而，举行一些局部地区的宗座代牧会议，周折并不太大，同样也能取得相当大的效果。① 于是，1851年间，就分别召开了这样的会议。上海也开了，在一定程度上，它显得特别重要。同年，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委任参赞普苏神父来到中国，召集遣使会的宗座代牧在宁波开会，商讨有关该修会所辖教区的教务工作。②

南京主教区署理主教赵方济认为，在上海召开这种会议比较有利，尽管不算正式会议，但对传信部提出的各项问题，可一一加以探讨，并把商讨的结果汇报罗马。③

赵主教曾邀请在宁波开会的四位遣使会的宗座代牧和日本的宗座代牧萨莫斯主教、福尔卡德来上海，共同对罗马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浙江宗座代牧顾主教因有要事未能出席，但他读了会议记录后，表示完全同意，并签了名。此外，方济各会会士、湖广助理主教诺韦拉正准备回欧，在开会之前路过

---

① 传信部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在1851年8月28日的一封信中曾提出了这一建议，在上海会议的导言中提到这一点。

② 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57页起；《遣使会年刊》，第16卷第821页起。

③ 我把保存在传信部的浩瀚而又有价值的记录，简略地摘录一些。见《传录》，第14卷。1851年，六位主教在上海召开商讨有关传信部向中国及其邻邦的所有主教提出的三十四个问题的会议，会议共举行十二次。在1874年的传信部全会记录里，对这次会议大大地表扬了一番。事后，传信部的不少指施就是依据这次会议中的主张而决定的。

上海，曾向赵方济和徐类思二主教谈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所以上海这次代牧会议出席人数尽管只有六位，而实际上，开会记录的确代表了中国东部的所有教区的八位主教的意见。

1851 年 11 月 7 日，在上海董家渡主教公署出席会议[①]的有：蒙古宗座代牧兼北京署理主教孟振生，河南宗座代牧安若望，日本宗座代牧福尔卡德，南京署理主教赵方济，蒙古助理孔主教，南京助理主教徐类思。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于12月 3 日，圣方济各沙勿略瞻礼日那天讨论全部结束。

在这期间，逢瞻礼庆日就在徐家汇会聚，我们在别处还将讲到。而开会时，是赵方济主教主持议程，福尔卡德主教担任会议秘书。

传信部所提出的议题，是集中了中国教区在领导、管理方面可能碰到的一切难题，这些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都很现实；所以我认为把上海的开会记录扼要地介绍一下是有益的。

第一个问题，提出是否要成立圣统制。除一人之外，所有的主教都赞成并祝愿中国尽早成立按教会法典规定的正规的主教区；这样可使各主教区的领袖们对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对地方官府们，显得格外有权力；也可使在中国的每一个教省区的省级会议作出统一的安排。安若望主教提出异议，认为目前在中国设立直属传信部的宗座代牧，看来对传教事业更为有利；至于定期举行省级会议，由于地方官的阻挠，在很

① 有人把上海的这次主教会议称之为"徐家汇会议"，这是异常错误的。这根本不是一次正式会议，而且又不在徐家汇举行，只有几位主教参加，任何耶稣会会士都不准参加；徐类思主教曾向教区耶稣会的新会长翁毅阁神父征求过对传信部提出的问题的看法。见《中总》，第 3 卷第 1 章第 12 页。

长的一段时期里还是无法实现的。

传信部计划只拟订在中国、高丽、日本建立三个总主教区，这显然是不够的；教省的划分必须增加。在主教区的编制上，必须按照习惯上遵循的行政区的府与县来划分。必须趋向于每一个省要有一位总主教，每一个府有一位主教。按目前来讲，暂时似乎可以划分为六个总主教区：北京区(直隶、山东、蒙古、满洲)；西安府区(陕西、山西、甘肃)；武昌府区(湖北、湖南、河南)；成都府区(四川、云南、贵州)；南京区(江苏分两个主教区，另一个设在扬州；江西)；福州区(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将来，满洲和蒙古一旦教友人数足够时，可划为一个特别总主教区。①

高丽和日本应当置于中国教会体制之外。

关于选举总主教，每一教省内所有主教以及总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选举权；"唯有教省内所有主教，以及总主教区内的外籍司铎有被选举权"。关于选举主教，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选举权，又主教区内所有中外司铎都有被选举权；"但有一个区别，如被选举的是外籍司铎，只要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不分中外，即可生效；如被选举的系中国司铎，则在所得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内，必须有全体外籍司铎的票数，才算有效"。在选举区主教时，审查工作由总主教担任，在选举总主教时，审查权则由教省内主教中任职期最长的人担任。

培育本地神职人员，又是一个引起主教们关心的问题。本

① 把这一规划和目前划分的宗座代牧区为五大区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对这五大区随后我将另有记述。在传信部保存有其他宗座代牧于 1851 年和 1852 年举行的会议记录，在谈到有关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的主张时，比起这次上海会议来，赞成的人更少些。

地神职人员中有的年龄过大，是否在授予神品之前可以简化神学课程，主教们一致表示反对；认为还是让他们充当传教先生更为有益，遇到特殊情况，可由本主教裁夺。主教们一致认为在修道院中应精心研究中文，但本地的年轻修士却不宜去应科举，避免在应考时碰到与教会禁令冲突的礼仪问题，此外还须谨防傲慢不驯的苗子。

一般不宜派遣本地的年轻修士前往欧洲求学，至于那不勒斯专为中国修士办的中国公学，则隶属于一种特别的制度，当然不受限制。①

福尔卡德主教倡议，在通商口岸，例如在上海举办中心修道院——总修院，那么那里的学业可比一般教区修院的课程高深得多，其他主教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时尚难实现"。

主教们认为，年轻的修士在领受神品之前，先实践一下传教先生的工作，看来是良好的和有益的，但要出于自愿；同样对一些新提拔的本地神父，在开头几年中还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西洋神父带领。

传教先生的训练和神职人员的培养同样重要，"一个教区的好坏和传教先生有着密切关系"。主教们一致认为，要在各教区开办"公学"或师范学校，专门培训得力的助手。原则上这确是件好事，但实施上尚有困难；一般地说有配偶的传教先生比独身的似乎更好些。

对教区内的教产问题，我们业已看到，这是罗伯济主教和

① 孟振生主教建议，某些中国年轻神父确有突出的才华，至少可以派往罗马考取学位，其他主教对此表示不甚赞成。

耶稣会之间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① 与会主教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彻底。传信部提案第十一条写道："下列规定是否适当，主教和其他一切传教士，不论属于什么修会或什么传教团体，其收到的一切捐献应一律归公，即每一个传教士无权支配任何物资财富，而只能由主教支配，他接收到的一切捐献，不论用什么名义得来的，都应一一向主教上交。"但最后的答复是："一致并立即"否决。

这样的措施是违反教会常规的，而且势必会造成教友们的大量捐助陷于枯竭。"哪一个修会，哪一个组织会赞成把提供给本会会员的物资财产，让给一个会外人去全权支配？"绝大多数传教士不会接受这种隶属于主教的方式，如强迫执行，必将堵塞大批圣召；② 会议提出的措施危害性显然很大，一个善良的主教，可能是一个很差的财政管理者，假如他是唯一处置财产的人，他会把整个教区历年的积蓄花费掉。与会主教观察到"目前中国教区内对物资方面的问题，业已依据各修会或传教团体的各自的组织大纲而妥善地作了安排，看来不必另行修改"。

对各教区如何在各会口举行开四规活动，不必有什么硬性规定。也无必要全中国发行一本统一的教理范本。原来的经文不宜修改，老一辈传教士在经文里保留的拉丁文字句仍应保留，因教友们已领会其意义并也已经习惯；用中文代替这些字句，如果发音谬误，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涵义，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圣洗圣事中的付洗经文，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影

① 见本卷第99页。

② 看到这个答复，使我联想起南格禄神父致罗伯济主教的备忘录，赵方济和徐类思两位主教一定很了解南、罗两人所闹的纠纷(见本卷第98页起)。

响其效果。

所有主教一致反对把原来用文言文或韵文译成的经文和教理问答改为各地区的方言。因教理问答原来已够简易，而且教友们也都能领会其含义；经文用文言或韵文，这同西方许多地区的各阶层教友念拉丁经文一样，只要向教友们解释清楚就行了；再则，用方言编写的经文，会受到尤其是那些文人学士们的蔑视。对专为传教士所须的种种特权以及对祭服的格式，无须完全划一；神父举行弥撒时按惯例戴的祭巾帽应予保持，已放弃的应当恢复；这是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须适应地方习俗的权宜措施；传教士们普遍按中国形式剃头留辫子，也是遵循风俗习惯的表示。孟振生主教单独主张祭巾帽必须逐步取消，对此他和安若望主教争辩得相当激烈。主教们一致同意向教宗呈请批准，主教们在中国举行宗教礼仪时，自礼仪开始一直到礼仪终止，常戴主教礼冠，以免不停地和祭巾更换。

对全中国各教区，不需要订出一种全国统一性的瞻礼节日和大小斋期的瞻礼单；各教区主教可以按照他那来自罗马的特权，发行各教区各自的瞻礼单。还应当请示圣父，把至今只限于本地教友免守大斋的特恩，也同样适用于在华的外国教友。一些热心善会非常适合中国人情，应当大力推行。女教友参与宗教礼仪或领圣事时，最好头上要兜纱，但不能以此作为普遍规定。通常女教友在圣堂里，不应单方高唱经文，但允许和男教友们相互轮流朗诵。①

在接受教友们捐献给传教士的钱钞或实物时，确存在一

①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罗伯济主教所遇到的困难（见本卷第92页）。

些弊病，每个主教应切实加以防范。公堂补赎(或称明补赎)看来是有效的，中国教友也乐意接受，所以仍应保留，情节严重的由主教亲自处理；对某种罪行，采取罚款方式"只能偶或使用，并只限于富人，所罚款项，也只能用于有益的事业，帐目要公布，让大众知道；这对某些中国教友，特别对一些守财奴尤其必要，非此不足以使他们悔改。"对贞女们，她们不论是集体住或是回家住，都应密切关注。在中国还没有必要公布特兰托公会议的有关婚礼的决议，宣布秘密结婚为无效，但应该严格遵守天主教有关婚礼的种种规章条例。中国的某些风俗，如幼年订婚、领童养媳等等，是许多罪恶和弊病的根源，在教友中，此风虽已日趋减少，但仍应不懈地审慎地加以抨击。

在中华帝国，骇人听闻的高利贷引起了主教们的注意；他们表示，根据国家规定，百分之三十的合法利率，教友们也可征收，但在利率较低的地区，则应按一般公正的行商惯例为依据。看来有必要向传信部申请撤销 1781 年针对一些中国契约所作的决定，后来在四川主教会议上又重新提出过；这些决定可能是由于呈报不确而造成的。

传信部最后提出的是关于学校问题和发展学校的主要办法，主教们的态度虽是诚恳的，但也提出了不少困难。"创办学校，这是每个主教日夜操心的事，不少教区已在积极筹备，只以江南一省来说，现在已经办有男女学校一百四十所。看来开展这样一项如此重要的设施，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请我们的一些杰出的帐房神父，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主教们再慷慨一些吧"。①

---

① 第三十四个议题的答案。

对一些有关吸鸦片或贩卖鸦片的良心问题，也终于作出了结论。会议结束时，举行了“向至圣圣父罗马教宗庇护九世、群羊的唯一善牧”宣誓效忠仪式。大会委任福尔卡德主教把会议记录带往罗马呈报教宗。福主教路过宁波时，浙江宗座代牧顾主教在详细审阅记录之后，表示完全同意，1851 年 12 月 20 日，他在会议记录上也署了名。①

主教们在上海逗留期间，着手办理了对未来的江南教区大有关系的两件大事。

上面已提到的遣使会的几位宗座代牧在宁波开会，并在该会参赞普苏神父主持下，商讨有关委托给他们修会的教区事务。② 会上，他们着重提出，他们是否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足以应付这一辽阔地区的教务，结论是否定的。尤其是北京主教区，孟振生主教原来只是临时性的署理，他的同事们都感到，要他们的修会维持整个这一地区的工作，他们是不能胜任的，大家同意只保留过去归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地区，并划为一个单独的宗座代牧区；主教区的其余部分仍和过去那样，由葡萄牙遣使会管理。③

孟振生主教认为“这种划分法和划分的区域是不适当的，”何况，葡萄牙的遣使会过去是，而且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不能胜任北京主教区的管理工作的。他另拟了一个方案，“把直隶省划为三个区，其中两个区交给另外两个传教团体承担，这两个团体必须是最愿意在这省内扎根，而且也

① 见附录中六位主教的答案。

② 见本卷第 197 页。

③ 孟振生在 1856 年 9 月 8 日致总会长艾蒂安信中陈述了这次会谈的过程，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75 页。

最有能力担负起分配给他们的天主的工程，并使之发展兴旺的”。① 接着，他又说：“这样，我们保留了过去全部的法国教区，即我们管理的北京主教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地区：北京、天津和保定府；我们只把省的南区、西南区、东南区及其所属教友让给别人。”②

由于远离北京几个月，因此孟振生主教无法同北京的同会会士商谈讨论，他只和也在上海的他的助理孔主教商讨，并征得了他的同意。③ 1851 年 12 月 20 日，北京署理主教从上海发往传信部部长枢机一份划分北京主教区的方案，即直隶西区划归耶稣会，东区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又推荐南格禄神父为西区宗座代牧，原在满洲传教的张敬一为东区宗座代牧。④

为了不使葡萄牙感到难堪，他们也总是希望和它签订一项协定，但传信部对此没有表态，只是把方案通知了有关的各个修会。⑤ 1856 年，孟振生主教的方案被略加修改后即付诸实施，我在后面将另有记述。

与此同时，日本教区看来将交给法国耶稣会会士去开发，

---

① 孟振生在 1856 年 9 月 8 日致总会长艾蒂安信中陈述了这次会谈的过程，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75 页。

② 同上。

③ 孟振生 1856 年 9 月 8 日致总会长艾蒂安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 8 卷第 1075 页。

④ 见《传特》，第 24 卷第 472 页起。

⑤ 《传特》，第 24 卷第 418 页起报道了这个问题。孟振生主教在上海时是否曾向江南教区的神父们表达过这个意愿，我在教区和罗马或巴黎的通信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当传信部把孟振生主教的划分方案向耶稣会总会长转达时，我们才第一次从罗马获得了这一消息。（耶稣会法国参赞吕比荣神父 1854 年 8 月 11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3。）

萨莫斯主教福尔卡德是这个帝国的宗座代牧，但至今尚未能踏进他的牧区。1847 年至 1851 年间，在他经常往返的奔波中，曾多次到过上海，亲眼见到并细细观察上海教区的一些事业。他曾想到，一旦日本帝国向欧洲开放了商埠，就邀请几位江南教区的耶稣会神父前往日本。另一方面，并不排除仍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① 对此，他是有充分权力的。事实上，在不多几个月之前，他曾接到传信部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如果你能找到从事日本传教工作的得力人手，劝你切勿错过这种机会。在人选问题上，也不必顾虑到什么人情关系。"②

1851 年，主教们在上海开会时，福尔卡德主教曾写过几封信给教区耶稣会会长翁毅阁神父，请他担任日本的副主教。由于福尔卡德常年留驻在琉球群岛，生活又十分艰苦，体力迅速地衰竭，因此不得不回欧洲去疗养。③ 但考虑到他代牧区的利益，于是他就先作好准备，一俟日本开放时，就能派出有能力的传教人员。福主教的同事、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马翁神父，

---

① 1852 年 4 月 9 日，福尔卡德主教在给传信部部长的呈报里，具体证实了这一曲折微妙的问题。"我并无排除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意思，我既不需要成为他们会里的成员，而接纳他们到我的教区里来；同样，我也不需要成为耶稣会的成员，而接纳耶稣会会士；我从来没有向外方传教会表示过拒绝他们的意思；相反，我对待我唯一的同事马翁神父也是一如既往，我把过去授予他的一切职权照样留给他；如果往后出现同样情况，我也当然不会拒绝向其他人员授予同样的职权的。"见《传录》，第 14 卷。

② 传信部部长 1850 年 9 月 30 日致福尔卡德主教的信里有"如果碰到可以派遣的工作人员的话，请你切勿由于某些人事关系而感到为难，以致使日本民族久久得不到教会的援助。"福尔卡德主教把这封信和其他罗马授予他一切权力和指示的复本，转给江南耶稣会会长翁毅阁神父。稿件至今仍保存在《徐档》，卷宗 E5 中。

③ 福尔卡德致传信部部长的汇报，见马尔博：《福尔卡德主教传》，第 101、203 页起。

仍保留着对日本教区的职权。①

翁毅阁神父在接受福尔卡德代牧授予他的职权之前，曾犹豫不决。众所周知，江南教区的档案也能证明，当年传信部派遣耶稣会会士来中国时，也准备一有可能就去日本开展教务工作。② 1845 年 10 月 2 日，福尔卡德主教被舰长迪普朗送到琉球群岛后已经两年了，他还一直无法开展传教工作；而他又被任命为日本宗座代牧，③ 因此南格禄会长曾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询问这次日本代牧的任命，是否把先前委托耶稣会的使命撤销了；④ 总会长罗当神父把这封信转呈传信部，同时把 1840 年和 1842 年的部令的副本一并寄了去。⑤ 1847 年 2 月 18 日，传信部秘书长萨洛尼卡的总主教答复说，福尔卡德主教既已授命为日本代牧，就有权使用他认为最适当的任何方法进入日本并建立教区。⑥ 1850 年传信部给福尔卡德的指示和他转给翁毅阁神父的这一份复本明显地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之外，邀请其他的合作人员。⑦

赵方济主教竭力鼓励耶稣会神父接受这项使命，到过去

---

① 见上述汇报。

② 见本卷第 36 页。

③ 见马尔博：《福尔卡德主教传》，第 110 页。

④ 南格禄 1846 年 10 月 7 日信，见《传录》，第 11 卷。当传信部向海塞本主教吕凯了解时，他复文建议让福尔卡德主教一人去探索进入日本之路。"往后，如果这一辽阔地区的大门敞开了……我们决不拒绝其他的工作人员来分担我们的事业；我们将高兴地欢迎他们，一如我们几年前在印度所作的那样。"（1847 年 2 月 8 日信，见《传录》，第 12 卷。）

⑤ 见《传录》，第 11 卷。

⑥ 见《日总》。

⑦ 见本卷第 206 页，卜亦奥神父致省会长神父信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点。1849 年 5 月 31 日信，见《法信》2660。

已有不少耶稣会神父洒过鲜血的教区。① 香港的总帐房费利西亚尼神父认为，日本可以接纳两个修会，各自在指定的地区工作，日后还能为两个宗座代牧区② 提供人员。

翁毅阁神父经过商量后，决定临时接受福尔卡德主教的敦请，但须等待总会长神父和传信部的批准。③

在同一条件下，翁神父还接受了福尔卡德主教的要求，一俟日本对外开放，耶稣会将对日本教区提供人力、物力的一切援助。④

最后，翁会长还送给身无分文的福尔卡德主教一笔款子，供他在旅途中使用。⑤

福尔卡德主教于 1851 年 12 月启程返欧，他随身带了上海主教们开会的记录。在香港时，他向巴黎外方传教会总帐房李波神父表示，他已决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脱离一切关系。⑥

福尔卡德主教于 1852 年 4 月到了罗马，他立即向传信部部长枢机呈报了上述事件。⑦ 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领导人也上书传信部表示，仍希望日本教区继续委托于他们的修会。⑧

---

① 赵方济 1851 年 11 月 18 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 14 卷。

② 费利西亚尼 1852 年 1 月 28 日信，见《传录》，第 14 卷。

③ 翁毅阁致耶稣会总会长信，见《徐档》，卷宗E5。

④ 见《徐档》，复本，卷宗E5。

⑤ 翁毅阁致耶稣会总会长信，出处同上。

⑥ 福尔卡德 1852 年 1 月 14 日致翁毅阁信，出处同上。

⑦ 1852 年 4 月 8 日，见《传录》，第 14 卷。

⑧ 巴朗神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院院长，他于 1852 年 5 月 6 日、12 月 22 日上书传信部。《传录》，第 14 卷。此后，巴尔纳博主教给耶稣会总会长一封措辞生硬的信，要求说明江南教区的神父们的态度(1852 年 9 月 7 日信)，总会长于 9 月 12 日复函，阐明了经过情况(《总法那罗》)。

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传信部请福尔卡德主教辞了职；① 萨莫斯主教回到法国后，不久被任命为巴斯特尔的主教。② 后来又任内韦尔主教，最后为埃克斯总主教。福尔卡德主教始终怀念江南教区，他写给赵方济主教和一些相识的耶稣会神父的信都满怀思念之情。③

福尔卡德主教已不再是日本宗座代牧了，于是，与耶稣会进行协商之事也作罢了。1853 年，总会长罗当神父写信给翁毅阁神父，指示在没有接到新的通知时，不必再去过问那筹划中的教区。此外，到了 1858 年，由于男爵葛罗签订条约之后，日本才开始与基督教国家通商，并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去传教。④

① 福尔卡德 1853 年 1 月 12 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 15 卷。

② 见马尔博：《福尔卡德主教传》，第 219 页起。

③ 福尔卡德 1852 年 1 月 10 日致赵方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2。又 1854 年 8 月 8 日致蒿必达信，"徐家汇始终是我心爱的场所，我很坦白地对你说，自我升了神父十五年来，我感到再也找不到能比在这所圣善的院子里所度过的更美好的日子了"。(《法信》2765。)

④ 见洛内：《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史》，第 3 卷第 363 页。

第 二 章

从赵方济主教任期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48年至1852年）

一、上海主教公署

建造主教座堂　主教公署　创办洋泾浜事业
吴淞的教务　上海的外侨

我们知道赵方济主教的住屋是造在主教大堂正门向东延伸的地段上的。德拉格拉维埃尔舰长曾到过那里，并留有良好的回忆，他说："主教公署并不豪华，砖砌的墙，瓦盖的顶，窗明几净，简洁朴素，令人赏心悦目。"① 这是一所中国式的房屋，当时人们还不敢建造西式洋楼。不久，来拜访主教的人越来越多，这所屋子就显得狭小不够应付了，乃从大堂弥撒间的部位向东延伸，另建一幢楼房。用走廊把前面的那间屋子连接起来，走廊两旁又添了一些小间，在1866年之前，这所简朴的主教公署已足够应付日常工作了。以后，才造了现在的这座住院。②

圣方济各主教座堂破土动工了；先是由辅理修士马义谷，后由方济各会神父芒吉里督造；看来芒神父对建筑不那么在行，部分兴建的工程在1848年间倒坍了。③

罗礼思神父完成了徐家汇教堂的建筑工程后，便来主持

这项工程，直到完工落成。这项工程耗费巨大，到了1853年，大大地加重了主教的负担，耶稣会曾大力资助主教三万多法郎用于造堂经费；④可是，罗伯济主教仍始终坚持禁止耶稣会神父在上海行使神权。⑤

从1848年至1853年间，赵主教不断地向欧洲，特别向法国劝募；⑥他写信向法国皇帝、⑦英国女王⑧呼吁。为了建造大堂，他动用了一切可以支配的基金，而且还透支，因此不得不借了一大笔钱。⑨不幸的是，饥荒和瘟疫迫使教区发放了无限止的赈济，⑩致使建堂工程中断了数月之久。⑪最后，终于被迫放弃原稿式样，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圆顶，在原计划的三分之二的高度上就结了顶，⑫因此呈现出今

---

① 见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1卷第283页。

② 见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

③ 薛孔昭1848年8月23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7页。

④ 卜亦奥1848年和1849年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8、13、24、27页；第6章第7页。

⑤ 卜亦奥1849年6月24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21页；见本卷第104页。

⑥ 卜亦奥1848年和1849年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9—12页。

⑦ 可惜赵方济的信是1848年4月13日写的（《徐档》，卷宗B13），这正值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故作者说"可惜"。——译者

⑧ 赵方济1848年5月3日信，见《徐档》，卷宗B13。

⑨ 翁毅阁1853年的汇报，见《传录》，第15卷。

⑩ 见本卷第171页。法国领事敏体尼于1851年6月12日给赵主教信说："得悉在去年一年中，有一万多个穷苦孩子被惨无人道的父母所抛弃，在你的照料之下幸免于死。我又获悉一千五百多个儿童至今还在你大德关怀下，用你的基金加以教养培育。"见《徐档》，卷宗B8。

⑪ 见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

⑫ 同上。

目的一种扁平臃肿的难看状态。

赵主教在董家渡的最早的同伴是方济各会会士徐类思神父,① 徐神父在 1848 年 9 月 11 日被祝圣为助理主教后移驻张家楼，接下来是翁毅阁神父。辅理修士马义谷② 担任主教秘书兼财务帐房。1851 年翁毅阁神父担任教区耶稣会会长之后，经常不住宿在董家渡；幸亏辅理修士马义谷于 1850 年 12 月 23 日升了神父，有一个时期，他负责为附近教友服务；在他调到外地堂口后，③ 罗礼思神父接替了他的职务，一面仍领导并监督建堂工程。④

梅德尔神父终于从海门调回上海后，他便常驻董家渡，担任主教的秘书兼帐房。那时上海的本地教友人数没有什么增加，仍在两百名左右，陆、艾、施三家的私堂已足够应付教友的宗教生活，主教本人也经常去这几所小堂举行宗教仪式。

对上海天主教外侨教友的工作，是从梅德尔神父任期开始积极开展起来的。原赵主教住在洋泾浜时布置的一所小堂照常开放，由一位神父从董家渡去举行弥撒，让一些在外国机构和洋行里工作的教友遵守教规过好宗教生活。到 1850 年，小堂才由一所比较宽敞的廊棚和附有几间神父房间的建筑物代替了。⑤

在吴淞，一些鸦片贩子把一大批快速帆船和趸船引进了

---

① 见本卷第 169 页。

徐类思主教的中国名字叫伯达，类思是他的领洗圣名，塞勒斯坦是他进会后的会名。他升了主教之后，就重新用了他的洗名，从此他签名时就用类思·塞勒斯坦·徐伯达。见马德赉：《中国教会仳制》，第 84 页。——译者

②③ 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148 页。

④ 见本卷第 210 页。

⑤ 见高龙鞎：《江南传教史》，第 287 页。

长江口，有不少澳门人和马尼拉人在这些船队里找到了收入很好的工作。当时这些船只是不准进入黄浦江的，但在地方官员大受贿赂的情况下，一些中国沙船就明目张胆地前来驳运这些害人的毒品。

1849 年，舰长德拉格拉维埃尔写道："这些趸船队的船长们看管着整箱整箱的银锭和满舱的鸦片，为了保卫这些财富，他们时刻准备着抵御海盗的袭击……他们船员很多，甲板上还装有成排的铜炮……在吴淞和公新门，每月总有两千箱左右的鸦片交货，估计价值在七百万法郎以上。"①

为了照顾在这些船上工作的教友宗教生活的需要，教区就在现在吴淞炮台所在地造了一所敞棚，权当天主堂，专供教士举行弥撒之用。②

这些装运鸦片的人是临时被雇佣的一些英美水手，他们都是生活腐化的亡命之徒，是可怕的邻居。1852 年 6 月，神父们果然遭到他们严重的骚扰。"汕头"号的船长汤姆逊，在一次乘吴淞教友与水手们发生争吵的机会，竟唆使他的水手和船员抢劫了吴淞天主堂。法国领事敏体尼用他一贯果断的手段，向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强硬的交涉，并得到了适当的赔偿。③

---

① 见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 1 卷第 249 页。拉沃莱对当时的吴淞作了一番饶有兴味的描写。又《欧洲对华政策》，载《两个世界评论》，1851 年 2 月 15 日，第 743 页起。

②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258 页起。

③ 敏体尼 1852 年 8 月 1 日致赵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8。赵方济 1852 年 6 月至 8 月致敏体尼的几封信，见《法领》，松江府总铎区西区常年汇报(1852 年)；《徐档》，卷宗 C1(7)。

幸有天主保佑，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那时期，天主教和上海欧美人士的关系搞得非常融洽，不管任何教派的欧美人士，在1849年至1850年间都慷慨响应赵主教赈灾的呼吁，人们看到一些英国医生和意大利的、法国的传教士们一致大力救护地方官完全置之不理的中国灾民。①

这是上海欧美洋商的传奇时代，是平步青云发财致富的惊人时代，是穷奢极欲豪商巨贾的时代，是投机取巧的时代，是大胆冒险的时代。1848年，三名基督教牧师去青浦散发圣经，遭到地方小民的殴打和抢劫，英国领事阿礼国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可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阿礼国就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两艘英国军舰封锁黄浦江，没有新的命令，不予开放。当时，有几千只运"漕粮"去天津的船只集结在上海，慑于英舰的炮火，谁也不敢冒险。梅德尔神父几天之后写道："皇帝是不习惯挨饿的，如果漕粮一断，唯地方官是问，那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了。数天后，他们不得不再一次遵照英国领事的要求办事，运粮船才得通行无阻。"②

每当一批洋船到来，对那些洋行来说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货物是从香港装运鸦片的快速帆船或一些速度更高的快艇运来的，另外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已拥有火轮船运送香港邮件，要比一般帆船快两三天，因此获利甚大。因机帆船不能直达上海，邮包就卸在吴淞，交中国马夫驰马转

---

① 见本卷第171页。

② 梅德尔1848年4月9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176页；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43页起。这三名英国牧师是麦都思、雒魏林及慕维廉。——译者

运，尽快把邮包投送到各指定的行商门口。①

这些欧美商人处在繁忙的事务和寻欢作乐之中，早把宗教置之度外。赵方济主教曾向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写信，在痛斥了这种对宗教漠不关心而又放荡不羁的情况之后，要求总会长指派一位神父来，专职照管这批混杂的洋人。②

梅德尔神父当时负责从董家渡到吴淞的四所外侨教友集中的会口，在1851年至1852年间，洋泾浜小堂经常有外国教友三十名，吴淞有四十二名。黄浦江左岸另有两所小堂也由他经管，唐家塔有本地教友一百三十五名，殷家巷一百四十名。③

由于太平军叛乱战争，迫使外乡人大量地涌来上海，神父们又有了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的机会，这就决定了这个大城市必须配备有一座大教堂而相得益彰。

二、徐 家 汇

歇夏与避静　第一所神学院　徐汇公学；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进展　圣依纳爵堂的兴建和祝圣　劝化附近教外人的失败　辅理修士范廷佐及其工艺学校　徐家汇的来访者　罗礼思神父引李盛博神父入高丽

---

①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48页起。

② 赵方济1848年12月20日信，由卜亦奥神父转。见《中总》，第2卷第5章第11页。

③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287页。

在这时期，耶稣会神父住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托庇在那里的传教事业也越办越多了。

当时，主教计划为一些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研究的神父专门设立一门课程，以备将来接近士大夫时能起一定作用。计划实施后不到几个月，由于发生了饥荒和瘟疫，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全部教士都投入了救灾工作。①

与此同时，从1851年起，江南教区制定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袭至今，中国其他教区后来也同样采用这种制度，即每年二次，在1月、6月或7月间，各总铎区的神父们在保证患病教友能得到应有的照顾的条件下，分前后两批集中到徐家汇，举行避静和歇夏。②

这是非常繁忙紧张的假期，根据薛孔昭神父的记述，对这个大无畏时代的规章制度，他是深有体会的，而印象似乎并不太好："这些规定似乎好些人都感到承受不了，几乎每天要集会讨论；每周一次或两次讨论告解圣事中的疑难问题和耶稣会会典中的具体理解问题；每周几次在一个老学究的带领下实习中国话；经常还有会长神父的对内训话，时间又往往拖得比通常的半小时还要长；每天下午，又要听讲'四书五经'一小时。"试想这样的一种制度，而且又是在上海最炎热的夏天里执行，就不能不使人钦佩我们老一辈的坚韧顽强的精神。通过神父们的实践，不久教区就对这个规定作了显然温和的修改。

---

① 见本卷第170页。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36页起。第一次避静和第一次歇夏是在1851年举行的，事先曾取得赵主教同意，耶稣会法国参赞吕比荣神父曾向主教表示感谢（1850年9月16日，见《徐档》，卷宗B5），而罗伯济主教却从未赞成过。

每年两次，所有的传教神父集合一起，过几天集体生活，这办法后来也推广到会外的教区神父处；尽管这样做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对传教神父是很有益的，对于传教士来说，孤单的确是最难以忍受而又最危险的考验。因此，传信部部长枢机在文告里，总是竭力称赞和推荐这种制度。①

1848年，出现了一个急待解决，有关今后江南教区的重要问题。马再新神父从意大利带来了三名读书修士：利膺乐、晁德莅、马理师；马驷堂辅理修士在他们来到之前早已来了；他们将在中国读完晋升神父之前必修的神学和以后的卒试（第三年初学）。问题是今后是否可以让一些尚未完成修会培养和读完神学的年轻的修士提早前来教区。不少人对这个措施深感不宜，提出了种种理由，认为在中国对神修和学问方面的培育，远不如在欧洲那样完备，经费不足，教学和研究的设备又不充实，另外对一些体质尚未健全的青年来说，江南可怕的夏天对他们更是一种危险。但另一些人却看到了许多有利的方面：传教士的人数增多了，青年人学习语言和汉字比较容易，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的适应性也较强，而且，不论在学业上和神修上，欧洲的读书修士对本地的同会修士也能产生良好而又有益的影响。②

---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39页起。翁毅阁神父在他通知休假的信中所制定的生活日程是令人吃惊的。传信部部长1852年5月24日信，见《徐档》，卷宗B5。

② 这是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请允许我引用一位富有学识又富于理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奥布里神父的评价，他在1876年曾视察过江南教区，他说："耶稣会神父有一种其他传教士所没有的窍门，他们在中国的神学院里，总是有几个法国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这就加强了神职人员们的圣教会的公教精神，而且又用欧洲人的干劲影响中国人。这是多么巧妙的理想！"见《中国人在其本土》，第82页。

从此，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拥护者；直隶东南教区一开始只接纳业已升了神父的教士，感到很满意；而江南教区，从1848年起，却采取了相反的办法，也颇能引以自慰。①

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于1848年开始成立；除上述的几名意大利读书修士之外，另有一名高丽青年崔多默，他曾在浜椰屿修道院读神学，且已圣了六品；他一边准备升神父，一边伺机回本国；他在1849年的复活瞻礼后的第一个主日，被赵方济主教晋升为神父；不久，他从满洲进入高丽，在那里传教了多年，很有成绩。②

当修道院修士开始读神学时，耶稣会神学院就并入张家楼修道院。③

第一批神学教授有伏守谦、费都尔、贝来德、马奥定四位神父。南格禄神父除给新来者教授中文外还兼当神师。④

1849年，徐家汇住院全体成员计有读书修士四人、他们的教授以及辅理修士五人。住院院长是由教区会长兼任；理家神父代理院务，但他又忙于应付附近教友的教务，所以也经常不在；一些新来的教士，先在徐家汇住上几个月，学习中国语言和生活习惯。⑤

徐汇公学是在1849年至1850年的饥荒年代里创办起来的，进展一直很顺利；1852年已有学生四十四名，因此必须扩

---

① 上述问题的两种观点在两篇回忆录里叙述得很详细，一篇是江南教区的帐房塔扬神父的，另一篇是直隶东南教区鄂尔璧神父的。这两篇回忆录见葛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236页起。

② 见达莱：《高丽传教史》，第2卷第362页起。

③ 见本卷后面。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1、12、28页。

⑤ 同上，第26页。

建校舍了。①

徐类思主教曾担心公学与他特别关心的张家楼修道院竞争，因此长期竭力反对，甚至不准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招收教友学生。赵方济主教开始也倾向于他的助理主教的偏见，后经神父们开诚布公地解释了之后，他认识到这所公学训练一些富裕而又有声望的教友家庭的大批子弟，将会给教区产生多么好的影响，即使他们没有修道的圣召，也能当传教先生、教师或堂口办事人等，成为传教士们的得力助手。② 徐类思主教曾把种种怨恨不满控诉到罗马；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把徐主教的意见转达给耶稣会总会长，总会长毫不费劲地把情况加以说明后，③ 公学仍然维持了下来。事实证明，公学不仅没有损害修道院，而且每年还给修道院提供了不少优秀的新生力量。④

在上述情况下，徐家汇耶稣会会院更显出它的重要性，看来一座与住院相称的圣堂是少不了了。1851 年之前的那所姓徐的教友家的简陋公所，曾略事装修后权充教堂；可是如果要举行一些足以引起周围教外人士景仰的、隆重的宗教仪式，那就显得太狭小了。于是，1851 年初就决定兴建一座正

---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25 页。

②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 1850—1851 年间，教区会长致罗马和巴黎的上级的一系列信件中提供了有关资料。见《徐档》，卷宗 B1、卷宗 F11 和卷宗 F13；见《中总》，第 2 卷第 6 章第 16、18 页；第 9 章第 11、13 页；又《法信》2667 (1851 年 2 月)。

③ 见《传录》，第 13 卷第 14 页(徐类思主教 1851 年 2 月 3 日、4 月 4 日、6 月 16 日的上诉信件，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 1851 年 5 月 17 日、7 月 15 日的复信)。

④ 见本卷后面。

式圣堂；辅理修士范廷佐拟订了建筑图样，由罗礼思神父监督营造。1851 年 3 月 23 日，按宗教仪式举行了奠基礼，封存铅板一方，上刻拉丁文："奉圣依纳爵为主保的耶稣会圣堂。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清咸丰十年，在位教宗庇护九世。"

在罗礼思神父的指导下，建堂工程进展迅速，7 月底已全部竣工。1851 年 7 月 31 日，圣依纳爵瞻礼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堂祝圣典礼，有四位主教参加；除赵方济和徐类思两主教之外，有溯广宗座代牧的助理主教诺韦拉。他是被驱逐出境正准备重返欧洲的，又有日本宗座代牧福尔卡德主教和两名非耶稣会的欧洲传教士、两名中国神父、二十多名正在避暑的耶稣会神父，还有修道院修士和徐汇公学的学生。从上海也来了不少外侨，其中又有才到上海的"莫测"号军舰的舰长德罗克莫雷尔和海军军官多人也同来观礼。①

这座圣依纳爵堂是中国第一座按西方建筑学建造的教堂。这就要求罗礼思神父具有非凡的技巧和毅力，才能训练和督导他的泥水木工。这座秀丽的希腊式的教堂加上中国宫灯的装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被认为是上海的一个奇观。②

从此，随着环境的许可，一些宗教瞻礼日的隆重仪式不断地在这座新堂里举行。12 月 3 日，六位主教在董家渡主教公署开好会后③ 都来到徐家汇，过了江南教区奉为主保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瞻礼，赵方济主教在无数教友庄严虔诚的场面之下，咏唱了大礼弥撒。④

从那时起，徐家汇耶稣会会院开始正规化，成了一个独立

---

①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37—40 页。

③ 见本卷第 198 页。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44 页。

单位，8 月 9 日第一个院长葛必达神父就职，称为会院和徐汇公学的署理院长。

徐家汇附近的传教工作是由郎怀仁神父大力推进的。几个月之后，他接替了葛神父署理院长之职，因为葛神父对管理院务似非所长，他似乎更适宜于在外奔走传教。新院长就任后，走访了四周所有的教外人家，特别走访了徐光启的后代。被走访的人家大都还能以礼相待，他尽量设法消除教外人士对教会的偏见，对那些已经背弃宗教的徐氏子孙，他更是激励他们追念他们伟大的祖先。可惜，这番工作只是枉费心机；直至今日，徐家汇的教外人还是难以争取过来。今日徐家汇拥有如此多而又如此热心的教友，大都还是从外地迁来的。对这些情况，以后我将另有叙述。

令人快慰的是郎院长时期，在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周围，天主教已取得了公开的权利。1852 年，圣体瞻礼日迎圣体（圣体游行）的活动，已跨出了教堂的垣墙直至近郊四周。游行队伍以十字苦像开路，后面是各式旌旗、散花孩童、身穿红袍和短白衣的辅祭儿童、四名秀才先生高撑着华盖，还有装饰得十分秀丽的圣体台等；总之，这动人的场面和欧洲举行的盛况实不相上下。大伙教友远道而来，四乡教外观众两旁排列成行，场面宁静肃穆，真是无懈可击，至今还是如此。①

郎院长的另一建树是为教区增添了荣誉，又对教区极为有利，而且这项事业维持至今并仍在不断地发展。原来从欧洲新来的辅理修士中有一位艺术家，他就是西班牙人范廷佐。他的父亲是一个杰出的雕刻家，是雕刻埃斯库里亚尔王宫的艺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47 页。

术家。他把儿子若望送到罗马，使他在艺术上得以深造。若望在罗马得了圣召，他立志修道，进了耶稣会那不勒斯省的初学院。1847 年，在他恳切的请求下，他被派到了江南。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座教堂的图样就是他设计的。不少雕刻的立像和浮雕还保存至今，给范修士以很大的荣誉。①

范修士建议在徐家汇创办一所绘画和雕塑宗教用品的工艺学校，可以供应教堂装饰品，而且对教友家庭和对教外人士都能起很好的宣传作用。郎院长非常赞成这一建议。于是，工艺学校于 1852 年正式开课，不用细说，范修士在培训中国艺徒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他惊人的耐心和智慧的了；创办初期，成绩已很显著，以至徐家汇的这些工场画室成为当时上海外侨郊游的目标之一。②

范廷佐修士培植出来的一些艺徒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传统；1850 年，创办在横塘的孤儿院迁到土山湾之后，这所绘画和雕刻的工艺学校就合并了进去；至今这个部门仍很兴旺；远东不少圣堂的优美装饰，都得感恩于范修士教练出来的这些真正的艺术家们。

从那时起，来访徐家汇的著名人士源源不绝。当时，在上海的各修会和各传教团体，还没有设立各自的办事处——帐房，一些初次踏上上海口岸的传教士，无不在徐家汇受到热情的接待。当他们患了病、需要治疗或休养时，又是在徐家汇既可使他们多少得到一些西式饮食，又可得到教区医师高慎

---

① 董家渡大堂正祭台下的“基督殓葬”以及徐家汇大堂中的一些立像和木刻浮雕都属最著名的作品。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48、139 页起。范廷佐修士的杰作记录，见《天主教传教史》，第 7 卷第 639 页。

思神父和一些特约医师的照料。这所耶稣会会院成立之后，南格禄和梅德尔感到非常快慰的是，当其他教区的一些战友们在遭到迫害时，这所住院可作为避难所，对于一些处境非常危险，不能踏进自己教区，正想方设法等待的传教士来说，这所住院又是临时的接待站。①

1850年至1853年间，赵方济和徐类思二位主教患病时，先后都曾在徐家汇治疗；湖广的助理主教诺韦拉、日本的宗座代牧福尔卡德以及其他参加上海主教会议的非耶稣会的传教士，都在这所会院里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日子。②

徐家汇的神父们还为中国内地以及满洲、高丽等地的战友们负责传送信件和包裹到欧洲去，同时还接济那些一无所有或遭受严重教难的教区。③

在徐家汇档案室妥为保存的一些邻近教区传教士们的信件，都满腔热情地表示了对上海主教和辅助人员的感激之情；还有在高丽或在满洲殉道致命者的亲笔信件，也都是今日宝贵的圣人遗物。④

当传教士们碰到困难时，驻上海的法英两国领事敏体尼先生和阿礼国先生总是灵巧地并切实有效地予以支持。他俩是徐家汇会院的当然好友。每逢喜庆节日或追悼仪式，他们从不缺席。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经常到徐家汇来，还有他自

---

① 南格禄1845年8月8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34页。

② 见本卷第193页；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27、28、40页。

③ "我们在上海设立的帐房将是大众的帐房，在为各修会的服务中，我们对其他修会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我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使我感到庆幸"。又南格禄信，见《中总》，第2卷第3章第34页。

④ 单就宗座代牧中几封特别显著的信来讲，有满洲的方济各主教、高丽的高主教和张敬一主教及日本的福尔卡德主教。见《徐档》，卷宗B2。

己的目的。原来他在范廷佐修士那里学习绘画、雕刻和塑像；一次，为了更好地进行实习，他一连几天膳宿在徐家汇会院，完全按照我们的集体生活方式，不愿有任何例外。范修士在这期间，曾给他雕刻了一个黄杨木的半身像。①

可惜，多年之后，这位拉瑟福德·阿礼国爵士去北京当上了公使，把先前对徐家汇的良好印象统统忘掉了，我们将看到江南教区的一些传教士，对他所发表的那些攻击诽谤天主教传教事业的言论、文章等等进行了严厉的驳斥。②

不用说，每当有法国船只到上海，总是给徐家汇引来了不少参观者；1849 年，神父住院和徐汇公学接待了法国第一任驻华公使陆英、"巴约内斯"号舰长德拉格拉维埃尔和一些军官们，有时举行欢迎仪式，有时则一般性地接待。③ 在 1851 年和 1852 年，参观徐家汇会院的有"莫测"号的一些军官、舰长德罗克莫雷尔、④ 陆英公使的继任人男爵布尔布隆和公使馆的随行人员。⑤ 1852 年，来徐家汇的又有"贾西义"号军舰初次来华的舰长德柏拉和海军上尉克莱克，这两位在和徐家汇神父交往接触中，产生了弃俗修道的圣召；后面我要讲到"贾

---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68 页。

② 见本卷后面。

③ 见德拉格拉维埃尔：《中国旅行记》，第 1 卷第 295 页起。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40 页。

⑤ 见顾随：《回忆录》，第 2 卷第 216 页起。顾随是布尔布隆使节人员之一。他的《回忆录》是在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写的，对徐家汇极表同情。1900 年该书出版时，传教士们非常高兴，可是其中不少情节是不正确的，如："著名的由耶稣会神父管理的徐汇公学创办于十七世纪，一直到现在从未间断。学生人数非常之多，除了一般学者应考的学问外，还兼学拉丁文和天文学，学校配有一所气象台，装有很精密的仪器，这是美国天主教人士所赠送的。"（着重号是作者所标，表示与事实不符。——译者）

西义"号之战，这与叛乱战争时期教区的历史有关，我将另有记述。

在这时期，徐家汇住院的造堂工程师罗礼思神父为高丽的天主教做了一件头等的杰出大事。自从高主教和金安德进入这个受折磨的国土之后，一直没有办法引进新的传教士。184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李盎博[①]神父和一位高丽六品修士崔多默被"胜利"号舰长德热努伊接纳上了舰船，他们和另一艘军舰"光荣"号，舰长是拉皮埃尔，同向高丽出发，声称要讨还八年来许多死难神父的血债。8月10日，两艘军舰中途在"古公山"[②]岛附近遇难，六百名法国水兵经居民们救援才幸免于死，但这次出征的目的却落空了，两位传教士和水兵们只得重返上海。[③]

1849年，李盎博和崔多默登上一艘澳门来的沙船，船驶到北岭岛后，他们发现事先约好来接他们的教友船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因此只得又重回上海。崔多默在等待期间，就跟徐家汇耶稣会神学修士们一起读完了神学，于复活瞻礼后第一个主日，被赵主教晋升为司铎。[④]就在这一年，他取道满洲进入了高丽，但他无法使李盎博神父也进入这个国土。

1851年，李盎博神父留在上海，准备伺机进入高丽。李神父身边有一个高丽教友，他是不久前跟随敏体尼到上海的，领事曾以难于置信的勇气乘了一只机帆船，解救了一艘遇难

---

① 据沈则宽：《高丽致命传略》，第85页；费赖之：《中国、高丽和日本的天主教教会体制》第161页上都只记述是李神父。——译者

② "古公山"在上引《高丽致命传略》中作"古群岛"。——译者

③ 见本卷第87页。

④ 见本卷第218页。

的法国捕鲸船上被拘禁的一批船员;① 崔多默神父想方设法，终于在法国领事的机帆船上安插了两名忠诚可靠的人，其中一个不久便返回了本国；另一个则准备在李神父一旦踏上高丽海岸时充当领路人。②

李神父决定雇一只中国沙船去实现他的计划，并请求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那艘“莫测”号军舰的舰长德罗克莫雷尔派一个舵手为他领航，舰长认为这样做会使他的水手有生命危险，于是便拒绝了。罗礼思神父因“原有一些航海知识”，乃自告奋勇地答允送李神父去高丽。法国副领事爱棠在敏体尼休假期中任代理领事，他想尽一切办法协助这次行动。他交给罗礼思一件公文，并授予他作为调查1847年两艘法国失事兵船残骸的特派员；后来，罗礼思在崇明找到了一条教外人的沙船，他们就开始了这次行动。1852年8月初，两位神父启程了，他们遇到了一场暴风，不得不驶回了崇明去避风，就在那里他们过了圣母升天瞻礼日。后来他们终于经过八天奇迹般的航行，到达了那些法国遇难水手们宿营过的岛上。罗礼思神父非常镇静地跟地方官接了头，说明自己的任务，并公然进行调查。事实上，完全象预料的那样，“胜利”号和“光荣”号两艘船上残存的一切都已被当地居民抢掠一空。8月29日的深夜，李神父和他的高丽同伴终于踏上了海岸。罗礼思神父又在那里住了几天，借以瞒过地方上的注意，后来他满怀完

① 见本卷第176页注解。

② 见达莱：《高丽传教史》，第2卷第362页起。不少去高丽的传教士是乘上海教友的沙船取道满洲而去的；董家渡的一些教友船主家还虔诚地回忆起，他们祖上的沙船曾接送过一些传教宗徒和殉难的烈士（按耶稣会会士沈锦标神父口述）。

成任务的喜悦重返了上海。①

在返回上海途中，沙船经历了一场惊险的遭遇。李神父在动身时随带了一批箱子，内有圣爵祭器和大量银钱，原定由几只教友船来转运这批东西，但由于岸上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小船无法靠拢罗礼思的大沙船。等了几天之后，罗神父决定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上海。船上的教外船员觊觎那些箱子里的珍宝，起了谋杀罗神父及其随员的念头，并阴谋把这凶杀案件推到高丽人身上。在他们决定行凶的那天，罗神父就发觉船员们异常紧张、并且磨刀擦枪地忙个不停，但他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正当他们要行凶的时候，突然一阵翻江倒海的大雷雨袭来，那只船颠簸得很厉害，情况十分危险，水手们十分惊慌，说："我们作恶的阴谋引起天老爷的愤怒了，这洋人定是老天爷所保佑的。"于是，他们就抛弃了那桩谋财害命的恶计，不到几小时，沙船竟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吴淞。

这一惊险事件的真相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被揭穿；原来船上有一个水手，为了报复那个曾侮辱了他的船主，于是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向崇明的几个教友告发了。魏道昧神父从教友处得悉后曾追问了船主，因此才得到了完整的供词。②

李神父非常及时地到达了他的教区；高主教于 1853 年 2 月 3 日去世前任命他为代权主教。

---

① 巴黎外方传教会弗朗格莱神父 1852 年 9 月 13 日在上海致该会修道院院长信，见达莱：《高丽传教史》，第 2 卷第 370 页起；又翁毅阁神父 1852 年 9 月 12 日致省会长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34 页起。

② 薛孔昭神父是唯一记录了这次返航途中的惊险事件的，见《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50 页起。

三、修 道 院

迁至张家楼　教学课程　教学成绩　与徐类思主教的纠纷

在横塘小修院培训的几名成绩优良的修生已经到了能读哲学和神学的程度了；所以必须为他们另订课程方案，使年轻的修士一面继续深造中文，一面又不妨碍进修神哲学。1849年第一届哲学班开课；1852年，第一届神学班开课。①

江南教区的正主教和副主教都希望自己能多接近那些中国的年轻修士，以便直接关心他们的修养。因此，1850年6月3日，施于民神父重新把修道院迁到徐类思主教的驻地浦东张家楼。不久，施神父回欧洲后就由南格禄神父接替。同年9月，原在徐家汇的耶稣会读书修士和修道院修士合并后，一面继续读神学，一面协助修道院院长承担一些工作。才升了神父的晁德莅教授神学，利庸乐修士教哲学，马理师修士教拉丁文法。②

1852年3月12日，翁毅阁神父自豪地写道："张家楼的修道院使用了我们会里的两个神父和两个读书修士，却赢得了所有来访的主教、传教士和俗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一所修道院。"③

---

① 《南京主教区修道院教学概况》，见修院档案(1843—1861年)。
② 同上；见本卷第217页。
③ 见《通讯》，第3卷第20页。

1853 年，当董家渡天主堂落成开堂后，赵主教要修道院的高级班修士留在身旁，以便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有修士们参加辅礼，使礼仪更显隆重；因此南格禄神父随同修士们一起来到了董家渡；过后，低级班的修生也迁了过来。①

在 1852 年初，教区两位主教，教区会长翁毅阁、修道院院长南格禄以及几位传教士和四位学有专长的中国学者一起进行了研究，经过冗长而又审慎的磋商之后，订定了修道院的教学规划。②

我们可以从南格禄神父的 1852 年 8 月 16 日的一份详细报道中了解到他们的研究结果；根据他十年来对本地神职的培训经验和实践，他提出了非常英明的主张。③

修道院修士共四十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认为这已是暂时不宜再超过的数字。南格禄院长在常驻修院的助理主教徐类思的严密监视和高度关注下，领导着这些修士。南格禄既是修道院院长，又是物理和宗教史的教授。一位神父教神学；两位神学修士，一位教哲学，一位教高级拉丁文法；四位年长的中国修士教拉了基础语法；另有中文教师三人，其中一位是秀才。修士中读神学的七人，读哲学的六人，读高级拉丁文的六人，其他二十一人分四个班读初级拉了文。有六名修士担任辅导，负责监护年幼的修生，每月对他们的神修、纪律、作业加以评分，其他教师也附上他们的评语。这些记分单和评语都汇总报告给正副两位主教。

修院的必修课要求既要学好“足使人花上全部精力”的中

---

①② 见修院档案中有关修院教学概况。

③ 翁毅阁致传信部总部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5 页起。

文，又要并行不悖地学好哲学和神学，这的确是十分困难的。在这里晋升神父的年龄不得不比在欧洲要延长几年。一般修士在三十足岁之后才能领受铎品，因为学哲学需两年，学神学四年，而年龄不到二十二岁的不能读哲学。在这以前，他们则专修高级拉丁文两年以及六或八年的中文功课，这要看他们在家时学得多少而决定。在头四年里他们学初级拉丁文。在整个学程中，不论读拉丁文或哲学神学，必须从不间断进修中文；修院修士必须有和秀才同等的资格，尽管他们不去应科举。总之，年龄不到十二、十三岁的学童，不能进修道院。在修道院受教育的时间为十七或十八年，一些老教友家庭出身的孩童，在热心神业和遵守纪律方而是不难达到的。遗憾的是他们对教外人的归化不大注意，这多少是由于受到家庭方而对教外人的藐视和漠不关心的影响。①

分析了上述情况后，足可证实南格禄神父的观点是正确的。漠视教外人的思想是可以纠正的，哲学班和神学班修士们的传教初步尝试，是很令人欣慰的。②

修道院的教学规程考虑得很周到，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翁毅阁神父在撮录欧洲神职界和俗界人士参观南京教区修道院后作出不少好评时，流露出满心的喜悦。③

但是神长们对执行修院事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不只凭幻想，翁毅阁神父在同一信中坦白地说："我们并不说修道院的一切都已十全十美了。"④

---

① 翁毅阁神父的感想，见《通讯》，第 3 卷第 28 页。
② 见《通讯》，第 3 卷第 27 页。
③ 见本卷第 228 页。
④ 翁毅阁 1852 年 3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0 页。

首先，修道院院长和教师们的工作不能自由开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徐类思主教常驻修道院，严密关注青年修士们的学业和神修原是他应有的权利，但在具体措施上，他的观点跟耶稣会的传统做法不能协调。神父们在给罗马和巴黎的一些信件中，不免叹息徐主教对一些自由散漫、马虎懈怠的修士过分宽容迁就，对自高自大的青年则任意吹捧，在师生双方发生纠纷时，往往是教师反受到委屈。①

加上徐类思主教完全承袭了罗伯济主教的一切偏见，反对耶稣会在教区神职人员中所起的影响。他不但要求任何修道院修士宣誓，在没有取得传信部许可之前，不进任何一种修会，而且即使得到许可之后，他还写信到圣部请求撤销许可。②

为了消除一切进入修会的意愿，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凡是耶稣会神父一律不准听修道院修士的神工，对在修道院工作的其他神父也规定如此；③ 这些禁令，青年修士们都理会其用意，其目的无非是要他们不信任他们的教师；徐主教还规定，严禁修道院修士阅读耶稣会圣人的传记或研究耶稣会会士的神修著作。④

修院修士和教师之间的谈话也被严密地监视，凡是某些

---

① 卜亦奥 1851 年 1 月 12 日信；监会铎伏伯禄神父 1854 年 11 月 21 日视察时的长篇记录。见《中总》，第 2 卷第 6 章第 15 页（徐家汇伏伯禄信原稿，卷宗 E5）。

② 徐类思 1852 年 10 月 21 日、1854 年 12 月 3 日信，见《传录》，第 14 卷第 15 页。

③ 徐类思 1849 年 11 月 13 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④ 伏伯禄 1854 年 11 月 21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5、16 页。

话语，主教认为有吸引修士进修会的气息的，他就随即向传信部控告。①

徐主教的这种对属下人员的不信任、同时又赏识他们的教学能力和工作方法的态度，实令人感到为难。②这一切，使在修道院造成了一种既不利于神修，又不利于学业的分裂状态，修士们也多少有意识地分成了亲主教和亲耶稣会的两派。③

冯若望修士的例子很典型，说明了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1849年，冯修士自感有进会的圣召。1852年，他向赵、徐两位主教表示了自己的志愿，两位主教存心拖延，劝他等到升了神父后，再向传信部申请解除誓言。这位青年不灰心丧气，在耶稣会罗当神父的支持下，他再次向罗马呈请。徐主教去信罗马，声明为了保持修院的安定和秩序，不该予以批准。徐主教胜诉了。1853年1月22日，圣部通知耶稣会总会长，认为不能满足这个中国修士的进会要求。1854年，冯修士认为此事有关本人神修和日后的传教工作，乃直接向教宗庇护九世奏请；徐主教却又从中阻挠，仍保持原议。1857年6月23

---

① 总会长罗当1851年5月17日致传信部部长信；徐类思1849年11月13日、1852年10月21日、1854年12月3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13卷第14—15页。

② 翁毅阁1851年9月9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1章第9、11页。

③ 1851—1854年间总会长收到的信，见《中总》，第3卷第8章第1、8页。特别是南格禄神父1855年1月10日致赵主教的重要备忘录，见《中总》，第3卷第8章第8页。备忘录指出，关于修道院中国修士所作宣誓的有效问题，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徐主教据此向传信部告发（1855年2月16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7章第11页），圣部也指责了他的做法。（1855年5月12日致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总》，第3卷第7章第12页。）

日，当年文思任代权主教时，这位中国修士在讲解教理工作中因中暑而生命垂危。直到他临终前，他才被允许进了会，当他发了忠诚愿后便去世了。①

修道院的宣誓问题以后如何结束，将另有叙述。

赵方济主教对这种局面感到非常痛心。同他的助理主教相比，他原不是那么反对耶稣会的。他赏识耶稣会神父们在会口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办事能力；此外，他也感觉到培养本地神职、完成司铎修养的重要性，他很愿意让南格禄神父和他的同事们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是他却顾虑重重，唯恐触犯他那难于磋商的助理主教而闹出更难堪的局面。②

至少他向传信部提供了确实的情况，他信件中的观点和徐主教的也截然不同。③

修道院的纠纷使耶稣会总会长和传教士受到传信部多次的谴责，④这些信件至少告诉南格禄神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培育本地神职这一细致的工作上，应如何审慎行事。

---

① 翁毅阁和南格禄致总会长的信和冯书田本人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见«中总»，第3卷第1章第22页；第2章第18、25页；第7章第4—22页。见贝来德：«冯若望修士传略»；«通讯»，第4卷第1页。

忠诚愿也称热心愿，是未经法定手续，自愿发的圣愿。——译者

② 翁毅阁1851年和1852年致总会长和法国参赞神父信，见«中总»，第3卷第1章第6、21、22页。伏伯禄1854年12月22日和1855年2月11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7—22页。

③ 有关情况摘要，见«传特»，第24卷第414页起。赵方济1851年2月15日、1853年6月1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14—15卷。

④ 总会长罗当1851年5月17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14卷；卜亦奥1850年10月6日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13卷。

四、松 江 府

横塘孤儿院迁至蔡家湾　收回松江教堂的尝试
郎怀仁神父在浦东的善会

这里，我们只叙述这段时期内一些特别令人振奋的事；至于上海周围的传教士的一般生活情况，前章已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修道院迁到张家楼之后，由于修道院修士和施于民神父的关怀[①]而在横塘举办的孤儿院却迁到离横塘不远的蔡家湾。这批由横塘迁来的孤儿便和另一批杨字圩柏葆禄神父在饥荒年代收养的孤儿合并在一起，托山东来的修道院修士郭相公尽心照料。柏神父死后，[②]赵方济主教把蔡家湾孤儿院的事务相继委托给佩利西亚和舍蒂诺两位神父，他俩只是暂时在教区逗留。1851年2月19日起，夏显德神父主持了这项工作，他是这事业的真正缔造者。当时有孤儿六十六人，男孩四十三人，女孩二十三人。他先把女孩迁送到浦东唐墓桥，那里已有郎怀仁神父举办的女孤儿院。蔡家湾从此只收男孩。[③]

夏显德在他亲自编写的关于孤儿院初创时期的六年大事记中，提到他曾筹办缝纫、木工、制鞋、印刷等几项手艺，使这些孤儿将来能有借以谋生的技术。夏神父极力防止懒怠，他

---

① 见本卷第178页。
② 见本卷第182页。
③ 见《耶稣会法国省历年函牍(1863—1864年)》，第146页起；又《夏显德神父传略》。

称"懒"是孤儿们的"第二原罪"，他又尽力使孤儿们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这是中国人向来不甚注意的。

我们看到，这些大多数是被教外人遗弃的孩子深深地被神父的热忱所感化；其中年龄较大的也懂得自觉地维持秩序。一些犯规的也会自觉地做相应的补赎。一次，发生了一桩比较严重的抗命行为，夏神父就把孤儿们教室里的一张大的圣母像收藏了；为此，好些孩子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苦苦哀求把圣母像重新挂上，并自愿遵守大斋① 三天。夏神父同意了，并准备第二天不要他们再守大斋，但由于他连日外出，忘了事先吩咐，待他回来时，听到这些孩子，连最小的也坚持守了三天大斋，夏神父深为感动。

在西欧学校里，促使儿童进步所沿用的一般方法，如成立圣母会、每周报告功课评分情况，我们对这些昨天还是很粗野的孤儿，也采用了这些方法。孩子们都深深爱上了这个家，每逢有教友人家来孤儿院招认领养子嗣时，孤儿们往往躲藏逃避，唯恐被人认领去。英国领事阿礼国和英国驻军司令来院参观时，不禁惊奇地说："只有天主教人才能替这些中国孩子解决问题。"不久，附近一些富裕的教友人家也和这些小邻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慷慨施舍为神父的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大瞻礼日，一些乡绅还亲自来给孤儿们搬饭端菜。1858 年夏，因直隶东南教区的神父们要求夏神父到北方去举办一所类似蔡家湾的孤儿院，夏神父便悄悄地离开了蔡家湾。孤儿们得知消息后，一清早，竟偷跑出去，饿着肚子，步

① 斋，是天主教在饮食上苦身的一种行为，斋有大斋、小斋之分：大斋是限壮年人一日三餐，只饱食一餐，余餐酌减；小斋则不吃肉类。——译者

行了三至五里路，赶到徐家汇向夏神父辞别。①

这所孤儿院是黄浦江左岸松江总铎区的一大荣誉。这一总铎区统辖四个本堂区，计有传教神父五人，孤儿院理院一人，夏神父还兼任横塘四周的教务。②

1850年，人们希望收回旧耶稣会在松江的神父住院，当时松江是上海县的府治。且不说这座教堂是老辈传教士修建的最大、而又最富丽的圣堂之一，而主要的是，收回了这座圣堂为其他教产的归还开创了一个例子。因此智勇双全的葛必达神父奉命办理此事。在法国领事敏体尼的大力支持下，赵方济主教和上海道台进行了交涉。上海道台表示，不但答应归还圣堂，而且还允许传教士公开居住在府城内。卜亦奥神父在1850年初曾写道："我希望葛必达神父不久成为松江的一个对教友以及教外人士有重要影响的人物。"③

不久，这种幻想消失了，地方官员的诺言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无实际行动。

---

① 见《夏显德神父传略》。

② 松江总铎区的传教神父名单（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349页）：

	松江		马桥
1849年	南格禄		丁恭思
1850年	翁毅阁		丁恭思
1851年	葛必达		丁恭思
1852年	德良弼		丁恭思
1853年	德良弼		伊再可
	浦南		青浦
1849年	禄理格	鄂尔璧	柏葆禄
1850年	禄理格	鄂尔璧	柏葆禄
1851年	笪良仁	鄂尔璧	施于民
1852年	笪良仁	鄂尔璧	卜亦奥
1853年	笪良仁	鄂尔璧	丁恭思

③ 卜亦奥1850年1月30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18页起。

1851年，德罗克莫雷尔舰长所率的"莫测"号军舰正停泊在黄浦江上，赵方济主教就想乘此机会把归还松江教堂之事再落实一下，于是他再次向上海道台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料事情反而弄糟了；松江知府对此大为恼火，并大肆宣扬说，法国军舰此来是为了运送军械，唆使教徒反对地方官。1851年8月3日，松江提督衙门发放月饷，提督吩咐在衙门入口地上，用石灰画一十字，所有兵士，必须先践踏十字，方得入内领饷。队伍中也有一些教友，有的事先得知这消息，因此没有参加，有的只是跨一大步，并不践踏十字，或只在十字旁边略微擦过。独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公开拒绝这种变相的叛教行为，因此被开除军籍。提督对此甚为不满，乃另作一张正式背教的文书，命令所属士兵必须在上面签字，可是他这种作法并不比前一次更妙，因不信教的士兵在给自己画押时，同时替要好的教友士兵代签名了。然而，还是有不少教友自动退出了队伍，没有退出的，官吏们就作为已自愿背教看待。这内幕被发觉后，又激起了教外人们的愤慨，于是街道上、城门口都画满了十字；许多教友人家被抄，声称是搜查法国军舰"莫测"号带来的军械；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传单、漫画四处张贴，谣传要杀尽教徒，特别是洋教士。

赵方济主教万分焦急，恳请德罗克莫雷尔舰长在局势平静之前，军舰勿离黄浦江。舰长因另有任务，认为事态并不那么严重，竟命令军舰驶离远走了。"莫测"号一开，人们就认为这下子要大难临头，一场大屠杀在所难免了；可事实恰恰相反，结果却是太平无事。谣言消散了，官府也贴出了安民告示。尽管情况好转出乎意料，然而对收回松江教堂一事，当然就更不宜再提，还得等待多年才得物归原

主。①

几天之后，在松江北门外一二公里处的五里堂会口发生了一场虚惊。原来那里有一所小堂，神父在不久前刚刚修复了这所小堂。南京总督因附近教外人士的告密，下令追究发动修堂的人是谁，并命令必须严格执行通商口岸外洋人不得自由行动的上谕。幸亏松江知府很怕事，他把要来调查的日期通知了神父，而且执行调查的正是知府的儿子，所以调查时，只有一些本地教友在场，而且答词也是事先商量好的。②

碰到了这种意外情况，神父们只得采取一些补救的传教办法，即积极推广给垂死婴孩付洗和整顿会口工作。葛必达神父参照在崇明时的做法，在松江培训了一班突出的女权付者，她们进入善堂医院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③

松江和浦南一样，教外人的归化少得可怜。鄂尔璧神父在 1849 年 10 月 22 日的信中强调指出，归化的主要障碍，对于穷人们来说是日夜操心的吃饭问题，而那些骄奢淫逸的富人们则只追求物质享受；另外，有些人担心要放弃老祖宗，脱离家族联系，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严重问题；此外也由于过去曾为文人士大夫们所尊重的天主教，现已沦为下贱穷人们的宗教了。他慨叹地说："唉！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出现有象我们的前辈那样出人头地的威望的传教士。看来很明显，在没有达到这步之前，休想争取中国的广大群众。"④

---

① 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 22 页；《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41 页起。无疑，为了引起法国舰长的重视，赵主教曾要求在徐家汇避暑的所有神父联名向舰长呼吁。

② 见《中国常年通讯(1851—1852 年)》，第 3 页；《法信》2660。

③ 翁毅阁 1851 年 11 月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418 页。

④ 见《通讯》，第 2 卷第 307 页。

郎怀仁神父从山东回来后，在浦东进行重整堂口工作。他先着手于恢复过去南怀仁主教和他同事们所创办但现已颓废了的圣母会和圣心会的善会组织；开会期间，到会人数有时竟达五百至一千人之多，这些会员在本乡本土便成了传教的宗徒。郎神父在1851年写道："我们逢每月的第一个主日集会一次，这很令人感动；比如今天是阴历六月的第一个主日，到会会员五百多人，有的隔夜已来，有的大清早冒雨赶到，每组集合在各组的会旗下，有的还带着捐献礼物，加上非会员的一般教友，我的听众竟达两千人之多。我备有小型木刻板，印发每月圣人主保单① 和已亡的会员或已亡预备会员的通功单② 等。我又组织了一个教理传习班，会员中的优秀分子才有资格参加，每次集会，由其中一人对事先指定的题材作一番讲话。我希望用这个办法造就一批可以对教外人传道的人员和堂口里优秀的办事人。"几天之后，他向省会长神父写信说："当我回忆起七年前我初到中国时的情况，在这同一堂口，把当年的教友和今天的相比，简直相差太大了。"③

这番整顿复兴工作必须先从培育儿童着手。1851年，葛必达神父举办了一所有十五名学员组成的教理培训班，培养未来的传道员或教师，并当教士的助手。④ 各处都办了教理读经班，设备也日趋完备。葛神父非常确切地指出："学校，这是

---

① 主保单后来发展成为每年刊印的瞻礼单。

② 通功单乃天主教教友死亡后由家属讣告全体教友的单子，上印亡者所属会口、姓名、籍贯、年龄、死亡日期等等，在教友会集时散发，吁请众教友为亡者祈祷通功，故称通功单；又因单上一般用显著的字体印上亡者的领洗圣名，故也称圣名单。——译者

③ 郎怀仁1851年6月29、30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89—390页。

④ 同上，第391页。

为开展辽阔前程的一个好办法；教外人士对此也有同感，并十分赞赏这个办法；我在这里认识了一家最富裕的人家，这家家长看到我们的这些办学措施后，也表示想奉教了。"①

由贞女们管理的孤儿院中，大约有十二所收养着在灾荒时期被遗弃的儿童。唐墓桥专收女孩子，至今还留有美名。徐家汇圣母院的育婴堂就是从唐墓桥孤儿院迁来而发展起来的。此事后面将另有叙述。②

神父们还关心修复和扩建一些会口中破残的小堂；教友们也乐意大力协助，并愿为保持圣堂应有的尊严作出贡献。

这些整顿和改进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某些漠不关心和贪婪成性的办事人以及傲慢和任性的贞女们从中作梗，向主教发牢骚。在一些保守思想占上风的地区，还有人在捣乱。但主教置之不理，神父们也坚持原定方针办事。后来，秩序也逐渐恢复了正常。③

在浦东，教外人没有发生什么骚扰。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④那时马奥定神父在高桥附近的一个穷苦会口里举行开四规，他刚刚做完弥撒，一伙土匪蜂拥而入，把堂内公所内所有的物件一抢而空，并把神父绑走，声称要把洋鬼子押送官府。途中，他们抢走了神父身上所有的东西，拳打脚踢一阵之后，抛下神父便逃走了。马神父好容易返回高桥，向教友们述

---

① 郎怀仁 1851 年 6 月 29、30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91 页。

② 见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 1 卷第 431 页。

③ 同上，第 432 页。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17 页提到，赵主教曾风趣地给郎神父看有人控告他的信件。

④ 从 1849 年起，浦东划分为两个本堂区：北区（郎怀仁、德良弼、费都尔）；南区（谷振声、笪良仁、马奥定、夏显德、翁毅阁）。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344 页。

说了经过情形。教友们已不象过去那样，对一切欺侮凌辱可以听之任之的了。于是，所有附近堂口的青年教友都集合了起来，一个专门负责地方治安的武官供给了武器，其中还有一门旧的土炮。教友们向土匪的老巢进攻，那时匪徒们已四散逃逸；为了报复，他们就放火把匪巢烧了。从此以后，神父们受到了尊重，谁也不敢再来侵犯了。①

五、崇明及海门

教友的复兴工作　育婴事业　贞女

在1849年至1850年的灾荒时期，梅德尔和魏道味看到地方官对灾民漠不关心，便费尽心机赈救了成千上万的教友和教外人。②

由于救灾成绩巨大，使葛必达神父开创的归化教外人运动加速了进展。当时，传教士们的书信中也深刻地表示出，虽然生活极度艰苦，但他们对教务的发展感到欣慰。③

1849年，卜亦奥会长给崇明、海门的饥民带来了从上海租界上捐来的大笔哀矜。这次善举对传教事业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850年，徐主教来灾区巡视并施行坚振，教友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些善良教友们的热情接待，几乎造成一次地方性的教难。费都尔神父向我们叙述了事情的经过：④“徐类思主教在崇明结束了坚振和巡视后，我和三十来名教友伴送主教坐船赴海门。一路上青年教友们燃放鞭炮高升，这是他们临时想到的一种热烈排场，谁知乐极生悲，这番兴高采烈的凯旋式的热闹，却引起了中途某村一些教外人的

仇视，他们就蓄意在我们的归途中寻事。我走在前面，穿过了有百来个人的人群，他们当面没对我说什么，让我过去了；可是当我的教友要通过时，他们却搜尽一切诅咒词汇漫骂起来。我的车夫挨了打，我退回来，站在那座他们原想要把我推下河去的桥上，对那些气势汹汹的人说：'你们要找我，那就来吧，我一人担当；为什么你们要刁难殴打那些一声不吭的人？你们又不是野蛮人，你们有警官……去！和我一起去，到他那里去评理。'警官不愿见我，那些闹事人却先惊散了。当我回到公所时，有人告诉我，说有三个带着镣铐的人来求饶。实际上他们是被出钱雇来的无辜的老百姓，是伪装来请罪赔礼的。我征得魏道味神父的同意，向徐主教汇报了这个情况。徐主教即向官厅交涉；那些罪魁祸首们除了要贿赂官吏外，还得由地方警官伴着来向我们赔礼道歉，这是必要的措施，因事关整个崇明区一切堂口的安全问题。"

---

① 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105页起。

② 见本卷第180页。

③ 崇明、海门两地的传教神父名单：

	崇　明	海　门
1846年	葛必达	
1847年	葛必达　魏道珠	魏道味（1847年7月）
1848年	葛必达	魏道味
1849年	葛必达　费尔伯	魏道味　年文思　梅德尔
1850年	年文思　倪也堂	魏道味　梅德尔
1850年	魏道味（1850年7月）	倪也堂
1851年	魏道味　费都尔	倪也堂
1852年	魏道味　费都尔	李秀芳
1853年	魏道味　马理师	李秀芳

另有几位神父经常到崇明、海门过上几个星期，临时替代离职的神父。例如郎怀仁曾先后五次从浦东去崇明、海门。

④ 费都尔1851年7月20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402页。

1852 年 8 月 17 日，魏道味在给耶稣会巴黎省会长神父的信中，总结了崇明地区八年来取得的成就：

“从 1844 年起，新建了十二所砖瓦盖的小堂，代替了过去做弥撒时用的一些芦苇草棚；凡是破旧塌毁的，也已整修一新。一部分费用是耶稣会提供的，一部分由教友们捐献。教友们尽管生活穷困，但凡是光荣天主的事，总是肯慷慨出钱出力的。在所有不论新的或老的小堂里，都悬供苦路像。每逢主日或瞻礼日，教友们集合在那里念经、拜苦路、做瞻礼，代替望弥撒。这种圣善的办法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好多教友过去连‘三守瞻礼之日’① 也不知道是什么呢。今年岛上所有的堂口还是第一次都满了‘四规神工’，即从 1851 年 9 月开始，到 1852 年的 5 月结束；接着是歇夏。这个间隙时期对神父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可以有时间料理一些私人事务；此外又避免了盛夏的酷暑和繁重的工作；我们能在这段时期把身体休养好，教友们也可不受牵制地从事农活。

“去年（1851年）徐类思主教光临我区巡视，给数百名教友行了坚振。另外，这里根本无力建造新的房屋，有不少破残房屋需要修复，有历年教难遗留下来的废墟，又有近年来一连串灾荒造成的新的破坏。这些新老创伤堆积在我们久被放弃的小会口里，真是百废待兴，谈何容易。过去的堂口分布得不尽合理，现在已比较合适地划分为四十五所小堂口，经常有神父按时来巡视，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教友们对教理更理解了，绝大多数教友对教规也遵守得完好了。我们有八所小学，其中两所是女校，由正直善良的贞女们掌管着。一些

① 天主十诫的第三诫。——译者

穷苦小学生由耶稣会资助。主教提用圣婴善会的捐款支付女校的开支。由于某些学童的家长还在抚养教外儿童，这双重的负担使这些教友家庭的生活越来越贫苦。

"在这七年之内，光崇明一地，由于一些热心而又机智的教友利用欧洲送来的救济，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成千上万个儿童送上了天堂。成年人的受洗人数也同样很多。当然，这也是煞费苦心得来的结果。"

总之，要描绘教区初期工作的艰巨情况，还得引用魏道味神父的说法："一个传教士在一些纯朴勤劳的人民中间的生活情况，确是一幅气象万千的巨大画面。他担任的工作几乎天天如此，既当律师，又当公证人，忽儿是法官，忽儿是市长，时而当警长，时而当县长。应付这种变化多端的日常生活，必须先学会那种难以想象的语言，适应那种跟西方风俗截然不同的习惯，还要对付那种连体质最强壮的人也难以支撑的气候；总之，必须把我们整个儿地脱胎换骨再改造一下，事事为人人服务，给耶稣基督争取众生。尊敬的省会长神父，对我来讲，我这六年的传教生活，不是在独轮车上，便是在神工架子里。我现在已感到正在大踏步地向衰老迈进。要是我在神修方面也能如此阔步前进，那我此时此刻，也许配得上称为我们光荣的会祖圣依纳爵的孝子贤孙了。总之，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我始终感到幸福和快慰；我热爱我的教友超过了一切，今世的事物我已不感兴趣，但愿他们个个得救，最后我跟着他们一起进入天国。"①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付洗被遗弃的孩童并把他们抚养

① 见《通讯》，第3卷第35页起。

大，在崇明是一桩特别偏爱的事业。教友中连最穷苦的工人、贞女，虽然他们只是做一天活一天的，但也不惜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约些钱来收买被人抛弃等死的婴孩。如果有幸孩子养活了，还得负责把他们抚养大。由于缺少资金，当时在崇明还不能创办一所中心孤儿院。魏道味神父写道："经济的薄弱、环境的困难，不允许我们事事都称心满意。我们从教外人处收来或买来的一些孩童，就安排在教友家里，这些人家大多数又是很穷苦的困难户，一般是由贞女们负责教养，大部分费用也由她们承担。圣婴善会的捐助，往往只用于收买遗弃的婴孩和资助经济特别困难的那些行善的贞女。这些领养的儿童和本家的孩子都享受同等待遇，而且往往还更受到爱护。"①

1852 年 1 月，费都尔神父收了八个五至八岁的女孩子，却找不到收养她们的人家，因此只得把她们安排在一间小屋子内，托两个穷苦的贞女照管。神父为每个孩子每天付十五枚小钱，一年约合二十四个法郎。②

这就是崇明孤儿院的开端，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个事业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

崇明、海门两处堂口的本地贞女是慈善事业的最得力的助手。老一辈传教士所创办的组织在教难时期已逐渐消亡了，葛必达神父和他的同事又重新把它恢复了起来。魏神父在给法国修道的姊姊的一封长信里，为我们报道了一些饶有兴味的细节，介绍了他是怎样培训这些辅助人员，以及她们是怎样尽力效劳的。"在海门和在这教区的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些优

① 魏道味 1850 年 7 月 12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353 页。
② 魏道味 1852 年 2 月 21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7 页。

秀人物，她们忠诚于天主的宠恩，一心为了天国。在现世，她们除了献身耶稣基督外，不愿另找配偶……一个青年女子一旦抱定守贞不嫁，当本堂神父来堂时，她在父母或抚养她的家长伴同之下，跪在神父前宣布自愿立志终身守贞，请求神父允许，并听她忏悔告解。这种献身仪式，一般是年龄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举行。一旦举行了仪式就定了终身，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向她求婚，她也从此可以过安定生活了。从我来到中国之日起，没有看到一个在宣誓之后中途抛弃这崇高志愿而另找出路的。总之，背弃誓愿，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这里再介绍一下这些献身事主的贞女们的受训过程。在海门和崇明，这些贞女的全部学问，一般只要求她们能背诵冗长的早晚课①、弥撒规程②和周年瞻礼经，这是代替望弥撒和主日晚课经的；再有圣路善工，一俟她们先后加入其他善会之后，就有专为其他善会的经文：比如加入圣母会之后，还有圣母小日课经等等；教理方面，这里通称四问答，当然，她们也应该熟读它；玖瑰经更是她们日夜背诵的课经，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哼着念起来。她们常常无数次地重复，不断地背诵经文，她们认为这样做才算是一个虔诚的好教友。因此一些老年贞女总是费尽心机地去教会那些年轻贞女，如有疏忽懈怠，学习不下苦功夫的人，那就遭殃了。下次神父一来，指责马上会来自四面八方，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被责问得面红耳赤，并保证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加紧努力。再看看，这是一番什么样的苦功夫：这些女子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也就是说，既不会读也

① 早晚课：天主教教友每天早上和晚上念的祈祷经文。——译者

② 弥撒规程：教友望弥撒时随着做弥撒神父的弥撒礼仪而念的祈祷经文。——译者

不会写。她们在要理问答上或一般经本上能辨别出几个字，那也是由于她们无数次地翻来复去地读、一句句地背，把这些笔划七横八竖的中国字硬嵌硬印在脑子里的结果。但是，当这些字在另一本经书上出现时，这些女'才子'就再也不认识了，她们又得从头学起。其次，即使某些女孩子能分别识得不少单字，并能流利地通读一些教会经本，但由于这些经本编写的词句不是通常的语言，因此她们也很少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意义。

"亲爱的姊姊，可能你要问我，这些善良的贞女是否领会神修并重视神修生活。我的回答是，看看她们是怎样生活的，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我们这里的贞女都是自食其力的，一般就在本家单独居住，① 周围尽是些腐朽轻薄的教外人。外表上她们跟一般妇女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求她们不穿太耀眼或太讲究的衣服。海门的贞女中，除十来个外都是穷苦人，她们靠日夜辛勤艰苦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在海门，只有百分之一至二的人家，生活比较宽裕。这些穷苦女孩就生活在群众之中，一天到晚就是呼呀呼地纺纱织布，往往起早摸黑地干，弥补她们念经和搞慈善工作所花去的时间。她们织成的布匹交给亲戚去市上出卖，再买进一些日用必需品回来。每天早晚，她们或独自一人或合家一起念早晚课。她们每天要念六端玖瑰经一串，另外两串五端玖瑰经，再加上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瞻礼经和圣母小日课经。每逢主日，根据地方习惯，上午休息，专心搞神业，如果小堂离家不太远的话，天蒙蒙亮就上

① 这与上海周围的贞女有显著差别，她们一般是几个贞女在公所里集体生活的。

圣堂去拜苦路①，做主日瞻礼。如有神父在，就去望弥撒、领念弥撒规程、听道理。一个虔诚的贞女，尽管经济困难，总是要设法做些慈善工作，有时无法参加，就会感到难受，好象自己白过了这一天。

"今天，我向这些女孩子保证，以后，我每年要来这里两至三次听神工，她们不胜感激，好象已经升了天堂，认为现在可以放心保险了。可是她们来办神工时，由于时间关系，我也只能三言两语扼要地指示一下，说明某一谬误行为的性质和轻重，这对一个全心全意要投入内修生活的人来讲，又算得什么？她们的一些神修知识，都是由老一辈的贞女粗枝大叶地、往往又是七拼八凑地传授下来的。再加上海门地区从开教时期起，也就是八十多年来不断地遭到教难，她们的神修教养又怎能会不松懈呢？了解了她们的情况后，你对她们的愚昧就会谅解了。她们没有受过特殊的培养，这更说明仁慈的天主对圣化一个质朴宏量的心灵，承行他的圣意，无须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目前，我们处在太平时期，传教士可以不断地走访各处堂口，这对普救人灵真是大有希望……

"尽管我们这里的贞女们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她们确能一片诚意地要求在虔诚和心灵的纯洁方面达到超凡的程度。尽管她们遇到重重的困难，而且四周又有许多教外人包围着，但是她们仍保持了心清神洁，依我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奇迹。天主上智慈祥的眷顾，使这些

① 拜苦路：天主教教友为纪念并朝拜耶稣受难的最后一段路程，从罗马总督比拉多判以死刑起到埋葬坟墓止，共分十四处(站)。据说于十三世纪初由方济各会传开，凡教徒不能亲往耶路撒冷朝拜圣地者，即以拜苦路代之。教友拜苦路时，须向每处苦路的十字架跪拜起立，默想耶稣苦难事迹。

娇嫩的花朵得以在污染的泥土中吐艳盛开。亲爱的姊姊，请你和我一起感谢吾主，愿主对这些忠诚的净配大量地广施恩宠。

"在海门和崇明，传教神父来到堂口的日子真是盛大美丽的节日；贞女们更是大忙特忙，她们领导布置圣堂，装饰祭台，还要给神父打扫宿舍，准备饭菜。十天半月的费用也得由她们事先去筹措，不但神父的开支，连跟神父来磋商议事的教友们的开支，也得由她们慷慨垫付。在开四规时期，她们发动教友、领读经文、开导愚昧。开四规的第一天，她们给我介绍由她们培训过的或愿意来访我的教外妇女，把归化她们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周折，唠唠叨叨地向我汇报；同时我又要对准备进教的保守教友——望教者传授教友的生活习惯和必须遵守的教会规则；凡是没有贞女的地区，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没有人去促醒，所以谈不上什么归化了；一些被教外父母抛弃的婴儿，同样就没有人去拯救。半年以来，我全靠这些贞女们的协助，我有幸能把二百五十多名婴孩送进天国。她们始终不渝地，也不怕花上几百文钱去寻找、收买这些微弱的生灵。如果某些地方她们自己不便去，就托亲友去把婴孩抱来。

"亲爱的姊姊，从此你可设想，这些贞女在天主眼里是何等赏心悦目，而一个传教士，在升天的道路上，又应该怎样关心引导她们前进。事实上，对一个业务繁忙得走投无路的传教士来讲，她们真是天主特派来的助手，她们关心一切、料理一切，她们的虔诚鼓舞了热心的人，敦促了冷淡的人，增加了天主儿女的数字。"

魏神父在结束这封信时，说他在海门有上百名这样的贞女，在崇明也近乎有这么多的贞女。①

① 魏道味 1847 年 10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148 页起。

据1848年的统计，有贞女一百零五人，1853年至1854年有一百七十人。她们的芳容，不惜任何牺牲的表现，真是举不胜举。1850年，有一个贞女一个人就抚养着四十来个孩子，同时还担任着托她管理的崇明的几所中心小学，她积极地工作，几乎不需要神父的资助。①

另一个贞女身患毒疮已达两年之久，但她不给任何人知道，深恐家里人去请医生来给她诊治，同时她还照样积极地继续为垂死的孩童付洗。②

六、西区教务

从无锡到五河各堂口的情况　文雅各的归正　马再新神父之死

1850年之前，耶稣会只负责松江府和崇明、海门这些地区的教务。1846年8月，只有薛孔昭神父被罗伯济主教派遣到苏州府治常熟县的一只重要堂口，去协助一位名叫谢吕比尼的方济各会神父。1847年，谢吕比尼神父因另有任务被调走了，这地区的艰巨的传教工作就落在薛孔昭一人身上。同年年底，这本堂区划分为二；希籍神父龙保理负责常熟城和近城的堂口，他和赵方济主教一样同是圣家会会士；薛孔昭神父则担任以张泾为中心的所属堂口。③

---

① 魏道味1851年1月1日在崇明写的信，见《通讯》，第2卷第377页起。

② 同上，第378页起。

③ 见罗以礼：《苏州总铎区十年汇报》(1875年起)序言；《徐档》，卷宗H4。

1849 年 6 月，薛神父在常熟附近险些儿被人杀害。事情是这样的：他去给四散在教外人中间的几户教友人家开四规，他到那里的第一天，一个儒生就煽动了一伙邻居包围了公所，嘴上还喊着杀，杀，杀。神父无法安定他们，只得重新上船。可是那伙人对船老大拳打脚踢，船只也被捣毁了，一路上他们还向神父乱掷石块。神父好不容易躲进了一个教外老妪家里，老妪把门紧紧堵住，最后闹事人才无可奈何地退走，就这样救了神父一命。附近教友闻讯，即打发轿子把神父接去，并护送神父回总堂，使神父脱了险。赵方济主教和敏体尼先生得知后，马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严厉追究肇事责任，迫使地方官接受赔偿一切损失的要求。官府还贴出告示，声明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教，信奉天主教是人民合法的权利；对肇事的儒生降级处分；并由官府出钱修理船只；官府又关押了二十二人，其中四个是村长，首恶分子则杖以大板。①

不久之后，薛孔昭神父又去负责那时被遗弃得最久的南京教区，当时称为"西教区"。夏显德、马义谷和另一位曾在那不勒斯圣家书院读书的中国神父顾安德；此后一连几年和龙保理神父一起从事常熟这一广阔本堂区的传教工作。江苏首府苏州地区是由一位在罗伯济主教和本地神职闹纠纷时曾起重要作用的沈西满神父② 和另一位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老学生张马塞神父共同负责。③

无锡、江阴两个本堂区过去一向由浙江的遣使会神父负

---

① 卜亦奥 1849 年 6 月 14 日信，见《通讯》，第 2 卷第 279 页起。

② 见本卷第 94 页起。

③ 《教务工作报告(1849—1853 年)》(活页)。

责。1850 年，移交给南京宗座代牧管理。①

1851 年，马再新神父被派去支援薛孔昭神父，因为薛神父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应付从苏州关卡一直到安徽省边境的十一所主要岗位的教务。

马再新神父专管长江以北的遥远的堂口，长江以南的，则由薛孔昭照管。此后在 1853 年，葛必达和桑理爵两神父接管了无锡及其附近地区。②

开始几年里，教区因缺少传教士，神父无法常驻在较远的地区，那里负责的神父每年只能巡视各堂口一至两次，巡视一圈约需十个月，教友们就是这样完满四规神工的。

传教神父在完成巡视之后就返回徐家汇，那边的教友就由地方上的办事人、传教先生和贞女们照管。在教区常年通讯和神父们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地区最为突出和艰巨的传教情况。

当遣使会把无锡地区移交给江南教士时，那里有教友三千名，分属三个会口。无锡西门外的三里桥有农民和小商小贩的教友约一百五十名，另外还有两千多名渔民教友。每逢一定季节，他们就在这里集合，举行宗教活动。这些渔民生活在五百五十多只网船上，终年在无锡四周的湖泊河道内，以捕鱼为生。为便于管理这些渔民，神父便把他们分成七个"支会"，各支会选一宗徒之名命名，并从渔民中推选一人为办事人。五个支会的渔民是在无锡就近捕鱼的，每月轮到一次到三里桥望弥撒；其余两个支会的会员因作业地段较远，集会次数就比

① 见本卷第 153 页。
② 薛孔昭神父自传，见《徐档》，卷宗 Hs。

较少了。每逢四大瞻礼① 则全体集合，五百五十多条渔船环绕在小堂周围，充塞了三里桥四周所有的河浜。除了原有的神父外，另外还请了四位神父前来帮忙听渔民们繁重的神工。三里桥每次集会，不仅是过宗教生活，同时在各支会之间，由办事人以和解方式办理一些世俗事务。这是继承了旧耶稣会在北京时，由法国神父们为渔民教友创办组织的一种优良的传统。

离三里桥几里之外，有一个小山丘②，山上有康熙年代建立的一处教友公墓，那是渔民教友墓葬之地，是赵方济主教在 1850 年根据清朝朝廷发还教产的谕旨，重新收复回来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神父们在信中都一致称道这些渔民教友的虔诚纯朴的高尚品德。他们一家生活在渔船上，跟城里腐朽的生活毫无接触。他们不懂什么情面，当他们的船只路过或是停泊在教外人的船只之间时，还能听到他们高声朗诵经文，那真令人心旷神怡。③

从无锡到扬子江边这一地区，有七、八百名丹阳教友聚居在四所小堂周围；另有三百名左右住在城内或近郊，靠近东门有一座小小的但也还象样的公所，那就是神父的住所。

船沿运河航行一天就到了镇江，这是一所历史悠久、但已

---

① 四大瞻礼：耶稣圣诞、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和圣母升天，这四个是天主教最大的瞻礼节日。——译者

② 即惠泉山。——译者

③ 对渔民工作的介绍，见《传年》，第 47 卷第 438 页起；卜亦奥 1850 年 6 月 6 日信中介绍了渔民的生活，见《通讯》，第 2 卷第 341 页起；伏伯禄 1854 年 10 月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46 页起；《中国教区年刊（1851—1852 年）》（《法信》2650）。

破落的堂口。到1850年，只剩下三十七名教友零零落落地散居在一个小公所周围，他们跟外界很少接触。镇江确是一座繁荣的府城，由于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叉口，所以商业很兴盛。

从镇江溯长江而上到了南京。这是一座大城市，是总督驻在地。当时清皇朝的余威尚存，1846年，薛孔昭神父初次到任时，计有教友三百九十五人，古老的教堂一直屹立着，因为教外人有迷信的恐惧心理，他们不敢触犯教堂。当南京官府听到了法国公使剌萼尼所求得的上谕后，才决定拆毁这座教堂，这样就无从提到教产的归还不归还了。教外工人谁也不敢承揽这项拆卸工程，深恐遭受天谴。最后，一个可耻的叛教徒承担并完成了拆堂工作，不久他死得很惨。

过去的旧耶稣会的神父住院已改为公仓，附属于西边相距不远的"丰北仓"。教友们就近保存了一间小屋，当神父来开四规时就作为公所。①

另有一个集合场所，是在"北极阁"小山脚下姓周的教友家里。这是一所华丽而又宽敞的住宅，这户人家很富裕，主人是负责运送部分漕粮和丝绸上北京的。

这姓周的曾从欧洲办来一副小圣堂的全套用具。他对路过的传教士既热情又慷慨。南京还有姓陆、姓李、姓贺的三户相当富裕的教友人家，他们拥有商船多艘并开设丝绸工场。这几户教友，尽管难得见到神父，但一贯虔诚热心。贺家有个贞女，人们称为贺大娘的，教友们都知道，她在刻苦、热心、

① 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409页起；《神学院》1887年，第154页起。

仁爱以及精通教理方面都很突出。她在她的侄儿协助之下，从1800年至1850年这五十年之间，能很精明而又有魄力地管理着南京这些堂口。

她这个侄儿原想当神父，由于当时江南教区还没有修道院，所以未能实现他的心愿。

罗伯济主教每次去山东必然要到南京去看一下；南京从1846年起，先有方济各会神父吕伯多住过一段时期，① 1847年至1848年有龙保理神父，1849年至1851年则是薛孔昭神父，1851年至1853年是马再新神父接替了薛神父。

1852年间，马再新神父在南京时曾获得一个极大的安慰，这是天主对他热心传教的报酬。

当时，在安庆有一个年老的官员文雅各，四川人，教友家庭出身，他是个翰林学士，在安徽历任要职，皖省举行考试时，他多次出任学台。他因忙于公务，无暇顾及神业，于是生活与教外人同化了。当他在凤阳任知府时，一些知道他历史的五河教友，曾请一位中国神父前去拜访他，他也没有出来接见。1851年下半年，马再新神父在五河时，教友们把这位老翰林的情况告诉了马神父；这时文雅各正住在安庆，马神父就给他写了一封诚挚的信，恳切地劝他关心自己的灵魂，每天至少念几遍“亚物玛利亚”。② 一位热心的传教先生准备去传递这

---

① 吕伯多神父，方济各会会士，先由罗伯济主教派他到山东，后又由山东调来江南，罗主教于1846年派他到南京，吕伯多神父满以为刺萼尼公使已获得清朝弛禁天主教的上谕，就一无忌讳地白天来到周家。据说，他又一路散发圣牌。就在当天，地方官府通知周家，翌日要来查抄；吕神父当夜被领出城外。（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410页起，又见《神学院》1887年，第155页。）

② “亚物玛利亚”：“亚物”出自拉丁语，用以请安致敬，已为世界通用，近译作“万福”。“亚物玛利亚”是圣母经的第一句，玛利亚是圣母的名字。——译者

封信，他决心冒着一切艰险把这封信带给文雅各；传教先生出发后，马神父和教友们加倍祈祷，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位老人家读了信后深为感动，他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仍答允等马再新神父下次到南京时，一定前去拜访。

1852年上半年，文雅各和马再新神父终于会面了。文雅各被彻底争取过来了，他做了三天的避静神工，办过告解，领了两次圣体。他为了表示悔改的决心，在众教友面前向那位给他送信的传教先生叩头致谢。他在众妾中选定一个为正妻，并叫她受训领洗入教；其余各妾，则拨给相当的生活费，在自己宅外各自分居。

这位老翰林归正后，他不只想到自己改正回头后的幸福；回到安庆后，还亲自向家人进行传道，不久宅内增添了新教友二十余人；不少病危垂死者，也从他那儿领了洗礼。往后几年内，他常到无锡拜访神父，1855年，葛必达神父于一次他来访后写道："他中上的身材，雪白的胡子，面容温良超脱，语言清楚，谈吐简洁，为人谦恭诚挚，再加上他的端庄和虔诚的宗教修养，算得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完人，也是我踏进中华天朝十一年来唯一所见到的一位。"①

这位翰林学士的归正，对这个尚未开教的安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位道德学问处处受人尊敬的人的感召之下，安徽的前途无量。可是不幸，随着太平天国叛乱战争的爆发，文雅各一家破产了，不得不合家逃到无锡附近避难，以后我们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贫穷凄凉的人，但他对天主始终很虔

① 葛必达1855年5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06页起。

诚。①

薛孔昭和马再新在一度料理了长江南岸的堂口之后，便沿着运河北上。他们首先到达扬州府，那是旧传教区中最著名的一座堂口，现今只有一百三十九名教友，都是些工人和农民。他们平时集合在一家较为富裕的姓史的教友家里过宗教生活。神父们发动了几个热心的女教友为垂死的婴孩付洗，去教外育婴堂或去托养弃孩的奶妈家，把成千个婴孩送入天国。②

在淮安，神父们只找到仅存的一百八十九名教友。淮安原是老一辈传教士创建的一座辉煌的堂口，现在只剩下一个可怜的遗迹了。神父们在那里传布了一番福音之后，离了运河线，有的走旱路，有的穿过洪泽湖取道淮河，到达了五河县。这是教区最远的一座堂口，也是当时安徽省内唯一的教友集中点。在五河县城四周，神父们找到三百六十七名教友，他们散居在一些茅草屋里，生活都很贫苦，然而神父们来到时，他们还是热情地招待，把神父迎入到一些筑在土墩上的泥墙茅屋内。这里是一片低洼地，这些茅屋是为了避免经常发生水灾而盖起来的。1847 年，龙保理神父曾来探访过这些苦难的居民；1849 年至 1851 年间，薛孔昭神父来过五河；以后两年，马再新神父来过。生活在这些穷困的居民中是非常艰苦的，但当教士们看到，一些由于多年没有接触教会而日渐放弃宗教信仰的人现在已回头归正，以及不少教外人信奉了天主教时，

① 一个老官员史。见薛孔昭：《耶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71 页起。葛必达神父信，见《中国教区年刊(1851—1852 年)》，第20 页起(《法信》2660)。

② 同上，第 34 页(《法信》2660)。

传教士们就把一切艰苦置之度外，而反以苦为乐了。①

1852 年，由于大雨连绵，五河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庄稼都被水淹没了；饥荒十分严重，随之而起的是盗贼猖獗、瘟疫蔓延、灾民大批死亡。马再新神父眼看教友们处此水深火热之中，心中不胜哀痛。他申请允许他于 1852 年至 1853 年的大部分时间留守该地，上级允准了。赵方济主教愿亲自参予这一次救灾工作，巡视该地教友，他们中绝大多数还从未见到过主教呢，因为这里已有六十多年没有主教来巡视了。1852 年 12 月初，赵主教到淮安与马再新神父会晤。10 日，两人骑着毛骡同行，15 日到达五河。一路上他们在极简陋而又极肮脏的小客栈里过夜，倍觉艰辛。主教为马神父的甘愿过苦行生活以及他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节省下来使之能多救济一些五河灾民的美德所感动。②

赵主教在布道和抚慰了一番教友之后，返回了上海，留下马神父在自己的羊群之中。马神父在一座主要的堂口里，收养了八、九十个被遗弃的婴孩，这个新创的事业和其他日常的济困扶危和抢救病人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捐款。马神父派了一个可靠而又机警的传教先生，来上海呼吁救济；可是在归途中，离五河仅几公里时，传教先生突然遇到一伙盗匪，他被洗劫一空，但总算保全了性命。几个月之内，由于无法

---

① 马再新 1852 年 7 月 13 日致赵方济主教信，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70 页；赵方济 1853 年 6 月 3 日致翁毅阁神父信，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88 页；又《中国教区年刊(1851—1852 年)》，第 19 页(《法信》2660)。

② 赵方济主教有关这次巡视的报道，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80 页起。

得到新的救济，马神父和教友同样都受到饥饿的威胁。结果，斑疹伤寒蔓延了开来；马神父在劳累和饥饿交迫之下，也感染了这不治之症。只因路途遥远，又不安全，无法邀请其他神父前来。马神父带病举行了最后一次弥撒，领了临终圣体，在场的教友无不痛哭哀泣；此后，他就卧床不起，一连十天不省人事，只安然等死。1853 年 4 月 22 日，他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向守在他床头的教友说："你看到圣母吗？""神父，我没有看见，你看到了吗？""是呀，她在这里。"说着说着，他又昏迷了，两小时后，他便咽气死了。

尽管教友们贫穷之极，但还是凑集了约合一百四十法郎的款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了。他们用这笔捐款买了一具上等棺材，把神父的遗体入殓。棺材停放在小圣堂内，等待另有神父来时，给这位仁爱的牺牲者举行教会的安葬仪式。当时，由于太平军的叛乱，传教活动一时无法进行，过了整整两年，葛必达神父终于来到五河。我们看了他的一封信后才知道了上述的事情。当教友们引他到马神父的棺柩前时，他感慨万状。当时，一阵奇香从棺柩中散发出来，在场的教友都嗅到这股香味，而教外人谁也没有闻到。教友们还向葛必达神父保证说，只要马神父的棺柩在，教友自会保持虔诚。很多教友为马神父戴重孝一年，象对待自己的亡父一样。①

今天，安徽北部算是教区中教外人归化的最令人快慰的地区了。这是由于第一个常住在那儿的传教士的艰苦奋斗、

① 葛必达 1855 年 5 月 24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196 页起。薛孔昭在教友中间又收集到一些补充情况，其中如棺材散发的奇香，只有一些虔诚热心的教友才能闻到。见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个家庭》，第 86 页起。

以身殉职的功德打动了天主慈心的缘故，我们怎么能怀疑这一点呢？

七、成绩概要

为了总结赵主教任职期间最初几年的传教工作，我想把保存下来的1847年至1853年的教务统计数字① 检查对照一下，是很有趣的。

1847年，教友人数为六万零九百人，到1853年，是七万四千人，六年内增加了一万三千人。增加的人中主要不是成年人的领洗。在饥荒年代(1849年至1850年)增加得比较多一些，但也不超过六百人。除了相当多的叛教者归正外，主要还是由于教友家庭繁衍的生育率。每年四规神工、四规圣体和平时的告解、领圣体数字的增加是传教士在教务整顿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的最好的证明。在1847年至1848年间，有资格领圣体的教友只占三分之一；1848年至1849年间为百分之五十；1852年至1853年间为百分之五十七。除去那些尚未初领圣体的儿童之外，当时江南教区的教友经过十年整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跟欧洲相比，可列入虔诚热心的一行了。1847年至1848年，热心领圣体的数字为一万人次，1852年至1853年达到五万五千人次。每年有不少非法无效的婚配被纠正，或补行合法手续，这也说明教友们对具体教规的认识已有所提高。1853年，一位传教士在他的汇报里为他的教友作保，认为他们对教规的认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他们

① 见《徐档》，卷宗 E17；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426页起。

已能毫不费力地听懂特兰托公会议所作的决议条文了。①

美好的育婴事业每年都取得可喜的进展。1847 年至 1848 年，给教外垂死婴孩付洗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人，1852 年至 1853 年为五千零十五人，由教友家庭或孤儿院收养的儿童有二千一百五十九人。

这是开头几年的教务工作概况；确切地说，当时是处在教务整顿阶段，传教士的工作是平凡的，也没有取得惊人的成绩。但从这些成绩里，我们可以想象出，传教士们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上海的智勇双全的法国领事看到这些工作情况，深表惊叹。1850 年年底，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因感谢法领事在上海的饥荒岁月里曾竭力照顾了教区事业，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敏体尼先生也写了回信，我转录在下面，作为他对江南耶稣会会士的一封最好的表扬信。从这封信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领事以一个军人的豪爽性格，坦率地对我们传教事业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总会长先生阁下：

接到阁下 1850 年 8 月 20 日的来信，使我不胜荣幸。阁下亲切的关怀，使我由衷感谢，种种颂誉，使我愧不敢当。总会长先生，您的来信使我万分满意，因藉此得知尊座对我的好感，并证明徐家汇的各位尊敬和称职的教士们了解并认识到我火热的心愿，以及在这可怕的国土上，为了他们的进步、健康和未来的安全我所作出的努力（可惜，这是太微薄了）。

① 见本卷第 183 页。

总会长先生，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老军人，尽管我是个好教友，但对教会的事情我还是个门外汉；突然我被安置在一个美妙而又神圣的为福音作战的环境里，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新天地；但由于我心地正直，并确愿为了正义和你们的传教事业出一份力，因此，我做事并不束手束脚，正如尊座来信所示的，我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可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的天职就该对任何人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我得声明，这是我的意志，也是我的特征；我深信，总会长先生，中国天主教的前途主要将落在贵修会耶稣会会士身上，而且就是目前，其他一些修会也是在耶稣会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愿天主保佑我，我不会贬低任何修会的功绩；我没有这种思想，我对一切修会，都是衷心爱戴和尊敬的；但在这尘世上，也只能是各自管各自。一切任性的不公正的叫嚷，在历史事实无可争辩的逻辑而前，都必须销声匿迹。在中国，从康熙年代起，除了极小部分，整个天主教的传教史和事实都属于你们可敬的修会。

尽管前辈尊敬的神父们在文化、人权、宗教方面对中国作出了辉煌的成绩，但并不削弱贬低今天这些热诚的追随者们所作出的非常有益而又重要的贡献。

总会长先生，贵会的这些好神父在宗教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无须我来表扬。他们的济困扶危、赈灾救难、照顾病人、收养孤儿、教育孩子等等……他们这些日常的难以计数的工作都是在为中国人民服务呀！

有一件工作，我们各修会还没有做到，可这是一件重

要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由于家庭和子女的密切关系，这件工作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认真地、大规模地办学校的问题。培植一批人才，以他们的教养和智慧作为民族的精锐和领袖，替代至今只满足于向一些愚昧群众作的宣传。耶稣教的传教士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深有认识，他们在上海及其附近，早已创办了这样的学校。总会长先生，我承认，我有一个法国人的利己主义思想，然而我还是看到，这样的事业不但能赢得中国人，而且也能赢得西欧人士的同情和重视。然而，在中国的法国教区中，这件大事至今还关心得不够，我感到非常可惜。

徐家汇的尊敬的神父先生们，早已懂得办学校的重要性，而且在他们会院所在地也已创办了一所可喜的学校；如果欧洲肯关心并助以一臂之力的话，那么中国的天主教事业必将会有广阔的前途。

教会的种种创新和在这里举办的一切传教事业，一般地对我来说，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总会长先生，我竭力设法向中国当局提出一切有利于传教事业的要求，借以抵御他们恶意的破坏。

按我肤浅的见解，对贵会在中国的事业，奠定完全可靠的基础似还缺少一项工作，即就地发掘新生力量，而不是依赖欧洲。因为依赖欧洲往往是靠不住的，既费周折而又不稳定；要象遣使会和其他一些修会那样，培植中国的耶稣会会士，而且看来这也不会引起中国当局的怀疑的。如果他们愿意，必要时创造条件，促使他们继承地产和其他产权。在浙江有些教区已采取了这种方式，使教区前途

有了保障。我们这里的好神父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最近发现，这次饥荒中散发了大量义赈之后，修会经济枯竭了。不幸的是，进行传教工作正象作战一样也需要金钱。这个糟糕的金钱，确还是现世一切事业的中枢神经呀！

总会长先生，请恕我这个行伍出身的小鬼胆敢闯进贵修会的如此重要的事务中来。我的愿望是向阁下说明我的信心，恕我冒昧，请阁下把这封信只留着为您自己；因为我以往对任何方面都应该不偏不倚，而且今后还得如此。尽管我钦佩徐家汇的这些尊敬的朋友们的切实面又积极的功绩，但也不能忽视其他修会的传教士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同样都是我的好朋友。

从1848年起，我已取得我政府的批准，对一切传教士的信件的收发，可以通过我的公文手续来传递。总会长先生，请您今后把我看作是您的邮递员，我冒昧地要求贵会的各省的会长神父，如果有信件交给外交部，请用一定规格的公文袋，而且尽量交于徐家汇耶稣会会长一人，避免信件量的过于繁重；其他教区也均照此办理。

此致

最崇高的敬意

您的恭顺的仆人

敏体尼①

1851年1月28日于上海

---

① 见《中总》，第2卷第6章第17页。

第 三 章

从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到徐类思主教任期结束（1852年至1856年）

一、红头(小刀会)占领上海之前（1852年至1853年9月7日）

太平军叛乱初期　占领南京城和城内教友的遭遇　董家渡大堂的祝圣　“哈尔米士”号在南京　李秀芳和马义谷徒然走访南京

自从1850年2月25日[1]道光皇帝死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南部，叛乱分子已纷纷起来，他们既反对满清皇朝又打击洋人并侵犯他们的财产。就在这一年，人们注意到，在广州附近出现了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首领，把一伙蹂躏帝国南部的盗匪组织成一支庞大的军队。

洪秀全，1813年生于广州附近的农村家庭，读过多年书，但没有考中秀才。1833年，耶稣教的宣传小册子落到了他的手里，使他模模糊糊地接触到了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后来他自己终于创立了一种由宗教的神秘和政治上的野心相结合的宗教：他自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受命在中国传道，同时要驱逐入侵中国的满清皇朝。1847年，他在广州居住了好几个月，求道于美国南方浸礼会牧师罗孝全门下，准备

当一名基督教的巡回传道者。②

此后，他周游广西乡间，宣传自己新创的宗教以及对满洲皇朝的仇恨。自从明朝覆灭之后，在中国蔓延着许多秘密组织，目的在于颠覆满清，企图重振汉族帝业，洪秀全就从这些成员中吸收了大批信徒。③

有一些在1849年和1850年间曾被英国巡逻队扫荡击毁而溃散的海盗的船队，竟也编进了他的队伍，不久后还发展成了一支相当惊人的力量。清朝官员的腐朽统治实在不得人心。1850年10月，洪秀全从宣传宗教转为实际行动。1851年1月，他攻占了永安州，就在那里宣布建国，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并分封四名将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韦昌辉分别为东王、西王、南王和北王。1852年4月，因部下意见分歧，太平军放弃了永安州突围北上，一路上吸收了一些心怀不平的百姓，尽情地进行掠夺，逐渐壮大了实力。太平军虽在广西未攻下桂林，又在湖南进攻长沙受挫，但他们仍蔓延在整个湖南。1852年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了在长江边上的岳州，获得了大批军需、武器和一支完整的舰队，使他们能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从此，他们所向无敌。他们连克汉阳、武昌和汉口三大城池，当时汉口是清朝人口最密集的重镇（1852年12月23日至1853年1月12日）。1853年2月18日，他们已到了九江，24日抵达安庆，3月4日克芜湖，3

① 见本卷第183页。

② 见后面引证的罗孝全的信，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75页起。

③ 关于这些秘密集团，见我们在本卷中经常引证的直隶东南教区徐听波的《在中国的会道门集团》；又格罗：《在中国的秘密帮派集团》。

月8日他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了。①

3月19日，南京城墙被打开了一道缺口，就在当天，通向长江的下关郊区的城门也失守了。盘据在南京明朝旧皇城的两万个满洲人，被全部歼灭。

当时的南京城，宏伟华丽，新主人就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首都，有人认为洪秀全住的地方就是明故宫。②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颁发了许多公告，重申他们的双重目标：建立汉族皇朝，把中国还给中国人；输入一种新的宗教。第一个目标，由于在一路上攻克了许多城市，大肆残杀了满洲官员及其同僚而已告成功。但第二个目标还很渺茫。这些南京新来的主子们所臆造的新宗教究竟是什么宗教？人们无可否认地看出，他们对崇拜偶像是最仇恨的。太平军所到之处，宝塔被毁了，和尚被杀了，寺庙被烧掉了。举世闻名的南京钟楼也不能幸免。耸立在这雄伟壮观的古迹下的宝塔，跟钟楼一起付之一炬，四散的断砖碎石被派作修补城墙之用。③

在太平天国的公告里，有不少方面可以明显地找到许多耶稣教教义的痕迹；在他们散发的书本里，可找到创世纪和福音书里完整的章节，一眼可看出是从香港、广州的耶稣教牧师们的译文中撮录来的。叛乱头目们散发的无数《十款天条》就是出自我们的天主十诫；其中第六诫禁吸鸦片烟，甚至连吸用

---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布尔热：《中国史》节本，第3卷第334页和高田：《远东》（见《通史》，第11卷第20章第719页起）。

② 可疑的是，洪秀全是否坐镇过南京？他是否在太平军进城之前已经消失？事实是，一切事务都由四王用他的名义办理的，江南教区的神父们从没有找到过一个当地人曾在南京和他接触过。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457页起。

③ 见方殿华：《南京今昔》，第233页起。

烟草也竟和禁止邪淫同例。无疑头目中不少人，曾直接或间接当过耶稣教牧师们的信徒。可能其中还有人正式信奉过。此外，在有些最离奇、往往又是最不道德、最危险的幻想里，也夹杂着这些耶稣教教义的痕迹。①

如果要解释太平军在理论和实际行动上的矛盾百出，必须先回忆一些事实。

南京城被占领后，教友们所盼来的，只是骚动和暴乱等一连串灾难。从 1853 年 3 月 20 日开始，一个老人连同他的大儿子在家里被杀了，次子受了重伤，第三个儿子成了俘虏被带走了，最小的一个总算死里逃生；同一天，另有四名教友惨遭杀害。翌日，即 3 月 21 日，美好富裕的周家被赶出了刚刚整修一新的住宅，匪徒们霸占了这所宅邸，住进去的却是他们的一个头目；男女教友都被关到邻近的一间屋子里，在那里，男子们被拉到叛军营里服劳役，抛下他们的妻子、儿女，任凭胜利者们支配；在他们看来，这比死更惨。这些教友经过迅速考虑后决定拈阄。他们先求圣母启示，后把分写着"生"和"死"的纸卷投入瓮里。两次抽出来的都是"生"字，这些可怜的遭难人就决定继续活下去。不久，男青年被强迫入伍，妇女和女青年们则遭到了粗暴的侮辱。

当时人人担心的，是生怕妇女们被掳去东王府。姓周的家长们虽是些不大热心的教友，但对官衙里的种种黑暗勾当

---

① 在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10 页的前言里，扼要综合江南传教士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的书信，他们的书本和公告早就被教士们弄到手。在这本书里可看到郎怀仁的非常有趣的信（1853 年 8 月 5、28 日），尤其是葛必达在 1853 年 1 月 6 日，在他去南京后所写的信（第 285、293、299、362 页起）。

是很熟悉的，所以决定用一把火来结束那无穷无尽的焦急和痛苦。他们就把当时居住的简陋的房屋付之一炬，合家上下三十九人，其中有三个贞女、二十一个孩童和一个外来的佣人，一起葬身火窟。几个月之后，葛必达神父在详叙这件惨事时写道："但愿天主大发慈悲，怜悯这个遭难的家庭。这三十多个死难者，误以为死得光荣，并引以自慰，他们是甘心等候着天主的意旨的，一连三天，他们不断地念着'助善终经'，准备安心地死去。"①

其他为数约有一百四十名或一百五十名教友，则集结在老耶稣会会院旧址上的一座小小的公所内，② 他们念着经，等候着侵扰者的来临。近邻有一家教外的官家府第，和周家一样也放火把住宅烧了，全家都被烧死。幸而火势没有蔓延到公所。同日，3 月 21 日，来了几个太平军，禁止人们跪着做祈祷，并且命令人们念他们的求天父的经，他们还带来了经文的样本。教友们拒绝了；他们给教友们三天期限，如果到期不服从，就要把他们全部处死。

3 月 25 日是决定生死的一天，这天正是圣瞻礼六（耶稣受难节）。教友们照例举行朝拜十字苦像礼。一队太平军叫喊着、恫吓着直冲进小经堂，他们毁坏了苦像、推倒了祭台，同时把带来的祈祷书交给教友们，强迫教友们念他们祈祷书上的经文。一个传教先生自动地给队长递上一本教理书《十诫

① 我把收集在翁毅阁神父《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里的赵方济 1855 年 6 月 8 日和葛必达 1854 年 5 月 25 日的两封信总撮在一起（第 274、409 页），他俩都详细询问过当时逃亡在外而幸免于难的周家人。高龙鞶在南京也曾收集到从死里逃生的一些教友的详细报告。见《神学院》，1887 年，第 156 页。

② 见本卷第 254 页。

真诠»，请他查看。队长把书很快浏览了一下，说："你们的教不错，非我们的可比，可是天王曾下命令，目前只有服从，否则死路一条。"兵士们在再三催迫之下仍不见效，于是就逮捕男教友，把他们的双手反绑；当女教友和孩子们鼓励被捕者不要屈服时，他们也同样被捆绑了。男教友们被押到太平军的衙门前听候发落；妇女和孩子们接着也被押到衙门。等了好久，一个小官员出来宣告，说既然教友们拒绝服从天王的命令，就得全部处死，并将他们带到西门外去执行。队伍开始上路，一个善良的老头因跟不上，就在衙门口被一刀砍了头，其余，约一百四十人到了指定地点。太平军再次提出警告，但教友们依旧不服从，而且回答说："我们是教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教友们竟没有被处死。晚上，他们被押回城里，关闭在一所谷仓里。

3 月 27 日复活节，一个新的情况又来考验囚徒们的信仰了。有几个衙役说："应该把这些抗旨的人全部杀掉。"另一个说："不能杀，杀了他们，他们就可以上天，这正符合他们的心愿了，而我们确成了罪人。"教友们非常坚定，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蔑视这些士兵，向他们高喊："把我们全部杀掉好了，我们就可成为殉教的致命者直升天堂。"显然士兵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正式的命令，他们把妇女和孩子同别的俘虏分开，把他们关到教友公所里；男教友们仍被缚着，押在谷仓里。3 月 28 日，二十来个青年让步了。他们先研究了向天父祷告的经文，认为没有什么违背天主教教理的地方，他们就同意念这篇经文，并声明自己还是忠于原来的宗教的，于是他们就立即获得了释放。其余的人由于怀疑经文的正统性，仍断然拒绝，结果惨遭了一阵毒打。不久有人通知，他们全部编进军队去服劳

役。当时，太平军队伍正沿长江顺流而下，开往镇江。他们中间有十来个人，于4月14日夜，趁着天色漆黑一片逃跑了，逃到了上海，把上面的情况告诉了主教。①

几天之后，其他逃出来的教友传来了扬州的消息。扬州和南京一样，也有人强迫教友念他们的"向天父诵"；有两个传教先生陈说天主教的道理，因发生争执而受到了处罚，一个挨了三百大板，一个挨了五百大板。赵方济主教总结了他的第一次报告说："总之，我们估计在南京、扬州、镇江城里约六百名教友中间，有五十名被杀害或烧死，许多人被捆绑或鞭打，大多数人倾家荡产作了俘虏，他们的灵魂肉体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②

太平天国在湖南、江西和江苏西部获胜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上海。而那些消息往往被歪曲得出奇，失去了本来面目。中国官员和富商们个个惊慌失措。最可怕的是从外省流窜到上海的成千上万的盗匪和海盗，他们麇集在城外法租界的那片荒地上。人们知道，这批家伙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③

局势虽然严重，但还不致于把圣方济各主教大堂的落成

---

① 赵方济的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76、299页起。

② 同上，第280页。赵主教的这封信由梅德尔神父编辑，有一部分曾在《世界》杂志上刊登过。这封信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棠先生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示不满，认为这定会使同情叛乱分子的英国人不愉快（致布尔布隆的信，《法使馆》，1853年）。

③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3页。还可对照1853年3月17日翁神父给德柏拉舰长的一份备忘录。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222页起；德柏拉舰长给"莫测"号舰长德罗克莫雷尔的报告，同上，第225页。英租界官员和军官们的报告，同样是很悲观的（《英国议会文件》，1667号[1852—1853年]，有关中国内战的报道）。

开堂典礼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这座大堂的落成，是付出相当可贵的代价与牺牲的。开堂典礼决定在3月20日举行，那天正是圣枝主日。大礼如期举行，而且举行得既隆重又庄严。德柏拉舰长的"贾西义"号巡洋舰恰巧在月初到达上海，随着涨潮，军舰尽量开进到黄浦江吃水深的地段。军舰上的大炮对坏蛋们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祝圣礼节历时较长，为了确保群众的安全，舰长德柏拉派了两艘全副武装的小艇，停泊在大堂前，当时大堂的更衣所就靠黄浦滩。水兵们作好了准备，一旦需要立即登陆。敏体尼、领事馆秘书哥士耆伯爵、"贾西义"号舰上的许多军官以及在上海的不少外侨，都参加了这次祝圣大堂的典礼。为了谨慎起见，领事和他的随从们都随身带着手枪。出乎意料的是典礼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万多人聚集一堂，黄浦江里大量的教友船只都扯起了彩旗或白底蓝十字旗帜；圣堂举行降福礼时，法国军舰鸣放了礼炮。①

这座主教座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座天主堂，很快成了周围居民的最有效的保障。

当时，中国官方的确对太平天国的袭击显得无能为力，上海的危险也越来越大。4月7日，敏体尼先生认为应该通知教区会长翁毅阁神父，邀请他和住在徐家汇会院的全体会士，住到自己的院子里来避难，一旦强盗们来突击，他们也可得到有效的救援，因为徐家汇离上海太远了。杰出的法国领事写道："为你们虔诚的神圣事业，如我能亲自保卫您和您尊敬的同伴，那原是我莫大的荣幸。在这紧要时刻，请您不要怀疑我

① 德柏拉舰长3月20日给他母亲的信，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287页起。

的忠诚和我私人的友谊。因为保卫你们的集体安全是我对所有我国侨民应尽的义务。总之，对一切我有责任保护的人们，我认为必须把他们团结在法国国旗的周围，集中在我们唯一的靠山'贾西义'号军舰保护之下。"①

会长神父回了信，对领事的亲切关怀深表感谢。但是所有神父们的工作岗位都分散在各自的堂口里。徐家汇的神父们应当作出榜样，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该以身作则。②

德柏拉舰长也曾邀请过徐家汇的神父们到"贾西义"号舰上避难；会长神父也作了类似的答复。③ 舰长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我不能不赞同这些意见，教友们需要他们的神父，教外人也需要他们的榜样。"

可是，南京和镇江接连被攻克的消息震惊了上海的官员，他们恳请舰长把泊在吴淞口的军舰驶进长江，溯江而上，迫使叛乱者们就范。香港总督文翰爵士当时正在上海，他同阿礼国和军舰的舰长们在英国领事馆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要保护租界；反对官兵、同样也反对叛军，但在两者之间，却要严守中立。④

当时，通商口岸的耶稣教牧师们对叛乱部队的宗教宣传和政治企图充满了种种离奇的幻想。这些牧师们被太平天国的书本和公告里引用的圣经译本的片断章节所迷惑，认为其

①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268 页起。
② 同上，第 270 页起。
③ 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234 页。
④ 德柏拉舰长 1853 年 3 月 20 日信，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225 页。

中含有基督教教义的痕迹，于是就深信中国皈依福音的时刻就在眼前，因此他们就竭力制造影响，使英国和美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即使不是公开的支持，至少也要保持善意的中立。上海的英美商人对太平军很同情，因为他们预见到战争中大有买卖可做，他们的动机比起牧师们来就更欠光彩了。①

看来江南的神父们对此曾观望了好几个星期。据传说，在叛军里有许多来自苗族的教友，有一部分在明朝已归化了，对这些苗族，满清皇朝始终没有完全征服过。②

然而，天主教的教士们从叛军攻克的城里逃出来的教友处得到消息之后，终于恍然醒悟了，很快就确信：太平军只是些强盗，根本不能建树什么，他们的基督主义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而耶稣教的牧师们就不同，他们没有确切的情报；他们所有的认识，只是来自叛军部队里的书本；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太平天国充满着幻想，并把这些幻想传给了英美的领事和军官们，给上海城带来了灾难。③

在各自不同的看法之下，结果大家却一致同意组织一支自卫队，其人员则从洋商机关里的职员中抽调，并在租界周围

---

① 郎怀仁 1853 年 3 月 20 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283 页。《英国议会文件》，1667 号（1852—1853 年）中，有饶有兴味的章节；那里可以找到不少耶稣教牧师们关于太平天国教义的报告。

② 郎怀仁 1853 年 8 月 5 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283 页。

③ 同上，第 23 页起；德柏拉舰长在传教士们的报告的启发下写的一些观点明确的信，直截了当地谴责英、美同事们对叛乱分子的同情，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234、254、257 页；"哈尔米士"号军舰的舰长费世班则相反，尽管他承认天主教传教士们获得的情报比他们的牧师们获得的更为准确，但他仍听信耶稣教牧师们的话，表示很同情太平军，见费世班：《中国印象》，第 107、280、335、370 页。

筑些防御工事。此外，停泊在上海的军舰也分别负起保卫欧洲企业的责任。英国"哈尔米士"号军舰泊在领事馆前；美国军舰"萨斯奎哈纳"号泊在洋泾浜出口处；"贾西义"号军舰则泊在董家渡。①

有了这些初步布置，上海城似乎平静了些。文翰爵士为了要探明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和政策计划，认为需要乘"哈尔米士"号亲自赴南京。② 他在 4 月 22 日启程，于 24 日到达新丰。留守在那里的南京总督正竭力集结军队和战船，想收复他的省城。清兵的一支舰队就紧跟在英国军舰之后，因此在穿过镇江和到达南京时，英国军舰遭到了叛军的炮击。然而一位军官和翻译官密迪乐被准许上岸后，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对他们的宗教教义询问了很久，感到很满意，即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太平天国的王爷们邀请文翰先生去会谈，由于请柬上的措辞傲慢，文翰拒绝了。"哈尔米士"号军舰溯江直上，到了安庆，见到那里有一小队满清的沙船防守着，军舰转舵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上军官们和翻译官把所能搜集到的情报都收集了。5 月初，"哈尔米士"号军舰又回到了上海。

德柏拉接到上级训令，必须离开上海几个星期，他拒绝了领事们的再三挽留，领事们为在如此动荡的情况下，自己的侨

---

①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 54 页；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245 页。

② "哈尔米士"号军舰舰长费世班对这次活动作了有趣的汇报，见《中国印象》，第 128 页起；费世班对这次活动的叙述（而不是评论）大体上与江南教区神父们的叙述相符。舰长是徐家汇的常客，人家把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他，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471 页；文翰先生的报告摘录见《英国议会文件》，1667 号（1852—1853 年）。

民被遗弃而深感不安。①

6月9日，"贾西义"号军舰起锚驶往香港，乘船同去的有翁毅阁会长神父，他是去罗马商讨教区事务的，关于这事，我们在下面将谈到；同行的还有敏体尼先生，他是去休假的；爱棠先生便临时主持领事馆工作。②

8月，赵方济主教和临时替代翁毅阁会长的郎怀仁神父决定派遣两位神父去南京收拾堂口的残局。根据南京逃亡出来的人说，贞女们起初被太平军关在公所里，后来被认为是无用的人而被赶走了；城里只剩下几个老人。③

李秀芳和马义谷两位神父，被指定去完成这个冒险的计划。他们既要援助这些遭难的人们，同时又要获得比"哈尔米士"号搜集到的更加完整和确切的有关太平天国对宗教持何种态度的情况。敏体尼不在，爱棠先生主持法领事馆事务，他递交给他俩各人一份盖有领事馆公章、由晁德莅神父及其助手们译成的中文证件。这份7月22日签发的"特殊照会"，呼吁"正义和人道主义"，这"在文明的民族中，是永远不会丧失其权利的"。照会还提到由于刺萼尼先生的请求而得到开放教禁的上谕，因此敦请"一切掌握了政权和军权的当局，本着正义和人道，都不得给履行这神圣职责者设置障碍"。这正是传教士要尽的职责。这是有关"拯救面临死亡的成百名教友的大事，

---

① 敏体尼1853年5月12日致赵主教信，信上说："照我看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尤其在中国，只应该有一个领导，否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见《徐档》，卷宗B8。

② 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273页起；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81页。

③ 赵方济6月8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79页；郎怀仁1853年8月5日信，同上，第283页。

他们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损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因为他们朝拜的也即是我们朝拜的天主”。①

此外，两位神父这次的使命并不是由什么官方派遣的，所以他们在船上不悬挂三色旗比较恰当。②

两位神父到达无锡后，原打算竭力设法从那里坐船到镇江，然后到南京。但是他们无法进入长江，终于在8月28日，又回到了徐家汇。③

丹徒是大运河流入长江的重要出口，满清海军严禁任何船只开往南京。虽经神父们一再恳求，并出示了法国领事馆的证明文件，这张证件曾使神父们一路通行无阻，但是这一次，神父们却无法使禁令让步了；清地方官还派了两名士兵登上神父船，监送他们回无锡。士兵不仅不侮辱神父，相反，非常尊重他们，甚至给神父们送来了返回上海的路费。④

南京总督写信给上海道台，道台再把信转给爱棠先生。信中提到，对于传教士违犯了皇帝谕旨，擅自潜入内地逾越五十华里，表示遗憾。代理领事合乎分寸地作了答复，指出官方如何曲解上谕，着重指出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曲解未免可笑又可恶。这件意外事至少有有利的一点，即总督已公开承认，法国领事是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人。⑤

---

①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89页，原稿在《徐档》，卷宗B8。

② 爱棠1853年7月23日致赵主教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7页。

③ 李秀芳1853年8月15、18日信，郎怀仁1853年8月28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8页起。

④ 郎怀仁1853年8月28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8页起。

⑤ 同上。

二、红头攻克和占领上海城
(1853年9月7日至1855年2月)

叛乱开始　神父们的忧虑；爱棠的殷勤　欧美人士决定中立　清兵围攻上海　董家渡主教大堂的险遇　"贾西义"号军舰在上海　董家渡医院　救援城内被围教友　"贾西义"号军舰的南京之行　董家渡和徐家汇神父们为"贾西义"号士兵们服务　被围时期的租界　"泥城之战"　辣厄尔海军上将到达上海　1855年1月6日的突击失败　叛军撤离县城

不多几天后，上海发生了一件骇人的事情。从1853年8月20日开始，张家楼修道院院长南格禄神父就向省会长神父诉说，由于一股广东帮和福建帮开始在地方上抢劫而感到忧虑重重，而官员们也已无力制止这股抢劫风。①

很快人们便知道，这帮家伙是属于名叫"三合会"的秘密组织。他们公开的口号是改朝换代；但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抢劫和分赃。老百姓一般称之为"小刀会"或"红头"，因他们都戴有一条红色的缠头巾作为标志。②

上海道台曾要求欧洲人的战舰来协助，共同对付他们，但领事们由于已经作出了坚持中立的决定，因而拒绝了他的要求。③

---

① 南格禄1853年8月2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2页。

②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54页起；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58页。

③ 见上面所引南格禄的信。

9月7日清晨，梅德尔神父坐着轿子进城，拟到施家小堂去做弥撒。当他走到东门时，正遇到一群人从城内逃出来，这些人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神父，快逃！"梅德尔看见一群头上缠着红布、手持军刀和标枪的人，正在后面追逐他们。城门敞开着，梅神父下了轿，进入城内，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于是就步行到了施家。在施家，他获悉了夜里发生的事情：当天凌晨三时，守城兵与造反者串通，未经交锋就夺下了各个城门。天明之前，官吏们的衙门被包围并遭到了抢掠，知县官被杀。①

道台是广东人，毫无疑问，他同暴徒中的一些人是有关系的，因此保全了生命，但他被迫离开衙门，逃到朋友家去躲避。在朋友家，他派人通知了几个同他有往来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开始拟向他们的领事要求，调派泊在黄浦江军舰上的水兵去恢复秩序。后来经过再三考虑，怕后果不妙，于是就决定选派两个勇士潜进城去，营救那个不幸的道台。事情也就这样算完了。这个道台吓得直打哆嗦，② 他乔装成一个店员，挟了一顶破伞，伴他同行的是化了装的、他手下的一个官员，他俩跟在救命恩人后面走。走到城墙边，美国人示意他用一根绳子拦腰缚住后，把他从城墙上吊下去。惊慌的吴健彰死也不肯这么做；后来一个美国人给他做了示范动作后，他才同意让人缚住缒下了城。接着，美国人又把他领到了美国领事

① 梅德尔1853年9月14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11页起。

② "哈尔米士"号舰长费世班给这个可怜的道台作了一个令人发笑的描述，说他在救命恩人前，"摇尾献媚，好象一只小狗"，他向他们许了种种美好的愿。当然，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兑现。见费世班：《中国印象》，第294页。

馆。①

梅神父在施家做了弥撒，并听了不少神工；他写道："我相信，教友中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行忏悔了。"后来，在这些恐怖的年代里，梅德尔仍保持沉着、镇静，他串街走巷，探听消息，探访各户教友，抚慰和安定人心。他所到之处都是畅行无阻，人们对他也很尊敬。第二天，他又来执行同样的仁爱工作。"我碰到好些叛乱分子，在路上，尤其在西门岗哨处，我同他们交谈。到处人们都知道徐家汇和董家渡这两个名词，待我象朋友和弟兄一样"。②

此外，胜利者的首领们宣布，他们要确保地方治安，严禁一切抢劫和强暴行为。好几个盗贼在作案时当场被捕，被立即就地正法。商店的门又开了，城里的买卖也开始活跃起来。③

但是，领事们远远不及传教士们那样安定，他们正担心租界会遭受袭击。尤其爱棠先生更是忧心如焚；自从"贾西义"号在6月开走以后，黄浦江里一艘法国军舰也没有了，如果租界遭到侵袭，那怎么办呢？他把自己的困境先通知了英国同僚；这位同僚非常热心，就派了"哈尔米士"号军舰上的一支小分队，由一位军官带领，开进法租界。他们驻在雷米先生宅里，当时，除了传教士外，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法侨。两个哨兵手持步枪守卫着大门，禁止一切武装的中国人通过往租界的

① 梅德尔1853年9月14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13页。

② 同上。

③ 梅德尔1853年9月14日信；另外在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54页起，对叛乱分子进城后的初期情况，有许多详细的记载。

那顶桥；英国巡逻队和美国的巡逻队按时来同这个哨所保持联系。①

"贾西义"号虽然因紧急命令而开走了，但爱棠先生仍和敏体尼先生一样，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给徐家汇、董家渡和张家楼的神父们，邀请他们到租界来避难。他要"大家集中到一个安全的，又可以随时得到照顾的地点。目下一切可敬可爱人的利益，都已委托给我保护，由我负责"。雷米先生也请神父们住进他的宅内，把他的家作为避难所。②

郎怀仁会长同翁毅阁神父一样，认为不应该领受这份深情厚意，于是他婉言辞谢了。"我深自庆幸充当一个志愿的流放者，流放在离开祖国如此遥远的地域。一方面，我在那些代表祖国的人中间，又重新领受到了祖国对自己儿子的一切慈爱，以及如此积极主动和明智的关怀；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同乡人中，我们逢到了雷米先生，不论现在和过去，他不仅是一位朋友，而且还是一位弟兄"。他请爱棠先生代向费世班舰长和阿礼国先生表达自己深切的谢意。"领事先生，我承认，英法两国在这个远东地区犹如在欧洲那样紧密团结，真使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此外，会长神父认为"不至于发生任何会迫使我们逃难的紧急情况，逃到由于您的慷慨和贤明的远见所准备的避难所来。传教士们现今都在各自的岗位——本堂区内，并将坚持留守在那里。作为善牧的使徒和传道者，也应该处处为保护自己的羊群着想，在这紧急危险的时候，牧羊人必须亲自在场。他们仅以圣言善语传道还不够，更重要的

---

① 爱棠先生1853年9月11日致郎怀仁神父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06页。

② 爱棠先生1853年9月11日致郎怀仁神父信，原件存《徐档》，卷宗B8。

是，牧羊人要能施行圣事，使教友们获得教会圣库委托给他们的种种帮助，使之振作起来。如有必要，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①

"贾西义"号军舰一得知红头占领上海的消息后，立刻驶回了上海，10月3日停泊于黄浦江。② 从此，一连好几个月，德柏拉舰长给予传教士们最明智和最热诚的支持。不久，传教士们就感到十分需要这种支持了。

当清朝官兵在上海出现，开始负责收复县城时，教区的建筑和事业才真正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当叛乱分子做县城的主人时，无可否认，他们一直维持着社会的良好秩序。他们曾截获正要运往北京的二十万两银子，这笔财富足够他们在数星期内整编军队和维持生活。松江府以及上海附近的一些大市镇同叛乱分子通谋合作，也招募到两万人左右。他们公开声明他们是占领南京和镇江的太平天国的同盟军，并宣布将向苏州、无锡进军，同北方的胜利部队汇合，最终推翻满清皇朝。③

由于叛乱分子一心想拉拢欧洲人，因此他们也保护天主教的事业。他们向领事们作了保证，并表示要坚守诺言。他们派来了一个岗哨，由教区的一个老工人当头头，守卫着董家渡主教大堂。9月7日，徐家汇附近的法华镇里的农民残酷地屠杀了叛乱分子派来的人；20日，叛乱分子对这个暴行进行了报复，他们烧毁乡镇，杀害了大批居民；徐家汇却安然无

---

① 郎怀仁1853年9月13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11页。

② 梅德尔1853年10月4日信，同上，第322页。

③ 梅德尔1853年9月14日和10月4日信，同上，第316、318页。

恙，由于叛乱分子许下的诺言，神父们的安全有了保障。①

可惜得很，9月底挫折开始了。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公开拒绝同上海的举事人合作，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条。此外，镇江和南京的胜利者，并不南下苏州、上海，他们却转头北上，直奔天津、北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江苏南部没有受到太平军的侵扰。②

江苏巡抚和省级的大官在苏州附近集结了一支陆军和两个船队，他们逐渐收复了曾一度被红头占领的上海附近的城镇，并进行了血腥的屠杀。③

9月29日，停泊在黄浦江里的五十艘武装沙船开始向城里炮轰，可是效果不大。炮弹在董家渡大堂顶上飞过，有几颗误落堂顶，人们在墙内和庭院内找到了四颗。炮轰一开始，梅德尔神父便叫人把主教大堂的大门打开，邻近众居民都急急忙忙地奔了进来。④

10月1日，炮轰又开始了。在一片嘈杂混乱中，人们看见一只装着两尊小炮、上坐十五至二十来人的小船，离开了船队，向神父住院驶来。徐类思主教走向窗口，拟向进犯者

---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60页；又梅德尔1853年9月14日和10月4日信。

② 梅德尔神父1853年10月4日信；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59页。

③ 官兵收复嘉定时，当地的传教士丁恭思神父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叙述说："逃跑的人被抓住后立即被官兵们杀掉；很多人被俘虏，被俘的被拖到仓卒掘成的大坑边上，官兵们再把他们砍杀掉。有几个仅仅被砍伤，他们竭力从坑里爬出来，爬到掘墓人脚下，苦求饶赦；但官兵们毫不怜悯，又把他们推下泥坑活埋了。"1854年12月25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47页。

④ 梅德尔1853年10月4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19页。

谈判，一阵雨点般的子弹直向他打来，子弹正打在窗户的两侧。

当时，有十五名左右的马尼拉人组成的卫队防守着神父们的住院，他们是得到吴淞口鸦片船上的船长们的许可而来保卫神父们的。[①] 这些老实人经常同海盗作战，他们自己多少也是海盗，可是他们宗教信仰十足，对向他们宣传福音的神父是非常忠诚的；这一天，他们成了神父和躲藏在院内的居民们的救星。梅德尔神父布置马尼拉人站在面对黄浦江的花园大门的两侧，并叫人把花园大门也打开；只要清朝兵船再开火或船上部队登陆，他们就开枪射击。但马尼拉人并未动用一颗弹药，因为侵犯者一看到军刀和刺刀，就溜之大吉了。很可能当时清兵是想来夺取住院和大堂作为据点的。[②]

"贾西义"号军舰于10月3日开到，它停泊在法租界和董家渡之间，在这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按照领事们和战舰上的指挥官们的决议，[③] 舰长德柏拉决定，在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但要求清兵和叛乱分子同样都要尊重有三色旗飘扬的建筑物。一位下级军官和三名海军被派来董家渡，奉命在危急时，把神父住院屋顶上的旗帜降下半旗。[④]

---

① 见本卷第213页。

② 梅德尔1853年10月4日信。

③ 见本卷第271页。

④ 德柏拉舰长的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13页起。三色旗飘扬在徐家汇、董家渡和张家楼。有些中国人看到这莫明其妙的颜色感到不安，便去问领事要求解释，爱棠先生那时成了即景诗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当场作了寓意诠释，回答说："法国人之所以选择蓝色和红色；因蓝色代表宗教，象征法国是蓝天的女儿；红色象征自由，自由是要人们用大量的鲜血去争取得来；二色之间的白色，象征纯洁和道德，没有纯洁和道德，自由就变成混乱，宗教也将产生狂热和异端。"领事认为，"中国人是寓言的爱好者"，因此收到很好的效果（致布尔布隆的信，《法使馆》，1853年）。

10月7日那天，“贾西义”号军舰上的水兵们在离主教座堂不远，扑灭了一场火灾，看来是叛乱分子放的火；23日，水兵们击退了一支想越过北门外的洋泾浜桥的红头。①

27日，主教大堂被从从未有过的最大危险中抢救了出来。清兵扎营在董家渡和县城之间，照赵方济主教所说的，这是怎样的一个军营呢，“与其称是一个军营，不如说是一个集市”。② 为了声援这几千个官兵作战，武装的沙船集结在主教大堂后面，把大堂作为屏障，大堂厚厚的砖墙足能抵御县城城墙上射击来的子弹。叛乱军在住院的另一边布置了一个炮兵阵地，他们甚至企图占领主教大堂，作为坚固的堡垒。“贾西义”号的水兵，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发出了求援信号。海军上尉克莱克驾了一艘作战小艇立即赶来，议定交战双方必须从各自的阵地撤走，不得在主教大堂的周围交战；如有哪一方不遵守这个命令，“贾西义”号的大炮将给以惩罚。梅德尔神父充当翻译，他们乘了小战艇驶向一艘欧洲制造的双桅船，这船是由一个美国水手指挥，还配上几个马尼拉人；满清船队的指挥官们就驻在这艘双桅船上，他们小心翼翼地躲藏在底舱深处。梅德尔神父翻译了法国军官的指令后，便指示他们应当向黄浦江上游退去；他们立即执行，其他战船跟着官方的双桅船一起退走了。

接下来，就要叛乱分子也同样撤退。海军上尉克莱克、梅德尔神父和四个护送人员到达城下，开始同红头首领们谈判，

---

① 德柏拉舰长的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13页。

② 赵方济1853年10月29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26页。

向他们表示，清兵已从董家渡撤走，以后也不会再来，他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免遭军舰的炮轰。红头首领们一口答允保证尊重这个协议；他们立即拖走了布置在主教大堂前炮队阵地上的大炮。①

上海城自十七个月以来一直处于被包围之中，没想到董家渡竟能这么快解了围而免除了一切灾难，这完全是由于双方都尊重这座天主堂的缘故。对交战双方，谁敢无视或破坏协议的，随时将受到应得的惩罚。事情也正是这样，10月6日，清兵的炮弹在离"贾西义"号军舰很近的地方飞过，舰上一位军官就警告清方统领，如下次有炮弹再来，即将受到大炮轰击；中国军官提出了抗议，法国军官回答说："随你们的便，现在我事先告诉你们，正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你们的炮弹对我们不起什么作用，而我们的，却能当场把你们击沉。"这次警告是一次最有力的教训。②

在这些忧闷深重的日子里，梅德尔神父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既身为主教秘书兼财务，又要对住在神父住院里的、以及逃到主教大堂来避难的大批人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在10月27日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虽然红头和清兵的炮弹交织地在圣堂顶上和在住院上空飞来飞去，但他却仍非常镇静，来来往往地忙个不停，他既要维持大堂里难民的秩序，又要阻止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企图强行打开天主堂及其建筑物的大门。在这危急时刻，赵方济主教带领修道院的修士跪在圣

① 德柏拉舰长引克莱克海军上尉的报告，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16页起；又谭维翰：《亚历克西·克莱克传》，第333页。

② 德柏拉舰长的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27页。

体前祈祷。[1] 主教建议要为保护大堂搞一个永久的纪念性东西。在他的要求下，艾方济神父的母亲、伯爵夫人埃斯泰夫就在法国请人绘制了一幅精美的巨型油画，至今还高悬在大堂右侧的第一座祭台旁。这幅像上画的是赵主教，围着许多中国人，他们长跪在童贞圣母前哀祷，圣母向他们揭露圣心，微笑着表示俯允所求。[2]

在围攻初期，赵主教授权梅德尔神父创办一所医院，专收双方无人照顾的伤兵。在圣堂附近有一所小屋，平时是作关卡收税用的，税吏早已逃跑，屋子空着，梅神父就去要了来。1853 年 10 月中旬，医院开诊了。此后，这座屋子后面另一所无人照管的小屋也被占用了。诚恳的耶稣会修士石怀德，原是在徐家汇管病房的，奉命到这所医院领导仁爱工作。德柏拉舰长答允派“贾西义”号军舰上的两位医师法利埃和于巴克，定期到这所医院来治疗伤病员，作出可贵的帮助。10 月底之前，已有四十名伤兵到那里去治疗。1854 年，梅德尔神父深自庆幸能给八百七十名成年人付了洗，毫无疑问，其中绝大多数是伤兵，这是天主教的仁爱感化了他们。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写的都是些动人的故事，记载着临终者的回头。其中有的原是天主教教友，如马尼拉人、法国人、爱尔兰人，他们是中

---

① 梅德尔 1854 年 7 月 10 日信中撮要地叙述了几个月来的情况，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447 页。

② 禄理格：«董家渡大事记»（董堂档案）。当时的书信中还记载着几次大火，有的是红头放的火，有的是官兵放的火，主教大堂却都幸免。信中还记载着“贾西义”号和 11 月到达的“高尔拜”号军舰上的海军们的忠诚服务，给法国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梅德尔 1853 年 11 月 29 日、1854 年 2 月 16 日信，«通讯»，第 3 卷第 54、58 页。梅德尔在这第二封信里写道：“保护董家渡大堂使整整这一地区都未曾遭到作战双方的抢劫和火焚，那里密集着至少有一万五千名居民。”

国官方出重金招募到武装沙船上的，现在他们受了致命的重伤，终于圣善地结束了他们动荡不安的一生。伤员中有的是教外官员或匪帮首领，他们感到自己已濒临死亡，于是要求领洗入教，想减轻痛苦。

赵方济主教和梅德尔神父曾向叛乱分子的首领们建议，在城里也创办一座董家渡那样的医院；但遭到了拒绝，可是对天主教的仁爱工作，他们却予以极大的鼓励。①

传教士肩负的另一项慈善事业，是要保护被围在城里处于种种欺压窘困中的教友们。1853 年 11 月初，传教士们已获悉有几家教友遭到沉重苛税的打击，以陆家为例，他们被迫必须交出一万块银元。于是，梅德尔神父请求爱棠先生帮忙。我们这位一贯豪爽的领事，答允干预此事。他先同德柏拉舰长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他撰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声称："城里的居民如因教友身分而受迫害，那么，我们都将视为这是对法国的敌对行为。"红头首领们接到照会后就来道歉；梅德尔神父利用这一事件使好多户教友搬出了城，出城就等于得救；有几户教外人也利用梅神父的保护，逃出了城，以后，他们同天主教的感情就加深了。②

因此，实际上在正式条约签订之前，法国对本地教友的保教权已经存在了。12 月底，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更严重的事件。赵主教的两名跟主教先生从洋泾浜来董家渡，正当他们经过一座炮位时，被叛乱分子拦住了；其中一个，在明确了身

---

① 郎怀仁 1853 年 10 月 31 日、12 月 28 日信和南格禄 1854 年 5 月 1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53、55、64 页起。

② 赵方济 1853 年 10 月 29 日信、梅德尔 1853 年 11 月 19 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328、330、334 页。

分后即被释放；另一个是山东人，被认为是一个化装的官吏前来刺探军情的，被作为囚犯关押了起来。爱棠先生一知道这事，就写了一份强烈抗议的照会，梅德尔神父亲自把照会送去，用梯子爬进城墙，同叛乱分子的首领交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那可怜的已打得遍体鳞伤的跟主教先生，立即被释放了。

接着是赔礼问题。爱棠先生要求把下令扣押两位跟主教先生的炮兵阵地的小头头引渡到领事馆来，他过去怎样杖责跟主教先生的，现在也要他在领事馆的旗杆下接受同样的处分，如遭拒绝，那么二十四小时后，"贾西义"号和"高尔拜"号两艘军舰即将炮轰县城。红头只得照办。那个获罪的小头头被带到领事馆，领事赦免了他棒打的惩罚；但他必须跪在爱棠先生和公馆人员以及一小队法国海员面前赔礼道歉。①

上海所有的欧美人士都不赞成用这种强硬方式对待中国人。德柏拉先生写道："假如我们对中国人表示害怕，假如我们对待他们象美国全权公使马沙利先生所要求的象对待已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文明国家一样，那么不要多久，我们的威信必将彻底丧尽。在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应当选择的是：或为主人、或当奴隶；要么使人敬畏尊重你，要么被人轻视瞧不起。这是我两年来在这个国家生活所得出的经验，我是在征询了称职的、和平的教士们和英国领事之后决定走上这条道路的。"②

1853 年 11 月底，"贾西义"号又有了给教区作出新的重

---

① 德柏拉舰长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361 页。
② 德柏拉舰长 1853 年 11 月 11 日日记，同上，第 325 页。

大贡献的机会。法国驻中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要亲自了解叛乱分子在扬子江流域的情况，他和自己的夫人、公使馆的秘书顾随以及翻译官马吉士来到了上海。他们决定乘"贾西义"号上南京，如英国公使文翰在八个月前一样，竭力设法同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取得联系。布尔布隆先生向郎怀仁会长要求派两位传教士同去，以便商谈有关教会方面的问题。南格禄和葛必达两位神父因为熟悉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就被选定同行。①

"贾西义"号军舰于11月30日从上海启程，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官方和叛乱分子的船队，于12月6日早晨到了南京。7日，使馆秘书顾随由军舰上的两位军官和翻译官马吉士陪同，去商讨法国公使希望同太平天国首领们会谈的具体细节。葛必达神父也参加了。正当他们在城外等待开城门时，有一名教友想尽方法，终于窜到了神父身边，向他报告了留在南京城内的教友们的消息：那些女教友一直留在公所里，对于宗教上的事，人们再也没有去麻烦她们；生活上、衣食方面的必需品她们还不缺少；男教友差不多全都逃跑了，只有十二人没有跑掉。神父就托他转告教友们，在眼前情况下，应该怎样应变对待。

城门终于开了。他们这一行人在经过四里多长的一片废墟时，一路上神父们都感慨万状，因为这里原是利玛窦和毕方济两位传教士建立的老会口。两位穿着官服、由一批侍从

---

① 关于这次重要的南京之行，我们还保存有三个记述：一是葛必达神父的（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39页起）；一是德柏拉舰长的（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38页起）；还有是顾随侯爵的（《回忆录》，第2卷第328页起）。我把三者融合为一，叙述不同之处，分别予以指明。

围着的官员接待了顾随先生，其中的一位一开头就先宣述了太平天国的主要教义，说是跟欧洲人信奉的宗教完全一致，他最后说："欧洲人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是朋友，而且还是弟兄。"布尔布隆公使要求进行会谈，后来会谈被定在12月10日举行。

8日和9日，"贾西义"号军舰上的军官们被允许登陆打猎而不受阻挠。9日，军舰上来了一个面貌庸俗、衣衫褴褛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围攻南京的清兵司令特派来的使者，他代表清方司令，要求法国提供援助。德柏拉舰长信守从叛乱战争开始以来一贯执行的中立政策，传话回答说："法国人这次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保护或打击任何一方。我们南京之行的目的是在于查明真相。因听说广西人（人们这样称呼叛乱分子，因他们大多数人原籍是广西）对信奉天主教的教友横加侮辱，我们是来查清这事是否属实的。因此官兵们也应该懂得，绝不能迫害教友，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法国迟早会找上门来的。"来人听后表示满意，就此告辞离去。

12月10日清晨，布尔布隆公使就带领随员出发，去与太平军头目会晤。先是三天前曾接待过顾随先生的两位大官出来接待了他，继而他俩又亲自领他去见太平军中的一个主要将领陈将军。①

这次接见比第一次更隆重，但是险些儿成为一场悲剧。原来布尔布隆公使强烈要求同陈将军平起平坐，同等对待。最后那位中国大人屈服了，他从台上下来，平等地同法国公使进

① 可能是陈玉成，虽然那时他尚未封王，但在太平天国里已是一名主要的将领（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434页）。

行会谈。布尔布隆公使只关心要尽其所能地详尽地搜集太平天国所执行的政策，特别是他们对天主教的前途所采取的方针。陈将军则拼命夸耀其主子天王的权力，并意欲订立一个协定来联合法国，使有利于自己的事业。他显然希望布尔布隆公使要求觐见天王。法国公使非常审慎，既不作任何诺言，也不订立任何约束，只递交了一份照会，阐明本国政府的要求，特别提到有关保护天主教的问题。

在会谈期间，陈将军邀请布尔布隆公使在南京过宿，以便从长商谈宗教问题。公使婉言谢绝了，但他推荐葛必达神父以天主教神父的身分替代自己；这位传教士就被邀在太平军里多逗留了几小时，凡是他希望得到的一切消息，人们将尽量全部供给他；神父满心喜悦地接受了，就单独和自己的传教先生留在叛军中间，而布尔布隆公使及其随行人员，则返回了"贾西义"号军舰。

开头几小时，葛必达神父是在另一位官员的衙门里度过的，他过得非常愉快；人们围在他身边，谈话也变得很有教益。不久，神父觉察到人们的态度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已研究了布尔布隆公使留下的照会。在这份照会里，公使引证了过去满清朝廷同法国签订的条约和历朝皇帝优待天主教的诏谕；并把咸丰帝认为是当今的最高统治者。这些引证强烈地激怒了叛乱者的首领们。首领中一位姓王的，派人把葛必达神父召去，厉声地对他说："既然妖头(咸丰帝)在你们心目中是那么可尊敬，你们必是他的朋友，而把我们看作是叛逆者，所以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为了更好地给你们的朋友效劳，到这里来刺探我们的军情，窥测我们的虚实。仅仅这一点，即使不砍掉你的脑袋至少也得把你当作俘虏扣留起

来!”葛必达神父听完这一切之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们这样的态度，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他声明，被指责的一切与他完全无关，如果有什么抗议，也应当向目前还在南京的法国公使提出。传教士到南京来，只是为了了解太平天国的教义，同时也介绍天主教的教义；他的任务仅在于此。听到葛神父如此解释后，首领认为言之有理，怒气也消了，没有使神父受到任何痛苦，就把他送了回去。接着，接见布尔布隆公使的那位陈将军的秘书接待了他；神父对他的聪明正直留有深刻的印象。神父从他那里获得有关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禀性、神召、幻想、计划等宝贵的资料以及有关叛乱分子的宗教教义方面的情况。葛必达神父也给他扼要地讲了天主教教理，并把带在身边的一本《教理简要》小册赠送给他。秘书回赠给神父的是不少太平天国的主要书本；在这些书本中，神父认出了一本《玛窦福音》的中文译本，但来源不明，还有耶稣教教徒们翻译的旧约里的几本书。

葛必达神父和他的传教先生在太平军中过了两天两夜，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同副官们共同进餐，并高声朗诵经文。因为叛乱分子严格遵守男女分行，所以他们不敢要求去探望被关押在公所里的女教友。人们邀请他俩在太平军中常住下来；他们说暂时不能答允，说要请示上级，但告诉他们不久定会再来。

但是，“贾西义”号军舰上的人因不见葛必达神父回来，十分担忧；南格禄神父很着急，试图前去接应。12月11日，南神父去看葛神父，但人们无情地不准他通行。12日晚上，德柏拉舰长给葛必达神父送去一信，① 通知他，如果这天他还不

① 保存在葛必达的来往通信中（«法信»2500）。

回转，那么太平天国的若干首领就要被当作人质而扣留。葛神父收到这封信后，立即通知了自己的新朋友；人们立即陪伴他到了扬子江边，当时，德柏拉舰长差一点要执行他的威胁行动了。

13日，公使接到"北王"答复布尔布隆公使照会的一封信："北王命令法国的洋弟兄趋来王府，有事面谕。"法国公使激怒了，回答说，只有自己的国王才能对他发号施令，他不能接受用这样语气提请的会谈。"贾西义"号决定在翌日开回上海。布尔布隆公使已获得此行的双重目的：既获得了叛乱分子方面的确切情况，又使他们对法国的威力有了高度的认识。14日早晨，"贾西义"号军舰起锚了；18日中午，军舰已停泊在黄浦江上。德柏拉舰长留葛必达神父在军舰上过圣诞节；葛神父见舰长、四位军官以及好几名下级军官和水手们，在他的弥撒中恭领圣体，深感欣慰。①

四天之后，"贾西义"号军舰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启航返回法国，把保护传教区事业的责任交给了"高尔拜"号军舰。几天之后，德柏拉舰长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离开中国，好似一个还没有完成任务，正在对工作开始感到兴趣时被人剥夺了工作的人一样……军舰虽不直接参加传教工作，但也能作出不少有益的事情，给传教士们帮些小忙。"②

舰长是位谦谦君子，"贾西义"号军舰所帮的"小忙"却拯

①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88页。当"贾西义"号军舰回到上海时，激烈的炮声和枪声正交织在一起；圣诞弥撒前不久，一颗流弹正落在"贾西义"号军舰的甲板上。

② 德柏拉舰长1854年1月16日信，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72页。

救了上海的天主教事业，保障了董家渡附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奠定并实行了法国对教友们的保教权。

当这艘军舰停泊在上海期间，教士们努力为自己的保护人服务，好似偿还所欠的债务那样。军官们和水兵们受了伤或生了病，人们就把他们接到徐家汇会院，给他们治疗；很多人在那里得到了比身体健康更可贵的东西：德柏拉舰长在自己的日记中庆幸地记道，当他们逗留在上海时，他手下所有的人几乎全都恢复了宗教生活。“在和有德之人接触之后，他们起了变化，人人认真严肃地要求办神工行忏悔，行动上也有真心回头的表现。今天早晨，一位年轻的神父马理师① 来到这里给我们举行弥撒。他听了我们大部分水手的神工。水手们高兴地说，我们愿意作这位新神父的第一批忏悔者。从远征开始以来，我从未见过他们努力为善的劲头有如此之大。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会，使舰上全体人员方便地尽好教友的职责？”②

海军上尉克莱克奉命从澳门急忙赶回上海，由于旅途仓促，军务又紧迫，因此非常劳累，舰长德柏拉就把他送到徐家汇，命令他在那里休息几天。他利用这段休假期，在会长郎怀仁神父的指导下，做了一次避静。1853 年 10 月 17 日，他再次巩固了他于 1850 年在德拉维尼昂神父指导下举行的一次避静中曾下过的决心：“我应该，我誓愿要终身致力于精修成全。我应该，我誓愿要进会修道。我应该，我誓愿要进耶稣

① 他刚晋升为神父。

② 德柏拉舰长 1853 年 11 月 12 日的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330 页。事实上，舰长曾尽力设法使每个士兵参观了教区的全部事业，他们都从中得益不浅（第 335 页）。

会。1853年10月17日订于徐家汇。亚历克西·克莱克。”在“贾西义”号回法国后，这位军官立即实践了自己的誓愿。①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在庄严宏伟的徐家汇大堂内，有一座奉献给这位后来成为耶稣会会士和殉道致命者的法国水兵的祭台。

“贾西义”号上另一位军官德戈莱雅克也是经常来拜访传教士的，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他进了夏尔特尔隐修院。由于舰长德柏拉同会长翁毅阁神父以及会士们频繁亲密的交谈，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回忆，使他以后又改进了耶稣会。

总之，南京探访之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布尔布隆公使夫人原出生于一家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的家庭。1852年至1853年两年内，在“贾西义”号军舰上的多次旅程中，她为德柏拉舰长和克莱克上尉的模范行动所感动，在这次历时三星期的扬子江上的航行中，② 她同葛必达神父进行了多次交谈，使她终于得到了光明。

回到上海后，公使夫人要求赵方济主教接受她的归正宣誓礼。于是，1854年1月5日，洋泾浜小堂内，在亲密的气氛中举行了归正礼。参加礼仪的有布尔布隆公使、翻译官马吉士、几位神父和四名修道院修士。新归正者要在前受洗礼无效的条件下接受洗礼和坚振，并在主教弥撒中，初次恭领圣体。第二天，葛必达神父写信给德柏拉说：“可惜，舰长阁下和克莱克先生没有光临，公使夫人最先发觉，并表示遗

---

① 见谭维翰：《亚历克西·克莱克传》，第343页。

② 顾随由于很健忘，在他的《回忆录》第828页上，竟肯定说公使夫人没有参加这次南京之行。

憾。"①

当然，有一些头脑简单的好心人认为，公使夫人的归正只是为了讨好欧仁妮皇后，因为凯特·麦克利奥德是皇后的童年好友。顾随伯爵跟布尔布隆夫人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她临死的时刻，他也在场；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曾反对那些所谓讨好的流言蜚语，而且确实证明公使夫人1845年1月5日的归正行为是绝对真诚的。②

"高尔拜"号军舰在上海一直逗留到1854年2月4日。从这天起，到法国舰队司令孀厄尔海军上将乘了"贞德"号军舰来到（1854年8月）上海之前，没有任何法国军舰停泊在上海；而教堂那儿却常常发出警报。"高尔拜"号离上海后不多几天，应招募加入清兵部队的一些盗匪想侵犯神父住院进行抢劫，因为他们的营房正好设在主教大堂附近。起初，院里的工友们打退了第一批闯进来的兵匪，并缴了他们的枪；后来，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派来了一队哨兵，守卫着主教大堂；这个行动立即发生作用，盗匪头子前来道歉，并表示遵守由德柏拉舰长议定的董家渡作为中立地区的规定。③

1854年，由于发生了上述的那些冲突，引起了上海租界地区组织上的重大变化，天主教事业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影响。原来直到那时，只有欧洲人和他们的职员和仆役有权在公共租界和美租界居住。自从红头占领上海和清兵包围县城

---

① 见梅西埃：《"贡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392页起。

② 见顾随：《回忆录》，第2卷第353页；第4卷第248页。关于葛必达神父在布尔布隆夫人归正一事中所起的作用，见薛孔昭：《葛必达神父传》，第21页。

③ 梅德尔1854年2月26日信、南格禄1854年5月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53、64页。

之后，为了免遭双方军队的迫害，成群结队的中国人都逃到租界上来了。因为无论清朝兵或红头，他们同样都是由那些可怕的地痞盗匪组成的。这时，在靠近英国领事馆的苏州河内，充塞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只，连接起来竟长达一英里以上，每条船上住着一户或几户人家。①

开始，人们是出于恻隐之心，容忍这些难民居住下来，继而想到，中国人涌来租界租屋居住，倒是一桩非常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于是为了接纳新来的住户，一批批出租房屋建造了起来。不久，租界里住的绝大多数倒是中国人了。在这些落户到租界里来的人里面，教友很快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于是，这所美好的洋泾浜堂口就形成了。②

上海道台吴健彰原是旗昌洋行的股东，红头占领上海城后，他就躲在那所洋行里，他想继续征收关税。以前，由于上海商业繁荣，曾供给清政府以大量的税收；而他又从来没有象在这次可怕的战争中那样急需银子。但是目前，他根本没有办法再叫人付税，尤其是欧美军舰上的军官们，根本瞧不起他。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领事们共同商量，结果议定由他们来代征代收；他们各指派一名代表：威妥玛代表英国，斯密司代表法国，卡尔代表美国。海关设在外滩一座中国式的院子里。这便是尽人皆知的洋人掌管中国海关的由来。海关的高级职员从此一直由欧美人士担任，给清政府帮了大忙。③

列强们在上海的代表尽管表示在清兵和叛乱分子之间保

---

①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66页起。

② 同上。

③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89页起；又高田：《远东》，见《通史》，第11卷第740页。

持中立，但他们总是希望结束战争，结束由战事造成的种种痛苦。他们一再向叛乱分子提出，只要他们肯放弃县城，保证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叛乱分子拒绝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国官方说的话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中有几个曾去谈判投降的人被残酷地处死了。一天，城里一个带领三千名叛军的首领召请梅德尔神父去，希望能同他谈和平条件；但两次会谈都没有结果。①

当时，至少梅神父还能进城探访仍留在城里的一些教友；安慰鼓励他们，凡愿意离城的，就设法帮助他们出城。陆家小堂被盗窃的东西追回了；并防止了其他小堂的被洗劫。他每次去干这些仁爱工作时，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由于他镇静的态度和人们念及在董家渡医院里他对伤病员的爱护，所以常常拯救了他。几名可钦可佩的女教友仿效梅神父的热诚勇敢，自愿留在城里。她们也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劝化教外工作，给临死者付洗，取得了美满的传教效果。这便是她们热心虔诚的酬报。②

清兵比叛乱分子更为可怕，他们设在城墙四周的营地，很快成了租界的祸根。这些盗匪经常出来抢掠和迫害洋商和他们的雇员。后来，有一次严厉的惩罚教训了他们，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泥城之役"。那是1854年4月4日，他们又出来骚扰抢掠，清兵营官还拒绝赔偿必要的损失，于是，由商团和当时在上海的英美船上的海员和水手等组成的一支三百人的队

① 梅德尔1854年2月13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57页；郎怀仁1854年5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65页。

② 梅德尔1854年7月10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50页。

伍，向驻扎在离租界最近的跑马场的兵营发起了一次突然袭击，据说那个兵营有一万人。

这支小小的进攻部队只携带一门大炮、几发炮弹，就把清兵打得抱头乱窜，水兵和商团们一拥而上，把营地肃清后就放火烧了。清兵在逃跑前打了两炮，伤十五人，打死了一个美国水手。在这次严厉的教训之后，租界就受到了尊重；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的租界面积向西扩展了一倍，延伸到他们为了应付事变所挖的壕沟处，至今那个地方还称作泥城浜。①

英美人看到自己的机关与企业有了安全的保证后，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现在留待结束叛乱分子占领上海以来所造成的灾祸的正是法国，也只有法国一国了。

1854 年 8 月底，印度支那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辣厄尔乘快速护卫舰"贞德"号来到上海，"高尔拜"号不久将前去会合。领"贞德"号军舰进入黄浦江的美国领港员，误把军舰领搁在吴淞口附近的沙滩上。八天之后，军舰才得脱险，但舰身已被损坏，需要修理六个星期。在这修船期间，海军上将到了上海，有充分的时间同领事们、英美的舰长们以及传教士们会谈，了解情况。很快他就觉察到，有许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有的从宗教观点出发，而大多数人是由于利益关系，偏袒着叛乱分子。他们把武器和弹药卖给叛乱分子，有相当多的英国和美国军舰上的水兵开了小差，投进叛乱分子的队伍里去；虽然领事们曾宣布，凡去给叛乱分子服务的，就取消其国籍，但仍

①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 72 页。

然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①

尤其在县城和法国领事馆之间属于法租界范围的这一片空地上，进行着这种很赚钱但又很不道德的买卖。在空地上简陋的棚棚里，进行着武器、弹药、粮食和从上海富商那里掠夺来的赃物交易；也就在那里，红头首领派来的人勾引各外国军舰上的水兵，把他们引进城里。

辣厄尔海军上将根据同英美舰长们达成的协议，负责防守黄浦江中从洋泾浜到董家渡的这一地区。因此，上述那个有问题的地区，② 正在他的防区之内。

他认为要保持法国的荣誉，就非得迫使终止这种卑鄙可耻的交易不可。"贞德"号一修好，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他通知叛乱分子，禁止以后带着武器进入租界，并把同他们一直进行交易的商人和古董商全部驱逐出租界。为了确保法租界的安全，他叫人筑起一道高十二尺的围墙，使租界和县城隔开，并禁止叛乱分子越界通过。

红头少不得要来利用这道围墙；他们靠着这道围墙筑起了一个炮兵阵地，因这道法国围墙恰好掩护了这个阵地。清兵沙船上的炮火就不能向红头的炮兵阵地射击，否则炮弹就有误落到租界上的危险。12 月 8 日，辣厄尔叫人写信给城内红头的首领，说他禁止继续建筑这个炮兵阵地，并要派人拆毁已经开始建筑的工事。翌日，即 12 月 9 日，在四十名法国水兵

---

① 伏伯禄 1854 年 12 月 26 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454 页。英领事阿礼国不久升任驻北京公使，曾留下他于 1857 年 12 月 31 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对当时形势作了极生动的描绘（《英国议会文件》，2571 号〔1859 年〕，第 59 页起）。

② 美国防守苏州河口的沿岸一段，英国防守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一段。

的掩护下，二百名工人去拆毁红头炮兵阵地的工事。当他们在拆毁时，城墙上的红头打来了几发炮弹和密集的排枪，工人们立即逃散了；红头以为已能得胜，于是就冲出城门去追击他们；法国士兵马上用好几排排枪和三发开花炮进行回击，红头立即退回城内，伤亡了好几个人。在这次突击中，一名法国水兵也受到致命的重伤。海军上将立即向红头的首领宣布包围县城。法国海军与叛乱分子进入了交战状态。就在这一天，"高尔拜"号连续两小时炮轰县城。11 日，他们限令红头投降。红头回了一封信，信中进行了大肆漫骂。13 日清晨，一支法国海军偷袭了一个装配有二十五门大炮的红头炮兵阵地，炮筒火眼被钉死了，附近房屋火烧了；此后几天内，法国海军又对红头教训了一次。法国海军向红头提出，只要他们肯撤离县城，就可以把他们送往台湾。红头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落入官兵手里，等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们始终拒绝。

海军上将原可用自己的炮火轰毁这座县城，但毁灭这么多的财富和无辜的生灵于心实在不忍；于是他决定攻占县城。他打算派陆战队夺取各城门交给清兵守卫，以后再把县城交给清兵。①

1 月初，辣厄尔将军向英国巡逻艇指挥官建议，共同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因为大部分的洋行企业都是属于英侨的，涉及到英国侨民的利益要比法国侨民的大得多。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很赞成这个计划。可是，英国驻中国领海的舰队司令

① 伏伯禄 1854 年 12 月 26 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 454 页起；罗礼思 1855 年 1 月 1 日信，同上，第 459 页起；南格禄 1855 年 3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165 页起。

曾命令属下不得给清兵以任何形式的帮助，他甚至宣称有意撤退在上海的英国军舰，不再保护上海租界。因为这种保护，理应由中国政府来承担。一些英商巨头对此愤慨地提出抗议，但也毫无结果。因此，当辣厄尔上将敦促这位舰队司令时，得到的是这样的答复："我接有上级的命令，不准帮助清兵驱逐叛乱分子。但是，麾下的军衔有权支配我，如果您下令，我必服从。"辣厄尔考虑到不宜下这样的命令，因此就决定单独干，① 作战日期定在1月6日那天。

这一天，有二百五十名陆战队士兵在法租界集中，英国领事阿礼国也赶来了。为了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弃权表示抗议，所以他决定和法国人一起上阵。②

早晨五时炮轰开始，七时三十分，便打开了一个缺口，由"贞德"号军舰上的海军上尉马索和马凯尔率领的两支冲锋队冲向前去；不久，就占领了城墙。接着，一支冲锋队冲向右侧，夺取了北门；另一支向左，奔向东门；这两处城门攻下后，准备交给清兵。

在城墙较远的一头，法国水兵在一座寺庙前遇到一些墙壁很厚的屋子，叛乱分子在屋内，从墙洞向外猛烈地扫射；叛乱分子由欧洲和美国的逃兵们指挥着，作着拼死的抵抗；一个军官和好几个水兵阵亡了。第二支冲锋队，按照预定路线进行，终于抵达并占领了北门。第一支冲锋队被坚强的厚墙工事挡住，经过四小时的激战还不能到达东门，子弹又快

① 见蒙塔尔托：《上海史话》，第87页；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85页。

② 同上。

完了。于是，辣厄尔就下令后退，退回租界重新整队。这次战斗中有三个法国军官和十个水兵阵亡，三十人左右受伤。①

清兵接收北门后，并不作战，只想抢掠，红头一反击，他们慌忙逃走，许多人就在逃跑中被打死。②

结果县城没有攻下，这次挫折对辣厄尔将军是个严峻的考验。但这次战役对红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这天起，红头再也不敢在面向法国人的城头上露面了。在八百公尺范围内，他们所有的大炮都被打翻而且失去了作用；许多房屋被烧毁，三百多人被打死。③

叛军首领中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人开小差逃跑了。从那时起，人们预料叛军的末日为期不远了。为了使这一天早日来临，辣厄尔同清兵步调一致，把县城封锁得更加严密；城内鸦片烟和粮食将很快完结，开小差的越来越多。④

梅德尔神父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他希望有朝一日叛乱分子会大批大批地投降；红头中的好几个首领想通过他从中调解，磋商投降条件；投入红头中的欧洲和美国的逃兵，则煽动一些最凶狠的狂热分子坚持到底，他们还杀了不少想投

---

①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63页起，引自《舰队导报》发表的一个报告。这里应该保存这些勇士的名字：海军上尉迪伦、海军中尉迪斯克里和贝蒂，水手长和水手勒让泰尔、多米尼西、热戈、孔索兰、特罗阿利克、比费、埃万、马西、贝夏尔、勒加夫。法租界一些路名就采用这次攻城战中阵亡军官的名字。

② 南格禄1855年3月1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70页起；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87页。

③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63页起，舰队教练员发布的一个报告。

④ 南格禄1855年3月1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70页起。

降的人。①

但每天总有造反者从城墙上滑下来或潜近城门，向法国领事馆投降，在保全他们生命的条件下，法国人把他们交给了清兵，可是诺言往往不能兑现。2月12日那一天，就有三百人从城里逃来洋泾浜和董家渡。有几次他们曾拼命出击清军兵营，但都失败了。②

2月18日，红头因对继续抵抗失去信心，几百个守城的红头决计弃城逃跑；为了通过清兵的封锁线，他们二十人一队或三十人一队，或潜出城门或从城墙上滑出城外。很多在乡村小道上迷了路的就被农民们杀掉，有的被追来的清兵杀掉了。相当多的一批人终于逃到附近各城镇，他们在那里受到较好的接待。③

徐家汇的神父们非常害怕这些逃亡队伍路过时来攻击住院。由于天主的保佑，尽管这是去松江的一条近路，但逃亡者竟奇迹般地没有一队取道徐家汇。④

然而，上海的人们却遇到了比红头更可怕的危险。清兵一得知红头逃亡的消息，急急冲进城里，纵火烧了不少房屋，并肆意抢劫。统带清兵的江苏巡抚曾向辣厄尔上将保证，城破之后决不抢掠。但初进城时，他还不能约束这些无纪律的士兵。只是在2月19日早晨，他下令把正在作案的抢劫犯当场处决，以后秩序才渐渐恢复了。一队法国水兵由梅德尔神父

---

① 梅德尔1855年1月19日至2月19日的日记（董家渡和洋泾浜），见《通讯》，第3卷第153页起。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58页起。

④ 伏伯禄1855年2月24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59页起。

和爱棠先生伴随着巡逻街道，碰到盗匪就用枪托来对付。当天傍晚，洋人又在城里街上出现了，市场也重新营业了。稍后几天，附近乡民拎来了五百多颗叛乱分子的头颅，清兵把它们悬挂在上海城墙上示众；辣厄尔要巡抚下令制止这种令人恶心的展出。①

一连十七个月沉浸在灾难中的上海，从此获得了解脱；这应当归功于而且也只能归功于法国人。1月6日的那次不幸的攻城战斗中，法国兵的勇敢和守纪律受到了英美舰长们的高度赞扬，并使清兵的统领们感到惊讶。②

中国各界人士对洋人在保护他们时表现出的牺牲精神深深表示感谢。他们把耶稣教国家的自私自利和法国的勇敢慷慨作了对比，对天主教也更有好感了。伏伯禄神父在上海县城收复后的几天写道："中国人公开承认，他们能重享太平应归功于法国人……法国的美名真是有口皆碑，再也不能称他们为蛮夷了。他们和英国人，尤其和美国人不同。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袒护红头，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并供给他们一切军需物资，为抵抗法军和中国官兵。谁都知道，有些美国人竟拿起武器同叛乱分子并肩作战。据说，他们中甚至有人自夸，在1月6日那天，曾发弹击毙'贞德'号军舰上的一位军官。舰队司令辣厄尔看到自己的勇敢坚韧收到辉煌成果，感到踌躇满志，自感欢欣。为了祖国的荣誉，单独向敌人作战，他是有理由自庆自慰的。这次攻城战的可喜成果使我们在中

---

① 梅德尔的日记和信，见《通讯》，第5卷第160、165页；伏伯禄1855年3月3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73页起。

② 美国舰长波普、英国舰长卡拉汉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致法海军提督辣厄尔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69页起。

华帝国的传教事业变得更为有利也更有希望。抚台以及其他官员都对法国人的忘我精神表示敬佩，他们作出的牺牲纯粹是为了中国的利益。"①

2月25日，在董家渡主教大堂内举行了谢天主弥撒，舰队司令及其参谋部的成员都参加了。弥撒做完后，紧接着唱了"我侪赞颂天主"的感谢颂。3月15日则为1月6日攻城战中阵亡的士兵举行了追悼礼。费都尔神父在事后不多几天，对这次追悼经过也曾写信作了汇报。② 不久他也牺牲在太平军的长矛之下。

"从八时开始，两艘军舰上的四百多名海军、参谋部成员、二十多位神父、我们的两位主教、大小两修院修士、徐汇公学学生、四五位中国官员以及数不清的群众，把董家渡大堂的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赵方济主教举行了隆重的主教大礼的安息弥撒和追思礼。郎怀仁神父先用法语致悼词，接着又用华语对在场无数的教友群众讲了话。

出堂时，有"两名执烛的人和四名陪在大十字架两旁的士兵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后面跟着徐汇公学的学生、小修院的修生及'贞德'号军舰上的乐队。每具棺柩由八人抬着，陆战队士兵、水兵、大修院修士、传教士、两位主教及两艘军舰上的参谋都陪伴着，中间还夹杂有几位中国文武官员，最后是押队兵。整个队伍排成两行，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圣咏的歌声和高唱着的中国经文声此起彼伏，启应不绝。队伍就这样在坍毁的城厢中，沿着不久前被水兵们攻下的东门炮兵阵地的废墟前

① 伏伯禄1855年3月4日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69页起。

② 费都尔1855年3月26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76页。

进。队伍在城北，离洋泾浜不远，即将树立纪念坊的地方停住了。就在那里，徐类思主教举行了最后一道追思礼。舰上的随军司铎特雷加罗神父向水兵们作了简短的讲话。接着是舰队司令辣厄尔讲话，可是他已泣不成声，不得不中止讲话。'高尔拜'号军舰上的舰长德博代昂也万分激动，甚至不得不把头靠在一具棺材上。最后，所有的人都在坟上洒了圣水"。

1857 年 1 月 6 日，攻城的两周年纪念日，悼念牺牲者的纪念碑落成了。在洋泾浜圣堂内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江西宗座代牧顾主教主礼，郎怀仁神父在许多军政要人前讲道。接着，人们就到距离圣堂不远的纪念碑前列队祝圣了墓碑，并最后一次为埋在那里的亡者念经祈祷。

几年之后，法租界里住满了中国人。于是，人们就把这座纪念碑搬到一个公墓里，它至今还屹立在该公墓中心。①

曾全力支援上海小刀会的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自然要非难辣厄尔司令的这次行动。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证当时他们在上海所说所写的一种样本。"在'三合会'占领上海时，在洋人团体中有一股竭力反对他们的可怕势力；开始时这股势力只是隐蔽的、狡诈的，我指的是耶稣会会士的阴谋诡计……法国领事和在上海的法国舰队司令对神父过度虔诚并被神父收卖了……他们连一点点正义公道都不讲，就去支援清兵，把'三合会'从县城驱逐出去。法国在上海打击小刀会的行动，

---

① 人们必会高兴地念一念这座纪念碑上的拉丁文："纪念 1855 年 1 月 6 日攻打盘据在上海县城的海盗时，为捍卫公义和人道权利、为了祖国的荣誉而牺牲的法国人。同胞战友们谨立"。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533 页起。

该公墓即原黄山路法国公墓，现已改为淮海公园。坟墓与墓碑最初的地点，即现在的上海博物馆南面。——译者

完全取决于这些耶稣会会士，而这次行动，却是政治上的一次错误。"①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巴黎，人们同样也指责辣厄尔将军的行动。指责他在没有英美两国同伙参战的情况下，悍然单独下了1月6日的攻城令，因此失败了。②

在失意中，这位海军司令只有在和江南教区的传教士们，尤其在和梅德尔神父的通信中，获得最好的鼓舞。当这位海军老战士获知，上海人民怎样念念不忘法国人的见义勇为，以及由此而使神父们的传教事业③日趋繁荣时，他感到极大的快活。

当1862年英法两国的海军司令共同负起维护上海及其附近秩序的责任时，辣厄尔将军看到自己先前的决策还是得到了胜利。梅德尔神父曾写信给他说："阁下定已知悉，法国和英国在无数困难之下，终于被迫负起阁下在八年前想要承担的责任，那时候，用较少的代价或许还能收到更多的效果。"④

至于有人指责他只是传教士们的驯服工具，这真是毫无根据的。毫无疑问，江南教区的神父们对太平军的造反性质⑤曾有一段时期捉摸不定，但对上海红头的叛乱，却从未有过什么幻想。他们只是一伙盗匪，此外什么也不是。法国领事敏体尼先生、爱棠先生及德柏拉舰长都询问过翁藹阁会长，

① 见《太平军革命记》。

② 见顾随：《回忆录》，第3卷第18页。

③ 辣厄尔1860年10月8日致梅德尔信，见《徐档》，卷宗 B8；梅德尔1861年2月8日、5月3日致辣厄尔信，见《通讯》，第4卷第17、63页。

④ 梅德尔1862年4月1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13页。

⑤ 见本卷第271页。

翁神父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并声明在他看来，要维持好一座每年同欧美有数以百万计贸易往来的大城市的秩序，是关系到基督教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的大事。①

领事们的一张非常明确的宣言，原足以遏止1853年9月7日的那次叛乱和接踵而来的一切灾祸；此后，基督教列强只要采取一致行动，单凭把县城封锁起来，也可抑制这次叛乱。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代表法国的敏体尼先生、爱棠先生以及德柏拉舰长和传教士们都同样希望有这样的一次行动。可是，有些英美人却另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人更是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和只想金钱的打算，给这宽大的政策设置了障碍，迫使基督教国家的代表在清兵和叛乱分子之间采取了中立。有关这些人们在本卷前一章已经看到了。②

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和在他之前的法国代表们一样，认为这样的中立既有损于荣誉而又很危险；他认为一旦手中掌有足够的实力，良心和理智对他怎样说，他就该怎样做。传教士们竭力赞成他的主张，他的这次行动确实使传教士们的事业受益非浅，而负起全部责任的，却是我们这位海军上将。③

---

① 见德柏拉舰长日记里的注释。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209、222、235页；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23—24页。虽然他在此书的序言里用了含蓄的词句，但他还是明确地摊开了这个思想。

② 见本卷第271页起。在蒙塔尔托：《上海史话》里，还可找到那时对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所作的类似的评价。

③ 遗憾的是，在顾随：《回忆录》里，有些章节显然是受了香港耶稣教牧师们的影响，那时作者正生活在他们中间。他写道："我们卓越的领事爱棠的丰富的想象和耶稣会神父们的热烈劝说，使辣厄尔上将'上当了'。1月6日的失败是个大灾难，但损害不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因为我们的海军在作战时曾表现得很勇敢；受损害的却是我们的威信。"（第2卷第450页起；第3卷第16页。）当时我们驻中国的公使布尔布隆就把这一类的汇报呈报了内阁，海军上将辣厄尔就此被撤职下野（第3卷第18页起）。1855年3月4日，布尔布隆曾明显地谴责爱棠先生，因他曾鼓励辣厄尔悍然出兵（《法倭馆》）。

三、教区内部历史

翁毅阁神父的罗马之行和他在法国的情况　翁毅阁神父的《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　伏伯禄神父巡视教区　江南教区和直隶东南教区同时委托给耶稣会　赵方济主教逝世　徐类思主教的离职

当上海正在结束我上述的重大事变时，江南教区也正在朝着现在的组织形式迈进。为此，1853、1854 和 1855 年三年期间，相继在罗马和巴黎就教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种种磋商。虽然在那几年里传教士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传教事业仍取得了不少成绩。

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于 1853 年 5 月 8 日逝世了。总会决定召开全体大会选举继承人。翁毅阁会长及其咨议神父一致认为，教区必须派一名代表前往，顺便把传教区的情况、遇到的困难和设想的计划当面呈报新任总会长和传信部。①

最重要而又最棘手的问题，还是教区的职权集中问题。尽管赵方济主教为人温良谦虚，所有的神父在信件中流露出对他表示最真诚的爱戴和尊敬；这位宗座代牧和他前任秘书②翁毅阁神父之间的关系也是融洽无间的。但是，两个权力同时并存总是会产生隔阂和磨擦的，是教会事业发展的阻力。尤其赵主教年事已高，体力又日趋衰弱，他曾多次谈到要辞职，

① 1853 年 6 月 2 日教区咨议神父(郎怀仁、年文思、南格禄、梅德尔)的意见，见《中总》，第 3 卷第 1 章第 29 页。

② 赵方济 1853 年 6 月 1 日致传信部信，见《传录》，第 15 卷。

这样徐类思主教自然成为南京教区的法定署理主教了。这使神父们非常寒心，他们认为徐主教是专权、独断、急躁、易怒，人人望之生畏的人。他在管理修道院问题上同南格禄神父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他反对耶稣会创办初学院，那是尽人皆知的事。许多人认为，徐主教一上任，耶稣会势必会被迫离开这个曾遭受过这么多牺牲、取得这么多成绩的江南教区。这对于神父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①

另外还有很多有关教士修会生活的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最后，对接受日本传教区的问题也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这些重大事情都必须和高级领导人当面商讨细谈。

为了这些缘故，翁毅阁神父不愿意把向罗马汇报的重任推给其他任何人。于是，1853 年 6 月 2 日，他动身回欧洲。临行前，他把教区的工作托付给了郎怀仁神父，任命他为代理会长；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代会长必须征询南格禄神父的意见。②

翁会长在法国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到了罗马。此时耶稣会正在开全体大会，大会选出了伯多禄贝克斯神父为总会长。8 月 22 日，翁毅阁把一份经过详细研究的备忘录呈报了新总会长。这份备忘录首先陈述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种种困难，最后又作出了唯一切合教区真正利益的结论，即从耶稣会里选拔一人，任命为宗座代牧。为了防止人们会根据耶稣会

---

① 翁毅阁 1853 年 8 月 22 日致总会长贝克斯信，见《中总》，第 8 卷第 1 章第 31 页。作者肯定地说："这是他动身之前，『徐家汇咨议神父们所持的一致的看法。』"

② 卜亦奥 1853 年 7 月 1 日致巴黎省会长斯蒂代神父的信，见《中总》，第 8 卷第 1 章第 30 页。

会典来提出异议(因会典原规定禁止会士接受教会显职)，那么就可向目前正在举行的全体大会提出申请，根据当前传教区的新形势作出例外的豁免。所以江南教区的耶稣会会长不能象旧耶稣会时代在许多教区那样，只兼任宗座监牧而无主教实权。为了管理本地神职和教区内八万多名教友，应当有一位有衔、有职、有权的主教；此外，一位耶稣会会长设立在一位耶稣会主教身旁，按照会典办事，这也合乎会典精神，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出现。①

1853 年 10 月 6 日，应传信部部长枢机的要求，翁毅阁神父给他上了一大本② 有关耶稣会在南京主教区的教务备忘录。他先扼要地陈述了教区的主要工作，汇报了从建造董家渡主教大堂以来所花费的重大开支，接着他很坦率地叙述了教区目前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他认为必要的补救办法，即委任一位耶稣会会士当宗座代牧，并由这位代牧当赵方济主教的有继承权的助理主教。徐类思主教则似可移驻到他所属修会的、至今还没有主教的一个教区去；或从辽阔的南京教区划出一部分地区，由他同耶稣会以外的神职人员共同负责管理。最后，翁会长也叙述了张家楼修道院的情况，并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他的看法。他担心该修道院按照徐主教的意旨培养出来的年轻神父，很难适应教区内艰苦和危险的工作。

这份备忘录经过详细研究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但罗马圣部认为，最好还是等待总会长派一位专员去江南巡视

---

① 卜亦奥 1853 年 7 月 1 日致巴黎省会长斯蒂代神父的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1 章第 30 页。

② 见«传录»，第 15 卷复本；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35 页，翁神父说："既然人们问到我，我就坦率地讲我的意见……"

观察一番，作出结论和报告之后，再作最后决定。①

于是，总会长决定派一位巡阅使立即去教区进行实地调查，查清教区具体情况和迫切需要，然后再根据他的报告作出最后决定。伏伯禄神父被选中负责这个细致难处理的工作。他原是哲学和神学老教授，曾先后担任三位省会长神父的随员，② 担任过拉瓦尔神学院院长，具有江南最早的三位会长所缺少的丰富的办事经验。教区里的法籍神父，他几乎个个都认识了解；他平易近人，镇静自若，判断正确，这就使他以后同江南主教能经常保持非常友好的联系。③

1854 年 3 月，圣母七苦瞻礼那天，伏伯禄神父奉命担任监会铎（教务巡阅使）同时兼教区会长。④ 他要求在赴任之前，亲自去罗马晋见总会长和传信部部长枢机，并仔细研究从教区来的信件，他的要求被批准了。⑤

总会长在给他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他在管理江南教区的耶稣会神父方面的权限，"因为他们是耶稣会会士"，而不是"作为传教士"来管束，因此他不该干预教区的行政工作。可相反，

---

① 总会长贝克斯 1854 年 6 月 18 日致翁毅阁信，见《传总》，第 3 卷 第 156 页。

② 伏伯禄 1854 年 10 月 15 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2 页；又《徐档》，卷宗E_5。

耶稣会上级身旁常有这种带有顾问性质的随员，拉丁文称"Socius"。——译者

③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 61 页；又《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109 页。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主教 1855 年 12 月 22 日写信给贝克斯总会长，赞扬伏伯禄神父呈报罗马的报告同赵方济主教的报告完全符合一致。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41 页。

④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 61 页。

⑤ 翁毅阁 1853 年 1 月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20 页。

一切涉及会士是否遵守三愿[1]和会规的事，都是他的份内事。会士在传教区里实行神贫愿时所能引起的种种良心问题，他必须予以解决；传教士和欧洲人士及当地人士之间的往来关系，他必须予以控制；他又必须调查会士对待主教和会士之间相互来往的情况。在学习方面，特别是研究中文，他应当更认真地加以推进；徐汇公学和其他学校都需要改善，原有的集体休假惯例应予维持。监会铎的使命首先是抚慰和坚定会士忠于会规，忠于圣愿。[2]

监会铎在1854年6月离了马赛港，和他作伴的有卜理奥和翁毅阁两位神父，8月17日他们抵达了上海；18日，在徐家汇监会铎宣读了总会长委任他职务的公函，[3]翁毅阁会长便成了一名普通传教士，他非常愉快地就去松江一带传教。[4]

翁毅阁神父在法国逗留的时候，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他去各修道院和巴黎省各会院作种种演讲，宣传教区，让人们认识教区，拿破仑三世也曾亲自接见过他。

领事敏体尼先生当时正在法国休假，在他的要求下，翁神父给他提供了有关中国传教区的情况，领事就把它转呈了上级。[5]

最后，翁神父搜集和整编了有关南京教区的资料，由谭维翰神父负责校阅完成后出版，题为《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

---

① 绝意、绝财、绝色，称三愿。绝意即听命（服从上级），绝财即神贫，绝色即贞洁。——译者

② 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2页。第2章专记会士和主教之间的关系，还陈述了过去的困难；这是耶稣会罗马总会长法国的参赞吕比荣神父的手笔。

③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68页。

④ 见薛孔昭：《翁毅阁神父传》，第59页。

⑤ 敏体尼1854年4月22日致耶稣会巴黎省会长信，见《法信》2660。

告»。①

作者在序言里，对太平天国和上海红头叛乱之所以获得成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为英美两国反对法国军政人员的意见，采取中立政策，置身局外而感到惋惜；② 他以无可否认的确凿事实，说明法国在上海的商业贸易微不足道的原因。他认为，法国在中国虽有法国人士的努力和八万名教友的好感，但是，"我们的同胞没有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及时抢先走一步"。③

接着，他用十章的篇幅，根据作者本人的观察和教士们已发表的书信，叙述了教区的主要工作；翁毅阁神父着重写了1849年灾荒时期创办的慈善事业以及有关徐汇公学和其他学校、修道院和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的教育事业。书中最后部分叙述了在江南传教事业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列出了十二年工作和成果的统计表。最后印着传教士们的各种通信。在翁毅阁回中国后，人们在书后又增加了监会铎伏伯禄神父的以及梅德尔神父关于上海小刀会事件的通讯撮要。

这本著作在法国收到了意外的效果。由于太平天国战争这一悲剧性的事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的注意。当时法国的主要报纸和期刊为这本书写了长篇的评论文章，评价很高。④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1856年2月1日发表在《两个世界评论》上的，原刺萼尼使团的一个成员拉沃莱先生写的一篇文

---

① 巴黎、朱利安、拉尼埃，1855年版；梅尔相神父致谭维翰的信，见《法信》2864。

② 见本卷第300页。

③ 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31页起。

④ 我找到的有：《团结》、《舰队导报》、《宪法》、《世界导报》、《国民教育杂志》，见《法信》2500。

章，题目是：《耶稣会会士在中国》。作者生动地描绘了江南新教区的特征，特别重点介绍了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最后他总结说："此后，一些无法抗拒的影响将推动中国走上新的途径；耶稣会会士的灵活和大胆是尽人皆知的，目前正是他们来重操传教事业的有利时机。科学和信仰并进，这便是江南教区取得成绩的关键。"①

但拉沃莱先生却谴责《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的作者，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人作了过分严厉的评价，他说他更喜欢采取北京老传教士们（旧耶稣会会士）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他也反对作者在书中对英美两国的耶稣教牧师的攻击。这两点批评显然是根据江南教区好几位传教士们的意见而作出的；南格禄神父和梅德尔神父曾写信给谭维翰神父，"如果此书准备再版的话，就应该把对中国人的品性和对耶稣教牧师所作的过分严厉的批评删去"。②

这本著作虽有缺点，但对教区却帮了不少的忙。尤其通过这本书，教区才被广大法国群众所认识。翁毅阁神父虽然为能回到教区传教而感到喜悦，但有一件事却使他常常郁郁不乐。徐类思主教从罗马方面得知翁会长在传信部部长枢机处的活动情况，于是妄加猜测，③从此情况就非常紧张。翁毅阁神父一回江南，徐主教就向传信部控告，说他自我吹嘘，说什么"传信部已答允不久就要划分教区附近的上海一部分地

① 见《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第536页。

② 南格禄1856年5月30日信、梅德尔1858年10月24日信，见《法信》2864。

③ 梅德尔1853年11月24日信、南格禄1854年1月29日信，见《法信》2667。

区，这地区将不再受传信部的管辖，而从属于其他法国教会系统”。① 因此，部长枢机要求总会长贝克斯神父对此事进行调查。②

由于徐主教的控告，翁毅阁神父心中非常沉痛，伏伯禄会长神父询问了他；他认为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意图。既然法国传教会同意大利传教会同样都属于传信部，因此这种想法也是毫无意义的。总会长贝克斯给转徐主教控告信的巴尔纳博秘书主教写了一封激昂的回信，抗议徐主教继续不断地控告翁神父，抗议他不信任这些天天冒着生命危险为传教奋勇苦干的人们。江南出现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容忍。③

巴尔纳博主教表示愿去说服徐主教，事情就到此为止了。④ 可是翁毅阁神父的心灵上却留下了一个沉痛的伤痕。梅德尔神父在几个月之后还写道：“由于有人诬告翁毅阁神父，说他要分裂教区，要在这里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国教区，因此他变得意志消沉了。可怜的神父，当他一知道人们对他竟会有这样的看法时，他痛苦得心碎肠断；从此，我一次也没有再见过他面露笑容。”⑤

徐主教控告的不只是翁毅阁神父一人，南格禄神父也被

---

① 徐类思 1854 年 9 月 28 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 15 卷。

② 传信部秘书巴尔纳博 1865 年 1 月 8 日致吕比荣神父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9 页。

③ 有关这次事件的报道，见伏伯禄 1855 年 3 月 1 日、6 月 26 日致总会长神父信，《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25、28 页。1855 年 7 月 28 日总会长贝克斯致巴尔纳博主教信，见《传录》，第 16 卷；《徐档》复本，卷宗E11。

④ 巴尔纳博 1855 年 8 月 4 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2 卷第 3 章第 30 页。

⑤ 梅德尔 1856 年 1 月 5 日致省会长神父信，见《法信》2667。

控诉在内。他抨击南神父管理修道院教导无方，控诉他批评和反对修士们在领神品前宣誓；梅德尔神父则被控告为只寻求讨好法国的外交官和军官，给他们当译员，专门从事他不该参与的政治活动。①

这些控诉曾转到总会长和法国的参赞吕比荣神父处。他们在中国作了调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对一些事出有因的指责，作了令人满意的处理。于是，南格禄由于在给赵方济主教的一份汇报里，对修道院修士们的宣誓发表了不正确的看法而受到了谴责；梅德尔神父也接到了训示，指令他放弃一切涉及政治的事务。②

伏伯禄神父是在一大堆内忧外患之中完成他的巡查教区的使命的。外患指的是他到达上海时，正值红头和清兵交战最激烈的阶段；为了从洋泾浜去董家渡，他就得坐船在清兵的战船和红头的炮兵交战的火线下穿过。③

内忧指的是，既然他是为了调查上述的令人难受的内部纠纷而来，一方面他既要在上级面前保护自己的属下，而另一方面却又要同徐类思主教保持着和好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困难局而更能显示监会铎卓越的管理能力。总会长贝克斯神父一接到他巡视各本堂区后的第一批消息后，写信给他说："只要你一到场，几乎已足以使人心情舒畅，这对传教士是非常需要的；那么，在你进行的巡视中，我还有什么不能期望的

---

① 徐类思1855年2月16日、4月4日、5月2、16日、6月1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16卷。

② 梅德尔1855年4月30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7章第10页；1855年2月28日徐类思致赵主教信，见《传录》，第16卷。

③ 伏伯禄1854年10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127页。

呢。"①

吕比荣神父同样称赞说："在伏伯禄神父这种心平气和、谨慎地领导管理下，冲动、急躁和莽撞是不存在的。"② 传教区的咨议神父郎怀仁和梅德尔的信也同样证明，伏神父这次巡阅所得到的成果既促进了安定和团结，更激发了传教士们的工作热情。③

监会铎伏伯禄神父的职权只是从总会长神父而不是从传信部那里接受来的；所以他的权力也只限于江南的耶稣会会士，他本人也不属于教区；在江南巡视结束后，他还要到印度马杜赖传教区去巡视，之后再返回欧洲。④

赵方济主教也没有授予他如三位前任会长那样的代权主教的职衔；当翁毅阁会长不在时，仍由郎怀仁神父继续执行代权主教之职。为使监会铎能走遍神父们的各本堂区，探访在岗位上的神父们如何脚踏实地地工作，规定当郎怀仁代权主教去各处施行坚振时，由监会铎作伴同往。此外，监会铎还要亲自给团聚在一起的神父们领一次避静，避静定于 1855 年 1 月和 2 月分两批举行。可是，由于害怕从上海城里突围出来的红头侵袭徐家汇，第二批避静被取消了；为了谨慎起见，已集合的神父也分散了。⑤

监会铎在给总会长的书信里，也表示了在他亲自实地巡

---

① 总会长贝克斯 1855 年 1 月 30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1。

② 吕比荣 1856 年 2 月 6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3。

③ 郎怀仁和梅德尔 1855 年 11 月和 12 月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37—40 页。

④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 52 页；又《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70 页。

⑤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89 页；又本卷第 300 页；《伏伯禄神父传》，第 68 页。

视教区的情况时，[1] 感到意想不到的愉快。以前，他在同罗马和巴黎上级的会谈中，阅读了保存在档案室的信件后，对江南神父们的成见颇深，他也认为其中总有些严重的流弊应该加以整顿。但他一经同传教士们接触后，他很惊奇这些终年忘我工作，又是在叛乱战争带来的困难环境中常被迫作出重大决策的人们，竟这样诚朴简单、虚心受教、服从他的领导、接受他提出的改进意见。他再三向他们说："你们给罗马和巴黎的信件太贬低自己了，你们的声誉比你们自己批评的要好得多哩。在欧洲，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容易当的领导了。"[2]

尽管监会铎对教区有良好的印象，但他仍清楚地看到了一些弱点，他的通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传教区当时的情景。

他看到，很多传教士为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上级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拘束而感到痛苦。这种拘束主要来自双重领导。传教士们常常遇到究竟应该听从谁的问题，他们害怕在主教和会长之间，在权力上发生什么冲突，以致妨碍许多有益的事业的开展。开头的三位会长在管理上也常常是无所适从的。他们三位到传教区时都很年轻，在修会生活上还缺少经验，以前在法国他们也都未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是会士在欧洲本会所习惯的那种。教区的权力

---

① 关于巡视方面的信，在《中总》，第3卷第2章中有二十来封，在《法信》2662里有十来封。

②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63页起。薛神父不只一次亲自听到监会铎的这些断言。1854年10月15日，监会铎写给总会长的信说："我请父台欢欣吧，请主欢欣吧！在我巡视的教区里，我只看到神父们和修士们过着真正的修会生活。"他也讲到，当他问赵方济主教有什么需要改革时，主教回答说，照他看来，没有什么重大弊病应当改革的。（《中总》，第3卷第2章第12页；《徐档》，卷宗E_5。）

太集中，总铎区的总本堂只是一个空衔，没有一点实权；实际上，教区的会长神父什么事都得自己管、自己决定；因此，无论是传教事业或教士们之间的内部融洽相处都受到了影响。南格禄会长的克己修德是值得众人惊奇和尊敬的，可是他经常表现出苛求、狭隘、胆小、甚至多疑。卜亦奥会长的多愁善感，翁毅阁会长的生硬粗暴和朝令暮改，使很多属下感到很痛苦；如果说他们曾成功地创办了一些令人赞赏的事业的话，那也是由于他们把繁重的工作强加给工作人员的结果。①

法籍神父和意籍神父混合共事，尤其是当意籍神父得到了他们本国主教的恩遇时，在教区管理方面就会引起一些麻烦，伏伯禄神父之前的几任会长们曾着重指出过这一点，② 监会铎神父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麻烦。当时有四名中国神职人员都已年老体弱，又有三名是那不勒斯圣家学院③ 的老学生，他们对传教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些中国神父，或由于健康不良，或由于天性懦弱，都不能胜任艰苦的传教工作。而且，他们对西洋教士，甚至对主教都表现得不甚友好；只要没有人密切注意，很可能立即会造成分裂。由于他们没有受过司铎的完整教养，对中文又没有什么深造，所以当地教友和教外人对他们也不那么尊敬。两位主教既不敢给他们下坚决的指示，也不敢纠正他们的错误。④

修道院是监会铎顾虑、操心的地方。他仔细研究了从徐

---

① 伏伯禄 1854 年 10 月 15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2 页；《徐档》复本，卷宗E5。

② 南格禄 1849 年 11 月 13 日信、罗礼思 1849 年信、卜亦奥 1850 年 1 月 10 日信，见《法信》2667。

③ 见本卷第 169、250 页。

④ 伏伯禄 1854 年 11 月 21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5 页。

主教接管领导修道院以来的详细情节，发现院长和教授们进行工作的障碍很大，并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教学和纪律问题都待解决，而年轻修士们也的确被主教纵容溺爱惯了。①

情况是严重的：这些青年中的高年级修士已读完了他们的学程，并已到了领受神品的年龄。六名已在读第四年神学，三、四名在读第三年神学。徐主教事先不作任何准备，就要晋升他们为司铎。院长和教授们一致声明，必须让他们马上出去传教，否则的话，对他们本人的灵魂和传教工作都是极大的危险；他们要求这些青年在晋升神父之前，首先在一个西洋神父的领导下作一次实习考验，充当传教先生，为期几个月、也可能几年；否则，会象他们很多的前辈神父那样，变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耶稣会宁可退出修道院，甚至，如有必要，退出教区，可不愿因过早地晋升这批神父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青年们大都出生于很好的老教友家庭，很可能成为有教养和令人钦佩、热心传教的神父，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应当让耶稣会自由地按照耶稣会的方法来培植。第一步，必须免去修士们在罗伯济主教的要求下而发的誓言，并允许若干人进耶稣会初学院。他们的榜样能带动虔诚，还可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不进会的中国神父能坚定、忠诚地紧跟罗马天主教会。②

这一切改革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监会铎神父非常坦率

---

① 见本卷第231页起。

② 伏伯禄1854年11月21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5页；又《徐档》复本，卷宗 E5。赵方济主教在得到南格禄神父关于修道院实况的报告后，曾感到"极度焦急"，"在他的良心和他的助理之间，产生了思想斗争"。(赵方济1854年12月25日、1855年2月11日、4月1日的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8、22、24页。)

地说："这里，一切的一切给了我两个结论：第一，如果耶稣会神父留在教区的话，那么教区宗座代牧或南京主教区的署理主教必须是个耶稣会会士。第二，耶稣会代牧主教必须按圣教法典任命，而且越早越好。这样，行政可恢复统一；传教士能在中国找到他们在修会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一切支持，首先是能找到本会上级的指示，而更愉快地从事于自己艰巨的传教工作。"① 监会铎觉察到，有几个传教士对主教确有欠尊敬和不服从之处，他们受到了指责和惩罚。②

尽管这些事情应该受到谴责，但事情的发生决不是孤立的；耶稣会的处境的确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好还是离开江南。③

监会铎发现了这些情况之后，采取了各种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实践证明是审慎明智的，因而一直维持到今天。第一项措施：在各总铎区指定一个有职、有权的总本堂神父，这是他在 1855 年 2 月 2 日的信上宣布的。监会铎提醒人们，按会祖圣依纳爵的精神，高级长上不应当把精力用在对付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上，而应当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属下，自己则从旁留神观察而已。南京教区现在发展得很快，新的属下逐年都在增加，作为上级更应该用相应的措施去进行管理。因此，监

---

① 伏伯禄 1854 年 11 月 21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5 页；《徐档》复本，卷宗E5。

② 葛必达神父尽管那么勇敢、热心，由于他的行动自由和态度粗暴，因此被特别点名受谴责。1853 年，他和赵主教发生了一场争执之后，翁毅阁会长和他的咨议神父们特地亲自向主教跪求宽赦。（德良弼、梅德尔、郎怀仁三位神父1853 年 2 月致省会长神父信，见《法信》2667。）

③ 伏伯禄 1854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21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5 页。

会铎就指定了几位总铎区的总本堂神父，替教区会长分担一些太繁重的职务。在提升他们到更高一级的职位前，要用事实证明他们是否真有办事能力。希望这些总本堂能成为会士们真正的上级，拥有耶稣会会典授予的一切权力，丢开其他事务，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由于传教士的人数太少又太分散，一时还不可能实行这个制度。但至少那些已被任命的总本堂，能够批准一定范围内的教规特赦；他们将观察会士对会规和惯例是否遵守，监视总铎区资金的用途，以及每季度一次接受并检查区内各传教士向他们呈上的汇报和所收捐献和开支的确切帐单；他们能支配这个或那个本堂区多余的资金，划归于该总铎区的公共事业或拨给比较穷困的本堂区。在接受重大的捐献或动用重大的开支之前，他们必须先向教区会长汇报请示。各个传教士每年一次都必须向会长汇报自己本堂区的经济状况以及下一年度需要开支的预算；总本堂则同样要作他总铎区的总帐。最后，每季度总本堂必须向教区会长呈送一份关于属下的传教活动的详细报告；总本堂必须出席教区咨议神父们每年两次的常会，会上要向会长神父报告总铎区的管理状况。

总铎区设立总本堂，这不是监会铎伏伯禄神父的创举，早在1853年，已有几位神父被委任为总本堂了；[①] 但他们的权力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行政管理也没有什么实效。只是从1855年开始，江南教区的这个特有制度才发挥了作用。之后，中国另一些传教区也采用了。此外，有关会士神贫愿的

① 卜亦奥1853年2月5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1章第27页。

问题，也规定了一些重要措施。① 直到那时，教区的全体神父都认为他们是徐家汇这个唯一的会院的成员；他们收到的弥撒献仪和教友捐款，全部都上缴给帐房，再从帐房那里领取各自需要的一切。从监会铎伏伯禄神父巡视和设立总本堂制度之后，每个本堂神父就有权自行处理自己堂口收到的哀矜，但必须把处理情况按规定如实向上汇报；另一方面，作为相应的措施，除传教士在本堂区遇到特大困难外，教区总帐房一般不再资助他们。

使监会铎伏伯禄神父非常吃惊的，是不少传教士在传教区的某些地方，因长期经受痛苦而引起的高得惊人的死亡率。他前任的几位会长由于过惯了江南的艰苦生活，也许不去考虑如何重视适应气候的需要，尤其不够重视对酷暑季节必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于是，监会铎为改善会士的日常生活，规定了一些重要制度，载入了"惯例册"②。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对传教士的健康如此关怀备至的却是一个责己极严的人，他明知自己来中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实上他在中国也只逗留了几个月，愉快地忍受着一切痛苦和劳累，不久，果真死在中国。③

不用说，他特别注意的是会士是否遵守会规，因为这是遵

---

①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64页；伏伯禄在1854年10月15日、1855年8月31日致总会长的信中谈到了此事，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2、32页。

② "惯例册"是有关地区性的生活习惯上的某些规定的记载。例如：会士在江南地区的使用蚊帐，就是伏会长在巡视郊区堂口之后规定下来的。——译者

传教士们的健康问题是监会铎经常关心的事情，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2、26、33、34、37页。

③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69页。

守贞洁愿的最好保证，这在传教区比在任何地区更需要；监会铎在他巡视了几个不同的本堂区之后写的一些备忘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①

伏伯禄神父巡视教区作出的一件显著的善行，是根据他坦率明智的报告，终于指定了一位耶稣会会士当了宗座代牧。翁爱阁会长的罗马之行，和他写给传信部和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只是开辟了道路，但在监会铎对问题尚未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他的意见之前，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②

一个意外的、而又是一个很有效的，也许伏伯禄也从未期待过的支持，却给伏伯禄神父帮了大忙。由于赵方济主教亲眼目睹江南耶稣会神父们积极工作的情况，于是逐步消除了从罗主教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③赵主教写给传信部的好多信件，证明和他合作的耶稣会会士是服从命令的、热诚的。④当伏伯禄神父开始巡查，请求赵主教对会士们的言行发表意见时，主教的回答是："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指责的。这在上面我已提到过。"⑤

此外，赵方济主教自己很明白，他的助理主教与耶稣会神父之间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分歧。他在向传信部所作的汇报中也为此事深感叹息；他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江南教区

---

① 见关于崇明的回忆录，这个手抄本还保存在《徐档》，卷宗 E5中，还有伏伯禄 1854 年 10 月 15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 章第 12 页。

② 见本卷第 313 页起。

③ 见本卷第 168 页；卜亦奥 1850 年 10 月 6 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 13 卷。

④ 赵方济 1850 年 1 月 13 日、6 月 5 日、11 月 18 日、1853 年 6 月 3 日信，见《传录》，第 13、14、15 卷；见《传特》，第 24 卷第 414 页起。

⑤ 见本卷第 317 页。

的真正利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所以，既然南京教区的神职人员、耶稣会会士占了大多数，而且他们对传教工作又最积极，那么就应当从他们中间任命一位宗座代牧。1854 年年底，在教区前任会长翁毅阁神父的指引下，赵主教在徐家汇做了一年一次的避静。他感到自己体力日渐衰弱，预料留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多了，他就决定要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尽其所能为教区培养一个最最有益的继承人。1854 年 12 月 28 日，他从上海寄出了一封信给传信部部长枢机，他的忘我精神、虚怀若谷和热心救灵的美德，在信中真是表达无遗。他赞扬了"杰出的、勤奋传教的耶稣会神父们"熟练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后，坦率地叙述修道院和开办初学院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并认为这全是由于徐类思主教从中阻挠而造成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双方的不愉快和痛苦还会与日俱增。"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为了巩固南京教区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我敦请枢座和传信部，俯允把教区和主教区的行政管理直接划归耶稣会"。

假如划分教区，徐类思主教可保留江南的一部分、安徽那块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以及崇明、海门和长江以北的堂口。至于目前南京主教区的署理主教，他已是"一个力不胜任的无用的人"。他要求返回欧洲，退居在一座耶稣会的会院里，例如在罗马的耶稣大堂内，以度他的余生。①

---

① 几天后，翁毅阁神父以赵方济主教的名义写信给巴黎省会长，肯定主教已决心要进耶稣会初学，在圣依纳爵的会规下终其余生。在翁神父看来，这感召是很认真郑重的。1854 年 11 月信，见《法信》2667。

耶稣大堂是耶稣会初期在罗马建造的大教堂，于 1568 年施工，历时半个世纪才完工。该堂在建筑上以简单朴素著称，可与雄伟壮丽的伯多禄大殿相映媲美。——译者

如果圣部认为他应该留在中国，他也不拒绝工作，但必须有一位耶稣会会士当助理主教。在他看来，南格禄神父担任这项职务最为理想。最后，赵方济主教要求传信部将豁免修道院修士的效忠誓言（它是传信部所规定的）的权力下放给宗座代牧；他还要求圣部批准他的建议，当修院修士学业完成后，派他们到富有传教经验的神父处学当传教先生，去锻炼一段时期。为了制胜徐主教的反感，批准这条建议是必要的。信的最后一句充分表现这位好好主教的性格特点，他说："我恳求枢座，不要把我的要求告诉在罗马的任何人。因为，如果我的助理徐主教知道的话，那一场火灾就很难幸免。"①

对有关教区未来传教事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赵方济主教同伏伯禄神父和教区内神父们的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传信部枢机主教弗朗索尼曾对总会长贝克斯神父谈起过，对监会铎和署理主教相处得如此融洽表示满意。②

为设立一位耶稣会会士当宗座代牧，其他好心人也从旁协助，但结果险些儿坏事。1854年，法国领事要求赵主教为庆祝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诞辰而咏唱"谢主颂"③，但在徐主教的煽动下，赵主教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本教区不是法国教区。④

根据前面叙述的，我们这两位意大利主教对葡萄牙保教

---

① 此信保存在《传特》，第24卷第449页起。

② 弗朗索尼1855年12月22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41页。

③ "谢主颂"只有在极隆重的谢恩仪式中才咏唱。——译者

④ 徐类思1854年8月16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信，见《传录》，第15卷；伏伯禄1854年8月20日、9月3日、10月30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8、10、14页。

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麻烦，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们也不希望法国给天主教来一个正式或半正式的什么保教权。① 假如他们想一想三色旗飘扬在主教大堂顶上和教区其他建筑物上空的时期，想一想一年来法国的军舰曾从决定性的毁灭中保护了天主堂及其事业，那么8月15日那天的拒绝唱"谢主颂"的决定就未免太生硬了。事后不久，辣厄尔海军上将到了上海，他一得知此事后，表示非常生气；两位主教尽力想缓和气氛，乘法"贞德"号军舰在吴淞口搁浅后重新安全进港之际，为之举行了谢天主大礼，并特准咏唱了"谢主颂"。②

要是南京主教区仍由意大利主教管理，那么麻烦事必不会减少。教区乐意接受法国的援助，但又不愿承认法国正式有保教权。这事促使辣厄尔海军上将进一步研究了教区的组织。他同爱棠领事商讨，向上海的和徐家汇的几位神父们请教。不久，他就从他们提供的意见中得出了结论。他对被咨询中的一位神父说："法国愿意保护传教，但希望能为教区做些善事；可是，按照目前的组织状况，你们的事业显然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你们也不可能久留在目前的立脚点，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你们必将离去。不过，你们耶稣会离开江南后，两位主教和他们的中国神父是不能有所发展的，反而会使教区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就会白白浪费时间和钱财；

---

① 见本卷第174页。法国外交官对两位意大利主教的态度曾作了汇报。顾随侯爵对赵主教也作了过分严厉的、近乎不公允的评论，说："这位'方济各会会士'(原文如此)的教长，论其圣德，无可非议，但太意大利化了，和他打交道有时很困难，他对待人没有做到应有的信任和坦率。"见顾随：《回忆录》，第2卷第216页起。

② 见本卷第300页。

因此法国最好还是马上退出。如果你们单独负责教区，那才有成功的希望，法国也将继续加强它的保护。”

伏伯禄神父当时不在上海；他回来后，海军上将向他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并说他将写信去巴黎，要求帝国政府呈请传信部任命一位法国耶稣会会士当宗座代牧。监会铎伏伯禄向总会长报告这件意外事时，结束时说：“我遗憾的是，传信部没有及时作出决定，致使世俗的权力插手到它原来只该从旁关心的事情里来了。”①

总会长神父认为这个计划实在是害多利少；法国政府的行动将大大挫伤传信部的主教们的积极性，他们很有理由为自己的独立性担忧不安。② 法国政府对辣厄尔海军上将的提议采取了什么活动，我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赵方济主教健康恶化的情况，促使难题解决了。1835年年初，主教的健康实在令人担心。神父们请上海法国军舰上的军医们前来会诊，他们的意见同高慎思神父和租界上英国医师们的完全一致；挽救主教生命的唯一可能性，只有回欧洲，至少暂时回去。4月7日，圣瞻礼七（复活节的前一天）伏伯禄神父率领徐汇公学的学生到了董家渡，跪求主教给以最后的祝福；翌日，4月8日耶稣复活节日，赵方济主教登上了一艘驶往香港的英国轮船。③

---

① 伏伯禄1854年10月30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14、16页；又《徐档》复本，卷宗E5；又伏伯禄1854年10月30日致省会长信，见《法信》2662。由于爱棠先生的要求，监会铎于1854年9月24日，给了他一份《备忘录》，详细地叙述了教区情况。他明确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托给耶稣会会士的宗座代牧区，如同其他教区托给其他修会一样（《徐档》，卷宗E5）。

② 总会长1855年1月20日致伏伯禄神父信，见《徐档》，卷宗F11。

③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17页。赵方济主教是和计依赖神父一起走的，计神父也因健康问题而离开教区。

伏伯禄神父曾有两封信给总会长神父，推崇赵主教是耶稣会当时在中国的一位最最真诚的朋友和恩人，恳请予以特别照顾。①

徐类思主教也有信给传信部部长枢机，敦请他密切注意，要谨防赵主教受了耶稣会的唆使而可能向罗马提出要求，并指出必须抵制这些要求。②

这位助理主教猜得果真不错。赵方济主教到达罗马后，即下榻于耶稣大堂的会院，会士们款待他如同自己的会友。他在同传信部部长枢机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会谈中，重申并阐明了他在1854年12月信里所提出的意见。③

后来赵主教退居到那不勒斯的一座中国公学——圣家书院，他原是该书院的成员，他设法在那里调养身体、恢复健康。1855年8月11日，他从圣家书院给传信部部长枢机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概括了他的一些要求。他陈述的意见同1854年12月在信里提出的基本上一样。只是在要求如何划分江南教区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主意，他建议把徐类思主教调往托给他所属修会管辖的湖广教区去。他知道，这样的请求一定会得罪他这位助理主教，这位"如此称职和如此热诚的合作者"，使他"内心深为不安"。但他认为应该首先考虑教区的利益，在双方感情和精神已日趋分裂的情况下，要么是耶稣会，要么是

① 伏伯禄1855年3月4日、4月1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2章第23—24页；又«徐档»复本，卷宗E6。

② 徐类思1855年4月4日、5月2、10日、6月1日信，见«传录»，第16卷。这些徐主教的信只有在一点上取得了胜利，即赵主教申请对修道院修士们的誓言的豁免权，依旧遭到了拒绝(«传特»，第24卷第430页)。

③ 翁毅阁1855年5月18日、7月20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徐类思主教，两者必有一个得离开江南；而如果耶稣会撤走的话，会使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建立起来的如此美好的事业陷于瘫痪。最后，赵主教再次申请豁免传信部加于修道院修士们誓言的约束。①

这封信是这位圣善的主教给耶稣会和教区的最后的德政。1855年11月2日，赵主教在那不勒斯逝世了，死时耶稣会神父帕拉迪尼给他送了终。② 他的葬礼在圣家书院圣堂内举行，还为他致了悼词。③

在中国，人们对赵主教的逝世深为悲痛。总会长神父贝克斯给江南神父们的报告中也认为，这是教区真正的不幸事件，他原希望高兴地看到主教能重返江南教区，用他的德表和教导来支持他要求来协助教区工作的耶稣会助理。④

赵方济主教逝世的噩耗一到，首先在董家渡主教大堂和徐家汇大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然后又在各本堂区举行了追悼会。上海的中国官员也和各国领事、法国和其他外国军政长官以及租界上几乎全体外侨参加了主教大堂内举行的教会的悼亡礼仪。富裕的教外人也都慷慨资助，分担教堂素彩的费用。谁也忘不了赵主教在1849年至1850年的饥荒岁月里以及叛乱战争以来所做的种种善举。⑤

赵方济主教一死，徐类思就成了法定的南京主教区的当

---

① 见《传特》，第24卷第460页起。

② 帕拉迪尼1855年11月4日致总会长神父信，见《传录》，第8卷第2章第43页。

③ 悼词保存在传信部资料室，见《传录》，第16卷。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16页。

⑤ 同上。

然署理主教，他也立即行使这个职权。但他对神父们并不讳言他的管理江南是不会长久的。①

1856 年 3 月 19 日，罗马来信通知徐主教，传信部已于 1 月 21 日撤销了南京主教区，代之以建立一个委托于耶稣会的宗座代牧区。② 徐主教本人则将移驻到湖广代牧区。③

徐主教并不是不知道这个措施，多年来罗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当他得知这个决定时，仍然感到突然和难受。几天之后，他给传信部上了一封直言不讳的、令人钦佩的信，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传信部部长。但当他一旦认清了这是罗马的命令后，他就只有一个思想："但愿主旨承行。"④

为了避免别离的痛苦，徐主教决定先去香港，而不说明此行的目的。在那里，他再等待罗马的正式公文。⑤ 他带走了三名江南修道院的修士，指定他们作为他新代牧区的人员，当时湖广教区的修道院是设在香港的。⑥

虽然我们并不隐瞒徐主教禀性上的缺点，但他仍不失为一位肯自我牺牲和服从上级的人：他同耶稣会会士的最后联系，为他本人和耶稣会会士都带来了荣誉。梅德尔神父在给巴黎省省会长的信中，给我们叙述了这一经过。徐主教指定

---

① 梅德尔 1856 年 4 月 5 日信，见《法信》2668。总会长贝克斯 1855 年 12 月 3 日发出赵主教的讣告时，也把这消息通知了江南的神父们。《徐档》，卷宗 F11。

② 传信部 1856 年 1 月 21 日信，见《传特》，第 24 卷第 430、432 页。关于这个决定，见传信部秘书巴尔纳博主教于 1856 年 2 月 8 日致总会长贝克斯神父的信，《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1 页。

③ 徐类思 1856 年 4 月 15 日从香港致传信部部长信，见《传录》，第 16 卷。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见本卷第 184 页。

了两个代权主教，当他不在时由他俩负责教区的工作。郎怀仁神父作为耶稣会会士的代权；圣家会的成员龙保理神父，作为非耶稣会会士的中外神父们的代权。① 徐主教还答允当时的会长梅德尔神父，让二或三名耶稣会神父去管理他的大修道院。梅会长写道："主教很悲伤，我们也同样如此。但一切都很平静、坦然，他还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诚恳……主教要离开一个安静繁荣的教区，而到一个混乱的教区去工作，在他着手承当这个艰巨的使命时，他要求本教区里曾和他同战斗共患难的几位修士同去，他正配称是传布福音的大英雄……我把刚刚写好的给总会长神父的信，读给主教听了。② 主教非常诚恳地感谢我，并说：'亲爱的神父，请深信我，我要同耶稣会神父生活在一起，并愿在他们中死去。'"③

1856 年 4 月 7 日，徐类思主教启程赴香港。④ 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在征求耶稣会法国省的咨议神父们的意见后，⑤于 1856 年 3 月 27 日，提议年文思神父当第一任江南宗座代牧主教。为了尊重徐类思主教，在开头几年里只给他以"宗座临时代理的职衔"。⑥

为了合乎耶稣会会典的规定，总会长贝克斯神父先向教宗请求给他本人和新当选者颁发一道按听命圣愿必须服从的圣命。年文思神父迫于这道圣命，忧心忡忡地纯粹为了听命

---

① 徐类思 1856 年 3 月 22 日信，见《徐档》，卷宗 B3。
② 梅德尔 1856 年 4 月 4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8 页。
③ 梅德尔 1856 年 4 月 6 日信，见《法信》2667。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117 页。
⑤ 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2 页起。
⑥ 总会长贝克斯 1856 年 2 月 20 日、3 月 27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256 页；又《中法那罗》，第 2 卷第 22 页起。

圣愿而接受了宗座临时代理这个职衔。①

5月25日，正在恭迎圣体游行的时候（圣体瞻礼后八日），徐家汇接到了这个重大的调动消息的正式通知。总会长贝克斯神父来信宣布徐类思主教已转移去湖北，南京主教区已改为委托给耶稣会的宗座代牧区。②

7月26日，徐类思主教从香港发来一封简短而又恰当的信，把传信部的决定，通过年文思神父通知了新代牧区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③ 正如总会长神父给新任的宗座代理主教写的那样，"这是一种新形势的开始，一位耶稣会会士，作为会士，仍隶属于修会的会长，但作为一位宗座代理主教，就只隶属于传信圣部"。④

在决定有关江南教区管理权的同时，传信部又裁决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从此就增加了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我们已看到，为了符合上海主教集会的要求，⑤ 北京教区宗座署理孟振生主教在1851年12月20日曾呈请传信圣部，建议把他辽阔的教区划出直隶的西南部给耶稣会，东南部给外方传教会分别管理。⑥

孟振生主教回到自己的教区之后，发现他呈请的计划，在

---

① 年文思1856年8月31日、1857年1月5日信，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16、24页。在耶稣会里，凡发过显愿的（一般称四大愿），就不能再接受教会里的任何显职，除非有正式命令，不服从即以犯大罪论。年文思不是显愿神父（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19页），但他也愿在这点上，遵守会典的规则。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19页起。

③ 见《徐档》，卷宗B3。

④ 徐类思1856年5月7日信，见《徐档》，卷宗B5。

⑤ 见本卷第198页。

⑥ 见本卷第205页。

自己同会的味增爵会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他们生怕耶稣会会士成为他们的邻居之后，会同他们发生纠纷。孟主教为了使他们满意，在1852年3月，又呈文传信部，要求撤销他的申请。①

此后不久，味增爵会总会长艾蒂安神父本人也上书传信部部长枢机，要求北直隶全省② 保留给自己的修会。他承认自己没有足够人数来完成目前由他的会士们管辖的一切教区，他提请把河南和江西让给耶稣会和外方传教会；这两省现任的两位代牧，可以调到北直隶当新代牧区的主教（1852年7月27日）。

在此期间，传信部部长枢机还咨询了外方传教会的各修院院长和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的意见。1852年7月26日，巴朗和瓦赞两位外方传教会神父也曾表示，如果味增爵会的上级同意让出的话，他们愿意接受直隶东南部这个代牧区。7月12日，耶稣会总会长罗当神父由于感到人手缺少、物力不足，谢绝接受直隶西南部。他认为最好还是把人力、物力放在南京教区，它已经消耗了会里一切能运用的财力；与其把一个教区托给耶稣会，不如从江南的会士中选出一位宗座代牧来。两年后，这个旧题又重提了。新任耶稣会总会长的贝克斯神父，仍以同样困难为由拒绝了，但为了能符合圣部的愿望，他在作出最后答复之前，先征询当时（1854年7月1日）

---

① 孟振生1856年9月8日致总会长艾蒂安神父的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77页起。

② 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前称北直隶；因当时江南也是直隶中央的省，故加北字以示区别。——译者

正在江南巡视的伏伯禄神父的意见。①

伏伯禄神父把问题交给大家讨论，咨议神父们认为可以接受新的教区，因为在中国拥有两个教区的话，对人事的调配就比较有利。②

贝克斯总会长把这个答复转呈了传信部，并表示耶稣会应该服从而且一定会服从圣座的命令；至于他本人，他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况，由于人力的不够支配，并不希望再有新的教区；他更希望能为江南教区准备多供应些优秀的工作人员，把江南教区建设得更加巩固牢靠。③

1856年初，总会长贝克斯神父获悉直隶西南区划给耶稣会，直隶东南区划给外方传教会。④外方传教会的修院院长们要求豁免承担献给他们的教区；他们不愿接受的真正理由，是生怕挫伤遣使会神父们的感情，因为他们看到遣使会神父对于划分直隶非常反感。⑤

这样，直隶东南部就划给了耶稣会。郎怀仁神父被指定担任该区第一任宗座代牧，顶衔为塞尔吉奥波利的主教。可怜的郎神父曾意识到自己有当江南主教的可能性，已深自庆幸摆脱了这顶主教冠冕。可是在1856年9月底，来了两份教

---

① 这些片断都全部保存下来作为附录，以供1856年1月21日传信部召开关于中国教务会议时作参考。见《传特》，第24卷第474页起。会议记录在同一卷里。关于这事有详尽的记载，我在这里仅作了摘要。

② 总会长贝克斯1855年1月20日致伏伯禄信，见《徐档》，卷宗F11。

③ 贝克斯1855年12月3日致伏伯禄信，见《徐档》，卷宗F11。

④ 贝克斯1856年2月20日致梅德尔神父信，见《徐档》，卷宗F11。

⑤ 孟振生1856年9月8日、11月6日致梅德尔和艾蒂安神父信，见《遣使会回忆录》，第8卷第1080、1100页。

宗诏书：一份是5月27日①，另一份是同年5月30日签发的，交给了他一项更重要的任务。② 和数星期之前的年文思神父一样，他在接到教宗的诏书时，同时接到以听命圣愿必须接受的命令。③ 薛孔昭神父同时被任命为将建立的直隶东南教区的会长。④

孟振生主教因没有得到传信部的任何消息，认为他在1851年提的建议已被遗忘了。⑤ 1856年6月，当江南梅会长神父写信告诉他罗马最后决定的消息时，他感到很不快活，也感到非常突然。他考虑到北京的同会人士的反感，希望耶稣会上级和郎怀仁主教拒绝接受新教区。可惜已迟了一步，郎怀仁主教同年文思神父一样，已接到了圣父以听命圣愿，不接受即犯大罪的命令。⑥

顶衔塞尔吉奥波利的主教一接到教宗诏书，就写信敦请北京的宗座代牧给他祝圣，祝圣礼于1857年3月22日在南张庄举行。⑦

从这时期起，郎怀仁主教卓越的生涯在我们的这段历史中将中断一时，直到他重返上海接替年文思主教为止。

翁毅阁和伏伯禄两位神父在组织现有的江南教区的工作中，曾协助耶稣会的高级领导人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可是他俩谁都没有亲眼见到自己活动的成果。翁毅阁神父先逝世，他重回中国不到一年，在酷热的夏天，由于松江地区艰苦的传教工作使他病倒了，结果他感染了斑疹伤寒而死去（1855年7月8日）。⑧

四个月之后，不幸就轮到监会铎兼教区会长伏伯禄神父。长期以来，他患有心脏扩大症，经常发生心绞痛和窒息。当他在马赛正要动身来中国时，曾发过一次病。翁毅阁神父曾

亲眼看到他发病时的情况，认为有责任提醒他，如果带着这种病去中国，那里的气候定会使他在短期内丧命。于是翁神父劝他向上级请求调任其他工作。但是，监会铎却简单地回答说："我需要的不是活命，而是听命。"最后，他还是动身了。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他一到中国就发病了，病痛使他受到了很大的痛苦，但他仍坚持巡视各总铎区，并且亲自关切地过问传教士们的生活和需要。长途跋涉的劳累加重了他的病情；10 月 27 日，他一回徐家汇，就此卧床不起，终于于 11 月 21 日安然逝世。⑨

---

① 见《徐档》，卷宗B1，诏书上盖有澈人玺印。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128 页。

③ 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20 页；皮埃尔：《郎怀仁主教传》，第 1 卷第 500 页。当伍命年文思主教的消息传到徐家汇时，神父们正在过暑假。郎怀仁神父庆幸自己免戴主教高冠，快活得象小孩一样跳起舞来。有一位神父笑嘻嘻地对他说："小心呀，你这样跳法，不要把你跳到直隶去。"

④ 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20 页。

⑤ 这种默而不宣是由于罗马既希望慎重些，不触犯葡萄牙，又希望同它达成一种协议：正式撤销北京主教区，把它划分为三个宗座代牧区。这一切对葡萄牙来说决不是件愉快的事。（见《传特》，第 24 卷第 414、418 页起；又《遣使会回忆录》中孟振生主教的信件，第 8 卷第 1080 页。）

⑥ 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20 页。

⑦ 见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23 页。直到那时，人们才发觉在颁给郎怀仁主教权力的诏书里，有一个难以解释的错误。诏书授命他为直隶东南部的宗座代牧主教时，同时又授他为直隶西南地区的临时署理主教。而同时颁给孟振生主教的诏书也授命他为直隶西南地区的署理。祝圣之前，郎怀仁把诏书呈给他的祝圣者检阅时，这错误才被发现。问了传信部，部长枢机答复道：错误是在颁给郎怀仁主教的诏书上。于是，就把诏书退回补发，现保存在徐家汇的是那份纠正后补发的诏书，已不再提及直隶西南地区署理了。（薛孔昭：《郎怀仁主教小传》，第 20 页。）

⑧ 见薛孔昭：《翁毅阁神父传》；又费都尔 1855 年 9 月 20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51 页。

⑨ 梅德尔神父 1855 年 12 月 5 日信、郎怀仁神父 1855 年 12 月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79 页起；又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 70 页。

直到最后时刻，他仍念念不忘怎样完成他的任务。当郎怀仁神父告诉他病情危急时，他回答说："我看这里一切都部署好了。我再对你说，在中国与其说我等待苦架，不如说我得到的尽是安慰。我想，我的巡视不全是无益的，对某些人，巡视号召他们要服从命令并修养成高贵的品德。亲爱的教区，我只愿为她而生活；我曾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她发展和壮大而感到满意。天主却把我象一架无用的工具置之一边，而把这安慰留给他人。"①

郎怀仁神父在讣告中写道："我们中国传教区永远也不能忘掉这位尊敬的伏伯禄神父，他为了教区，自谦听命至死，他是一位长期历经艰险而又默默无闻地工作的殉道者。"②

在临终前几小时，监会铎神父把徐家汇的理家神父德良弼唤到床边，口授遗嘱，用他所有的特权，正式给传教区指定一位临时会长直至耶稣会总会长另有决定为止。他亲手写了自己选定的人，把证件加印盖章后，交给了德良弼神父；同时嘱咐他，在料理他的丧事之后，召集徐家汇所有全体神父，向他们宣读他的遗嘱。他的遗愿一一都照办了；被选定的临时会长是梅德尔神父。③

1857④年8月5日，总会长神父的信到达徐家汇，任命南格禄神父当教区会长。⑤这位德高望重的教区老前辈，在信

---

① 郎怀仁1855年12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283页。
② 同上，第281页。
③ 见薛孔昭：《伏伯禄神父传》，第71页。
④ 原文1857年，疑是1856年之误。——译者
⑤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21页起。

到不久之前已去世了。梅德尔神父继续留任为代理会长。总会长贝克斯不久就追认他的职权。梅神父当代理会长七年，为教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① 见《耶稣会会士录》，第98页。

第 四 章

教务细节(1852 年至 1856 年)

一、江南教区的七个总铎区

上海　徐家汇　松江　浦东　苏州　崇明及海门　西教区

我在前面已说过,[1] 由于伏伯禄神父的安排，从 1855 年开始，教区划分了几个总铎区，为了叙述得更清楚些，我把 1853 年至 1855 年这一段时期，按照总铎区的顺序逐一作介绍。

上　海

当时,组成上海总铎区的堂口，除董家渡主教大堂外，有城里的三所私堂和洋泾浜小堂,还有县城对面,黄浦江右岸的金家巷、张家楼和网尖三个本堂区。董家渡主教大堂和神父住院同上海红头之乱以及清兵收复该城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上面我已叙述过当时主教府曾遭受多么大的危险,幸亏有法国海军的干预，大堂和主教府才得保住，同时还保护了周围的整个地区。[2]

虽然时局很紧张，但赵方济主教仍坚持在他举行宗教大礼时要有修道院的修士们参与辅礼。因此，1853 年 12 月,神

学班修士在南格禄神父率领下迁到了董家渡；而低年级的修生和副院长李秀芳神父，则仍留在张家楼。南格禄神父兼两地修道院的院长。

前面我已讲过，南格禄神父在办修院时，遭到了徐类思主教的种种非难。[3] 徐主教离开教区后，按神父们一致的意见，修道院读完神学的修士，在领受铎品之前，必须分别安插到一些传教神父那里，先充当一名传教先生。[4]

人们早希望主教大堂成为董家渡本堂区。由于法国的保护，董家渡得到了安定之后，已经有好几户教友迁来这里定居了。还有不少人从南京太平军占领区那里逃出来移居这里，使这里的移民人数增加得很快。根据1857年《教务工作报告》，主教大堂已拥有四百名教友。为了庆祝收复上海城，为了悼念1月6日攻城战中阵亡的法国水兵而举行盛大的宗教追悼仪式以及为了表彰主教大堂旁边那所医院救死扶伤的功绩，这座主教府成了中外人士注目的地方。原设在江南修道院内的圣母圣心善会的分会，此时也随着修道院一起转移到董家渡，并很快成为堂口内教友们的一帖强有力的促进剂。[5] 然而，美好的董家渡堂口真正蓬勃发展，是在年文思主教任期内，关于大批移民涌进之后的事，下面将会谈到。

从1853年至1855年，梅德尔神父一直照顾着殷家巷、江

---

① 见本卷第324页。
② 见本卷第282页。
③ 见本卷第230页起。
④ 见《南京修道院课程纪要》，修道院档案。
⑤ 李秀芳1857年12月20日致谭泽德信，见《通讯》，第3卷第2章第62页。

湾和吴淞三处黄浦江左岸的堂口；他把在鸦片烟船上工作的不少马尼拉人从吴淞召到董家渡和徐家汇，我们已看到这些勇敢的、对神父又赤胆忠心的人们，为这两地的会院作出了多大的贡献。① 梅神父还兼管着洋泾浜教堂，因为那时，该处还没有一位专职常驻的神父。②

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第一个天主教司铎是包若瑟神父，他是外方传教会会士。包神父是准备去满洲传教的，1855 年 6 月 2 日，他搭乘去辽东的教友的沙船，外方传教会的比埃神父和味增爵会的戴济世神父作伴同行。沙船一出黄浦江，就遭到海盗的抢劫，他们被迫投降。比埃神父为了自卫被投进海里，包、戴两位神父被捆绑在大船的主桅上。当海盗们尽情洗劫后，就丢下沙船，于是沙船驶回了上海。③

在等待新的机会期间，包神父接受邀请，住进洋泾浜小堂附近的一座小屋子，给已定居在租界的教友开展传教工作。1855 年 7 月，洋泾浜已计有二百六十名教友。④

上海已逐渐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商业中心：各种不同的修会都设法要求来上海设立自己的帐房。1855 年，徐类思主教答允外方传教会在香港及澳门的管理财务的李波神父，在上海设立一所分帐房。⑤ 但直到 1864 年，他们才得到许可。

---

① 见本卷第 284 页。

② 见本卷第 212 页。

③ 梅德尔 1855 年 8 月 1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45 页起。根据他信中说，教友沙船在出事后，继续驶往辽东，后来才返回上海的。我所转载的是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574 页所作的叙述。年文思 1857 年 7 月 26 日致传信部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见《徐档》，卷宗B_4。

④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574 页。

⑤ 各修会的帐房，各有自己的堂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称"三德堂"，味增爵会的称"首善堂"，耶稣会的仍称"洋泾浜天主堂"。——译者

1856 年 6 月，味增爵会在法租界设立了帐房。它的创办人埃梅里神父，也曾一度居住在洋泾浜。传信部也提出要在上海设立一所帐房，但没有实行。① 耶稣会只是在年文思当了主教后，才在法租界正式设立了帐房。

法国政府正在为自己的领事馆找一座更适宜、更相配的建筑物。1855 年 10 月 2 日，教区从清朝官方拨还教产的土地上，划出了一部分让给法领事馆，后来天主堂又把这块土地买了回来。②

当时，梅德尔神父同法领事往来频繁。1855 年，他曾一度担任过领事馆的翻译，这是越出圣职范围的职务，实际上也是出于形势所迫。当时除了刺萼尼使团中曾当翻译的一个还俗的司铎卡勒里先生外，再没有其他可当翻译的人了。可是领事本人和神父们谁也不愿再把他留在上海。③

梅德尔神父就利用他在领事馆里的职务，利用同清兵将领和叛乱分子的首领们经常接触的机会，拯救了成千上万个难民，使被困在城里的教友免遭抢劫。④ 但是他这种处境，总是不正常的；徐类思主教把这件事控告到传信部，1855 年年底，梅德尔神父就辞掉了领事馆的工作。⑤

爱棠先生当时曾设想，以后又一再提出一个计划，即开办

---

① 各种各样的有关设立帐房的信件送到了总会长神父手里。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45—62 页；又吕比荣神父 1858 年 6 月 1 日信，见《徐档》，卷宗 F13。

② 这就是当时"公馆马路"和"天主堂街"的转角处。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575 页。

③ 伏伯禄 1855 年 2 月 11 日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22 页。

④ 梅德尔 1855 年 5 月 31 日信，见《法信》2676；郎怀仁 1856 年 1 月 3 日信，见《法信》2668。

⑤ 见本卷第 288、299 页。

一所由法国青年和中国教友组成的翻译学校，学校托神父们管理，原则上这个计划被采纳了，但法国政府对此没有作出反应。[①] 县城被围时虽然极其恐怖，但陆家和艾家的小堂却得到尊重，不久也恢复了宗教活动。[②] 相反，施家的小堂则在 2 月 17 日，被红头和清兵们放火烧毁了。[③]

在上海对面的三所美好的浦东会口，当时附属于董家渡住院。网尖由吴雅阁神父负责管理，1855 年那里有十一只小会口、一千八百名教友；张家楼有一千三百名教友，由修道院的副院长和修院教师管理；金家巷及其附近的会口合计有两千名教友，[④] 由一位圣家会的中国神父张玛塞神父管理。[⑤]

---

① 1855 年 2 月 4 日会议记录，见《徐档》，卷宗E6；伏伯禄 1855 年 2 月 11 日致总会长信，见《中总》，第 3 卷第 3 章第 22 页；又《徐档》复本，卷宗 E5。

② 见本卷第 319 页。

③ 见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 559 页。

④ 1854—1855 年的教务工作报告。

⑤ 根据教务报告所提供的上海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董家渡		张家楼		
1853—1854 年			徐主教		
	赵主教		南格禄	贝来德	张玛塞
	梅德尔		殷神父	平乃公	
1854—1855 年	赵主教	徐主教	殷神父	李秀芳	
	梅德尔		笪良仁		
	南格禄				
1855—1856 年	徐主教		李秀芳	笪良仁	
	龙保理				
	梅德尔				
	南格禄	贝来德			

	金家巷	网 尖	洋泾浜	
1853—1854 年	张玛塞	吴雅阁	梅德尔	
1854—1855 年	张玛塞	吴雅阁	梅德尔	
1855—1856 年	张玛塞	吴雅阁	包若瑟	梅德尔

徐家汇

从1847年建造时开始直到1856年，徐家汇会院常常是耶稣会神父们的总院，也是唯一的会院。全体会士都自认是该会院的成员。事实上也是如此，每年他们都集合在那里避静和歇夏。

从1856年起，当教区转移到耶稣会手里后，徐家汇会院已丧失了耶稣会会士唯一会院的性质，剩下的只有徐汇公学。会长神父经常驻在董家渡耶稣会主教身旁。那时，董家渡已成了教区的中心。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海县城一连十六个月的被围时期，徐家汇处于怎样的命运；除了几个吴淞来的马尼拉水手和几个在疗养的法国军舰上的伤病员外，毫无任何保护人。而会院和公学终于摆脱了种种危险，神父们常把这次得保安全，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教区的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在1854年的围城恐怖时，圣体瞻礼的圣体游行(迎圣体)依旧隆重地举行。圣体出堂，在会院四周绕行。同年，圣依纳爵瞻礼日或是公学举行给奖典礼的一天，军政要人、外交官、海军军官以及中国官员们都参加了。上海的几个从城里被红头驱逐出来的大官员，也乐于来徐家汇参观，并亲自查考学生们的成绩。①

"贾西义"号军舰上的军官和海军们的传统习惯也被"高

①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67、69、72页。法国领事爱棠先生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他常常参加哲学和神学考试，还亲自提出问题考问。见梅德尔1854年3月14日信，《法信》2667。

尔拜"号军舰、"贞德"号军舰上的军官和水兵们继承了下来；那就是伤病员到徐家汇来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们几乎人人身休、灵魂两受其益。伏伯禄神父于1855年写道："在到徐家汇来休养的五十或六十名水手中，莫不幸庆自己灵魂上重得平安，肉体上也恢复了健康。"这些老实人不知怎样表达他们的谢意。1855年1月1日，"贞德"号军舰上的一名略知书写的水手，用全体同伴的名义，写信给院长神父说："最慈善、最尊敬的神父们，1855年1月1日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天，使我们有机会感谢恩人而感到愉快。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诸位亲爱的神父！你们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体，而且关心我们的灵魂，给了我们这些可怜的水手们慈母般的关怀。我们无法形容我们的感激之情，但请你们相信，我们对徐家汇的神父们，心中常抱有一股深深的敬意；尽管'贞德'号上的水兵们找不到足以向你们表达这种心情的语言，但不论将来离开得多远，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对他们的关怀。请你们相信，当我们回到家乡后，我们将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的亲属和朋友反复讲，功绩和光荣必须归功于勇敢的传教士们，是你们使积劳成疾、疲惫不堪的全体船员获得了新生。最可爱的各位神父们，但愿天主上智能够俯允我们今天的愿望，你们的教区将得到出乎意料的收获！① 用你们天神般的语言，使微不足道的英美耶稣教牧师们屈服！用你们司铎的圣德，把他们蹩脚的道德准则化为乌有！"②

---

① 伏伯禄1855年2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161页起。

② 信末这段结束语在石印时被删掉了，理由是防止误会。我从伏伯禄神父的原信里，把它重新整理出来。见《法信》2662。

徐汇公学在晁德莅神父管理下日见兴旺。晁德莅在1853年晋升司铎后，即奉命就任公学校长；1855年，公学已有学生四十五名。由于上海教友和西欧人士的慷慨捐助，公学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可能；当时神父们在通信中常常怀念当时上海唯一的法国商人雷米先生① 和斯密司先生，后者是当时代收清朝关税的法国代表；② 斯密司原是加尔文教派信徒，而且还是该教派的一名六品，但他常喜欢来徐家汇参观；公学用他留赠的一笔哀矜买进了目前校园的一部分土地。③

公学的发展速度使来上海和领事商量教务的各地宗座代牧大为惊奇。在这些来访的著名人士中间，《徐家汇会院年刊》特别记载了两位：一位是北京教区的宗座代牧孟振生主教，他由于一位官吏的命令而遭逮捕，并被押送到上海，然而这是符合刺粤尼签订的协定的；1855年，孟主教在上海逗留了好几个月。另一位是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张敬一主教，他在东京因传教而受到迫害。之后，教宗庇护九世钦命他为高丽的宗座代牧主教。他为人和蔼谦虚，在青年和教师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他获得了曾在东京避免了的致命殉道的荣誉。④

范廷佐修士的工场间常常吸引着许多参观者，其中突出

---

① 梅德尔1856年4月28日信，见《法信》2667。

② 见本卷第298页。

③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66、148页。德柏拉舰长见到徐家汇学生气色都很好，深受感动。1852年，他写道："我为学生们的健康情况感到高兴，我从每个孩子脸上看出，他们是很幸福的。"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163页。

④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01页；又达莱：《高丽教会史》，第402、521页起。关于他的来访，见梅德尔1856年1月5日信，《法信》2667。

的有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1] 他在参观这些工场时，神父们乘机同他进行了认真的交谈。神父们认为阿礼国先生的信仰问题是摇摆不定的；布尔布隆夫人归正的榜样，他是否会效法，但至少徐家汇神父们是这样希望的。[2] 德柏拉舰长也经常和这位英国领事谈话，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很喜欢领事率直坚强的性格；在离开上海时，他向领事赠送了一部尼古拉的《哲学课本》。[3] 这些愿望后来落空了，我在本卷前面早已提及了。[4]

1856 年 8 月 29 日，范廷佐修士的工场间险些儿给徐家汇的全部建筑物带来一场大祸。原来一个中国佣人由于粗心大意，把烘烤小塑像的炉灰倒在一大堆干柴上，引起了一场大火。风助火威，火舌吹向圣堂，看来圣堂连神父住院都将化为灰烬了。那时葛必达神父正在徐家汇，他把一枚圣心圣牌投进火场，同时许愿做几台谢天主弥撒，于是风向突然转了，一切危险也即解除了。[5]

在 1854 年至 1856 年间，对上海城来说，是一个痛苦残酷的时期，教区也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十名年富力强精通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神父修士，都染上不同疾病而死去，[6]

---

① 见本卷第 223 页。

② 郎怀仁 1854 年 3 月 2 日致省会长信，见《法信》2667。

③ 1853 年 12 月日记，见梅西埃：《"贾西义"号在中国海上之战》，第 366 页。

④ 见本卷第 224 页。

⑤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 123 页起。

⑥ 伊再可神父死于 1854 年 5 月 1 日，卜亦奥神父于 1854 年 6 月 9 日，石怀德修士于 1855 年 5 月 22 日，翁毅阁神父于 1855 年 7 月 8 日，伏伯禄监会铎于 1855 年 11 月 21 日，南格禄神父于 1856 年 7 月 17 日，马奥定神父于 1856 年 8 月 15 日，以上各位都死于徐家汇；高慎思神父于 1856 年 11 月 3 日，范廷佐修士于 1856 年 12 月 31 日，这两位死在董家渡；魏道味神父于 1854 年 8 月 23 日死于崇明。

死者占了全体外国教士的三分之一。除了魏道昧神父突患闪电式的霍乱，不能送来上海而死于崇明外，其余的都先后死在徐家汇或董家渡。教区初创时的四位会长也在那时过世。翁毅阁和伏伯禄二位会长的死，我在上面已提及了。①

卜亦奥神父在解除会长职务后，于1851年被派往松江府的青浦县，后来又调到浦东北部；由于劳累过度，使他多年的肺病陷于不治的绝境。至于南格禄会长，我们已见他专心管理修道院近七年之久，开头在张家楼，继而在董家渡；他既当院长又当教授，虽有徐类思主教的影响给他造成了困难，但他还是对年青的本地神职人员作出了很多宝贵的贡献。②

1856年初，他的体力已不允许他再搞教育工作，修道院乃由李秀芳神父管理，而他则被派到靠近松江的泗泾本堂区，暂时代替另一位神父工作几星期；他强忍劳累，而劳累又加重了他的病情；梅德尔会长得知后，就亲自来看他并把他带回了徐家汇。在那里，他又折磨煎熬了两个多月。当逼近死亡时，梅会长请求这位可敬的教区奠基人，祝福当时正在徐家汇度暑假的神父们；他纯朴而又令人尊敬地祝福了在场众人。他的谦逊、苦修③和光明磊落吸引着人们；总会长神父任命他重当会长的信，在他死后不久才收到；赵方济主教曾要求过，请他做自己的助理主教，孟振生主教提议把自己教区的一

---

①② 见本卷第339、123页。

③ 薛孔昭神父给我们保存了一件有趣的轶事，证明这位尊敬的教区创始人的苦身克己的修养。一位新传教士来接替他的本堂区，那里除了南格禄神父外，还没见过其他耶稣会神父。这位新传教士在到任的第一天晚上，见人们忘了给他送晚饭，他问了以后才发现，南格禄神父原来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他只在船上吃几颗栗子就算了。教友们因此以为耶稣会会士都是这样天天守大斋的。见《南格禄神父传》，第11页。

部分委托给耶稣会，曾指定他去担任第一位宗座代牧。① 他对本地神职和修道院修士们的影响，是其他欧籍神父所望尘莫及的。凡是同他来往过的人，同他接触过的人，无论在通信或谈话中，都对他留有超凡入圣的印象。他从中国寄给总会长神父的信，也都证实了这一点。②

善良的辅理修士石怀德是值得特别悼念的。上海被红头占领时，他协助梅德尔神父创办董家渡医院。③ 战后，医院继续开办；附近贫苦的老百姓都熟悉去医院的路，或把病人抬去，或去要些药品，"这位相公对任何来者，总是诚恳、和蔼可亲的。他耐心接待病人，仔细倾听病家的叙述，并好言抚慰，以减轻他们的痛苦"。④

上海城收复后的几个月，住院病人有时竟多至三十人，而每天还有上百个病人来看门诊或换药。在石修士的指导下，有两人成了护士；人们正期待着这慈善事业取得更大成就，但天主却另有圣意。1855年5月，这位可爱的修士出诊到张家楼为一个患毒疮的病人包扎，在一只破旧的小船上受到了狂风骤雨的袭击；回来时他便觉得精疲力竭、劳累至极，不久转成了伤寒。人们把他送到徐家汇，5月22日他安然逝世了。梅德尔神父在信上继续写道："我们的中国人悲痛难言，熟悉我们的欧洲人也很伤心，众口一词地不断称赞这位好修

---

① 见本卷第205、329页。在翁毅阁神父的一封信里着重指出，徐类思主教对南格禄和梅德尔两位神父的控告，无疑是使他俩失掉了江南主教冠冕的机会。而他俩对这位好心的教长却都感到由衷的感谢（1856年4月6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② 见《中总》，第3卷第1章第3—27页。

③ 见本卷第287页。

④ 梅德尔1855年5月3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06页起。

士的热情、忠诚、谦虚、和善。六、七百个伤兵或病人，在他的治疗和照顾下，领了洗礼，在他之前进了天堂。"①

1855年9月6日和1857年1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出葬仪式，护送亡者的遗柩到圣墓堂——耶稣会在上海的公墓；在围城战的恐怖中荒废了的公墓，现已按原样整修一新。此后，这座公墓成了人们景仰的地方。②

好几个乡村本堂区是属于徐家汇会院的。负责这些本堂区的神父们的通信，给我们留下了好多有关的记录。

横塘本堂区以有蔡家湾孤儿院而享有荣誉，它是由"圣婴会"的慷慨捐助而发展起来的。1855年，孤儿院收养着一百二十二个孩子。当时盖造的新屋足足可以收养两百个孩子。夏显德神父把这一队小百姓安排得有条有理，他委托年长的孤儿去照顾年幼的，所以院中秩序井然。有几个从上海骑马来此郊游的欧洲人，曾闯进孤儿院，亲眼目睹孤儿院的情况，是孤儿事业的最好见证人。他们中有人写信给梅德尔神父说："当我看到这些小工人，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向您表述我的感觉。他们面目清秀伶俐，工作也有条不紊，熟练安详。看着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领导起他们的小伙伴来，好似当了二十年的老师傅那样，这难道还不够令人惊奇么。"③

1855年，负责横塘本堂区的薛孔昭神父，在耶稣会的旧

---

① 梅德尔1855年5月3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09页起。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96、142页起。薛神父指出，上海城被围时，董家渡会院所做的好事令人念念不忘。当时，按圣教礼仪从大堂送殡到墓地时，棺柩所过之路，居民都自觉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一路上秩序井然。

③ 梅德尔1856年10月6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899页；又夏显德报告：《婴年》，第7卷第370页起；第9卷第50页起。

住院内创办了一项前途光辉的事业。他把老会院改名“圣母院”，集合了一些切愿献身传教事业，特别肯为管理小学校和孤儿院工作的好多名贞女；不久，就有十来个贞女汇集来了，她们不发圣愿，但须遵守由薛神父拟订，经赵方济主教和伏伯禄监会铎批准的生活准则。①

创办人薛神父离职他调后，由夏显德神父继续指导这项工作，虽然他人在蔡家湾，但他仍尽其所能地去关心、培训这批贞女。②

七宝本堂区，包括上海四周，由于上面讲过的种种情况，这个时期发展得很快。年文思神父从法国回来后（1853年至1854年）负责这个地区，此后，由鄂尔璧神父继任。直到那时，上海北面的一些县里教友很少；1855年，鄂尔璧神父有机会坐着轿子在这个地区走了整整一天，可一路上竟没有碰到一座教友的公所，他感到非常痛心。他祈求圣若瑟，并许愿把他所能建造的圣堂，都奉圣若瑟为主保。③

此后，几乎立刻就有一些人前来要求奉教，从1855年至1860年，一股认真的归化活动出现了。鄂神父巧妙地利用法国海军曾给上海官员们帮过大忙的机会，得到在一些县城及重要市镇上安居下来的许可。很快，就在鄂神父的小堂周围，要求奉教的人汇集成一片；五年之内，受这样培训的就有一千多人。1855年开头几个月里，天主上智给他派来了一位

---

① 横塘这个小会口却是江南教区的三大事业：修道院、孤儿院和“圣母院”的摇篮。关于这些事业的初期情况，见薛孔昭：《婴年》，第10卷第214页。

② 见费赖之：《江南教区》，第70页；又费都尔1855年9月2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53页。

③ 鄂尔璧1857年7月7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0页。

卓越的助手，那就是张尊三(保禄)。他原是个吃长素的佛教徒，他归化于天主教仅仅只有一年。由于他能言善辩，特别是他出奇的圣德，至今仍为江南教区传教先生的模范。他乐于忍受辱骂、冷遇、挨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一切机会来宣传自己的信仰。他创办、奠定了十二只会口，① 至今这些会口仍然很兴旺发达。由于这位热心传教先生的信德，他多次奇迹般地治愈了病人。

在鄂尔璧神父奔波传教时，往往会接触到当时也已开始在郊区活动的上海耶稣教牧师。鄂神父把他们的传教方法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他们经常坐着为他们专用而又很舒适的中国小船，船舱里装满了圣经和其他书籍。到了一座县城或市镇口，他们叫一个仆人陪着，走遍主要街道，把所带书籍分送给向他们要或没有向他们要的人们。如果这些牧师先生们知道中国人怎样处理这些书籍和准备派什么用途的话，那么，肯定他们会立即放弃这种传教方法的了。牧师把书本分送完毕后，通常在事先布置好的庙里，作一整天或一连几天的布道。中国人便奔走相告，象看社戏似的来看外国人。不用多说，在中国如在欧洲那样，这些布道的内容不外乎是贬低天主教为教皇主义的偶像崇拜者……但究竟有没有中国人归顺耶稣教的呢？我说：既有，既没有。说到有，我们认为归顺者大多数就是牧师们的佣仆，他们知道这是不可缺少的赚钱条件；此外是几个善良的老太太，她们每星期或每月到礼拜堂听道，

① 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606页起；又莫光被：《鄂尔璧神父传》，第37页起。鄂尔璧在书信里，也常用得意的笔调，描述这位传教先生的品德和传教成绩。见《通讯》，第3卷第215、362、376页；第3卷第39页。

也多少有些收入。说到没有，我们认为真正真心诚意的归顺，真正移风易俗、遵守宗教规条的人，那就不敢说有了。事实证明，这些中国的耶稣教徒，当他们在牧师处再也得不到什么，或不再从属于他们时，他们就再也不想去礼拜堂了"。①

鄂神父对牧师们认真办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评论，就不同了。他证明上海差会派来的某位医生，走遍各个乡村专做好事。他特别指出好几位牧师，用他们的翻译作品和出版刊物影响了一些上层人物。"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牧师先生们对于汉学的研究，比起今天天主教的传教士来，他们已领先了一步。天主教传教士人数既少，又太忙于教友事务，以至没有时间去研究中国语言"。②

青浦本堂区当时（1853年至1859年）由丁恭恩神父管理；地区内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河浜大大方便了传教工作。在1854年至1855年，丁神父听了七千到八千个神工。丁神父回到徐家汇歇夏时，愉快地写道："我认为我的教友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尚未砸断魔鬼的锁链。"③

丁恭恩神父还对我们描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些事情发生在一所很特殊的会口里，它地处诸巷镇，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会口之一。该处教友拥有出海的大沙船，往来经商于上海和辽东之间。在战争恐怖年代，当上海商业大受损失时，这些虔诚的教友们明显地得到天主特别的祝福。当教外人的沙船遭到长江口海盗们的敲诈和抢掠时，诸巷会的沙船几乎总是平安通过；船主们讲起在种种惊险情况中得到天主特别保佑

① 鄂尔璧1856年7月1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70页起。
② 同上。
③ 丁恭恩1855年7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329页起。

时，更是感慨万千而坚定了信仰。例如：有一天，某沙船被一只武装了的海盗船盯住了，沙船塞了价值几百法郎的钱作为借贷，就脱险了；另一条沙船，已遭到海盗袭击，正处在危急时刻，却得到了另一艘更大更快的教友沙船的救援。总之，在1854年至1855年这段时期，教友船主们挣得了四倍于本金的钱。他们慷慨地捐献出大量的钱来建造一座圣堂。这座壮丽宏伟的天主堂于1848年初动工建造，估计至少要花一万以上的银元（约合五万法郎）。集款的办法是向每一艘教友沙船征收百分之二的利润。在该圣堂内举行的宗教仪式的丧礼十分隆重，中国人尤其非常重视追念祖先，所以在追思已亡节① 后八天内，花钱很多。丁神父写道："试想一座价值五百法郎的追思台，搭在全部中国式而又非常壮丽的圣堂内，而且又有近百支蜡烛点缀着，能不光辉夺目！你更难想到，那个捧着十字架，屹立在追思台前有一小时之久、一动也不动的那位严肃的人物，正是会口的主要办事人：他本人就有三艘大沙船，拥有百万家私；那个拿圣水壶的青年，就是他的独生子；其他辅礼的也都是沙船的船主。"②

这些大沙船的船主们为了逃避流窜在乡村的太平军的迫害，不久就离开了诸巷来到上海，他们就促成了今日董家渡这座既富裕而又热心的市区大堂。③

松　江

在这个总铎区内，好几位中国神父是旧南京主教区留下来的神职人员，有的是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老学生，他们同欧洲传教士合作得很好。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沈玛窦神父，他曾带领教友反对过耶稣会和罗伯济主教。④ 现在他们已言归于

好，沈神父退居在佘山山脚下的张朴桥，照管该堂口及其附近的教友。

当时，神父和教友不断地在追究发还松江府城内一座老教堂的问题。法国驻中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于1853年到上海时，[5]赵方济主教也曾请他向当时正在苦求法国海军帮助共同攻打太平军的中国省级大官重申，发还那座天主堂。[6]

江苏巡抚承认，这是属于应当发还的教产。但他声明不能因教士之故，允准外国人潜入松江。为此他答应归还旧的教产，只要法国公使正式承认松江府城不是开放城市，并承认外国人不得在那里建宅定居。当巡抚的答复到达时，布尔布隆已动身到澳门去了。赵方济主教和爱棠领事认为承认这个条

---

① 追思已亡节在11月2日，天主教称11月为追思月。当时诸巷教友出海的大沙船有四、五十艘，其他走内河的还不计在内。诸巷会这座圣堂曾几经沧桑，沙船业既废，教友亦四散，约在1848年，该地本堂神父把建筑材料拆卸他移，改为别用。——译者

② 丁恭思1855年7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240页起。

③ 徐家汇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徐家汇会院			七宝塘湾本堂区	
1853—1854年	郎怀仁	禄理格	罗德莅	年文思	高慎思
1854—1855年	郎怀仁	计依赖	罗德莅	鄂尔璧	高慎思
1855—1856年	郎怀仁 利庸乐	德良弼	罗德莅	鄂尔璧	高慎思
1856—1857年	梅德尔 利庸乐	兰廷玉	罗德莅	鄂尔璧	

	七 宝	横塘和蔡家湾		青 浦
1853—1854年	李路加	夏显德	薛孔昭	丁恭思
1854—1855年	李路加	夏显德	薛孔昭	丁恭思
1855—1856年	李路加	夏显德	马理师	丁恭思
1856—1857年	李路加	夏显德	马理师	丁恭思

④ 见本卷第96页。

⑤ 见本卷第224页。

⑥ 见本卷第278页。

件，可能引起将来无休止的麻烦，因此就把这件事搁置了。①

但赵主教肯定，问题早晚会圆满解决的，因为当他回欧洲时，曾宣布愿把松江的神父住院以及其他教产全部让给耶稣会，只保留上海城内的神父住院，这住院不久也必将收回。② 这些希望还要悬空很长一段时期。关于松江总铎区内的其他本堂区，我们也没有其他特殊详情可以提供。它们离上海较远，受战争的痛苦也较少，而圣婴会的育婴事业③ 在那里也发展得特别好。④

浦　东

这个广阔的总铎区有七十所会口和一万二千多名教友，可是只分为南北两个本堂区：谷振声神父担任浦东南部的本堂有十八年之久；而浦东北部则在 1853 年以后才由费都尔和罗礼思二神父相继负责；浦东南部本堂区的中心在汤家巷，浦东北部的中心是唐墓桥。当时在浦东，学校事业办得特别

---

①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621 页；爱棠先生 1854 年 12 月 6 日致赵方济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8。

② 见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622 页。

③ 卜理奥 1858 年 8 月信，见《通讯》，第 9 卷第 98 页起。

④ 松江总铎区负责人名单：

	松　江		浦　南	
1853—1854 年	德良弼	鄂尔璧	罗礼思	宫良仁
1854—1855 年	年文思	翁毅阁	卜理奥	
1855—1856 年	年文思	薛孔昭		
1856—1857 年	德良弼	薛孔昭		

	高　桥	马　桥	张朴桥
1853—1854 年	马奥定	伊再可	沈玛窦
1854—1855 年	罗礼思	马奥定	沈玛窦
1855—1856 年	卜理奥	马奥定	沈玛窦
1856—1857 年	卜理奥	马奥定	沈玛窦

发达。1854 年 6 月费都尔神父在信中说，他的中心学校是专为培养小学教师和传教先生的，还培育一批有志修道的学生；该校有学生二十五名，聘请了四位老师。所属各小堂口有自己的读经小学；有十二所小学因实在太穷，就由传教士出钱资助。自从耶稣会来到浦东后，学校的数字增加了十倍。①

郎怀仁神父恢复了旧耶稣会神父的圣母会，② 它继续指导教友修德成圣。农历每月第一个主日，圣母会会友聚集在四座主要圣堂内做会期，恭念玫瑰经和其他敬礼圣母的经文；神父给他们作一次训话，神父不在时，则由一名会友领念一段圣书；圣母会会友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在教外人中开展传教活动；往昔，一名圣母会的预备会员，在被接纳入会当众念"奉献给圣母诵"之前，必须先劝化四名教外人进教。费都尔利用这个先例，激励他的优秀教友们的传教神火。③

谷振声神父对浦东南部也作了类似的工作报告；他特别强调慷慨好义，鼓励教友们过继、抚养被弃的孩子；在他三十来座堂口内，容纳了由教友人家收养的十、二十、三十甚至五十个小女孩，成了一所真正的孤儿院。④

罗礼思神父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是值得一提的，此外他在松江总铎区和浦东总铎区还积极地从事于传教工作。当时，人们提议在江南建立天文台，罗神父为了能胜任这个管理工作，曾在法国受过精心的培养。⑤ 由于传教的需要，迫使这项

---

① 费都尔 1854 年 6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8 卷第 74 页。
② 见本卷第 239 页。
③ 费都尔 1854 年 6 月 18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77 页起。
④ 谷振声 1857 年 7 月 4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23 页。
⑤ 见本卷第 165 页。

科学工作一时不能开展，这位物理学家便成了一名积极的传教士。但在他艰苦的传教工作中，他仍不忘上级派他来中国的目的和对他所抱的希望，他写下了不少关于物理学、自然科学的种种学术论文，当时在法国得到好评。我只略举其中一些主要的论文：《上海地区摇船的橹》，这篇是和"贾西义"号军舰上的海军上尉克莱克协作写成的。再有《中国砖瓦淬火术》、《酒药》或《中国人的酿酒药》、《养蚕学》及《中国的绿色颜料》等。①

这最后一篇是应里昂制造商的要求而写的，他们想知道中国极漂亮的绿色丝绸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怎样加工染成的。这篇论文曾再版多次。②

苏　州

这个时期，南京主教区的一位优秀的中国司铎沈西满神父的逝世值得一提。他曾经大力赞助召请耶稣会重返江南。在宣布米郎达神父被提名为南京主教时，也幸亏了他才避免了一次裂教行动。③他常常驻在这座文化大城苏州，深受人们的尊敬。1856年，正当徐类思主教拟请他作伴同去湖北时，

---

① 这些论文发表在教会出版的《学习与研究》杂志上，见第1卷第1章第442页，第3章第485页；第2卷第2章第484页；第3卷第7章第528页；又《通讯》，第3卷第358页起；索梅尔沃热尔：《图书馆》，第4卷第262页。

② 浦东总铎区的负责神父名单：

	浦东南部	浦东北部
1853—1854年	谷振声	费都尔
1854—1855年	谷振声	费都尔
1855—1856年	谷振声	费都尔　罗礼思
1856—1857年	谷振声	费都尔

③ 见本卷第95页。

不幸他在苏州逝世了。①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徐家汇大堂于1856年6月22日，②为他灵魂的安息举行了大礼弥撒和追思。他在临死之前，曾把南京主教区的教友们向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呈请征召耶稣会会士重来江南，写在白绢上的一份申请书的复本，交给了李秀芳神父；申请书共有三份，一份呈教宗，一份呈耶稣会总会长，一份呈葡萄牙女王。③

圣家书院的龙保理神父负责常熟及其附近的一些美好的会口；有两位和他同是那不勒斯修道院的成员的中国神父④协助他的工作；在这个总铎区，耶稣会神父只作为助手，一直到年文思神父被任命为代牧主教为止。⑤

徐类思主教在离开教区时，指定龙保理神父为中国神父们的副主教，驻在董家渡。当教区托给耶稣会时，苏州总铎区仍保留给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传教士，而龙保理神父就是他们的当然总本堂了。⑥

不久，龙保理去罗马活动，推行他那早已设想停当的计划，为圣家书院争取得到安徽省，而他本人就可当该省的宗座代牧了。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上级驳斥了他，因为圣家书院的办院目的就是为中国培植本地神职，而不是去管理教区。⑦

---

①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626页。

② 见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20页起。

③ 郎怀仁1855年11月3日致省会长神父信，见《法信》2667。

④ 见本卷第251页。两位神父是：顾安德、张玛塞。

⑤ 指薛孔昭和马义谷两神父。见本卷第251页。

⑥ 年文思1856年8月19日、9月26日致传信部部长枢机主教信，见《徐档》，卷宗B_4。

⑦ 枢机主教巴尔纳博1857年12月5日信，见《徐档》，卷宗 B1。

传信部也不接受他的计划，龙神父就再没有回到教区来。他后来在耶路撒冷拉丁区宗主教府供职。他同江南教区的神父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① 方济各会会士卡洛齐神父也曾在苏州总铎区传教过：后来他受了传信部驻香港办事处的方济各会帐房神父昂布罗齐的委托，要他在上海建立一所帐房，但没有成功，② 卡洛齐就重回到方济各会传教的山西教区。③

崇明及海门

一件悲痛的事情考验着这两个总铎区。原来魏道昧神父和葛必达神父同是这两个区的真正组织者，特别是他俩，使圣婴善会的事业在这地区有了迅速的发展。④ 1854 年 8 月 23 日，魏道昧神父死于一场闪电式的霍乱。年文思神父在写给省会长神父的信中，给我们描述了有关这位传教士的最后工作和死亡的详细情况。⑤

在徐家汇歇夏后，魏神父便回到崇明，为临死的教友施行终傅。他一连数天，在火热的太阳下，坐着小车长途跋涉。此外，他那时还忙于商谈发还旧耶稣会在崇明城里的一所住院

---

① 龙保理 1858 年 4 月 5 日信，见«徐档»，卷宗 B10。

② 年文思 1858 年 7 月 25 日致部长枢机主教信，见«徐档»，卷宗 B4。部长枢机主教 1858 年 12 月 31 日致年文思神父信，见«徐档»，卷宗 B1。

③ 苏州和常熟总铎区负责神父名单：

	苏州	常熟		鹿苑
1853—1854 年	沈西满	龙保理	马义谷	顾安德
1854—1855 年	沈西满	龙保理		顾安德
1855—1856 年	沈西满	卡洛齐		顾安德
1856—1857 年	卡洛齐	张玛塞		顾安德

④ 见本卷第 144 页起。

⑤ 年文思 1854 年 8 月 29 日信，见«通讯»，第 3 卷第 117 页起。

的事。他在临死前的四天，写道："我向你保证，除了依靠圣宠支持我的精神和心灵外，我必须在本会另找不可缺少的、足以激励我这个可怜人的力量；没有它，我休想在这里站住脚。我向你坦率地表明我的感受，请你为我祈祷，使我不致在奔波中倒下。"①

8月21日，他给七个病人施行终傅之后，便渡过把崇明和海门隔开的长江支流，到柏理师神父处办了神工。整整一天，他在那里过得很愉快，毫无病态。8月22日至23日的夜里，一场凶险的霍乱突然发作了；神父神智非常清醒，他领受了终傅，于23日早晨逝世了。当悲痛的消息传到徐家汇时，人们正在庆祝监会铎伏伯禄神父及其同伴们到达上海。我摘录年文思神父信上的一段话，他说："魏道味神父的一生，是表现活泼的信德和热烈的仁爱的一生；人们认为他应该受到天主的宠恩和人们的爱戴。"②

教友们对魏道味神父表示了极深沉的哀悼和尊敬。他们虽然很贫穷，但他们却要求把魏神父安葬在他们的坟地上。他们到海门迎运他的遗体，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很多人悲痛得如丧考妣，长期为他戴孝。魏神父安葬在崇明的大公所附近，在千百个领洗后就死去的孩冢中间。这些孩子是因他而得到永福的，从今以后就和他永远在一起了。③

当这个悲痛的消息传到徐家汇时，崇明的总本堂禄理格神父正在徐家汇歇夏。他立即返回崇明。平乃公神父被指定

---

① 年文思1854年8月29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22页。

② 同上，第117页。

③ 禄理格：《崇明史料》，见《徐档》，卷宗H4；又伏伯禄1854年10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139页起。

接替魏道味神父的工作，由他继续商谈有关归还崇明老堂的那件棘手的事。最后终于成功了。原来在雍正教难中，彭加德神父离开该岛前，曾把这所圣堂卖给了一名教友，因此圣堂才没有被充公。这名教友的子孙已移居海门；他们把这份卖契文给平神父，平神父也偿还了他们祖先当年所付的那笔款子。按照剌萼尼先生所获得的上谕，圣堂和神父住院都应该发还给教区。但教外人已住进了邻屋，并把圣堂改作他们停放棺材的厝舍；有些教友也住在神父的旧住院内，无限期地拖延着搬迁的日子。这样经过磋商交涉，一直拖了几年，直到1858年才解决。梅德尔神父和敏体尼先生来岛视察（详情我在下面将叙述），得到县长批准，正式把圣堂和神父住院归还给平乃公神父。平神父叫人把旧建筑整修一新，并派了一名教友老师驻进那里，既掌管学校又为来参观的教外人宣传天主教。①

1854年，赵方济主教去岛上巡视，并给教友们施行坚振。整个的10月份，他的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主教由监会铎伏伯禄神父和代权郎怀仁神父陪同着。禄理格、平乃公和柏理师三位神父作前驱，他们提前一天到达主教所要去的堂口，以便给那里领坚振的教友们作好准备。巡视的效果很慰人，伏伯禄神父在他写给法国神父们的信里，生动地描述了崇明教友的信德和诚朴以及教士们忘我牺牲的工作精神。②

主教的巡视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他亲自讲解教理，料理一些重大的事情，颁布若干必要的公补赎。在主教行列所到之

① 禄理格：《崇明史料》；高龙鑒：《江南传教史》，第684页。
② 伏伯禄1854年10月信，见《通讯》，第3卷第135页起。

处，无数教外群众肃静围观，都表示尊敬和好感。

主教在这次视察中作出了两个很有成效的决定。首先是取消许多家用的私堂，这是教难时期的产物，而代之以一定数量的中心圣堂，在那里举行宗教礼仪更为适宜，行圣事也更方便。特别是大公所，就是这样由四所小会口合并组成，并聚集有九百多名教友。①

同时，主教又决定盖造一所大的孤儿院。由于葛必达和魏道味两位神父的努力，收养弃孩和给临死病孩付洗，一开始就成为崇明教友最喜爱的工作。② 于是主教就决定开办一座中心孤儿院，它可接纳被遗弃的新生婴孩，等待有人来收养去。孤儿院于1855年建成，第一个管理人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徐龚氏，她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积极的人。她竭尽全力地工作，为育婴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头九个月，就有人把二百二十二个小孩抱进孤儿院。这座孤儿院后来就成为江南教区最美好、最光荣的一座孤儿院。③

就在这个时期，第三名传教士奉派来到了海门；敬礼"圣母月"的好风气就是当时引进的，神父必须在这个月里去各堂口轮流作一、两次探访。这样就等于第二次开四规（教友们一般称作"补四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教友们更热心地恭敬圣母。

1854年4月，伏伯禄神父到海门视察，决定在茅家镇买

---

① 禄理格：《崇明史料》，见《徐档》，卷宗H4；高龙鉴：《江南传教史》，第634页。

② 见本卷第144页。

③ 禄理格：《崇明史料》，见《徐档》，卷宗H4；又伏伯禄1855年11月1日信、禄理格1855年10月15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63、270页起。

进一块地皮，建造神父总院和中心学校。在海门和在崇明一样，也开办了一座中心孤儿院。此外，在1856年，还成立了若干托儿所。李秀芳神父在写给省会长神父的信中说："这只是些用芦苇和稻草盖造的茅屋，屋内家具是几张小床、十二只摇篮、两或三只小凳、一张板桌和一盏油灯……三、四名女教友负责着这几间简陋的孤儿院。她们总共收了男、女孩子一百名，年龄多数是两、三岁，此外也有九至十二岁的。"①

海门居民诚朴的信德象崇明人一样，使监会铎喜出望外。应当承认，这种朴实有时未免过了头。伏伯禄神父举了一个最近发生的、典型的例子。② 某个坏教友是个惯偷，他是地方上的耻辱，但同教的乡亲们不敢向衙门告发，生怕官老爷乘机抢劫堂口。因此他们就私自判决罪犯，处以火刑。他们在深夜突然袭击了他的家，把惯贼捆绑了拖到旷野，"那里，教友们男男女女聚集了一大群，各人拿着一束稻草，把稻草堆在囚犯身上，继而就点火燃烧，同时他们向这个可怜的受刑者高喊，叫他快快发个真心痛悔"。③

西　教　区

我们已经见到，这个所谓西教区的范围，从无锡一直延伸

---

① 李秀芳1857年4月27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6页起；又伏伯禄1855年5月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92页。

② 同上，第194页。

③ 崇明和海门地区负责神父名单：

	崇　明			海　门	
1853—1854年	魏道味	禄理格		李秀芳	柏理师
1854—1855年	禄理格	平乃公		马义谷	柏理师
1855—1856年	禄理格	平乃公		马义谷	柏理师
1856—1857年	禄理格	平乃公	卫德宣	李秀芳	鲁通骏

到教区的边界，占了江南四分之三的面积。[①] 当时，在那里开展传教工作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非常危险。太平军直上天津、北京后，虽然受尽挫折，但仍坚守着镇江以下的扬子江流域，继续不断地袭击长江南岸和运河一带。[②]

清朝官兵围剿太平军，他们组织舰队，并在镇江设下大营。清兵和太平军的军纪一样恶劣；一个外国人要在这些专事抢劫而又极残暴的兵匪军队中通过，那是令人担心的。探访该区最前方的教友会口的葛必达和桑理爵两神父，是从众神父中选拔出来担任这项艰巨和危险的工作的。他俩的勇敢和机智灵活，敢去北方探访被遗弃的教友的精神，在教区史上是值得另写一页的。

1853 年，李秀芳、马义谷两位神父徒劳无益的一次探访以及同年年底，"贾西义"号的南京之行，都证明要去北方是非常困难的。[③] 如果从镇江对面的丹徒，即运河入江处坐船，船肯定会被清兵扣留。所以只有放弃走平时最稳妥的那条水路——运河线，改走内地陆路北上。

1854 年 5 月 2 日，葛必达神父在无锡过了冬，又坐船去运河边的丹阳，他绕航避开了常州，因为那处的清兵统领是一个出名的残暴和仇恨天主教的家伙。葛神父在丹阳教友中过了八天；那些能从镇江逃出来和生活在附近的教友，都来会集了。清兵部队里的许多信教的福建兵，也趁机来堂领了圣事，尽了教友责任。

5 月 15 日，葛神父离开丹阳，也离开了两岸由清兵看守

---

① 见本卷第 250 页。

② 高田：《远东》，见《通史》，第 11 卷第 721 页。

③ 见本卷第 276、289 页起。

着的运河，神父舍舟登陆；他雇了一辆独轮小车载行李，自己步行着向南京附近走去。路上有三段艰险的路程，每天须经受连续十二至十五小时的炎夏天气的酷热。在句容县附近，为了逃避最后一段旱路，葛神父雇了一条小船，船主人满以为能平安地送客人到离南京只有几里路的方山脚下的花林镇，因为从南京逃出来的教友正在那里避难。

5月16日至17日夜里，由于前两天的劳累，葛神父和他的传教先生感到精疲力竭，正在船上酣睡，一阵可怕的喧闹声把葛神父惊醒了。两艘满载官兵的大船把这条可怜的小船扣住了，带领这些官兵的一个下级军官正在开始搜船。他一见神父的祭箱，① 即联想到可能与太平军有什么联系，因为当时人人都知道耶稣教是同情太平军的；于是队长就恫吓神父，扬言要把他淹死，传教先生和带路人都被捆绑了押上官兵大船。神父因为是个洋人，他们还算对他尊重，只把他扣留在小船上。神父却声明不愿和自己的同伴分离，于是也就跟着他们一同上了大船。在大船上，神父的同伴们遭到棍打，那军官把痰吐在葛神父的脸上以此来侮辱他。葛神父的态度十分镇静，答问非常明确，尤其当他出示了敏体尼发给各个传教士的护照时，那个军官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那个军官深知上级的意旨，要尽量避免同洋人发生纠葛；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道歉话，就把抢掠去的东西，几乎全部送还到神父船上，并让小船开走。

5月17日，葛神父到了花林镇，从南京逃出来的教友已

① 祭箱是神父出门远行时，装着为做弥撒用的一切宗教用品的箱子。——译者

经在那里等候了。留在城里的只有十来名男教友，其中大多是有病和没法逃跑的。还有十五、六名女教友，因为妇女抱着孩子是不准通过城门的。出于母爱，她们就被迫留在城内了。逃出来的教友聚集在花林镇的一所租来的空庙里。葛必达神父从这些教友那里获得了有关太平军攻占南京时的经过情况，他们叙述的情况比第一批逃来上海的教友所叙述的更为详细。①

从这些教友嘴里葛神父还知道了禁闭在公所里的女教友们的情况。在六个月之前，当他第一次乘"贾西义"号军舰作南京之行时，他还不敢同她们取得任何联系。②

原来，这些女教友一连数月集中在一起，专靠做手工活命。她们彼此相互勉励，决心坚持信仰。她们最担心的是怕她们中有人被选送到某王府去充当宫女。由于她们的机智，特别是天主的保佑，使她们摆脱了这个灾难。她们还能保护自己的子女，因为太平军到处寻找儿童，精心培养他们，长大以后，男的当兵，女的充婢妾。女教友们在被禁闭了几个月之后，几乎全部逃了出来。这些勇敢的女教友，在南京不顾自己的危险，给大批临死的孩子们付了洗，还劝化了好几个被关押在同监中的教外妇女。这些女教友虽然多年来心灵上得不到帮助，但她们仍为教会增添了荣誉。葛神父听了以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都热心地满了四规。葛神父开了一所学校，有二十五名孩子上了学，接受宗教教育。其中有几个是曾在太平军面前直认自己信德的勇士。后来葛神父觅得了一个可

① 见本卷第267页起。
② 见本卷第293页起。

靠的送信人，给尚留在南京城里的教友送去了经济上的援助，又指示他们怎样应付困境。

当葛神父留在花林镇教友中时，有两位教友军官，大概具有中尉、少尉军衔的，非常纯朴地也来履行了教友的本分。其中一个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冒充太平军深入南京城里，救出了好几个险遭侮辱的妇女。

葛神父在花林镇的一座小山上，了望宏伟的南京城，见到那座举世闻名的瓷塔还屹立着；四面环绕着太平军的红色营帐和清兵的白色营帐。这位教士忧郁地黯然自问，在双方的营帐中，不知究竟那一方的残暴作恶更为突出。①

葛神父在花林镇逗留了十五天后，又继续他那危险的旅程。为了要从扼守镇江的清兵船队背后渡过长江，他就顺流而下。后来，他到了一家离扬州约一里路的教友家里。扬州城里的教友陆续来找神父，陈诉一年前太平天国攻占扬州城时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太平军在扬州不如在南京时那样残暴；在背教问题上，当教友们明确地断然拒绝后，他们不再来麻烦了；会口里有一个模范贞女，由女教友推荐作领袖，她们做针线活，太平军付给相应足够生活的工资。后来，骇人听闻的瘟疫发生了，"这次的灾害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官方记载，这次死亡人数竟达十万人之多；许多教友就死在这次瘟疫中。"在教友弟兄们的帮助下，他们都象义人一样死去，俯首忍受，听凭天主圣意"。太平军兵士也有大批死于瘟疫的。后来，由于他们人数太少了，只得从城里撤退，清兵便乘虚而入，城里

① 这段叙述是我从1854年5月25日葛必达神父写给布尔布隆夫人的信里摘取的，翁毅阁神父在《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中（第390页）也引用过。

的老百姓不久就想念起太平军来了。①

扬州以北的形势更不好，神父无法去那里活动。因此，这年淮安和五河的教友都没有得到神父的探访；葛神父在6月底返回了无锡。

这年冬天，葛神父就在无锡渔民中过冬；渔民们的小堂也陆续修建好了，后来接替他的教士，也都占了他的建筑技术的光。②

从1855年2月开始，葛必达神父做了避静后，又离开上海重去巡视西区。由于辣厄尔将军这次对清皇朝的效劳，使法国教士的传教工作更为便利了。路上，葛神父遇到了江苏巡抚的队伍，原来巡抚是怀着收复上海城的自豪感，带领他的胜利的部队准备前去围攻南京；这部队竟毫不刁难便让葛神父通过了。葛神父在和花林镇当地的和避难来的南京教友再次相遇后，又获得了不少太平军和清兵双方的详细内幕；他把这些情况都忠实地给爱棠先生汇报了，结束了我们的领事认为叛乱分子是耶稣教的幻想，但至今许多英美人仍坚持这个看法。太平天国的王爷们认为南京城里分别囚禁在各院各宅的妇女是个累赘，在1855年初，他们便决定，把这批妇女连同被弃的无主房屋一起分配给属下士兵。一连几天，南京城里各处大办喜筵，煞是热闹；可是有几百名女子，却宁死不肯受

---

① 葛必达1854年6月10日致布尔布隆夫人信，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37页。

② 桑理爵1855年7月18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232页。下面叙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当时最狂妄的官吏也是尊重法国的。1854年10月底，有个十分能干的传教先生被扣留并遭到一顿毒打，又被常州知府认为是私通太平军的暗探而关进监狱。要使这个人获得释放，只要神父恐吓一下，说要到领事那里去控告，就起作用了。

辱。双方军队的战斗依旧绵延不绝，而且越来越激烈；暴露了太平天国毫无控制局面的能力。清兵方面的教友军官给葛神父提供的情报对法国的官员来说，当时确是非常宝贵的。①

葛神父在南京和教友们相处了半个月之后，又动身前往扬州，后又沿大运河北上，于5月10日到达五河。五河已有两年没有神父到过了。在县城附近的张家庄堂里，首先引他注目的，是停放在小堂里的马再新神父的遗柩，我在上面已经讲过。②

葛神父从教友处了解了马神父最后数天以及临死前动人的详细情形。在当时尽可能做到的条件下，葛神父隆重地为马神父举行了追悼礼仪。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为三百多名五河教友讲道行圣事。五河教友几乎全部陷于极端的贫困，但他们还竭力设法维持马神父收养而还活着的三十七名孤儿的生活。这些诚实的教友们的信德与乐天知命的精神，大大地安慰了这位传教士。他听到好几个教外重病人，在接触了教友们借给他们的念珠和圣牌之后，病就好了，也有的因此而进了教，心中甚为高兴。葛神父也为孩子们办了小学。在他动身之前，爱棠先生和徐类思主教曾慷慨送给他一笔可观的捐款，因此，他能救助这里的穷苦教友，减轻了不少受苦人的灾难。③

葛神父在回来的途中，在沿运河的淮安过了几天，那里曾

---

① 葛必达1855年4月19日致法国领事爱棠信，见《通讯》，第3卷第181页起。

② 见本卷第259页。

③ 葛必达1855年5月24日致法国领事爱棠信，见《通讯》，第3卷第195页起。

有两百名教友牺牲在一个十分仇视天主教的地方官手中。6月底，他回到了无锡；在那里，他高兴地接待了一位教友老翰林文雅各的来访，他是三年前由马再新神父劝化回头的。① 他这次来访，赶了三十里的路程，穿过了好几个作战阵地，特地来指导举行告解和领受圣事的神父。②

1855年，③ 葛必达神父又一次出征，而且比前几年的更为危险。太平军得到北上直隶而南归部队的支援，开始向苏州方面进攻。葛神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想从扬州附近通过清兵的阵地。有一个坏教友，因为葛神父在上一次北上途中当众斥责过他的恶劣行为，并不许他领受圣事，因此他怀恨在心，发誓要进行报复，他已准备到城里官员处告发神父。而葛神父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危险，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葛神父直向五河前进，不曾在扬州逗留，因此避免了这场危险。④

在回来的路上，又发生了新的可怕情况。有一队官兵，举着大刀直向神父扑来，并咆哮着："洋鬼子，站住！"葛神父叙述说："我也向他们高喊着，我还叫他们不必着急，我有时间等他们。接着，你就会看到，他们那种气势汹汹的劲头消失了，而且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问我是否真是洋人。我回答：'是，而且还是法国人。'接着，我们彼此就客客气气地分别了。"可惜的是，葛神父认为事已了结，自己匆匆地走在替他挑行李的脚夫前面；不料跟在后面的官兵，扑向那个脚夫，把箱笼统统抢

① 见本卷第255页。

② 葛必达1855年5月24日致法国领事爱棠信，见《通讯》，第3卷第206页。

③ 葛必达1856年2月至7月致维莱特夫人的两封长信，见《通讯》，第3卷第291页起。

④ 见《通讯》，第3卷第328页。

走了。①

6月15日，葛神父回到了无锡，这次巡视历时四个月，行程三百里。五河、淮安、扬州、花林镇、丹阳等地他都巡视了；每个重要的教友村都没错过开四规的机会。这些正直的人得益不少。葛神父在一些书信中常常提到教友们的勇敢和信德，而清朝官兵和太平军都是荒淫无耻之徒。女教友和女孩子们处在这种境地，仍保持贞洁，宁受毒打关押，宁冒生命危险，也不愿委身求全，去满足兵匪们的兽欲。②教友们虽很贫穷，但还有人在收养孤儿，并授以宗教教育，抚养成人；重病和残废者，也有人照料。被弃的小孩受洗和教外人归化的数字和最太平的时期同样多。③

1856年7月间，太平军火烧官兵的营房（南大营）成功，迫使扎营在那里的清兵溃退。南京和镇江之间的整个地区一片混乱，老百姓公然表示反对太平军并竭力援助清兵。这样一来，胜利者兼主人的太平军便扬言定要报复，好叫老百姓吸取教训。逃亡在花林镇的南京教友和镇江丹阳的教友们，于是决定向上海方面转移，他们深信上海的神父和教友们是不会抛弃他们的。④

我们必须读一读葛必达神父在一封信中所记载的这次大

---

① 见《通讯》，第3卷第319页。

② 同上，第323页。见翁毅阁：《江南教区目前状况的报告》，第419页起。后来广西人对南京的女教友们非常尊敬，以至对她们说："我们不杀掉你们，杀了你们，你们就成为殉道者，你们可升上天堂，而我们则下地狱。我们在湖广时，有人曾杀过教友，有的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是教友，后来我们的那些人都死得很惨。"

③ 见《通讯》，第3卷第326、329页。

④ 葛必达1856年7月3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30页起。

批逃难的情况。"仗着天主的保佑，我们的教友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走完了整个路程；一路上，他们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已锻炼出坚韧不拔和逆来顺受的毅力，因此没有一个人掉队。虽然他们被劳累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常常要忍受着饥饿，至于睡觉，破庙已算是好地方了，有时常常要在露天过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坚持念自己每日的早晚课经文，甚至在菩萨像前或者当着教外人的面。母亲们忘掉了自己的劳累和痛苦，她们非但不抛弃自己的孩子，还去抢救教外人舍弃的孤儿。因此，一路上，她们始终留心要让弃儿领到圣洗的神恩。有五百多个孤儿在逃难的路上被送上了天堂。有一个贞女尤其令人惊奇。大家正在仓皇逃难时，她却把小圣堂里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裹，背在肩上。一路上，她还指挥别的妇女，边鼓励、边帮助她们，她还常常替那疲劳不堪、无力支持的母亲们抱小孩，还留心观察，以防止忘了替被遗弃的教外小孩付洗"。①

7月中旬，一百五十名属于南京堂口的逃难者就这样到达了无锡。柏理师和葛必达两位神父尽力地接待了他们，收留他们住了几天后，使他们分别登上十二艘民船驶往上海。到达上海后，人们又把他们分别安插在上海、徐家汇和浦东的各个堂口；爱棠和斯密司两位先生和上海有钱的教友们慷慨解囊，供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②

① 见《通讯》，第3卷第331页。

② 同上，第332页；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82页起。梅德尔1856年7月29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77页；柏理师1856年12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33页。

二、总　结
（赵方济主教时期教区的进展）

我们保存有从1847年以来的教务工作报告。[①] 学校和在校学生的数字，从1854年开始才有记录。教友的增长数字不大，从1847年的六万零九百六十三人，到1857年，只增加到七万四千二百九十六人。堂口的数字同样处于停滞状态：1847年三百五十一所，1857年三百九十五所。保守教友的人数总是不多，最多的要算上海城被围的一年（1854年至1855年），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名。成年人领洗也不多，最多的是在闹灾荒的1849年至1850年和上海城被围困的那年，为一千九百十八名和一千七百九十名。

传教士人数增加了近三分之一；1847年，有二十一名西洋神父和五名中国神父；1857年，有三十五名西洋神父和六名中国神父，这个数字对于向教外人大力开展传教活动来说，还是太少了；每一名教士平均应当负担近两千名教友，他们经常又是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地区，交通工具又很不完备，可想而知，每个教士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的工作量很大，因此劝化教外人只能是他们传教工作中的一个插曲。

我们已看到，在罗伯济主教管理时期，教务还是有进展的，但重点是在给教友以再教育。每年作四规神工和四规圣体的数字以及作一般的恩工和恩体的数字都有所增加，说明教友们的虔诚热心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欣慰的。1847年，我

① 总的教务报告，见《耶稣会会士录》（1908年），第104页起印有数字表。

们统计到四规神工为二万五千一百六十一人次，一般恩工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五人次，四规圣体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四人次，一般恩体一万零八百九十四人次；1857年，这些数字增加了一倍多：四规神工五万二千一百零五人次，恩工五万零一百零五人次，四规圣体四万三千六百十九人次，恩体五万零八百十六人次。如果把那些由于年龄幼小还不能领告解和领圣体的儿童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江南地方的教友在奉行教规方面的虔诚之心，实能和其他最出名的基督教国家的教友相媲美了。①

教友们和教士们一直认为最美好的圣婴善会的事业至今还在继续进行。1847 年有一千七百七十名教外儿童受洗，其中一千零四十名保养了下来；1857 年，一万零九百十五名教外儿童受洗，四千七百六十七名保养了下来。儿童付洗最多的是在饥荒和兵灾最猖獗的年头，因为那时被遗弃的小孩也最多。1856 年至 1857 年，这个数字加倍地增长，从五千八百十二人猛增到一万零九百十五人；这显然是由于从南京至无锡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大批逃来上海的结果。②

我们已经看到，在教育事业方面，开办学校是上级特别关注的，传教士们也最为重视，并认为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③我们找到 1854 年有关这方面的一个统计表。那时有一百五十八所男校和同样数字的教师，有一千六百三十六名教友学生和五百三十八名教外学生；五十五所女校和同样数字的女教师，有七百四十八名教友女生和六十六名教外女生。三年

① 按宗教仪式举行的婚配圣事为数不多，因此不能表示教友人数的增多。目前教友们在这方面已受到相当的教育了。

② 见本卷第 376 页。

③ 见本卷第 239 页。

后，学生数字增加了一倍。计二百四十八所男校和二百六十五名男教师，有三千二百七十名教友男生，七百二十五名教外男生；七十九所女校和八十九名女教师，有一千一百八十名教友女生和八百零二名教外女生。这些卓越的成绩可以说明当时传教士们付出了多大的辛勤劳动啊。从1847年至1857年，传教士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他们讲道和训话的次数却增加了将近三倍，即从一千七百三十五次增加到四千零十九次。

还有一种在法国发起的事业，就是号召教友参与传教事业。富约神父曾当过好几位江南传教神父第三年卒试时的神师，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艰苦工作。从教区的通讯中，令人注意到一件事实。这事实深深地打动了这位领卒试神师的心。那就是教区内一些老教友，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关心向教外同胞们传教，甚至有意阻挠这个工作的进行。富神父就想根据"传信会"的办法成立一个会团，其目的不是为传教区劝募捐款，而是直接向教外人士做传教工作。这些会员，十人一组，共同保证为归化无信仰的人念一定的经文，要想尽一切办法为临死的婴孩付洗，还要利用一切有利机会开导和劝说教外人进教。赵方济主教欣然批准了这个"热心传教会"，他在罗马时，还为加入这善会的会员求得了种种大赦。①

神父们在1855年和以后几年的通信中，证明这个"热心传教会"给神父们传教帮了不少忙，有力地促进和激发了教友们的传教热忱和救灵神火。②

---

① 富约1855年6月10日信，见《徐档》，卷宗B1；年文思主教还为这个善会求得了新的恩赦。（巴尔纳博枢机主教1862年8月7日信，见《徐档》，卷宗B1。）

② 李秀芳1856年5月1日信、笪良仁1856年9月29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354、384页。

附 录 一

北京教友呈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书[1]

北京原信为中文，在那不勒斯[2]译成拉丁文

至尊至敬耶稣会总会长神父座下

中华帝国教友敬向父台俯首请安

久欲奉书，陈诉素愿，终被阻隔，无任痛惜，今蒙天主宠恩及圣母慈佑，幸逢良机，得倾衷曲，斯固钧座所关注而有待于我侪者也。盖我侪原系罪恶之子，狱魔之役，既愆尤盈满而又幽链缠身，正钧座急欲出之冥狱而置之圣教自由之域者。为此我侪肫切恳求总会长神父，因天主宠爱与仁慈，尽速遣发座下所属优秀卓越之传教士，莅我中华，宏宣教化焉。

往昔，我中华举国上下，对贵会会士之钦佩企羡，实难以言语形容者，良以耶稣会士，在多方面，均较其他修会之西士为优胜，其学问道德，造诣更深，举止行动，谦虚审慎，工作不辞劳瘁，热心超越众人，此乃任何正直之士至今犹追念仰止者。忆当此辈怀瑾握瑜之士贲临我国不久，不仅受到中国人民之欢迎，即达官显宦，亦多加青睐，尤特蒙皇帝宠眷渥惠，晋爵锡禄，赐恩赏地，拨币建堂，仅京都一地，建有四座，美轮美奂，分布四门，犹四灯塔之耀被四表，促使拜偶像者弃邪归正焉。京师而外，即其他省府州县，亦各建有圣堂，行见奉教者

日众，偶像日见淘汰，圣教光扬有厚望矣。此乃二百年来，圣教在我国之实情也。

惜乎于今，思之痛心。传教士日见减少，硕果仅存者，只本国神职人员，虽在基督葡萄园中耕耘力作，但为数过少，总共仅十人耳。若辈诚如圣经所云"不见重于本乡本土"者，既不被皇上与官府之器重，又何能在此辽无边际之大国，维持教会之原状，更何敢发展云乎？其他西来之外籍教士，若辈与贵会会士又截然不同，人民远而避之，官吏厌而恶之，据此又焉能宣传福音哉？目前京内只剩老迈沉疴之主教一人，坐困愁城，一筹莫展。徒见教务日废，圣堂坍弛，或被充公，或改官邸，教友已成为失路无牧之羊，甚至有重拜偶像而叛教者，每念及兹，实堪痛心。

为此我侪肫切恳求总会长神父，尽速派遣贵会神父来我中华，疗治创伤，使信德旧根，重萌嘉荫，坚信者巩固之，重举十字旗帜奋勇前进；冷淡者炽热之，偶像毁灭之，异端排除之，而圣教得重见光扬于我邦。

兹有恳钧座尽量选拔派遣贵会中精于天文、历算、绘图、音乐、建筑、造钟制表等等专家前来中华，盖我国人，尤其皇帝和官府对此等技术学问特别爱好故也。

---

① 《中总》，第2卷第1章第4页。见本卷第30页。

② 这里的那不勒斯是指该地圣家书院。该书院在1732年由马国贤神父创立，专为培植有志去中国传教者，以及培育中国修士的修道院。该书院在1888年被意大利政府封闭，当时已培养成功一百多位中国神父。（徐宗泽：《中国教史概论》，第297页。）

此信中文原稿现存罗马传信部，此间无从查核，今从拉丁文转译。因而人名、地名、官名职衔以及年、月方面不免有所舛误，附录第二篇尤其如此，望读者指正。——译者

最后，我侪俯伏于父台座前，预致我侪之诚挚谢忱，再次呼吁恳请，并致以我侪微弱无力而从不间断之祈祷。

但愿钦崇荣福永归于天主。

一八三二年五月七日

附 录 二

北京教友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奏疏[1]

北京主教暨伯尔明祥阿皇侄殿下签准，北京全体教友叩请大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圣座圣安

至圣圣父：

圣父德高五岳，泽被四海，遐迩闻知。此间与圣京相距万里，远隔重洋，罪仆等亦有风闻，故敢冒昧上疏，干渎宸聪，伏地哀恳圣父救援，使罪仆等摇摇欲坠之信德，免陷于沉沦熄灭之灾祸。圣父乃我圣教有形之元首，基督群羊之善牧，与世俗帝王迥然不同。圣父对基督群羊，一视同仁，即处天涯地角，也蒙眷抚备至，或有迷失，则圣父伤恻，更甚于慈母之失子而急追其归栈焉；一旦失而复得，则慈心欣喜，必偕在天大父和诸神诸圣共欢庆也。正因圣父对基督羊群如此关怀，罪仆等铭感无涯，今我中国，不仅为一羊之失而竟有全群沦亡之虞，爰将中国教会今昔，泣呈始末，幸圣父垂察焉。

溯念 1581 年，耶稣会利公玛窦首先来我中华，以其精通历算，学贯古今，深受朝野士民以及皇帝器重，致四方有志之士慕名而来师事之。利公则乘机宣圣教传福音，循循善诱，因之即有多人皈依焉。名公巨卿翰苑中人，有追求真理者，将利公所著教理书携归，晨昏钻研，终于恍悟，受洗者亦不乏其人。利公博闻强记，颖悟过人，短短十年之内，不仅华语流利，即我

士大夫必读之中国经典，亦贯彻融通，且又著书立说，阐明教理，迄今教友犹珍藏其遗著，教外鸿儒亦喜爱而读之；且利公诸德俱备，平易近人，因之男女老幼，莫不喜与之接，乐闻其道而视若天神矣。

至与利公玛窦同会之其他诸公如汤若望、南怀仁、② 徐日升、戴进贤、巴多明和郎世宁等，或怀绝技，或擅巧艺，深得历代皇帝渥惠恩宠；郎世宁精工绘事，向邀皇帝宠异，帝或对朝贵愠怒，一经郎世宁求情，龙颜即为之霁释。皇帝固心许圣教之真，故钦赐传教自由，广布福音矣。综观从明神宗(万历)帝起迄大清康熙帝，百五十年间，耶稣会士联翩蒙受五位皇帝恩礼有加，晋官赐禄。原我中国官秩品级，文官九品，武官七品，一品官最高。汤公若望受顺治帝敕赐"通微教师"通政使司通政司，加一品又加一级，执掌钦天监印务，并恩赐建堂，赙置墓地。戴公进贤亦受皇帝宠信，任职历算馆，授五品，加二级叙礼部侍郎。南公怀仁更邀康熙信任，授三品工部侍郎兼钦天监执掌历局。巴多明奉命为钦差大臣，领兵部一品顶戴，出使俄国。际此圣教显赫之时，康熙帝又钦赐在和平门内建造圣堂一座，更在宣武门内拨帑藏再建一座，竣工后又御题"万有真原"横额，又御撰并御笔亲书"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对联。总之，我历代皇帝对耶稣会传教士之优渥恩宠，不胜枚举，兹不赘述，免扰宸聪。综以往事例观之，足证当时我天主圣教，正如旭日东升，晃朗弥高，信光普照全国，全民族之皈依圣教，亦已在望矣。

惜夫此后精通历算，和鸿博多技之耶稣会会士，不复贲

---

① 《中总》，第2卷第1章第6页。见本卷第81页。

② 原文为 Nan-tse，想是南氏之译音，当指南怀仁。——译者

临，皇帝之待教士亦不若往日之宠遇，致我圣教，时至今日，犹如日之已晡，不复映夺，尤其此间肩负重任之主教，老迈病弱，教会前途真如奄奄将暮。每念及此，罪仆等惟有仰天长叹，恸哭流泪，勤做苦功，补赎已往愆尤，俾在天大父化义怒为怜悯。罪仆等虽罪大恶极，但仰赖天主无穷仁慈暨至圣母童贞玛利亚大能之转求，以及圣父大力之扶助，满望有朝一日，重见昔日之盛况而我侪再获新生也。世间未来之吉凶顺逆，固智士亦难其必，然亦能预见其呈兆，如救主降生前之天下升平，救主亲谕宗徒之世末灾异。罪仆等似已隐约辨出我圣教即将复兴之端倪矣。盖有皇侄伯尔明祥阿殿下，在此困难岁月中常屑作圣教之保护人。彼同此间主教，依然情同意合，每月竟两、三次惠临主教府邸，畅谈天文历数和教理教义，并面允一旦大权在握，必将面奏皇上敦请西欧历数家来华，重振天文历数和钦崇真主等事业。罪仆等但愿其即将实现，因皇侄殿下已五次受命视察历局，彼诚为异口同誉为正直稳重之人，为此，罪仆等不断感谢广施恩泽之天主。窃念朕兆总呈现在顺逆之前，盖所以使人有所准备也。侧闻在澳门之泰西教士，通数学者仅一二人，而又非精于斯道者。为此，罪仆等哀恳至圣圣父及早简选，合乎我皇上所需之硕学鸿儒，早集澳门，庶几一旦钦命颁来，即可应召启程，良以从欧洲出发，旷日持久，夜长梦多易滋变化而坐失良机也。罪仆等泣求圣父早日派遣一如往日遴选比西热，① 汤若望，南怀仁等才学渊博之耶稣会会士，既能推算校正日月蚀之舛差，又能修理自鸣钟及制造圣器等多才多艺之人。为援助教友，维护信仰，更迫切需要传教士

① 原文Bi-si-je，可能是指毕方济。——译者

者，莫若距北京十天路程之江南① 教友，彼辈已逾十年未见神父矣。江南教友曾屡次不辞艰苦，跋涉千里来京吁请求主教，派遣教士前往，主教既不能拒不接见，而又手头无人可遣，只有善言婉劝："汝等该敬从主命，恪守规诫，以邀全能天主助佑"云云。主教如此反复之训诂，江南教友只有含泪盈眶，伏地哀恳，如主教不速遣教士，彼等誓不离去。主教年迈沉疴，目击此等情形，不禁心痛若割，泪流如珠，教友相与唏嘘，泪眼相对。主教由于悲伤过甚，事后竟连日食不下咽，寝不安眠，从此不复接见来访，只请代言人代见而已。除江南省外，其他府县，多已四、五年不见教士矣。数年来，教士中已有七位逝世，三位卧病，今在基督葡萄园中工作者，仅十人耳。往日京师城内传教士常有五、六位，目前仅存一人，且兼顾城外，以致城内有时只剩主教一人作守舍人。主教病且重，仅能在小堂献祭。昔日，罪仆等每年尚能四次领受告解，以涤除所犯之罪，今者连一次告解也难得矣！昔日城内有四座大圣堂，今只剩一座矣。倘若主教一旦逝世，则此仅存之大堂连同祭器经书以及教产等等，势必均将不保矣。

为此，罪仆等谨以赤子之诚，恳求普世教会元首，我等至圣圣父，众信友至仁至慈之善牧，速救我辈如拯孩提之于水火，如引迷途亡羊之回归基督羊栈也。如蒙圣父俯允所求，则无异赐罪仆等以希世之珍，出罪仆灵魂于幽谷而赋予新生焉。且圣父之恩泽，不独身受者没齿勿忘，即普世信友亦将歌功颂德于无穷也。为达到此目的，只有派遣才德兼优学问渊博之

① 原文为Nan-tu，当系"南都"的译音。南都为南京，转指江南省。但本卷第31页说是山东。——译者

耶稣会传教士为唯一捷径。盖此间王公巨绅，士人君子，以及邻国日本民族，对耶稣会会士超众之才德学问，俱记忆犹新且尊敬之为鸿儒者也。矧由宗座派遣来华，中华上下必将热忱欢迎。深信不久，帝国朝野，自宫廷以至茅舍，咸得接受基督福音，而圣教得以广扬矣。展望前途，无限光明，伏祈圣父垂察焉。

最后，我北京全体信友，恭吻御履，聆候纶音。

1833年圣神降临瞻礼，发自北京城内大堂。

前领南京主教，现任北京主教　　签押

皇侄伯尔明祥阿　　签押

附 录 三

1842年至1844年的最初教务记录[①]

耶稣会神父在中国施行的圣事：从1842年6月至1844年1月

付洗	婴孩	203	神工	4326	终傅 350
	成人	68			
补礼	婴孩	164	圣体	3706	坚振 88
	成人	47			
	降福婚配	51	补行婚配	42	讲道 627
	教理	375			

1844年经济收支情况

收 入	西班牙币*
从欧洲带来或哀矜的结余现存	1384
一年来收到的哀矜	616
	2000
新来教士带进，扣除开支后的余数约计	250
	2250

* 当地当时的通货单位为西班牙币（即鹰洋或墨西哥银元），每枚约合5法郎50生丁。

① 《中总》，第2卷第3章第18、27页。见本卷第153页。

支　出	西班牙币
修理或赎回房屋费	500
付家具	100
付两只船	116
付传教先生和工友工资	70
付为十位神父二位修士做的中式衣服	1444
	2230

下年度经济预算

1845 年初，我们的经济是拮据的，管帐神父为弥补赤字，向修道院借款。由于天主的照顾，不久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意外的哀矜，经济状况才有了好转。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预计当地究竟能有多少捐助。

1844 年南格禄神父任会长时的中国传教区情况

地区和住院	居　　民			新领洗者	
堂　　口	教友	异教徒	教外人	成人	婴孩*
浦　　东	10000	15	无数	64	110
浦　　西	6000	0	无数	5	27

* 婴孩一般不由司铎付洗，因他们多数长期四出奔走，居无定所，故指定受过训练的教友给婴孩权付。上表所列数字，仅仅是由传教士付的全礼圣洗。

1844 年(续表)

地区和住院	异教徒	神职人员		大堂	小堂
堂　　口	归化者	传教士*	本籍神父		
浦　　东	0	1	0	0	75
浦　　西	0	1	0	0	16

* 四规圣体：浦东 4099　　浦西 500

教区修道院于 1843 年创立，地处离上海六栾加(一栾加合四公里。这里写的数字和实际有出入。——译者) 的张朴桥，由于该处教友长期遭受教难，生怕受累，修院只得迁往别处。终于在离上海比较近、约两栾加的地方，找到一座(横塘)会口，那里有更新、更宽敞、更舒适的一座院子，可容纳更多的青年，最多可容纳三十人；在欧洲，这还算是个小数目，但对于长期遭受教难、目前稍有自由的地方，已算是个大数目了……这些青年都由教区经费供养，他们都自愿加入圣职，即预备当教区神职人员。

这些青年学生一开始就学习拉丁文，逐渐能讲、能写，并对教义有更深的造诣。由于传教士缺少，修道院只有一位神父包揽一切，因此学生们各方面的进步都受到阻碍。

南京教区修道院虽说是由我们中的一位会士在管理，但决不能认为是耶稣会的一所公学，因它绝对隶属于主教，由主教单独定夺一切、掌握一切和管理一切。但修生们也不作任何不进修会的誓言。

修道院目前是在横塘，横塘是属浦西本堂区的一所会口，

离上海约四栾加。

1844年，在我们传教区里正式工作的只有二个人，① 当时我们总共是三个人，一个人已给修道院整个占了去。

教区还没有专为耶稣会神父的住院，神父们只分住在各个本堂区，各本堂区有它被指定行使本堂职务的神父。每个本堂区又包括几所会口，各会口又各有自己的圣堂，更确切地说，那是些设在公所里的小堂；这些小堂都非常狭小，与其称为圣堂，不如称它为客堂或房间。之所以称为公所，因为是由本会口的教友们公共集资建造的。神父每次来到，就住在那里。

复活节领圣体数字尚难以计算，因为只有本堂神父亲来巡视本会口时，所行的告解领主才算是四规神工和四规圣体；由于传教士太少，每二年或三年才到一次，在此期间，比较热心的教友，有不少还办了神工。

劝化教外人的工作更为困难，因为传教士同教外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由于连续不断的教难，教友们直到如今，还是心有余悸；但假如传教士对教友们多加引导和鼓励，许多教外人也会通过教友而皈依圣教的。可惜传教士日日夜夜只是忙于教友之事，其他事情实已顾不到了。

① 这两位传教士中的一位，年内大部分时间又都用于建造两座住院（一座为主教，另一座为耶稣会），后因患了重病才告停止。

附 录 四

修道院修士宣誓式[①]

誓 文

江南省江南主教区，山东省宗座代牧区的耶稣圣心修院的青年学生，经考验合格后，该宣读的誓文。

我冯若望，父名保禄，母名亚纳，籍贯江南娄县。确切深知传教士责任之重大，仰赖天主扶佑，我切愿荣获神职。

我宣誓，我保证，我在修院时，在任何情况下，或学业有成，或中途离院，我决不进任何大小修会，并在修会中任职就业，若无传信部明文许可，亦不转往其他宗座代牧区或主教区领受神品，及担任教士之职。

我宣誓，我保证，我完全遵从目前由传信部授命为江南和山东教区主教之钧旨，在上级认为适宜时，领受各级神品和司铎之品。

我宣誓，我保证，倘若得蒙允准进入修会，或仍留教区任神职时，我将二年一次向传信部呈报我本人，以及我职守所在地之一切情况。

我宣誓，我保证，我将终身努力从事于圣部任命之主教，

---

① 《中总》，第2卷第7章第6页续。见本卷第166页。

及其管辖区内之工作，专务荣主救灵；并时刻准备绝对服从主教命令，为传布信仰或其他传教事务，或在江南，或去山东，甚至去任何地点，我必立即欣然前往，悉听主教支配。

最后我宣誓，我保证，我深切理解誓言，并谨守誓言，负担其约束，并将恪守不渝。

我谨手按圣经宣誓，伏望天主助我佑我。

宣誓者　冯若望

于 1847 年 9 月 18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江南传教史　第一卷
作者=
页数=394
SS号=10239212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原序
参考书目
第一部分　罗伯济主教时期（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８年）
导言
一、江南地区
二、江南教区的起源
第一章　１８４０年的江南教区情况
署理主教罗伯济
第二章　耶稣会被召重来江南
一、征召
二、选定首批传教士及传教士们到达澳门（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２年）
三、从澳门到上海
第三章　罗伯济主教时期的教区概况
一、刺萼尼使节来华之前（１９４２年至１８４４年）
二、从刺萼尼出使到松江教友事件（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６年）
三、教区内部纠纷和罗伯济主教离任（１９４６年至１８４７年）
第四章　教务细节
一、耶酥会会院
二、修道院
三、上海及其附近
四、崇明及海门
五、江南其他总铎区的教务概况和统计举要
六、山东教区
第二部分　赵方济主教和徐类思主教时期（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６年）
第一章　从赵主教任期开始到叛乱战争发生（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５２年）
教区历史概况
第二章　从赵方济主教任期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２年）
一、上海主教公署
二、徐家汇
三、修道院
四、松江府
五、崇明及海门
六、西区教务
七、成绩概要
第三章　从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到徐类思主教任期结束（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６年）
一、红头（小刀会）占领上海之前（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３年9月7日）
二、红头攻克和占领上海城（１８５３年9月7日至１８５５年2月）

三、教区内部历史
第四章　教务细节（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６年）
一、江南教区的七个总铎区
二、总结
附录一　北京教友吴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书
附录二　北京教友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奏疏
附录三　１９４２年至１８４４年的最初教务记录
附录四　修道院修士宣誓式
附录页